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9 772096 337230



03>

2023/2

统一战线学研究

二〇二三年第二册 / 总第三十八期 (第二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一、参考主题

- (一)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 (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 (三) 统一战线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研究
- (四)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五) 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研究
- (六)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防范与化解研究
- (七)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研究
- (八) “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
- (九) 国际社会热点事件的统战视角研究
- (十) 统一战线(含各领域)研究述评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对参考主题范围内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作者向我刊投稿，视为同意将文稿的汇编权、发行权、翻译权、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网络出版及信息传播权的专有使用权授予我刊。

三、基本要求

对符合如下基本要求的稿件，我刊优先审稿，审稿通过后优先刊用。

(一) 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鲜明体现大统战视角。

(二) 立题。问题提出部分要有精到、深入的文献综述，能开门见山地指出本文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一般不少于10条。

(三) 结构。论证框架合理，论文一般应有一二级标题，结构有相当的系统性。各级标题能够明确表达文章的主要观点和论证思路，内在逻辑严密。行文善于运用主题句、观点句。

(四) 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文法规范，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引文差错(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和参考文献著录信息)；无逻辑错误；坚持学术化表达和学理化阐释。

(五) 体例。论文须包含规范的题目、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著录及作者有关信息。参照《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和我刊已出版论文体例进行撰写和排版。

(六) 篇幅。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宏富，优秀论文不限篇幅。

(七) 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不高于15%。请作者慎重投稿：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八) 审稿周期。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欢迎作者通过投稿邮箱直接向本刊编辑部咨询有关情况。联系电话：(023) 62874725。

(九) 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十) 关于我刊。微信公众号：tyzxxxyj，全刊获取：<https://cqsy.net.cn/?Tongyi/Zhanxian/>。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3 年第 2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 委：王 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 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 俊
李 捷 杨 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 俭 张 建 张献生
陈 纪 陈 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罗振建 相德宝 袁 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 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夏晓华

主 编：何晓栋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3 年第 2 期（总第 38 期）

双月刊

2017 年创刊

第 7 卷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01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统一战线的两种范式及其历史性变革 / 路璐 李小宁
- 14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监督意涵及实践证成
/ 樊士博 徐敏
- 25 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 / 成利平 牛冬梅
- 34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团结奋斗视角
/ 杨玉文
- 45 迈向全方位统战：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历史发展与现实
镜鉴 / 李松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 54 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的特征、形势与方向 / 张冠华
- 65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百年演进与迭代升级
/ 郭雷庆 李新
- 81 “三心二意”的追随者：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
/ 周明 何舒雯
- 104 “台湾自决论”发展动向与学理批驳 / 薛佳贝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 中国终身教育学术研究数据库总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 115 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动向、风险与应对 / 张 梦 罗 昕
- 125 算法权力与未来民主：数字技术的政治效应及其规制
——基于《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的考察 / 曹克亮
- 137 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状与引导路径
——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 / 许科龙波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 148 论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合作：以匈牙利和美国为中心的考察
/ 严少华 李炳萱

研究现状与动态

- 161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题脉络与进路展望
——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 何 旗 王 婷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3 No.2(Sum No.38) Vol.7

-
- 01 The New Leap of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United Front—Two Paradigms of the United Front and Its Historic Changes Lu Lu&Li Xiaoning
- 14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umps out of the 'Two Answers'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Rate:the Meaning of Supervision and the Proof of Practice Fan Shibo&Xu Min
- 25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United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Cheng Liping&Niu Dongmei
- 34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Own Strength: Unity and Struggle Perspective Yang Yuwen
- 45 Towards an All-round United Fron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Realistic Mirror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Hong Kong Li Song
- 54 The Characteristics, Situation and Direction of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Zhang Guanhua
- 65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gainst Ethnic Separatism: Century Evolution and Iterative Upgrading Guo Leiqing&Li Xin
- 81 Followers of 'Three Hearts and Two Minds': Research on the EU's Xinjiang-related Position and Behavior Zhou Ming&He Shuwen
- 104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oretical Criticism of 'Taiwan Self-determination' Xue Jiabei
- 115 The Trends, 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Western China-related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Zhang Meng&Luo Xin
- 125 Algorithmic Power and Future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ts Regulation—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Power of Algorithms: How Do Humans Live Together?' Cao Kelian
- 137 The Status Quo and Guiding Path of Xinjiang College Students'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t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Xu Kelongbo
- 148 On the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of Right-wing Populism: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Hunga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Yan Shaohua&Li Bingxuan
- 161 The Theme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Visual Analysis—Based on Knowledge Graphs He Qi&Wang Ting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统一战线的两种范式及其历史性变革

路璐¹ 李小宁²

(1.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2.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传入中国百余年来, 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其重要标识之一就是统一战线的范式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统一战线有两种范式, 一种是经典“敌我友”范式, 一种是新型“共同体”范式。经典范式的核心理念是: 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必须正确区分敌我友, 团结朋友, 孤立敌人, 为夺取革命事业胜利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持。新型范式的核心理念是: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 执政的共产党应当把全体人民凝聚成一个共同体, 汇聚起克服各种社会矛盾、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磅礴力量。统一战线范式变革的理论逻辑是联盟固有的双重功能和党的历史方位转变。范式变革不是弃旧图新, 而是新旧兼容, 各有适用范围和侧重点。从实践逻辑看, 统一战线范式变革既是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 也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需要。统一战线两种范式各有适用范围,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适时调整范式, 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需要处理好的新课题。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统一战线; 范式; 敌我友;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2-0001-13

DOI: 10.13946/j.cnki.jcqi.2023.02.001

作者简介: 路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李小宁,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引用格式: 路璐, 李小宁.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统一战线的两种范式及其历史性变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1-13.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先后实现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1]。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战略和策略。从 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作出《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至今，党的统一战线已经走过了百余年历程。一百余年来，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也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其重要标识之一就是实现了统一战线范式的历史性变革。

此前，国内学界围绕“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百年发展”主题展开了研究。有的研究认为，经过百年发展，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从“联盟之术”走向“强国之道”^[2]。有的研究提出：“统一战线范式创新主要表现为人民共和、社会团结、软性治理等三个方面理念及话语的融合建立和协同发展。”^[3]本文力图从统一战线的经典范式和新型范式入手，阐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实践中发展变化的学理依据，揭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实质，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推动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对“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发挥“强大法宝”作用^[1]。

一、统一战线的两种范式

“范式”（paradigm）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首创的概念，指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即公认的理论模型或模式（pattern）。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是“范式转换”（paradigm conversion），是从一种范式转换为另一种范式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s）^[4]。自库恩之后，“范式”的转换和变革被广泛应用于描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2021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5]本文所称“统一战线范式”，专指统一战线的核心理念和理论模型；所称“统一战线范式变革”，专指党的统一战线历经百余年，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其核心理念和理论模型也随之发生转换。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范式有两种：一种是“敌我友”范式，另一种是“共同体”范式。

（一）“敌我友”范式

“敌我友”范式是统一战线的经典范式。这种范式的核心理念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争取自身和人类解放的斗争中，必须正确区分敌我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争取广大的同盟军，分化和孤立敌人，为夺取革命事业胜利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持。这种范式的理论模型可以表述

为：革命事业胜利的把握，正比于“无产阶级+同盟军”组成的革命力量，反比于资产阶级的力量。范式如下：

$$\frac{\text{无产阶级+同盟军}}{\text{资产阶级}} = \text{革命事业胜利的把握}$$

统一战线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战略和策略，从一开始就同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并以区分敌我为前提。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马克思指出：“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6] 恩格斯则提出：“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6] 315-316} 这个经典范式中，存在着敌我对立的两个阶级联盟，形成了敌我对立的两条战线：一个是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压迫者剥削者对付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战线；另一个是工人阶级的联盟，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反抗压迫者剥削者的战线。敌与我——各国资产阶级与各国工人阶级殊死斗争的两个联盟和两条战线，正是“统一战线”的本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统一战线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重要策略，其理论模型包括两个联盟。第一个联盟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自身的团结统一，包括一个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各种政治派别的团结统一，也包括世界各国工人阶级间的国际联合。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处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6] 435} 第二个联盟是无产阶级要争取广大同盟军，即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及其政党的联合。同盟军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自己人”，第二种是“同路人”，第三种是“敌人的敌人”。首先，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是“自己人”。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时指出，在革命还没有使农民“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6] 455}。如果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6] 769}。其次，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只是革命的“同路人”。马克思、恩格斯通常称城市小资产阶级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或“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他们指出：“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6] 499} “同路人”虽然是同盟军，但最终目标并不一致，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应当采取的态度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它们采取反对的态度。”^{[6] 556} 再次，资产阶级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同盟军，这种同盟军即“敌人的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

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6] 434-435

列宁时代的统一战线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策略，遵从“敌我友”范式。当时的“敌”是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各国资产阶级，“我”是国际无产阶级，“友”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东方各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列宁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统一战线”和“两种同盟军”的新模型。

“两个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是联合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统一战线。1919 年 3 月，在列宁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共产国际是各国坚持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国际统一战线组织。1921 年 12 月，以列宁的建议为基础，共产国际执委会制定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和关于对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人以及对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的提纲（“十二月提纲”），明确提出“工人统一战线，应该理解为一切愿意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的统一”^[7]。第二个是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列宁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把民族问题同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问题相联系，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920 年 6 月至 7 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8]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8] 280 中提出，要争取各被压迫民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这一策略集中体现为共产国际提出的一个新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8] 326 “两种同盟军”的第一种是直接同盟军。农民是无产阶级直接的可靠同盟军，“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背的地方”^[9]。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是无产阶级的直接同盟军，例如左派社会革命党，但“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9] 222，“无产阶级决不会忘记，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可能是可靠的民主派”^[10]。第二种是间接同盟军，即“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8] 180。两种同盟军分属三种类型：农民是“自己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革命的“同路人”；敌人营垒中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是“敌人的敌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同样遵从“敌我友”范式。毛泽东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1]毛泽东经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态度的分析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11] 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其基本模型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是革命的敌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工农联盟是“自己人”的联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两个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是动摇不定的中间力量，是可以团结争取的

革命“同路人”；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所依附的英美帝国主义为了自身利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属于敌人营垒中可以分化并争取的同盟者，是“敌人的敌人”。对于那些动摇不定的“同路人”，对于那些即便合作期间也从未停止反共的“敌人的敌人”，毛泽东告诫全党：“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11]⁹

中国革命的胜利充分证明，经典范式的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阶级状况是“两头小、中间大”。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要在这样的国度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首先正确区分敌友，尽可能联合一切中间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孤立和分化敌人。胡绳曾这样提出和回答问题：“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一个当然是靠武装斗争，再一个就是靠统一战线。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过来，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12]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把正确区分敌友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且在1939年提出“三大法宝”时，把统一战线排在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之前，作为“战胜敌人”的第一个主要法宝^[13]。

（二）“共同体”范式

“共同体”范式是统一战线的新型范式。这种范式的核心理念是：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执政的共产党应当把全体人民都团结在自己周围，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在当代中国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汇聚起克服各种社会矛盾、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磅礴力量。这种范式的理论模型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把握，正比于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全体人民（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同胞）组成的“共同体”的广度，反比于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挑战的烈度。范式如下：

$$\frac{\text{共产党} + \text{全体人民}}{\text{困难} + \text{风险} + \text{挑战}} = \text{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把握}$$

这种新型范式着眼于时代发展，把建立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政治基础之上的所有同盟者都视为“自己人”，着重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功能，着力于构建全民族的命运共同体。

统一战线的“共同体”范式肇始于邓小平理论。1977年5月，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4]。1978年3月，邓小平明确断言：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4]⁸⁹。1979年9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工人和农民是联盟，说明工、农是两者。过去把知识分子搞到另一个概念，新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劳动者。”^[15]这一系列新论断把我国广大知识分子重新定义为“自己人”，彻底破除了特定时期把他们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为统一战线范式的历史性变革创造了第一个重要契机。1979年6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

开幕词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年来社会阶级状况发生的根本变化，提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14] 185-186}。1980 年 8 月，他又补充了“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内容^{[15] 239}。至此，新时期统一战线不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不再是两大阶级殊死斗争的“战线”，而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的联盟。

统一战线的“共同体”范式孕育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2001 年 7 月，江泽民创造性地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群体称为“新的社会阶层”，定性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6]。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意味着广大新社会群体同工、农、知识分子一样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力量，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在此基础上，2004 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部分写道：“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段话在论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力量时，同时使用了两个不同的社会结构分析模型：一个是传统的“阶级/阶层”模型，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另一个是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四者”模型，即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阶级是成对的范畴：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有这一方，就有敌对的另一方。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消灭了资本家和地主，工人和农民已经是两个失去敌对方的过渡阶级形态，但这种分析模型本身仍然隐含着阶级差别和对立。“四者”模型则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四者”之间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远近、亲疏的差别，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力量。“四者”模型的提出和两种模型同时使用，是统一战线新型范式逐渐成形的阶段性标志。

2004 年 9 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2006 年 7 月，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统一战线重要而独特的作用^[17]。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已经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社会形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共同体。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包括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阶层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海内外同胞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统一战线能够促进所有成员在共同体内和谐相处。“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战线促进“五大关系”和谐的提出，是统一战线新型范式逐渐成形的另一个阶段性标志。

从邓小平理论关于知识分子是“自己人”的新论断和统一战线是“三者”联盟的模型，到“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新的社会阶层”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新论断和统一战线“四者”联盟的模型,再到科学发展观关于统一战线是“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的新论断和统一战线促进“五大关系”和谐的模型,统一战线新型“共同体”范式呼之欲出。

统一战线的新型范式生成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新理念并不局限于民族工作领域,而是普遍适用于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理论创新。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18]在这段论述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三个大团结”的精神纽带,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价值旨归。这既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郑重总结,也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史经验的郑重总结。

至此,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经百年,终于生成了新型“共同体”范式。《决议》同时指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18]“重要法宝”是毛泽东用来说明统一战线功能的中国化比喻,“克敌制胜”体现统一战线经典“敌我友”范式的功能特征,“执政兴国”体现新型“共同体”范式的功能特征。两个“重要法宝”并提,表明我国现阶段统一战线两种范式并存,且呈现出由“敌我友”范式向“共同体”范式发展的变革趋势。

二、统一战线范式变革的理论逻辑

统一战线范式变革的内在依据是联盟固有的双重功能和党的历史方位转变。统一战线本质上是一种联盟。联盟有双重功能:一是克敌制胜,二是安邦治国。通常,我们把联盟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政治力量(阶级、阶层、政党、民族乃至国家等)为了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19]。这种认识不单发生在中国,欧美学者也这样定义联盟。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一个典型的联盟一定是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特定国家集团的”,“假如敌人难以确定的话,任何同盟条约都将是行不通的”^[20]。另一位代表人物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指出:“结成经济或文化联盟可能仅仅是出于合作者国内的原因,并且是为了互利,而结成政治联盟却总是针对第三方。”^[21]

联盟具有克敌制胜的功能。对联盟的上述界定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历史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形形色色的联盟,往往是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联盟是周武王“八百诸侯会孟津”讨伐商纣王;历史上最著名的联盟则是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或东方六国联合起来抵抗强秦(合纵),或秦国联合某个国家征伐其他国家(连横)。欧洲历史上,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结成的“第一次雅典同盟”是为了抵抗波斯人的入侵;“第二次雅典同盟”则是雅典联合其他城邦共同抗衡斯巴达的霸权。现代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两大联盟之间:

同盟国对协约国，反法西斯同盟对轴心国。二战之后，两大国际政治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对立，造成了长达 44 年的冷战格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土地革命时期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是为了反对国民党新军阀；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联盟具有“安邦治国”的功能。除了上述种种常见的联盟之外，另有一类联盟不针对第三方，而是以执政者为主导，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结成执政联盟，其功能是“安邦治国”。这类联盟在古今中外也不乏实例。中国古代，西周天子与诸侯会盟，其功能在“讲礼于等，示威于众，昭明于神”，以对神明盟誓来约束各方行为，加强王室对诸侯的控制。秦汉以降历代中央王朝通过结盟的方式处理边疆、民族、宗教问题，运用缓轡羁縻、和亲联姻和崇释兴教等策略，实现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统治。欧洲历史上，古罗马的前三头（恺撒、庞培、克拉苏）同盟和后三头（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同盟也是基于统治庞大帝国需要的执政联盟。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不同于一般的联盟，除了具有策略性，更是党的长期战略，因此具有克敌制胜和执政兴国相统一的双重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功能以何为主，则由党的中心任务和历史方位所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方位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统一战线为阶级斗争服务，其功能突出显现为“克敌制胜”。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历史方位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突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其功能突显为服务“执政兴国”。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22]。构成这个联盟的“四者”，包括了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兴国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个联盟不再以反对某个特定政治力量为目标，而是要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把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都联合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23]**这一系列新的论断阐明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双重功能，这是统一战线范式历史性变革的内在依据：克敌制胜适用“敌我友”范式，执政兴国适用“共同体”范式。**

统一战线范式的变革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个学说是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部分。其出发点和实质，是把资本主义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指导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达到消灭一切阶级、一切剥削，进入无阶级社会，实现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俄国布尔什维克运用这个学说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中国共产党同样运用这个学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阶级斗

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科学性, 已经在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各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问题在于, 革命成功之后怎么办?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怎么办? 列宁在 1917 年曾经指出: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 “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9] 140}。这个论断是基于欧洲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阶级明显分化和两极对立的实际情况, 以及俄国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概括出来的。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我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既然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政权, 而且运用政权的力量和平赎买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 把他们逐步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阶级矛盾就已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 退居次要地位。正是从这个事实出发, 1956 年党的八大适时作出主要矛盾转化、工作中心转移的重大决策。随后,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遗憾的是, 由于随后国际形势复杂变化, 党对国内外形势做了过于严峻的估计, 阶级斗争再次被当作主要矛盾, 并且被扩大化、绝对化, 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受到这条路线的影响, 工人阶级应当团结的对象几乎统统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 统一战线最终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实践证明,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科学真理, 但在运用这个真理的时候不能把它当作固定不变的教条, 而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当我们从实际出发, 创造性地运用这个学说时,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辉煌胜利; 当我们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形势, 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以阶段斗争为纲”时, 社会主义建设遭遇了挫折, 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也遭到了破坏。

统一战线范式的变革不是弃旧图新, 不是相互否定, 而是新旧范式兼容, 各有适用范围和侧重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远未终结。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为了维护日益衰落的霸权, 拼凑新冷战联盟, 设置各种议题, 采取各种手段, 利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和宗教等议题干预我国内部事务, 支持“台独”“藏独”等势力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国内也有一些敌对势力与国际敌对势力遥相呼应, 散布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言论, 甚至从事危害性活动。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依然担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防范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的重大责任, 依然需要正确区分敌友, 团结朋友、战胜敌人, 不断夺取伟大斗争的新胜利。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的双重功能共存, 决定了“敌我友”和“共同体”两种范式相互兼容。正如近代物理学从经典力学范式转换为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范式后, 经典力学范式在宏观低速世界依然有效一样, 统一战线范式的历史性变革并不意味着经典范式退出历史舞台。

三、统一战线范式变革的实践逻辑

统一战线范式的历史性变革是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发挥强大法宝功能，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守正就是坚持正确的，创新就是调整过时的。统一战线两种范式各有适用范围，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适时调整范式，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需要处理好的新课题。

统一战线范式的变革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需要。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最新部署同 2022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概括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其中蕴含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要义，就是要适时调整范式，不再囿于“敌我友”的经典范式，不再把党外人士看作“一支消极甚至异己的力量”^[24]，而是要把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都当作“自己人”“一家人”，把全体中华儿女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只有这样，党才能“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已经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统一战线新型范式已经在各主要工作领域中得到实践。

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新范式新理念。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早已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25]。“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5] 123}中国共产党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干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的事业把各个政党凝聚成一个事业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是“自己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自己人”之间的合作和协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26]。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新型政党制度”。只有遵循“共同体”范式，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多党合作重要论述的思想精髓，才能准确把握“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才能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推动多党合作展现新气象、思想共识取得新提高、履职尽责展现新作为，更好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

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体现了新范式新理念。我国各民族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民族问题的实质不是阶级问题，也不是民族差异问题，而是不同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兄弟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一家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是增强文化认同, 建设各民族精神家园,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5] 15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7]只有遵循“共同体”范式, 把中华各民族看作“一家人”, 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才能在民族工作实践中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 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 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 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推动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体现了新范式新理念。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都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28], 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 同属一个“共同体”。只有遵循“共同体”范式, 把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都作为党的基本群众, 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以能不能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作为评价宗教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才能理直气壮地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才能旗帜鲜明地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有针对性地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 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文化; 才能坚持好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体现了新范式新理念。我国知识分子大部分在党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体制外新兴知识分子, 他们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都是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都是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只有遵循“共同体”范式, 把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当作“自己人”, 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重要论述, 才能切实“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29], 坚持“信任尊重、团结引导、组织起来、发挥作用”的思路^{[22] 21-22}, 把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党外知识分子都团结在党的周围,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体现了新范式新理念。1991年, 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就已经指出: “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 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者简单地类比和等同, 更不是要像五十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30]改革开放以来, 广大民营企业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 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 民营经济功不可没。2020年7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31]2023年3月6日,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 并参加联组会, 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 “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 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32]只有遵循“共同体”范式, 把民营企业家真正当成“自己人”, 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统战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不断增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共识,引导他们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体现了新范式新理念。“港澳同胞同内地人民一样,都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33]“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34]世界各地几千万海外侨胞“都是中华大家庭的成员”^[35]。除了“台独”“港独”及其他分裂国家的分子,广大港澳台同胞都是“自家人”。只有遵循“共同体”范式,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要论述,才能团结港澳同胞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能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才能围绕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主题,最大限度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来、发挥出来,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致力于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合作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2] 林华山, 龚静阳. 建党百年统一战线发展逻辑: 从“联盟之术”到“强国之道”[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1): 5-13.
- [3] 张伟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统一战线范式创新及其实践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3): 9-19.
- [4]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4版.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9-147.
- [5]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5月28日)[N]. 人民日报, 2021-05-29(2).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13.
- [7] 贝拉·库恩.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 第1册[G].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5: 432.
- [8] 列宁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15-222.
- [9] 列宁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60.
- [10] 列宁全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174.
- [11]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
- [12]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7.
- [13]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06.
- [14]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41.
- [15]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159.
- [16] 江泽民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86.

路璐, 李小宁.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统一战线的两种范式及其历史性变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1-13.

- [17] 胡锦涛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470-471.
- [1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G].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00.
- [19] 邓小平文选: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55.
- [20]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 [M]. 7版. 徐昕, 郝望, 李保平,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19.
- [21] 马丁·怀特. 权力政治 [M]. 宋爱群,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79.
- [22]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3-4.
- [23] 本书编写组.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4.
- [24]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 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学习讲座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5: 6.
- [25]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53.
- [26]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N]. 人民日报, 2018-03-05 (1).
- [27]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28]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12-05 (1).
- [29]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年5月17日) [N]. 人民日报, 2016-05-19 (2).
- [30] 江平. 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 下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550.
- [31] 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11月1日) [N]. 人民日报, 2018-11-02 (2).
- [32]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 [N]. 人民日报, 2023-03-07 (1).
- [33] 习近平. 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 (2018年11月12日) [N]. 人民日报, 2018-11-13 (2).
- [3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10月18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56.
- [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63.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 监督意涵及实践证成

樊士博¹ 徐敏²

(1.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2.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上海 200241)

摘 要：跳出历史周期率事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先后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政府”与“党的自我革命”。“人民监督政府”与“党的自我革命”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共同突显出鲜明的监督意涵。纵向来看，“人民监督政府”强调了人民监督重要性，“党的自我革命”更加注重党内监督的关键作用。横向来看，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具有整体性，前者对后者具有引领保障作用，而后者的有效发挥是推进前者的重要条件。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统筹治党治国关系的重要历史经验和重大政治优势。新征程上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在监督结构上发挥合力作用、在监督过程中实现内容贯通、在监督方式上优化联动机制，以“党的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政府”的协同互促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关键词：人民民主；历史周期率；自我革命；党内监督；人民监督；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3) 02-0014-11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2.002

作者简介：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徐敏，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的话语创新研究”（2022EDS003）；上海市学校共青团工作课题“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体系研究”（4-03）

引用格式：樊士博，徐敏.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监督意涵及实践证成[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4-24.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事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政治命题, 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针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大政治命题,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给出了两个答案: “人民监督政府”以及“党的自我革命”。从监督的角度来看, 前者强调人民监督的政治作用, 后者内蕴党内监督的重要意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 但如果不同有关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 就不能形成监督合力。”^[1]进言之,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内在要求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协同互促。

既有文献对一个“答案”的研究较多, 尤其是更多聚焦“党的自我革命”。有的学者探讨了“第二个答案”的哲学基础^[2], 关注到了“第二个答案”的话语逻辑^[3], 并对“第二个答案”的实践性转化进行了考察^[4]。此外, 在“两个答案”的相互联系上, 学者们聚焦演进逻辑、逻辑关联、互促机制三大论题。在“两个答案”的演进逻辑方面, 有学者认为, 延安时期“窑洞对”提出的“第一个答案”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及政治内涵, 新时代成功探索出“第二个答案”也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据和现实启示^[5]。在“两个答案”的逻辑关联方面, 有学者指出二者理论同源、一脉相承、相辅相成, 贯穿于走好“赶考”之路的伟大历程之中, 深化于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的良性互动之中^[6]。也有学者注意到, “人民监督”强调外部动能和外部约束的重要性, “自我革命”则强调自律自为、内部动能的重要性^[7]。在“两个答案”的实践要求方面, 有学者认为, “应推动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贯通协同、党内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相互促进、党的自我纠错与外在纠错衔接协调, 在‘两个答案’相互促进中凝聚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合力”^[8]。

学界已从多个层面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进行了深入研究, 但多数研究侧重于“两个答案”提出的合理性阐释与理论性证成, 缺乏现实性转化的具体研究。特别是, 学界对“两个答案”之间关系的研究缺乏特定视角。虽然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两个答案”的监督意涵, 但对“两个答案”与监督效能的内在关系未进行清晰勾勒, 对于如何在推进多种监督相互互通过程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更是鲜有涉及。鉴于此, 本文运用监督视角, 梳理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实践进路。

一、内外监督: 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共同关注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 离不开党的建设诸方面的有效配合。其中, 建构科学、合理的监督体系是这一伟大工程的关键环节, 也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命题

1945 年抗战胜利在即, 为推动国共合作, 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赴延安考察访问。在此期间, 黄炎培向毛泽东谈到: “一部历史, ‘政怠宦成’的也有, ‘人亡政息’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 我略略了解了, 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 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9]这是历史周期率问题提出的基本情由。毛泽东与黄炎培纵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 中国共产党尚未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这一时期民主人士主动

谈及这一问题表明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赢得其他民主力量的支持与拥护。历史周期率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权所呈现出来的兴衰治乱、朝代轮替的周期性现象。回顾中外历史长卷，确有无数政权或政党难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魔咒。然而，之所以是“周期率”，而非“周期律”，就是因为其并非历史的铁律，而仅是政治的概率。跳出历史周期率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实际上，历史周期率直指政党执政的时间性特征，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回答好的重大问题。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构成中国共产党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命题。跳出历史周期率关乎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绩与效果，是衡量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党建国家的历史逻辑也决定了党的事业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间联系紧密。党兴则事业兴，党强则国家强。只有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时代性课题，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第一个答案”强调人民监督

70 多年前的延安窑洞里，面对黄炎培所提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困惑，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9] 611}“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而兴、依人民而盛的底气。这里的“政府”实际上指广义上的政府，泛指中国存在的政治实体。当前，中国 95%以上的领导干部、80%的公务员是共产党员^[10]。据此而言，“人民监督政府”实际上蕴含着人民监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意涵。“人民监督政府”突出强调人民监督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监督旨在激活多元主体，使广大人民有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并通过民主参与实现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人民监督包括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侧重于外部力量对于执政党的监督。这些监督在规范政治生活、约束公权力使用上发挥重要作用。

“人民监督政府”思想立意高远，监督意涵跃然纸上。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群众，只有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党和政府，才能真正实现人民民主，进而突显“监督民主”的价值意蕴^[11]。其次，人民群众产生的监督效力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毛泽东之所以对依靠人民监督跳出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正是源于党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深刻认识。百余年来，正是牢牢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党才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最后，“人民监督政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底色。“人民监督政府”不仅仅是一种避免政治懈怠和人亡政息的具体方法，更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忧患意识^[12]，它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群众力量的敬畏与信任。

（三）“第二个答案”注重党内监督

面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党治理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郑重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一个政党之所以会丧失执政地位，之所以会酿成人亡政息的悲剧，就是因其忽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一旦忽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就会埋下因小失大、盛极而衰的隐患。当问题越积越多，政治形势便会积重难返，政权崩盘也就在劫难逃了。一贯重视历史、熟稔王朝兴衰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对跳出历史周期率保有充分关注。中国共产党具有敢于刀刃向内、祛除自身弊病的优良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

樊士博,徐敏.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监督意涵及实践证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4-24.

敌。”^[13]党的自我革命指的是将革命的矛头指向党自身,不断推动党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勇于、敢于、善于自我革命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内在原因。

自我革命与党内监督联系密切,互为表里。一方面,党内监督是自我革命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14]自我革命旨在将党自身存在的消极性因素剔除出去,而这些消极因素在不断强化的党内监督中注定无所遁形。另一方面,党内监督是自我革命精神的生动彰显,党内监督意味着监督主体与监督客体具有一致性,而这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高度一致。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蕴含着党内监督的深刻意涵。

二、问题共答: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逻辑理路

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辩证关系根植于中外政党监督理论的滋养之中,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治理过程之中,淬炼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之中,彰显出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一) 理论逻辑:政党在内外监督中实现革命性锻造

权力监督是政党治理的核心议题,涉及用权是否任性、是否规范、是否谨慎。用权必受监督,政党只有接受多方有效监督,才能在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上运转。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如何监督权力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产生了以分权制约权力的思想。18世纪,孟德斯鸠更是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15]他认为,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采取分权与制衡的方式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基于人民主权理论,卢梭认为无论是何种分权都无法彻底保障人民主权不受侵蚀,权力监督的目标指向在于将权力回归于人民。从这些监督思想的发展脉络中不难体察到,西方国家的政府与政党对于权力有限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将分权制衡奉为圭臬。这一传统为近现代西方政党监督理论与实践打下了烙印。

西方政党权力监督的重要特征在于政党政治中的权力相互制衡。故而,西方国家多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在这一制度背景下,政党以获取选票为出发点,以选举获胜为终极追求,以期上台执政对其他政党形成制约。西方国家的政党通过在议会中建立党团发挥监督作用,往往运用立法权、议案审议权以及质询和听证制度来对政府和执政党进行牵制。如果说党际监督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是西方政党权力监督制约的重要方式的话,那么西方国家政党的内部监督则显得相对涣散。这是由西方国家政党本身的性质特征决定的。西方国家政党对自身的监督更多是为了换取选民的信任,以便扩大选举优势。在实践中,由于西方国家政党具有典型的“部分性”特征,其对政府和其他政党的监督容易沦为“为了监督而监督、为了反对而反对”。显然,这种内部监督具有典型的功利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政党与国家权力监督,并强调权力监督的阶级属性。马克思从国家理论出发,认为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实质在于阶级统治的产生。国家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公权力的运行具有阶级统治性质,因而必须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如何防止“社会公仆”蜕变成“社会主人”?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时期的人民监督公社方案多有称赞,

并强调选举权与罢免权是人民实现有效监督的前提条件。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对党内监督也颇为重视。恩格斯强调：“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16]列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监督与党内监督的思想。他明确指出：“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17]所谓自下而上的监督实际上指的是人民监督。除了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外，列宁还高度重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并在实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1920年，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提议成立党内专门的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这一决议明确规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目标和组织、制度框架，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得以强化。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一贯自觉接受内外监督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党内监督问题。党的一大十分强调纪律对约束、规范党组织及党员行为的重要性。党的二大开始探索特派员制度，明确特派员的监督功能，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党内权力运行。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最早的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监察委员会，标志着党内监督机构起步发展。1928年和1931年党中央分别颁布《巡视条例》和《中央巡视条例》，极大地推动了巡视制度的发展。除了高度重视党内监督作用外，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也逐渐意识到党外监督的重要性。他特意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18]苏维埃建设过程中，党建立了中央工农检查部，其内设控告局等机构，自觉接受党外监督。延安时期，毛泽东更是强调发挥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联动作用，提出了“内外夹攻”的思想：内靠整党整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外靠人民监督，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毛泽东同时指出：“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不断推动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协同并进，迅速建立起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内监督机构的完善，为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确保中心工作有序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明确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20]在党内监督方面，毛泽东认为批评是“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21]，必须要形成浓厚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氛围。在外部监督方面，邓小平更是直接指出，中国共产党“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22]。党注重以运动化的监督态势遏制党自身的腐化现象，在“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党号召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此外，党不断提高外部监督的制度化水平：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形式使政党之间的监督实现了制度化；在中央人民政府内部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建立了国家最高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为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畅通了组织化渠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力图构建权威高效、全面覆盖、内外联动的监督体系。对于外部监督而言，党逐步推动外部力量监督的制度化、常态化、科学化，既依靠群众又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避免运动式监督带来的无序状况。在党内监督方面，党的认识也实现了从阶级斗争视域向制度建设视域的转化，制定出台了《中

樊士博, 徐敏.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 监督意涵及实践证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 14-24.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一系列党内法规, 夯实了党内监督效力, 党内监督的制度化水平全面提升。

(三) 实践逻辑: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要求发挥监督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大党独有难题”^[23]的新命题, 明确了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问题指向,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战略自觉。随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用六个“如何始终”进一步阐释了这一命题的内涵^[24]。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必须用好监督利器, 释放监督合力。^[25]依靠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必须发挥党内监督的重要作用。此外, 党员干部要切实为民用权、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和廉洁用权, 同样无法离开人民监督作用的发挥。

第一, 大党之大不仅体现在数量上, 更体现在胸怀和担当上。初心永恒, 使命光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和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 使命无上光荣。担当好责任, 履行好使命, 就离不开多方力量的督促。第二, 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 是党的无价之宝。只有实现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团结统一, 才能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进而迸发出强大的干事创业动能。截至2021年底, 中国共产党是拥有9600多万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党, 超大规模政党要想实现步调一致, 必须要以最严格的纪律和规矩规范组织行为。纪律和规矩的遵守同样离不开有效的监督。第三,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风险考验接踵而至, 党所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长期存在。对此, 党只有自觉接受各种力量的监督, 才能保持政治清醒和自觉, 进而提升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第四, 作为拥有70余年执政历史的大党老党,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愈是老党大党, 愈加需要警钟长鸣, 永葆踔厉奋发的精神状态。第五, 超大规模政党极易滋生不良的风气, 进而损害党的健康肌体。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超大规模政党建设逻辑的内在要求。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风的集中统一。只有在全方位有效监督的锻造下, 才能构建出良好的政治生态。

三、相互贯通: 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监督协同

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辩证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之中。二者之间具有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内在关联。正确认识这种关联是发挥监督合力的重要基础。

(一) 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具有整体性关联

“国家权力来自人民, 并由人民整体共同掌握。”^[26]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具有整体性特征, 这决定着权力监督同样要具有整体性特征, 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由此而言, 党内监督根源于人民监督, 党内外的各种监督力量之间不存在相互抵触的关系。与之相反,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监督体系存在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结构性弊病, 各种监督形式仅是各类不同政治势力斗争的工具, 监督政治已然成为分权对抗的“游戏”。我国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之间的整体性关联集中体现在靶向一致性、效用全面性、价值契合性三个方面。

第一，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具有靶向一致性，二者共同指向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只有靶向一致，才能行之有效。政党权力监督旨在消除党内存在的与自身先进性、纯洁性要求不符的消极因素，真正实现廉洁用权。无论是党内监督还是人民监督，其目的都在于破除党内存在的不良之风，夯实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党内监督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具有多种方式，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锻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生命之源。”^{[14] 185}若要实现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严整不良之风，祛除积弊流弊。人民监督主要是指党外力量对政党的监督。党和人民息息相关，党内若滋生出不良之风，必然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疏离党群关系。因此，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之间虽然动力机制有所不同，但是作用靶向却高度一致。这也是实现监督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前提基础。

第二，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的重要实践取向就在于实现监督效力的全覆盖。“它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实现对权力的无缝隙监督。”^[27]无论是人民监督还是党内监督，其在理论上都无禁区，没有例外，但在实践中仍存盲点。对于党内监督而言，其对监督对象的生活作风尤其是“八小时以外”仍需加强有效监督，而这恰恰是人民群众监督的有效范围。党内监督处在决策过程的上游，对于决策执行的具体过程存在鞭长莫及的问题，写好监督的“后半篇文章”，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日常性监督。对于人民监督而言，有些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事项受到保密原则限制，因无法触及而必须采取党内监督的形式。此外，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监督重点也不相同，前者的重点在于政治监督，而后者的重点是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因此，只有实现二者衔接，才能保障监督效力的全覆盖。

第三，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的协同发力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涵。作为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的民主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其中，民主监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一环。没有充分的监督，就难有真实的民主。在某种程度上说，“监督”同样也是一种民主形态。党内监督是党内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民监督是人民民主的重要构成，推进二者的协同互促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

（二）党内监督对人民监督具有引领保障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必须坚持党对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统一领导。在这一过程中，党内监督对人民监督具有引领保障作用。具体而言，党内监督在方向引领、文化构筑、权威保障三个方面对人民监督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党内监督确保人民监督的政治方向。人民监督具有主体多元、力量巨大的优势，但也可能存在碎片化、滞后性等不足。人民监督若得不到良好的引导，反而可能会被敌对势力利用。人民群众由个体组成，个人的监督素养参差不齐，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势力所蒙蔽。因此，党内监督在同人民监督互动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群众监督的引导，使群众监督过程在政治方向、政治道路、政治原则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党内监督的良好氛围带动提高人民监督的实效性。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素养与能力存在不均衡状况，与新时代新征程对人民群众的要求并不完全相符。中国共产党必须着力营造浓厚的监督氛围，坚持以党内监督带动人民监督。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巨大的监

樊士博,徐敏.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监督意涵及实践证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4-24.

督潜能,但这种潜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它依赖于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部分群众对监督的对象、方式、渠道仍不甚了解。有鉴于此,必须发挥党内监督的示范效应:通过党内监督的带动作用,充分吸纳人民群众有序衔接党内监督的相关领域、环节和链条,充分锻炼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能力。

第三,党内监督为人民监督提供权威性支撑。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其作为无行政权力依托下的监督形式,极易形成碎片化监督,监督效果往往不如人意。因此,党内监督要通过人员、机制、影响力的渗透与融通,不断增强群众监督的权威性。

(三) 人民监督对党内监督具有促进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28]党内监督的深入开展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充分参与,这是由党内监督的自身限度决定的。尽管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在监督主体、监督内容和监督手段上存在差别,但二者的根本出发点皆是更好发展人民民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者的有效结合能够补强党内监督的功能,切实增强党内监督的有效性。

第一,人民监督夯实了党内监督的覆盖边界。党内监督的覆盖范围具有边界性。政党权力的运行体现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既渗透在组织生活当中,也大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好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要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作用。换言之,必须唤起人民群众对党政机关的有效监督,才能真正实现监督效力的全覆盖。

第二,人民监督拓展了党内监督的信息来源。党内监督的信息获取具有有限性。党内监督并非仅仅是囿于党内空间的针对党员干部的封闭过程,而必须依赖于外部有效信息的支撑。人民群众是权力监督的主体,只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才能织密权力监督之网,使党内监督获得更多有效资源。

第三,人民监督实现了对党内监督的“再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党内监督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成了一句口号。”^{[14] 185}如何保障党内监督权落到实处直接影响监督效果。党内监督本身作为一种权力运作过程,同样需要被监督。只有发动人民群众对党内监督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才能防止出现监督的形式化问题。

四、互促共进: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监督合力

跳出历史周期率需要发挥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协同作用。具体而言,二者要在结构上发挥合力作用、在过程上实现内容贯通、在方式上优化联动机制,推动“人民监督政府”与“党的自我革命”之间的互促共进。

(一) 结构上:发挥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合力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3]党内监督是以党内法规为基本遵循,而人民监督的依据则是国家法律。两种监督的文本依据不同,因此必须借助合理的监督机制构建合力。充分增进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内在统一,要求对党内外监督力量进行系统衔接,明晰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的不同地位及功能,构建监督合力。

具体而言，要协调好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之间的功能关系。一方面，发挥党内监督的主导作用。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发挥党内监督的主导作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员干部分布在各个领域的公权力岗位上。公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以有效的监督保障权为民所用。党内监督嵌入公权机关内部，这种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方式最具威慑力。另一方面，发挥人民监督的重要作用。相比较于党内监督有专门的文本条例，人民监督则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发挥人民监督的重要作用，就要不断完善人民监督的法理基础，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规中关于人民监督内容的有效衔接。

（二）过程上：推动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内容贯通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姓公，也只能为公，必须为民所用，而不能为私所用，或为小集团所用。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推动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协调统一。其中，监督内容的统一是其内在要求。

党内监督的诸多内容具有明确指向，人民监督则范围更广。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明确了党内监督的八个方面，分别是：遵守党章党规，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模范遵守宪法法律情况；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全党令行禁止情况；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情况；坚持党的干部标准，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情况；廉洁自律、秉公用权情况；完成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部署的任务情况。上述八个方面基本涵盖了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人民监督同样应该聚焦党内监督的主要方向，集中发力。值得注意的是，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之间的内容贯通，并不是要实现党内监督内容与人民监督内容的重合。对此，要寻求两者结合的突破口，实现内外监督协同效能的最大化。

（三）方式上：优化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联动机制

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成熟、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健全科学规范、内外联动的监督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委（党组）要发挥主导作用，统筹推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辩证统一正是释放监督合力、发挥监督效能的重要体现。

第一，构建监督信息共享机制。信息占有是实现充分监督的前提。信息掌握的数量多少、程度深浅直接关乎监督的质量高低。在当前监督实践中，党内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各自构成了运行闭环，二者形成合力仍有强化空间。因此，应逐步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和党务公开制度，借助互联网等媒介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布信息，为人民监督提供切实渠道，进而构建起互通有无的监督协同机制。

第二，构建监督职权协作机制。党内监督主体要采取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呼声，关照人民群众意愿，进而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有效协作。应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等党内监督机构与人大、政协等机构之间的联系。统一战线领域涉及人民政协监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和特约审计员等多种监督形式。为此，要妥善处理党内监督职能同统一战线监督职能的衔接关系，进一步强化统一战线的监督职能。

樊士博,徐敏.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监督意涵及实践证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4-24.

第三,构建监督成果运用机制。2022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29]监督仅是手段,目的在于在建立规范制度体系,保障权力运行。要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结果与人民监督结果的公开机制,促进监督结果的运用与转化,推动监督结果落到实处。

五、结语

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30]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不仅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主导性作用,也要充分释放人民群众监督的力量,并推动二者的有机结合。实现“人民监督政府”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统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政治命题得出的重要经验。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必须不断推进两种监督的融通互促,不断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充分释放监督合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17.
- [2] 顾红亮.“第二个答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43-50.
- [3] 董振瑞.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论述研究述评[J].党的文献,2022(4):14-25.
- [4] 韩喜平,姚治,何柏岐.坚持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J].思想教育研究,2022(4):3-10.
- [5] 杨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之间的演进逻辑[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8):30-39.
- [6] 韩振峰,米亨.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及其内在统一关系[J].求实,2023(1):4-14.
- [7] 丁忠毅.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辩证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8):74-82.
- [8] 吕永祥.深刻理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J].理论探索,2022(5):52-60.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10-611.
- [10] 肖培.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N].人民日报,2019-12-16(9).
- [11] 刘俊祥,曾森.人民监督权力:论发展社会主义监督民主的理论逻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3):1-10.
- [12] 张桂林.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公权力监督思想研究[J].政治学研究,2022(5):49-60.
- [13]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164.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86.

- [15]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 上 [M]. 张雁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154.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07.
- [17] 列宁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06-507.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11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06.
- [19]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10.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9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121.
- [21] 毛泽东文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406.
- [22] 邓小平文选: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71.
- [2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4]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3-01-11 (1).
- [25] 樊士博, 齐卫平. 大党独有难题的内涵解析、破解之道及其理论意义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 (2): 62-68.
- [26] 林尚立. 论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J]. 政治学研究, 2016 (3): 2-12.
- [27] 杨俊, 肖高华. 建党百年来党内监督的历史演变、特征与启示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1 (2): 24-28.
- [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511.
-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549-550.
- [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47.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

成利平 牛冬梅

（海军军医大学 政治理论教研室，上海 200433）

摘 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充分认识团结奋斗的重要意义，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团结奋斗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凸显了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重要性。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攻坚克难的重要法宝、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实践路径涉及基本前提、重要基础、根本动力、必要方式等方面。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团结奋斗，要求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强化共同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只有这样，团结奋斗才能产生无穷的吸引力、汇聚磅礴的向心力、激发伟大的创造力、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团结奋斗于当今世界是一种宝贵的稀缺资源。中国的团结奋斗说到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展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统一战线；中华儿女大团结；伟大斗争；新时代新征程

中图分类号：D261；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2-0025-09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2.003

作者简介：成利平，海军军医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牛冬梅，海军军医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教授。

引用格式：成利平，牛冬梅. 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25-33.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团结奋斗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全篇。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团结奋斗”列入党的代表大会的主题并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题目。报告在第三部分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报告再次强调:“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1]报告专门指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 39}报告结尾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报告把团结奋斗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凸显了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2]。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需要全国上下团结奋斗。”^[3]

此前,学界对“团结奋斗”进行了一些研究阐释。有学者认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持续团结奋斗,持续团结奋斗是前进道路上目标的宏伟性、任务的艰巨性和形势的复杂性所要求的^[4]。有学者认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强调团结奋斗,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针对现实问题的需要,对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5]有学者指出:“团结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品格。”^[6]总体上,现有成果对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研究,主要是从现实需求的角度聚焦实践意义,或是从党史发展的视角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理论意蕴的阐释还有待全方位、多角度的细化研究,对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实践路径也需进行系统梳理。鉴于此,本文聚焦分析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路径。

一、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理论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7]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奋斗精神的继承,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优良传统的弘扬。团结奋斗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攻坚克难的重要法宝。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离不开团结奋斗。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1] 26}新时代新征程需要应对的国内外风险挑战、防范化解的矛盾冲突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严峻复杂,对团结奋斗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 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

在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们祖先形成了伟大的团结精神和奋斗精神。团结奋斗精神让我们的先人得以战胜自然、天灾和异族入侵而不至灭亡,生生不息不断繁衍。团结精神和奋斗精神早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中华儿女的基因里,流淌在血液中。“团结精神和奋斗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内容。”^[8]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和一盘散沙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几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为恢宏的史诗。团结奋斗深深地熔铸和彰显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和践行的伟大建党精神之中。

成利平,牛冬梅.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25-33.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不是对一个两个优秀共产党员的身影和精神的形象概括,而是对千千万万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气质和风骨的生动写照。在党的理想和信仰之光照耀下,团结起来不懈牺牲奋斗的一大批人前赴后继,与人民群众一道创造了历史伟业。单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从精神上团结起来的群体的爆发力是惊人的。由中国共产党这样先进群体团结带领中国广袤土地上数万万人民的接续奋斗,在人类历史上上演了一幕幕史诗级的话剧,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从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改天换地的新中国成立,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壮举,再到惊天动地的新时代伟大变革,这些都是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鲜活印记与历史证明。

（二）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攻坚克难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7]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来的。新时代十年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团结就是力量,奋斗才能胜利。团结奋斗也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要诀。正是因为始终围绕明确目标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才能由建党初期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9600多万名党员,由最初十几个人组成的地下革命党,发展到当今世界第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百余历程中,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重要战略。早在1939年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的经验时,就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9]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其中第九条就是“坚持统一战线”,再次强调了统一战线是凝聚团结奋斗力量的重要法宝。

（三）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²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在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10]。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11月1日零时我国人口总体规模已经达到14.43亿人^[11]。带领如此规模庞大的人口实现现代化,其本身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堪称史诗级别的现代化。这一过程注定是艰巨复杂的,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共同富裕更是世界性难题,即使目前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没有找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子。我国虽然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然一定程度存在,实现共同富裕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此外,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避免西方现代化过

程中的物欲膨胀、精神贫乏、人的异化，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如何在保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不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如何在崛起的过程中避免与外部的冲突等，都是摆在我国现代化面前的世界性难题。破解这些难题，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上下同心万众一心团结奋斗。

二、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必须系统回答好四个重大问题：团结在谁周围，拿什么来团结人，团结奋斗要干什么，团结奋斗如何干，即团结奋斗的基本前提、重要基础、根本动力、必要方式。这四个方面是新时代团结奋斗的实践路径。

（一）团结奋斗要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12〕}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要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要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让党成为风雨来袭时全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这样团结奋斗才能产生无穷的吸引力。

第一，以“两个维护”捍卫党在政治上的团结统一，凝聚党的内部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7〕49}政治上的团结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的基础，也是直接决定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的关键。新时代党要真正做到高度团结统一，首先要加强政治建设，全体党员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新时代十年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始终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党才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团结奋斗就有可靠的主心骨。新时代新征程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要求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用“两个维护”捍卫全党在政治上的高度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带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达到一个内部与外部双向的团结统一。

第二，以“三个务必”保持赶考路上清醒和坚定，增强党的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1}“三个务必”既是中国共产党过去团结带领人民走好赶考路的宝贵经验，也是未来党继续带领人民团结奋斗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现实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全体党员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历史自信，把准历史方位，增强历史主动。过去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不代表未来，前进道路上依然有不少困难和阻力，全党对此要有充分的估量，必须时刻牢记“三个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种重担在肩的工作职责。走的再远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更何况我们还远未达到终极目标，绝不可以有松口气、歇歇脚的念头。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一种纯朴优良的工作作风。今天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奇迹，但是这绝不是骄

成利平,牛冬梅.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25-33.

傲自大、洋洋自得的资本。我们始终要有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危机意识,绝不可躺在功劳簿上止步不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一种无畏前行的工作态度。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要随时准备经受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第三,以“自我革命”淬炼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党的生机活力。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13]自我革命是淬炼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锐利武器。自我革命要有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决心和韧劲。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1] 69}腐败是侵蚀党健康肌体的最大病原体。腐败本身破坏了党的风气,败坏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而且腐败也会导致党内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阳奉阴违等不良现象的滋长,造成党的软弱涣散不团结,损害党长期执政的根基。腐败最容易伤害干群关系,造成党与人民群众离心离德。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腐败是人民群众与党员干部之间一堵无形的墙。腐败会把党推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因此,要继续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强高压、长震慑、建制度,在头脑中筑起不敢腐的带电高压线,在实际工作中织密不能腐的网格线,在思想上拉上不想腐的警戒线,坚决斩断腐败链条。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1] 68}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要继续坚持和发扬好我们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作风,力戒群众反感和痛恶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二) 团结奋斗要强化共同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

心往一处想,劲才能往一处使。从精神纽带和思想认同上形成的团结才是牢不可破的团结。培植好共同的精神纽带和统一的思想基础,这是团结奋斗的重要基础。这样,团结奋斗才能汇聚磅礴的向心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现阶段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4]

第一,筑牢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15]党员干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既是全党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也是全党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坚定理想信念也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了,内心精神世界丰富了,思想追求高尚了,就会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心上,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看淡外在的物质享受,自然就能做到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坚定的理想信念既是维系全党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也是促进全党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16]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17] 190}“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7] 144}因此,团结奋斗先要筑牢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根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特别是要把握好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

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坚持’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科学方法及精神品格，是一个联系紧密、相互支撑的逻辑整体，也是这一科学思想的精髓要义和活的灵魂。”^[17]

第二，凝聚最广大人民思想共识。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一经提出，迅速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梦喊出了近代以来中华儿女深藏心底的最大心愿，说到了每个中华儿女的心坎上，抓住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8]要用中国梦铸就当下中国人的信仰，凝聚最广大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在表达当下中国人信仰的确立上，没有哪个范畴能像中国梦这样具有理想性与执著性的信仰意蕴；在表达当下中国人信仰对象上，没有哪个范畴能像中国梦这样具有崇高性和凝聚性；在表达当下中国人信仰方式上，没有哪个范畴能像中国梦这样具有超越性与神圣性。”^[19]中国梦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最大同心圆。中国梦最大程度地把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个人的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中国梦就不会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与每个人的人生与命运紧密相连、休戚相关的人生信仰与奋斗目标。“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7] 554} 培植好中国梦的深厚土壤，还需要在全国全社会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也是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割不断的“根”和“魂”，也是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历尽灾难而始终傲然屹立的重要精神支撑。要通过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三）团结奋斗要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团结奋斗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时刻牢记团结奋斗是为了人民，团结奋斗需要紧紧依靠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8] 1-2}，“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 19}。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过程中，既要着眼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同时又要落脚于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现实利益、物质利益。这样的团结奋斗才能激发伟大的创造力。

第一，团结奋斗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20]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人民群众眼下的急难愁盼着手，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让人民群众有沉甸甸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守护好人民的心，这样人民才会愈发紧跟党走团结奋斗。“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

成利平,牛冬梅.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25-33.

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21]“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2]人民群众是团结奋斗最根本的动力,团结奋斗先要赢得人民、赢得人心。

第二,团结奋斗要统筹规划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人民对生活‘美’和‘好’的追求具有高端性、全面性、动态性、差异性。”^[23]这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团结奋斗需要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处理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兼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就必须协调人民内部各种利益关系,努力实现人民整体利益、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24]统筹协调利益关系,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来整体把握平衡,做好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权衡利弊,统筹推进。

(四) 团结奋斗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一致、敢于斗争。力量源于团结。这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大仗一个接一个,每一仗都是靠全体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斗争闯过来的。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只有全体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不断夺取新的更大胜利。”^[25]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道路上,要正视风险、不惧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团结奋斗的必然方式。这样团结奋斗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第一,要辩证把握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团结是我们追求的理想效果,但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用矛盾分析法来看,团结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而且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就要求我们用联系、发展、全面的眼光来对待团结,辩证把握团结与斗争的关系。

首先,讲团结敢斗争。敢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26]求解放,必须敢于斗争。恩格斯说过:“斗争是马克思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27]我们共产党人向来讲平等、讲团结,但我们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我们讲团结也要敢斗争。“我们党历来提倡团结,但团结是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达成的,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28]奉行“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爱惜羽毛,不敢斗争,这是与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背道而驰水火不容的。如果这样,只能求得一时的“团结”,损害的却是党和人民长远的、根本的团结。历史上,我们党正是在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不断斗争中,实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事实证明,与错误行径作坚决斗争,非但没有影响和破坏党的团结,反而让全党统一思想,更加团结统一。

其次,善斗争促团结。斗争是一门艺术,善于斗争是一门高超的本领,需要智慧胆识魄力兼备。善斗争要明确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团结而斗争,以斗争促团结,以斗争求团结。这就要充分摸清斗争对象的特点规律、掌握斗争的火候,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斗争。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这就是“团结一批评一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22] 210}。用这个公式,充

分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能使党更加紧密团结起来。

第二，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7] 12}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历史反复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妥协求安全则安全亡；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以妥协谋发展则发展衰。”^[29]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风险挑战日益严峻，党和国家随时可能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惊涛骇浪。不敢斗争、不善斗争，只会损害党和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吸取和用好党在历史上形成的丰富斗争经验，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努力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行家里手。

三、结语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团结奋斗于当今世界是一种宝贵的稀缺资源。相比西方国家的政党对抗、政治内耗、权力纷争等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撕裂、种族对抗等荒唐闹剧与滑稽丑闻，中国的团结奋斗难能可贵、优势突出。中国的团结奋斗说到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展示。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成功的秘诀。在波诡云谲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新使命更是需要带领人民团结奋斗。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要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强化共同的精神纽带和统一的思想基础，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样，团结奋斗会迸发出无穷的吸引力、磅礴的向心力、伟大的创造力和强大的战斗力。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基本前提、重要基础、根本动力、必要方式，四者是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体，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系统实践路径。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要深刻理解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路径，筑牢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团结奋斗的钢铁长城，以团结奋斗之力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0.
- [2] 习近平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N]. 人民日报，2022-10-18（1）.
- [3]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强调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 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 汪洋王沪宁丁薛祥出席 [N]. 人民日报，2023-01-17（1）.
- [4] 丁薛祥. 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N]. 人民日报，2022-11-02（3）.
- [5] 王炳林，石卓群.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J]. 新视野，2023（1）：5-13.
- [6] 郭跃文. 团结奋斗时代要求的多重意蕴 [J]. 广东社会科学，2022（6）：5-14+280.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54.

成利平,牛冬梅.新时代新征程团结奋斗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25-33.

- [8] 李捷.“五个必由之路”的历史蕴涵和现实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1-9.
-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6.
- [10] 习近平.坚守初心 共促发展 开启亚太合作新篇章——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2022年11月17日,曼谷)[N].人民日报,2022-11-18(2).
- [11] 国家统计局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全国人口情况[N].中国统计,2021(5):7-8.
- [12]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J].求是,2023(3):4-10.
- [1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70.
- [14] 秋石.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J].求是,2013(20):3-6.
- [15] 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J].共产党员,2022(5):4-9.
-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3.
- [17] 刘建军,李小春.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10.
-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3.
- [19] 汪青松.中国梦:筑就当下中国人的信仰[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270-273.
- [20]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N].人民日报,2022-10-24(2).
- [21]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
- [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 [23] 田鹏颖,田菁.动态演进视角下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特征、新要义[J].学习论坛,2020(6):5-11.
- [24] 李春华,张燕妮.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0(4):5-14.
- [25]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N].人民日报,2023-03-07(1).
- [2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 [28] 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J].共产党员,2022(5):4-9.
- [29] 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J].求是,2023(1):4-14.

责任编辑:林华山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团结奋斗视角

杨玉文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权，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密码。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形成自己的力量基点、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动国家和民族发展、助推团结奋斗有序开展百年历程，经历了团结救国、团结兴国、团结富国、团结强国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的历史进程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主要体现在坚持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障、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以统一战线为力量支撑、坚持以独立自主为基本原则和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心任务五个方面。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巩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点，更好地推进团结奋斗，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有机统一，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合理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力量基点；团结奋斗；独立自主；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2-0034-11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2.004

作者简介：杨玉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22ZDA022）

引用格式：杨玉文.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团结奋斗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34-44.

一、问题的提出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权, 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密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几项重大原则。在谈到第二条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 报告提出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被提升至党的中心任务的高度。通过统一战线形成自己的力量基点, 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动国家和民族发展, 是百余年来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长期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首次提出作为政治话语的“力量基点”这一概念, 强调中国革命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 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1]。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实践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探索, 党日益明确通过统一战线凝聚人心, 以形成自己的力量基点推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邓小平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 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江泽民强调要把现代化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是贯穿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条基本原则^[2]。“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是我们党百年来带领人民团结奋斗实践的经验总结, 是对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党的使命任务作出的重要政治宣示。

目前, 学界对“力量基点论”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现有成果集中在对“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的历史意义、理论内涵和现实要求的探讨方面。有学者论述了“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一原则在党百年奋斗史、新时代十年和未来中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3]; 有学者论证了“力量基点论”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之间的关系^[4]; 有学者强调了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的现实要求^[5]。现有文献对“力量基点论”的阐释力度、挖掘程度不够, 研究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形成、巩固自己的力量, 并将自身的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 在不同历史阶段调整统战政策, 推动统一战线组织和制度创新。因此, 以团结奋斗为切入点, 有利于深入探索“力量基点论”的历史形成和实践指向。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与坚持团结奋斗密不可分。一方面, 只有实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才能形成自己的力量基点。在近代中国, 推动国家转型、建构现代国家的核心力量难以自发形成, 必须通过政党来汇聚人心, 使全体人民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创造出一种政治大一统新形态, 以此形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支撑^[6]。另一方面, 只有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才能更好地全面推进团结奋斗。只有坚持独立自主, 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路, 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凝心铸魂, 才能不断引领团结奋斗的正确方向。此外,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离不开一定的组织形式。党历来高度重视组织工作和政治组织体系建设, 通过地方党组织建设推动社会组织工作^[7]、贯彻党的意志, 使全体中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形成一个上下有序的组织体系, 实现社会一体化整合。只有在广泛凝聚人心、有序组织群众的基础上, 才能充分调动自己的力量推动国家和民族发展。为此, 从团结奋斗视角探讨“坚

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的百年历程、实践经验和现实启示，对更加深刻把握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具有理论参考和现实意义。

二、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的百年历程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8]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始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历经团结救国、团结兴国、团结富国和团结强国的奋斗历程，不断开展伟大斗争，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团结救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变化调整统战政策，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逐步明确、增强和巩固自己的力量基点，坚持中国共产党掌握革命领导权，将革命事业的推进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完成团结救国的历史任务。

在北伐战争时期建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作出错误让步，丧失了革命主动权，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力量基点，造成中国革命极大损失。这次教训让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土地革命时期经过“八七会议”“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党逐步形成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9]，明确了在城市发展空间受到极大压缩后，需到广大农村去凝聚自己的力量，通过建立工农联盟形成自己的力量基点的观点，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党根据革命任务的变化，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民众和革命军的配合，在坚持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将统一战线拓展至社会主要阶级阶层，进一步增强了自己力量的基点。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10]党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革命的领导权，要始终将革命事业的发展放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人民所形成的力量基点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巩固、增强自己的力量基点，使中国共产党完全成为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中心。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比，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国民党蒋介石和地主阶级纳入敌人范畴，表面上使得团结范围缩小。但实际上，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出卖民族利益的丑恶行径彻底暴露，另一方面由于我党积极采取彻底的土地政策，我党获得了比抗日战争时期更多群众的衷心拥护，自己的力量基点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团结兴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通过组织和制度的创新调整，党进一步优化统一战线的战略结构，使自己的力量调配走向规范化、组织化。由此，党能更好地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完成团结兴国的历史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党的中心任务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转变为领导人民巩固政权, 统一战线的核心内容也从“敌我斗争”转变为自我改造和建设。为了改变国家重建初期分散的社会结构和无序的社会状态, 党需要通过统一战线将社会力量全面整合与有序组织起来, 形成强劲的力量基点服务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在组织层面, 党通过建立基层党组织, 实现了党、国家、社会的一体化整合: 一是农村的基层组织如村党支部的建立, 加强了党对农村的管理力度; 二是通过城市单位化以及单位党组织的建立, 形成了个人依附单位、单位依附国家的严密行政组织。农村和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建立, 实现了党领导社会、整合社会、调控社会的政治功能, 强化了党对社会成员的动员力度, 极大地巩固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点。在制度层面, 我国通过确立一系列政治制度实现了党对全国力量的有序组织和合理调控, 使“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得到了更强的制度保障。一是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现实途径, 使各族人民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二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格局, 通过人民政协这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有序政治参与, 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在方法层面, 党对如何巩固统一战线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强化自己的力量基点采取了现实可行的方法。如对待资本家和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法, 通过合理安排工作、举行座谈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形式, 将资本家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将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又如在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时, 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在组织、制度和方法层面的创新性发展,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团结富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 党将统一战线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建立了更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极大地扩大了团结范围, 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基点, 依靠全体中华儿女的力量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国际和平发展的历史趋势, 将统一战线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切爱国者力量的基点上, 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以及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奋斗目标。为顺应经济社会多元结构演化趋势, 爱国统一战线发挥出凝聚社会与国家政治力量的治道价值^[11], 信任和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集中精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指出, 中国现代化事业中经济建设的“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12]。在一定意义上, 这里的“自己”是指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爱国统一战线。在邓小平看来, 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必须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始终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一以贯之。胡锦涛也多次强调,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 “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 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13]。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形成的这条发展道路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是改旗易

帜的邪路，而是一条符合国情、顺应民心的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是能最大化发挥爱国统一战线力量基点作用的道路。党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借助市场的力量优化资源配置，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团结强国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通过广泛凝聚人心强化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点，团结带领人民应对一系列风险挑战，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明确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14]。报告突出强调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随着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各种国内外思潮交织混杂，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相关论调不断冲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诸多挑战。为了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所具备的汇聚人心功能，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家能凝聚共识，本身就是力量”^[15]，“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16]。党进一步明确新时代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来源，将“人心政治”界定为统战工作的本质和功能，将统一战线从革命策略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17]。为了更好地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保证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充分体现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更加巩固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点，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积蓄了前进力量。

实践证明，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坚持以统一战线凝聚自身力量，巩固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是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路径，是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的正确战略。

三、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的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从实践中抽象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双向互动，推动了团结奋斗历史经验的沉淀，促进了对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领导主体、指导思想、力量来源、基本原则和中心任务五个方面对这些经验和认识进行梳理，能够为新时代新征程巩固自身力量基点、更好助推国家和民族发展、指引团结奋斗前进方向提供有益启发。

（一）坚持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障

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承担着动员和凝聚民众力量的政治任务。她能够通过其所孕育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不断增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点，维系和保障民族独立和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体化基础。“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18]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失的惨痛事实时刻警醒着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把握国家和民族事业领导权，如此才能保存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力量。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19]他强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不断组织和发动群众结成统一战线，并将所凝聚的力量引导至正确的方向上，完成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建构现代国家的挑战，党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和联合了利益诉求并不相同的各个群体，推动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上，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有序推进团结奋斗历史进程。“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和汇集力量职能的基本政治条件。”^[20]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有效的组织工作将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吸纳进党内、团结在党周围，这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地注入有生力量^[21]。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因而具备团结全体人民、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点的能力。

（二）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不断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身，引领团结奋斗的正确方向，更好地推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才能引领团结奋斗的正确方向，才能正确回答、解决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近代中国封建社会遭遇资本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中国面临国家重建危机。在此民族危亡时刻，找到一种能够指引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思想力量，成为摆在中国先进人士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经过不断地尝试，摒弃了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解决民族独立和国家重建危机、实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方向指引。然而，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22]如果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一味盲从共产国际的指挥，而不是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就会掉入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陷阱，就不能团结人民走上革命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23]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4]¹⁶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断引领统一战线的战略方向，使所凝聚的力量得到充分、合理、有效的发挥，为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引。

（三）坚持以统一战线为力量支撑

党历来坚持通过统一战线汇聚人心、形成自己的力量基点，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领导和调配所形成的力量。一方面，党通过统一战线整合各方面力量，将社会凝聚成为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点的强固整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统一战线作为党百年团结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决议指出：“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8] 69}百余年来，党推动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依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和工作任务的转变调整统战政策，不断巩固自己的力量基点，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来源。另一方面，党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政权，领导和调配所形成的力量，着力推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形态都是统一战线政权，统一战线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形态。”^[7]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时期建立了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政权，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进行边区“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政权实践，解放战争时期建立并不断调整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战线性质国家政权。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确立了通过统一战线所形成力量的领导核心和组织结构，并通过领导核心和组织结构实现社会力量的一体化整合，推动现代国家建构有序进行。

（四）坚持以独立自主为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就是要坚持以独立自主为基本原则，坚持走自己的路，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土地革命时期，党破除对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的迷信，坚持独立自主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积极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探索出游击战、运动战等新的战略打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依据本国国情创造出渐进式、说服教育和非暴力的改造方法。20 世纪 50 年代末，面对苏联单方面撕毁技术协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情况，党团结带领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攻克一道道难关，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功爆炸原子弹和氢弹，发送“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党在爱国统一战线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24]。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纵深演进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挑战，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奋斗中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赶考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了优异答卷。实践证明，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想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就要坚持以独立自主为前进的基本原则，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把握历史的主动权。

（五）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心任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始终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离不开党的坚

强领导，离不开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的一条独立自主的民族复兴之路。统一战线所具备的充分凝聚力量、有效动员群众的作用，使党在群众工作中不仅建立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还确立和巩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领导核心地位。以统一战线为力量来源，以中国共产党为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道路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就具备了充足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它完全避开了“脱钩、趋同、依附”模式，在资本现代性所建构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中成功突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保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会走入邪路、老路、死路、绝路，提供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26]。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奋斗目标，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不断巩固自己的力量基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四、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基点上的现实启示

回顾来时路，是为了走好前进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巩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点，更好地推进团结奋斗，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有机统一，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合理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一）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有机统一

党与群众血脉相连、鱼水相依。党只有依靠民众，才能发挥其建构现代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党只有为了人民，才能凝聚人心，形成力量基点。人民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活泼局面。只有通过党指引前进方向，人民才能更好发挥自己的力量，走上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正确道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26]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与各政治团体就国家和民族发展事业进行协商，广泛吸纳人民意见，并通过这些政治团体将政策主张发布至社会，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形成统一行动，从而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27]。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要结合形势任务发展变化，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机制；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通过人民群众的监督拓宽党自我革命的渠道；坚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在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中不断增强前进动力；继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使全体党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二）坚持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相统一

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作为党百年团结奋斗的两条基本经验，彼此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相互依存。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权，坚持走符合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路，才能推动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统一战线动员社会、整合人民的功能。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充分凝结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自己的力量基点，才能推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才能在保持自身独立力量的情况下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路。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相互贯通。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统一战线，是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即统一战线本身就意味着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独立自主，是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即独立自主本身就意味着要凝聚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这样才能具备走自己的路的勇气和底气。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坚持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相统一是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警惕，不可丧失对革命的领导权^[28]；在争取获得他国援助的同时，不可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作为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中国和世界关系的一条经验，在建设和改革时期传承下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始终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和平外交政策，促进国内政权稳定、外交关系和谐，为长治久安、繁荣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党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是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面对国家和民族发展前进道路上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14]¹⁷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在中国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毛泽东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29]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和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于同各个国家的文化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才能成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力量。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唯其精华不足以形成推动现代化的思想力量，唯其糟粕则只能起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效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具一种建构性力量，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不仅需要一种建构性力量，更需要一种批判性力量，通过批判对明确自身制度优势，通过批判审视进行自我革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排斥吸收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不仅不排斥，而且要积极学习借鉴，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武装自己”^[30]。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想牢牢把握历史主动权，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团结奋斗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就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四）合理看待中国与世界关系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与世隔绝, 而是要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新机遇, 吸收他国有益经验和文明成果, 更好地增强自身的力量, 在此基础上推进人类文明事业的进步。从革命时期强调争取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情、援助和支持, 到建设时期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坚持“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 中国发展的百余年历程生动诠释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命运与共的关系。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国在促进世界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4] 60} 这表明了中国外交立场, 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和平稳定、持续繁荣指明了方向、绘制了蓝图, 深刻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中国怎么做的问题, 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指引了前进的正确道路。在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交往不断深化的趋势下, 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整体, 各个国家同处一个命运共同体, 面临着人类共同的难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高度统一, 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切各国人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关心人类文明进步事业, 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在解决自身难题的同时为世界各国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要拓展世界眼光, 坚持对外开放, 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在交流互鉴中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凝聚国际共识,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五、结语

2023年3月6日,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 并参加联组会, 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 “团结一致、敢于斗争。力量源于团结。这些年来, 我们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 大仗一个接一个, 每一仗都是靠全体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斗争闯过来的。未来一个时期, 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只有全体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才能不断夺取新的更大胜利。”^[31] 通过统一战线形成自己的力量基点, 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动国家和民族发展, 助推团结奋斗有序开展, 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取得重大成就、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因素, 也是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要原则。当今世界正处于不断加速演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 全球性问题加剧,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来自外部的风险挑战始终存在并日益凸显。在由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所带来的国际形势动荡变局下, 必须增强自身发展的力量, 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32.
- [2]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0.
- [3] 曹健华,钟晴伟.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J].湖南社会科学,2022(5):22-28.
- [4] 何忠国.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N].学习时报,2022-08-05(1).
- [5] 林尚立.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N].经济日报,2022-01-07(3).
- [6] 汪仕凯.论政治大一统:内涵、本质和演进[J].学海2022(5):21-31.
- [7] 肖存良,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J].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79.
- [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7.
- [9] 武传鹏.坚持独立自主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2(2):46-54.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6.
- [11] 陈明明.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统一战线的三重面相:策略、战略与治道[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6):5-14.
-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06.
- [13] 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66.
- [1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5.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1.
-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94.
- [17] 吉秀华.习近平关于统战工作“人心力量论”的多重逻辑[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3):3-10.
- [18] 李应瑞.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国复兴的团结底色[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5):22-34.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97.
- [20] 姜胜利,张玉杰.凝心聚力——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08.
- [21] 张浩.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J].红旗文稿,2022(24):20-23.
- [2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
-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5.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760.
- [25] 辛向阳.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8):15-19.
- [26]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8.
- [27] 刘建军,陈周旺,汪仕凯.政治逻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457.
- [28]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03.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1.
- [30] 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J].求是,2023(1):4-14.
- [31]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N].人民日报,2023-03-07(1).

责任编辑:刘泮菡



迈向全方位统战：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镜鉴

李松

（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而不断演进。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党在香港组织工人运动抵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为了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党在香港对知识分子和商业阶层开展统战工作。在建设时期，为了应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我国的围堵，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保持理性而克制。在改革开放时期，党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和香港稳定发展的需要，对香港社会的精英阶层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进入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在香港实行全方位统战工作：统战对象逐渐扩大，统战内容不断丰富，统战手段更加灵活，统战格局日益开阔。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等手段，将统战工作深度嵌入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领域之中，更加广泛地团结爱国爱港人士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统一战线；全方位统战；香港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2-0045-09

DOI：10.13946/j.cnki.jcqis.2023.02.005

作者简介：李松，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师资博士后，复旦大学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基金项目：2022年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

引用格式：李松. 迈向全方位统战：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镜鉴[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45-53.

近现代以来香港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漫长过程。香港回归以后，政治社会总体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受到各种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针对近年来香港出现的政治乱象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央政府落实“爱国者治港”，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不断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建构最广泛的“一国两制”统一战线^[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香港有效开展统战工作，影响着“一国两制”和“爱国者治港”等政策的全面准确贯彻落实。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为切入点，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心任务的转变，探讨党在香港地区统战工作的演进及其历史逻辑、历史经验，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现实镜鉴。

一、文献综述

现阶段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的作用大致存在以下几种观点。首先，增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就中央政府层面而言，一些学者指出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统一战线来赢得香港民众的支持^[2]；就香港特区政府层面而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由中央授权的香港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并且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也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因此，当香港特区政府的合法性遭到香港民众质疑时，中央政府通过统战工作来争取更多香港民众支持香港特区政府^[3]。其次，实现政治经济的融合和整合功能。香港一直是中国内地与西方世界经贸往来的重要窗口。香港被中央政府纳入长期发展规划之中，最终实现从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上塑造和引导香港人的身份认知^[4]。再次，体现维护国家安全的功能。香港议题关系国家安全，尤其在 2019 年香港爆发修例风波之后，在安全化背景下，中央政府加强在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确保消除“港独”分裂势力，使国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3]。

上述观点主要从统一战线的功能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研究着眼于香港回归之后这段时间。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虽然有学者专门研究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诸如“六七运动”（当时参与及支持者称其为“反英抗暴”运动），但是既有研究难以全面把握党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切入点，即通过党在香港近百年统战史的研究，探索统战路线演进的历史逻辑，并总结统战工作经验，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

近代中国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帝国主义和落后军阀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社会。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新三民主义的框架下建立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香港开展了统战工作。其中，标志性事件是省港大罢工运动。1925 年，为了支持上海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州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大罢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和苏兆征等同志在罢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大约有 25 万人参与罢工运动，持续时间长达 16 个月^[5]。

李松. 迈向全方位统战: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镜鉴[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 45-53.

由于大革命失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国民党右派的严重摧残。彼时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 把工人、农民和士兵作为基本革命力量, 建立工农联盟为主的“下层统一战线”。但是, 由于革命形势的复杂性, 这一历史时期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国民党特务分子无法明目张胆地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阻挠, 对其机关的破坏也不如内地明显。各种政治力量能在这里以商业活动为掩护开展政治方面的角逐^[6]。1941年2月,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期间, 在重庆与茅盾谈话时指出: “现在香港有了很大的变化, 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 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侨胞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 又是内地与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 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 因此, 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 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7] 1944年,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 新华社将统战工作从广东扩展到香港地区。1947年1月, 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成立分局, 并且在分局之下设三种平行组织: 一是香港工委, 二是城市工作委员会, 三是各地区党委。解放战争时期, 香港成为华南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党在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形成日臻完善的体系。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主要围绕工商界精英和知识分子展开, 党成功开辟了在香港的“上层统一战线”^[8]。这一统战路线是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和赢得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摒弃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思想, 将统战对象扩展到所有爱国人士。尤其当国民党在内地掀起反共高潮时, 香港这个特殊的环境对于中共坚持抗战与进步, 反对投降与倒退, 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9]。这一时期党在香港的上层统战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 很多民主党派人士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支持, 并逐渐与经验丰富的统战工作者建立紧密关系。比如1946年夏, 周恩来、董必武在与中共广东区委统战部部长连贯、中共中央南京局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书记廖承志交流工作时指出: “许多民主爱国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也要转移到香港去, 党组织要帮助他们转移, 并协助他们安排工作。”^[10] 其中, 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被安排在达德学院教书^[11]。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也争取到了很多民主党派人士的支持, 党成功在香港发展起广泛的“地下阵线”, 并成功影响了当地政治^[12]。

为了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 1948年5月1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 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 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 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为着打倒蒋介石, 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 “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 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3]。“五一口号”发布之后, 各民主党派致电中国共产党表示积极拥护党的领导。毛泽东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复电, 邀请他们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事宜。为了使他们安全抵达解放区, 中共中央进行周密安排, 周恩来亲自指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中共香港工委的负责人方方、潘汉年等人, 和钱之光等人具体负责将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14]¹⁶⁶。这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和民主协商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冷战格局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敌视态度, 不仅在政

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而且还在军事上围堵中国。中国选择“一边倒”地支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总体上服从于“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是十分理性和克制的，得到了香港广大爱国者的强烈拥护。当然，这种理性和克制是由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作重心和特定历史环境决定的。

在中国取得解放战争胜利之后，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将很快收回香港，并做好了撤离香港的准备。时任总督杨慕琦（Mark Young）基于英国的政治外交利益考虑开启了“光荣撤退”计划^[12]。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坚称“香港和澳门都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同时，选择暂缓收回两地，并指出如果“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15]。后来，周恩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16]这是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没有预料到的，用英国人自己的话讲，“令人很难想象，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会不顾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仇恨，而不去重占香港。香港之‘失’，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17]。

这一伟大战略很快就赢得巨大回报。英国政府为了维持在香港的统治，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外交关系。早在 1950 年 1 月，英国政府就率先承认新中国，并且两国还建立了通商关系。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宣称“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禁运”问题上同美国存在严重分歧，因此对美国采取了两面派态度：表面上慑于美国压力颁布了很多“禁运”管制法令，并做出严格执行“禁运”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在暗中支持英国商人同新中国进行贸易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

当然，在这艰难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爱国商人涌现出来。霍英东利用自己的船只冒着被暗杀的风险、顶着各方面压力帮助志愿军运输物资；庄世平在香港创立了南洋商业银行，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纺大王曹光彪急祖国所急，打通香港和内地的航空通道，将战争急需物资送往内地等。正是党在香港长期建立起的“地下阵线”和复杂的组织网络，并与爱国人士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才有众多爱国人士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毁家纾难支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这种理性克制的统战路线也受到内地“左”的思潮影响。1966 年 8 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江青等人向中央统战部发动突然刁难，污蔑全国统战、宗教工作部门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蓄意破坏统一战线和干涉统战工作。在“左”的思潮的袭扰下，左翼劳工力量在香港掀起了一波波的政治运动，以反抗港英当局的殖民统治和资本家对劳工阶层的剥削。据统计，这一阶段香港的工人运动异常活跃。1950 年至 1960 年，香港的罢工总数为 68 次；但在 1960 年到 1970 年间，罢工共达 193 次，最少一年也有 9 次，最多一年则高达 47 次^[18]。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六七暴动”。1967 年香港劳工阶级的这一事件，让英国殖民当局认识到只依靠武力镇压工人运动的方式，会导致劳工阶级使用暴力的反弹。港英当局在后续的殖民统治中，开始通过经济社会改革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这段时期内，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逐渐由“理性、温和”转向

李松. 迈向全方位统战: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镜鉴[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 45-53.

“激进”，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不可否认，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在革命年代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早期的革命政权争取了外部支持。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战工作总体上服从于革命的意识形态，但这里也需要理性、克制的一面，让统战工作服务于新生共和国的建设。

四、现代化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构建的上层统一战线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统一战线的性质也随之发生转变。邓小平在 1979 年就明确指出：“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统一战线的性质叫革命的祖国的统一战线，就是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这样范围就宽了，具有广泛的性质。”^[19]“革命的祖国的统一战线”的提法新旧结合，既反映了长期以来统一战线的革命性质，又反映了新时期推动改革开放所要求的爱国性质，具有鲜明的过渡性。这一提法逐渐淡化了“革命性质”，具有很强的现代化导向^[20]。

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围绕着“致富能人”的新的社会阶层展开，“上层统一战线”在市场化进程中发展起来。据统计，1991 年，在党政干部任职上对党外人士在县级以上任命只有 781 人；到 1994 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到 1 523 人^[21]。在经济领域，中央统战部利用全国工商联、人民政协和其他渠道，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吸引进来，让他们发挥更大作用^[22]。在上海，中国民主建国会长期致力于吸纳全国工商联和相关协会的负责人或组织者，以及那些有影响力的企业家^[23]。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则是新时期统一战线政策走向成熟的标志。在理论界看来，它赋予改革开放以来商业阶层在政治上的合法性。

这一历史时期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也反映了这一统战路线的调整，党扩大了对商业阶层、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统战工作。克里斯蒂娜·卢（Christine Loh）认为，中国共产党以影响力指标考量香港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分子、技术专家和管理专业人才等人士，统战工作的策略便是影响各领域负责人的决策^[24]。在廖承志担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时，他长期与香港社会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打交道。在统战工作中，他提出：“千万不要把香港这个缺口堵死，要充分利用香港、澳门的特殊经济地位，将其作为新中国同国外经济联系的基地，通过两地吸收外资，争取宝贵的外汇。”^[25]为此，他提炼出解决香港问题必须遵循的两条原则：“既要收回香港，又可保持其繁荣、稳定，这就首先要求必须采取一套特殊的政策，收回香港后只改变与主权有关的东西，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尽可能不变。”^{[25] 540}

当时中英谈判陷入僵局，英国在香港打“经济牌”，让香港的汇率创下二战后的最低点。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出于维持香港稳定的目的，对英国的举措进行反制。1983 年 11 月 20 日，廖承志会见以黄鉴为团长的香港厂商联合会参观团，阐明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商业阶层的方针，将其概括为“收回主权、港人治港、制度不变、保持繁荣”16 个字^[26]。廖承志还反复强调收回香港的方案要考虑香港的历史，顾及香港各阶层人士的利益，要制定一个能够容纳人的政策，否则香港的资金流走了，

人才跑光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就成一句空话。他指出：“可以长期保留资本主义，财产、生活方式、自由港、贸易中心，我们十分愿意香港的繁荣能够保持。”^[27]其后，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更多走向社会，深入各阶层群众，团结中间分子。

在香港被殖民统治时期，很多香港华人社会精英被吸纳到政治体制之中，形成香港特殊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治理结构^[28]。这些华人精英成为港英当局的支持力量，构成了港英当局维持统治的“政治社会”基础^[29]。此外，由于香港的左翼政治力量在香港“六七暴动”之后式微，“以整个阶级或者集体的利益为取向的政治意识和活动再也难以得到普遍的支持”^[30]。因此，在中英围绕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展开博弈之时，商业精英阶层成为党在香港推行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这种统战路线的转向，奠定了香港回归之后中央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基调。正如强世功所言，港英当局通过开放行政管理体制的方式，将普罗大众吸引到行政系统之中，成功压制了香港代议制民主的发展^[31]。然而，进入特区政府时期，香港的政治社会结构日益变迁，精英阶层开始走向分裂。

“精英分裂和倾轧已严重削弱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并且精英阶层的不团结已经演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32]此时，党在香港推行的上层统战路线已难以完全适应香港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

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全方位统战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变迁，社会分层化明显。“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产业工人和新兴中产阶层构成中国社会结构中非常重要的阶层。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已经形成了不可忽视的矛盾，因而社会结构呈现出紧张关系，中国社会整合的难度明显增加了。”^[33]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广泛的联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这个联盟的成员概括为 12 个方面，总数达数亿人^[34]。随着国际格局的日益紧张，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打压中国，试图遏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鉴于此，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无疑是克敌制胜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构建起一个广泛的、凝聚起最大公约数的爱国统一战线，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要求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35]。为了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出全方位统一战线。就性质而言，全方位统一战线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儿女大团结局面。就对象而言，全方位统一战线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致力于民族复兴大业。就领域而言，统战工作围绕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展开、一体化推进。就手段而言，统战工作的开展坚持政策、法律、经济等多维手段并用。就格局而言，全方位统一战线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服务强国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党的全方位统一战线也在香港逐渐铺开：

首先, 统战对象逐渐扩大。“全方位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统一战线”不同, 它淡化统战的“阶层属性”, 凸显统战路线的功能性作用, 将最广大爱国者团结起来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在香港的统战对象由特定阶层的代表人物逐渐扩展至社会中的不同群体, 其中包括像工会联合会、福建氏族团体、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区级联合会和邻里(街坊)协会等社团组织。党在香港的统战路线也越来越贴近底层民众的生活, 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解群众之所难”。2021年, 时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多次深入走访香港社会基层, 开展中联办“落区聆听·同心同行”活动。在中联办的示范下,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多名司局长随后走访了香港的基层社会, 了解香港市民的生活和需求, 并表示特区政府会加大力度增加房屋供应, 解决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其次, 统战内容不断丰富。香港回归之前和香港回归初期, 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主要围绕香港回归和回归之后的政治社会稳定展开, 统战工作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随着党在香港的工作重心变化, 统战工作转变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体化推进。在政治领域,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保证国家主权统一和香港稳定有序发展, 依法打击乱港、祸港分子和分裂中国的违法行为。在经济领域, 将香港金融、航运以及自由贸易港的优势与内地广阔的市场相结合, 加速香港融入国家经济发展大局, 推动香港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发展。在社会领域, 香港现阶段贫富差距巨大, 社会矛盾突出。中央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创造更多经济增量, 引导特区政府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政策来调整香港的社会关系, 尤其是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机会给年轻人, 疏解香港社会的负面情绪。2020年10月1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 吸引更多港澳青年来内地学习、就业、生活, 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36]

再次, 统战手段更加灵活。在香港回归初期, 为了贯彻“一国两制”政策, 党主要从政策层面来制定统战工作原则和推进实施统战工作方法。然而, 随着香港诸多问题暴露, 中央在香港落实全面管治权面临诸如立法权之争、司法权之争、行政权之争、外部干预斗争等诸多困境^[37]。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 党在香港的统战手段更加灵活, 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等多维手段来落实中央在香港的政策。十八大以来, 党在香港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2020年6月30日,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正式生效。2021年12月20日,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 从选举委员会的重新构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 以及完善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等三个重要方面, 引领和推动香港局势和民主发展重回正轨^[1]。

最后, 统战格局日益开阔。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时期, 中英两国围绕香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权展开激烈角逐。为了保证香港顺利回归和维持香港社会稳定, 中央政府给予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在香港回归之后, 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始终围绕如何处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展开。由于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 香港居民的“一国”观念比较淡薄。更有甚者, 西方国家在香港特区刻意抹黑内地, 策动“港独”分子制造暴乱。进入新时代, 为了解决香港社会存在的顽疾, 中央加强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党在香港的统战工作更加强调在“一国”前提下构建“一国两制”统一

战线。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指出：“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承担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的调查研究、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职责，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基础上组建，作为党中央办事机构，保留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牌子。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38]这一改革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强决心和意志，必将保障“一国两制”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六、结语

随着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踏上新征程，这对党的统战工作提出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39]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党必须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扎实推进全方位统一战线，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优势和作用，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等手段，将统战工作深度嵌入到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领域之中，更好团结爱国爱港人士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2021 年 12 月）[N]. 人民日报, 2021-12-21（10）.
- [2] Shiu-Hing Lo. Competing Chinese Political Visions: Hong Kong vs. Beijing on Democracy [M]. Westpor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10.
- [3] Shiu-Hing Lo. Ideologies and Factionalism in Beijing-Hong Kong Relations [J]. Asian Survey, 2018（58）: 392-415.
- [4] Lam Wai-ma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M].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 [5] 金安平.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能力研究——以省港大罢工的领导结构和经费筹集为例 [J]. 北大政治学评论, 2021（3）: 3-19.
- [6] 袁小伦. 粤港抗战文化史论稿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2.
- [7] 茅盾. 我走过的路: 下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216.
- [8] Cindy Chu. Chinese Communists and Hong Kong Capitalists: 1937-1997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9] 陈雷刚. 抗战时期叶剑英在南方的统战工作述论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2）: 66-73.
- [10] 达德学院校友会. 达德学院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G].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3.
- [11] 朱益飞. 中共中央南京局在香港达德学院的统战工作及其当代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5）: 63-70.

李松. 迈向全方位统战: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统战工作的历史发展与现实镜鉴[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 45-53.

- [12] 李彭广. 管治香港: 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2: 23.
- [1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统一战线 100 个由来[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70.
- [14]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华文出版社, 2017: 166-168.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 5 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249-250.
- [16] 金尧如. 保持香港现状和地位的战略思想[N]. 香港经济日报, 1993-07-02(10).
- [17] 罗拔·郭瞳. 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M]. 香港: 明报出版社, 1993: 36.
- [18] 齐鹏飞. 长期打算, 充分利用——1949 年至 1978 年新中国对于香港问题和香港的特殊政策[J]. 中共党史研究, 1997(3): 1-8.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319.
- [20] 肖存良. 服务强国建设: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内涵、特征与机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4): 1-11.
- [21] 格雷·格鲁特. 发展与转型: 法团主义与霸权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M]. 上海: 复旦大学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基地内部参考资料, 2020: 204.
- [22] 阎小骏. 中国何以稳定: 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 [23] 罗光武. 民主党派基本知识[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8: 37.
- [24] Christine Lo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ols of Co-optation and Persuasion, Underground Front[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5] 王俊彦. 廖承志传[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30.
- [26] 刘智锋. 狮子与龙——中英双方在港较量密录[M]. 广州: 广州出版社, 1998: 184.
- [27] 廖承志文集: 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675-678.
- [28] 金耀基. 中国的政治与文化[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229-254.
- [29] 李松. 香港行政主导体制的兴起与衰落(1841—1997)[D]. 上海: 复旦大学, 2022: 88.
- [30] 李明堃. 变迁中的香港政治和社会[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1987: 61-63.
- [31] 强世功. 中国香港: 政治与文化的视野[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3.
- [32] 刘兆佳. 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322-342.
- [33]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34] 中央统战部理论学习中心组. 为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凝心聚力[N]. 人民日报, 2021-08-25(11).
- [35]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
- [36] 习近平.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20 年 10 月 14 日)[N]. 人民日报, 2020-10-15(2).
- [37] 冯泽华. 新时代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 实施困境与法治进路[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1): 54-63.
- [38]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N]. 人民日报, 2023-03-17(1).
- [39] 习近平.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2(20): 4-7.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的特征、形势与方向

张冠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研究所，北京 100083）

摘 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实践路径。近年来，国家发展进步引领两岸关系发展方向的能力显著增强，祖国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体制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密切衔接，两岸经贸合作动能由要素驱动加快向创新驱动转换，大陆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为两岸产业合作提供强力支撑，高质量对外开放推动两岸价值链、供应链合作向海外拓展，台胞获得感切实增强，两岸融合发展新特征开始呈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缘政治冲突、中美战略博弈和两岸关系复杂严峻对传统两岸经贸发展格局产生了深层次影响，当前两岸融合发展水平尚不能满足推进国家统一进程需要，创新驱动面临诸多制约，两岸经济合作的机制、平台有待完善。未来，应把握祖国大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大机遇，善于化危为机，因势利导加快转变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融合发展，夯实祖国和平统一基础。

关键词：国家统一；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两岸关系；两岸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2-0054-11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工程、实践路径^[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2]当前，在大陆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势下，国家发展进步引领两岸关系发展方向的能力显著增强，推动两岸经贸合作与社会交流呈现出一系列融合发展新特征。同时，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2.006

作者简介：张冠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引用格式：张冠华. 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的特征、形势与方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54-64.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叠加全球经济变局、中美战略博弈和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等重大变化, 这些因素给两岸融合发展带来历史性新挑战和新问题。

两岸融合发展重要论述自 2019 年 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后, 成为国内外涉台学界的研究热点。相关专家学者从各自专业视角对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3]、政策内涵及实现路径^[4]、推进策略^[5]等进行了探讨。但总体来看, 相关研究成果更多集中于理论、模式探讨或具体领域的实践, 对近年来两岸融合发展实践特征的总结与规律性分析不够, 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度进行研究不足,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两岸融合发展面临的历史性挑战、产生的新问题分析有待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重要论述提出以来, 内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如何因势利导, 运用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大机遇将外部冲击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新契机, 成为需要加强研究和探讨的迫切问题。本文将着力探讨和总结近年来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特征, 并重点分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两岸融合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 提出未来两岸融合发展应有方向 and 对策建议。

一、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特征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党着眼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加快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满足新发展阶段要求提出的对台重大举措。近年来, 两岸融合发展实践取得积极进展, 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一）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与祖国大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密切衔接

两岸经济合作与社会交流的发展特征, 与大陆改革开放格局和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从历史演进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两岸经贸关系恢复以来, 两岸经贸关系深受经济全球化进程、两岸各自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 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日益成为主导力量。40 多年来, 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 吸引台湾产业梯次向大陆规模性转移并拉动两岸贸易, 推动了两岸经贸关系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是, 在大陆改革开放总体格局下, 台商在大陆投资也呈现“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特征, 与大陆内需市场、产业体系融合水平不够高, 与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不相适应。当前, 我国进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 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对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也提出高质量发展新要求。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重要论述的内涵丰富, 坚持在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 确立了新发展阶段推进两岸经济社会交流的新目标新举措, 积极以祖国大陆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由“两头在外”的快速发展阶段转向融合发展阶段。这表明, 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 两岸深度融合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夯实祖国和平统一基础。

两岸融合发展充分贯彻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两岸融合发展着力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 有利于增强两岸经济合作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两岸融合发展注重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 有利于促进两岸经济合作与社会交流的协调发展。两岸融合发展提出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更高合作目标, 有利于推进与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相适应的两岸高水平开放。两岸融合发展积极为台胞提供同等待遇, 增强台胞获得感, 有利于让两岸同胞共享祖国经济发展成果。

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政策不断完善创新，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密切衔接。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践行“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政策要求。“十四五”规划提出，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持续出台实施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支持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随着以同等待遇为指向的惠台利民制度、政策持续完善，台商将在更广领域与大陆企业同等享受改革开放政策红利，台胞将更多享受居民待遇、同城待遇。这使两岸融合发展更深融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程，增强祖国大陆经济发展对两岸经济社会交流的引领作用。

（二）两岸融合发展动能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长期以来，要素驱动是推动两岸经贸合作的主要动力，即台商着眼于大陆相对低廉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将加工制造业向大陆转移以降低成本、获取竞争优势。近 10 年来，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和两岸生产要素价格水平接近，要素驱动逐渐减弱，台商向大陆转移产业趋缓，在大陆的部分台商开始向东南亚等更低要素价格地区转移传统产业。同时，大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为两岸经济合作注入新的动力。近年来，大陆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高速发展，补短板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两岸在新技术、新产业领域呈现出更强的互补优势。台湾地区的芯片、电子信息、机械等优势产品对大陆出口的高速增长，成为拉动两岸贸易与投资的主要动力。其中，台湾地区的芯片对大陆出口猛增。据台湾地区财政主管部门统计，以芯片为主的电子零组件产品对大陆和香港出口比重由 2012 年的 32.9% 迅速上升至 2022 年的 62.4%，成为拉动两岸贸易增长的绝对主力产品。大陆是台湾集成电路出口的最大市场。2021 年台集成电路出口金额共计 1 554.95 亿美元，其中出口大陆和香港为 937.09 亿美元，占 60.3%。台商对大陆高科技产业投资比重增加。2021 年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核准的台商对大陆投资中，电子零组件投资额为 20.46 亿美元，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产品为 8.09 亿美元，两者合计占该年对大陆投资总额的 48.7%。两岸在新经济领域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陆品牌企业与台企合作更为密切。这促使两岸供应链进一步嵌入大陆产业链和内需市场，提升了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三）大陆市场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依托

大陆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数字消费市场，超大规模市场的效应和潜力巨大，消费已成为拉动大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近年来，大陆市场对两岸经贸交流的拉动效应明显增强。从两岸贸易看，在大陆市场拉动下，近年台湾对大陆出口规模与依存度屡创历史纪录。按海关总署统计，2021 年两岸贸易规模高达 3 279.3 亿美元，其中对台湾出口额为 782.9 亿美元，自台湾进口额高达 2 496.4 亿美元。按照台湾方面统计，2020 年和 2021 年台湾对大陆出口分别增长 14.6% 和 24.7%，占总出口比重分别提升至 43.9% 和 42.3% 的高水平。台商在大陆投资动机与经营方式也发生重要变化。据调查，2020 年台商赴大陆投资的重要动机，以“当地市场发展潜力大”比例最高（占 32.88%，高于投资其他海外地区的 25.35%），其他分别为“劳工成本低廉”（8.49%）、“原料供应方便/价格便宜”（6.17%）、“土地成本低廉”（2.80%）等^[6]。中国工业体系在全球最为健全，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受惠于大陆完整产业体系与发展生态，台商在大陆制造业投资经营当地化趋势加快，为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据调查，2015—2020

年,在大陆投资台商机器设备当地采购比例由 74.59% 提升至 84.24%,原料零组件和半成品当地采购比例由 68.28% 上升至 70.10%;产品与服务的当地销售比例由 72.97% 提升至 81.88%,其中食品饮料、石油及煤制品、塑橡胶等传统制造业产品几乎全部内销,过去外销比例较高的电子零组件产品也由 59.61% 升至 71.07%,计算机、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由 48.13% 上升至 81.57%。台商在大陆获利能力明显增强,2019—2021 年台上市上柜公司在大陆转投资收益分别为 3 911.89 亿元新台币、4 981.38 亿元新台币和 6 186.25 亿元新台币,连创历史新高。

（四）两岸产业合作布局向海外拓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大陆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两岸融合发展向海外拓展提供了有利政策环境。台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尤其在地缘政治冲突和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物流与供应链的形势下,一些龙头电子厂商运用中欧班列将笔记本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运往欧洲。比如,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量及出口已连续多年居国内第一,惠普、宏碁、华硕等品牌商及其主要代工台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和硕等均已落户重庆。中欧班列(渝新欧)因笔记本电脑而生,因笔记本电脑而强。其构建起的贯通欧亚的国际大通道,成为电子信息产品对外贸易的重要运输载体^[7]。RCEP 的签署实施和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台商在区域内开展合理产业布局。近年来,一些台商或为寻求更低廉生产要素成本,或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将部分产品的加工组装产能向东南亚等第三地调配,其上游原材料、零组件等仍从两岸采购,拉动了两岸与当地的贸易。RCEP 的实施尤其是区域内原产地累积规则的利用,将有效降低台商在 RCEP 区域内产能调配布局的成本与效率。这有助于构建以两岸产业合作为基础、以大陆市场和产业链为依托、向 RCEP 区域延伸的新格局,提升两岸企业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变局的能力。

（五）在大陆台胞的获得感明显增强

近年来,大陆积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与体制机制创新。国家有关部门先后推出《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018 年 2 月 28 日印发,简称“31 条措施”)、《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2019 年 11 月 4 日印发,简称“26 条措施”)、《关于应对疫情统筹做好支持台资企业发展和推进台资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2020 年 5 月 15 日印发,助力台企“11 条”)、《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2021 年 3 月 17 日印发,“农林 22 条措施”)。各省市区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以落实。大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法治化水平持续提升。2019 年 12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进行第二次修订,相关法律也加大对台胞适用性。2019 年 3 月 1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条例》第 48 条明确规定:“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大陆投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以下简称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未规定的事项,参照外商投资法和本条例执行。”2022 年 8 月,江苏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江苏省对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促进

条例》，为首创性的涉台地方性法规。

大陆近年来出台的惠台利民政策以推进台胞在大陆同等待遇为出发点，正形成日益完善的制度、政策和法治体系。在经贸领域，台商不仅适用大陆对一般外资的市场准入开放，还在数十个领域享受与大陆企业同等的投资准入待遇，较过去比照外资“同等优先、适当放宽”有了更大拓展。在社会领域，大陆积极为台胞在就业、创业、生活等方面提供同等待遇。在文化教育领域，为台胞学习、科研、职业资格考试、参与文化与体育事业等众多领域提供同等待遇。在海外，国家加强保护台胞海外权益，台胞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到 2022 年，大陆已累计设立了 78 家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服务和入驻台湾青年创业项目企业 220 多个，有 2 000 多名台湾青年学者在大陆高等院校任教。每年有近 3 000 名台湾大学生在大陆高等院校获得奖学金，有近 1 000 名台胞考取了大陆各类热门行业的职业资格证书，有近 300 名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胞获得了地市级以上的各种荣誉称号^[8]。在大陆台胞台企与当地居民、企业的待遇差别迅速缩小，获得感明显增强。

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两岸经贸与社会交流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总体看融合发展的质量还不高，尚难满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更高要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中美战略博弈叠加其他因素，对推进两岸融合发展提出空前挑战。同时，大陆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新的重大机遇。两岸经贸关系传统发展格局面临重构，两岸融合发展进入历史性关键时期。

（一）两岸融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两岸共同市场构建仍有不足

两岸经贸关系自 20 世纪 80 年代恢复以来，长期保持快速增长。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进出口地区，两岸经济依存度持续上升。同时也要看到，虽然两岸经贸交流规模持续扩大，但融合发展的水平还不够高。当前两岸融合发展的水平与质量，与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

其一，台湾对大陆市场的实质依赖度低于表面规模。长期以来，两岸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即台湾对大陆出口的多数产品在大陆加工制造后再出口海外，以大陆为最终市场的一般贸易比重偏低。据海关总署统计，2021 年大陆自台湾进口金额为 2 496.4 亿美元，其中一般贸易进口额为 892.1 亿美元，只占进口总额的 35.7%；进料和来料加工进口额为 1 022.9 亿美元，占 41.0%；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境货物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金额合计 567.1 亿美元，占 22.7%。再从台湾地区接获的外贸订单来源地看，从 2014 年起美国取代大陆和香港成为最大来源地，2021 年来自美国的订单额为 2 001.4 亿美元，占 29.7%；来自大陆和香港订单额为 1 750.5 亿美元，占 27.0%^[9]。从贸易规模上看，大陆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美国跨国公司实际上为台湾企业的最大客户。若考虑到在大陆生产再出口美国的份额，加上台湾地区直接对美出口份额，美国实际上仍为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

其二，跨国公司主导两岸电子信息产品等供应链。在电子信息产业等领域，美国苹果、惠普、戴尔等企业将手机、电脑等产品委托台企鸿海、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和硕等代工生产，其

生产基地集中在大陆, 形成“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为主的两岸供应链格局。以中美贸易摩擦开始的 2018 年为例, 台湾地区信息通信产业接到的出口订单为 1 485.1 亿美元, 其中来自美国 559.4 亿美元 (占 37.7%)、欧洲 501.8 亿美元 (占 33.8%), 大陆只有 138.5 亿美元 (占 9.3%)^[10]。同年, 该产业在大陆生产比重高达 89.7%, 加工生产后再出口海外比重高达 83.9% (其中出口美国比重为 32.8%)。

其三, 在大陆台商与当地产业链、市场体系融合度不够。在大陆台商经营以独资企业为主, 除传统食品、石化、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台商较深融入大陆市场外, 多数电子信息产业与当地市场、产业链融合不足。虽然近年来电子信息产业的台商在原料及零部件采购、运用当地人才等方面的在地化经营加快, 但总体上看其供应链主要发生在大陆的上下游台商之间, 即台商龙头企业赴大陆投资, 带动其配套厂商跟进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与大陆当地产业链融合度不高, 形同经济“飞地”。

其四, 两岸产业合作以制造业为主, 现代服务业合作滞后。长期以来, 台商在大陆投资行业布局中制造业占 80%左右。2008 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 两岸达成金融合作等一系列协议, 推动台湾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赴大陆投资, 两岸现代服务业合作迅速发展。2013 年《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签署后, 因受到岛内“反服贸”事件的影响, 目前仍处于搁置状态, 对两岸现代服务业合作形成严重制约。服务业已成为两岸特别是台湾的主导产业, 占台湾 GDP 与就业比重均在 60%以上, 而且服务业合作是典型的内需市场导向, 两岸服务业合作的滞后制约了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二) 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创新驱动基础尚不牢固, 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影响

在两岸经贸关系的要素驱动减弱后, 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创新驱动基础尚不牢固, 较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影响, 这对两岸产业融合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其一, 两岸高科技产业合作中核心供应链仍在台湾。台商在大陆代工生产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以组装为主, 所需核心与关键零组件仍在台湾及海外生产, 在大陆生产比重不高, 主要依赖从台湾进口。2021 年台湾以芯片为主的电子产业外贸订单, 在岛内生产的比重为 57.0%, 在大陆生产的比重仅为 31.3%, 远低于信息通讯产业在大陆生产的比重。其二, 拉动两岸高科技产品贸易与投资的主要动力为跨国公司。据海关总署统计, 2021 年自台进口芯片中, 以大陆为最终市场的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只占 27.8%, 其余均为加工贸易方式进口。从进口企业主体的分类看, 台商及外商占自台进口芯片的比重近 60%。也就是说, 苹果等欧美跨国公司将芯片等核心零组件交由台积电等代工生产, 然后出口到大陆由鸿海等台企组装生产, 最后销售到海内外市场。其三, 两岸高科技产业合作正受到中美战略博弈的强烈冲击。美国对华为等数百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和机构进行制裁, 逼迫使用美国软件、技术与设备的台企与大陆相关企业中止合作。2022 年 8 月, 美国出台《2022 年芯片和科学法案》, 阻止芯片资助接受方在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扩大某些芯片生产。2022 年 10 月, 美国商务部从多个方面加强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 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计算芯片、开发和维护超级计算机以及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 为两岸半导体产业合作设置新的障碍。台积电 2019 年公司年报显示, 仅华为公司即占其营业收入 14%, 是第二大客户。而 2021 年的年报显示, 来自整个大陆企业的营业收入只占 10.3%。据台媒报道, 在美国出台芯片出口管制新规后, 台积电为确保遵守美国的芯片法规, 暂停为上海壁仞智能科技制造先进芯片^[11]。

(三) 两岸融合发展的机制平台有待完善, 社会基础有待加强

2008 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 两岸在“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上开启和平发展新格局, 先

后实现直接“三通”、签署包括《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内的 23 项协议，两岸经济合作基本实现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但 2016 年民进党再次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协商联系机制中断，两岸已达成的机制平台及协议实施陷于停摆。这段时期，大陆推出的一系列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惠台利民措施，只能单向实施，受惠者更多是在大陆的台胞和台企。加上此前三年受疫情影响，两岸人员交流与往来规模几乎跌落至两岸开启交流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更直接限制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受益群体。同时，过去全球化背景下以产业转移拉动两岸贸易为主要特征的两岸经贸交流，在给台湾带来产业转型加快、出口持续扩张等财富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一定的收入分配效应。近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趋缓使财富效应相对减弱，分配效应相对上升，这被岛内“台独”势力污名为“民众无感、财团获益”^[12]。由于台湾地区的因素，岛内民众获得感仍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台湾不同产业、不同人群、南北区域存在着较大差异，甚至随着两岸在部分产业领域竞争性的上升，台湾地区部分民众与企业对两岸经贸交流产生疑虑。台湾地区《联合报》每年度的《两岸关系大调查》显示，2013—2022 年岛内民众对两岸经贸交流的看法，由“偏向互利共赢”转向“趋于竞争”。在当前两岸关系严峻复杂背景下，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受到诸多政治限制，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的基础与条件还不具备。大陆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与社会交流相互促进的机制、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两岸制度化合作推进兼顾效率、公平、共享的包容性发展还存在政治障碍。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政治社会外溢效果，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祖国和平统一基础需要着力化解的瓶颈。

（四）两岸融合发展的外部环境空前复杂，受地缘政治影响显著

传统两岸贸易投资格局与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分工深化密切相关。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跨国公司着眼于全球供应链管理革命，要求其代工生产的台湾企业向大陆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库存、接近市场，两岸供应链成为亚太地区供应链的重要组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地缘政治紧张正加剧地缘经济分裂的风险，经济全球化面临新挑战，国际供应链正在重组，两岸融合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空前严峻复杂。首先，地缘政治冲突影响下，全球经济急剧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世界经济增速将从 2021 年的 6.1% 放缓至 2022 年的 3.2%，占全球经济 1/3 左右的国家将在 2022 年或 2023 年发生经济萎缩^[13]。全球经济走势叠加疫情影响、电子信息产业周期性下行等，使两岸经济增速从 2022 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回落。2022 年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率仅为 2.43%，相比 2021 年的 6.53% 大幅回落。其次，地缘经济分裂风险上升。俄乌冲突发生后，各国和地区更重视经济安全，正强化供应链自主和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经济结盟，尤其是美国加快与同盟伙伴构建所谓基于“共同价值”的韧性供应链体系，组建针对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加大吸引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在本土生产。这些情况正对亚太及两岸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再次，跨国公司调整全球化策略。为应对地缘政治紧张，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布局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由过去的零库存策略转向增加库存、分散生产基地、调整供应链全球布局。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苹果公司开始加快分散制造产地。2021 年苹果公司在中国产量约占 95%，但承担约 8 成 iPhone 手机代工业务的台企鸿海集团已在印度设厂，并增加了最新机型 iPhone 14，估计到 2025 年在印度生产可能占 iPhone 总产量的 25%，越南、墨西哥、巴西也可能生产 iPhone^[14]。最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新技术革命加快国际供应链的地区化、本地化、短链化。亚太地区已

经形成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将促使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更为密切。新一代技术革命加剧国际供应链重组, 自动化和数字技术应用推动生产本地化,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要素成本在跨国公司生产区位选择中的角色, 影响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生产外向化、发散式的变动方向, 国际生产体系中出现更多较短的价值链和更为集中的地域分布^[15]。

(五) 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和台海局势紧张, 直接冲击传统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格局

首先, 中美贸易摩擦直接冲击两岸“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传统供应链格局。2018 年下半年以来, 美国先后对中国 5 000 多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 10%~25% 的关税。在中国大陆生产、出口美国的部分产品被加征高额关税后, 部分台企向东南亚等第三地转移, 部分产品回流岛内生产, 在大陆代工生产比例下降。到 2021 年, 台商在大陆生产再出口美国比重由过去的 30% 以上降至 24.0%, 其中信息通信产品和电机产品分别下降至 27.0% 和 32.5%。其次, 美台加快经济制度化合作, 重构排斥大陆的韧性供应链体系。近年来, 美台恢复所谓“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TIFA), 构建所谓“经济繁荣伙伴对话”(EPPD)、“台美科技贸易暨投资合作架构”(TTIC) 等新合作平台, 重点推动双方供应链合作。2022 年, 美台举行所谓“21 世纪贸易倡议”磋商, 意在为双方重构韧性供应链制定合作框架, 建立排斥和遏制大陆的“制度围墙”。将台湾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纳入韧性供应链是美台合作重点。2020 年 5 月, 台积电在美迫压下, 在美投资 120 亿美元、建立 5 纳米制程芯片工厂。2020 年 12 月, 台积电宣布将投资规模扩大至 400 亿美元, 增建 3 纳米制程工厂。美还加紧拉拢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共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 加大在国际上围堵中国。再次, 民进党当局加快推进经济“脱中入美”策略。民进党当局借中美战略博弈加大吸引大陆台商回流和外移, 2019 年 7 月 1 日发布所谓“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等三大方案, 到 2022 年 8 月共吸引资金回流 17 000 亿元新台币左右, 实际到位金额近 9 000 亿元新台币。民进党当局还与美国合力推进韧性供应链 2.0 计划, 唆使大陆台商向东盟、中东欧、北美等地转移生产链; 加大限制陆资, 采取所谓“逐层认定”新政策提高大陆资金赴台的认定门槛; 限制两岸技术合作与人才交流。

受全球经济下行及外部复杂政经因素挑战, 2022 年两岸贸易投资出现调整态势。两岸贸易增长势头减弱, 尤其是 2022 年下半年电子信息产业受全球需求减弱影响步入下行周期, 对以芯片和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两岸贸易形成直接冲击。2022 年台湾来自大陆的出口订单负增长 17.0%, 其中信息通讯产业负增长 19.0%。两岸贸易增幅减弱。据海关总署统计,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两岸进出口总额负增长 2.5%, 其中自台进口负增长 4.6%, 对台出口增长 4.2%。按台湾方面初步统计, 2022 年全年台湾出口金额为 4 795.22 亿美元, 增长 7.4%; 其中对大陆和香港出口额为 1 859.15 亿美元, 负增长 1.6%, 占总出口比重下降至 38.8%, 较 2021 年的 42.3% 明显回落。台商赴大陆投资趋于谨慎。长期以来台商对大陆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 70% 左右。据台湾方面统计, 2016 年后经核准的赴大陆投资占对外投资比重开始低于 50%, 2021 年更降至 31.8%。

三、新时代新征程两岸融合发展的新方向

当前, 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呈现出一系列融合发展的新特征,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挑战。

充分把握大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经济快速发展机遇，因势利导转变两岸经贸传统发展方式，化危机为机遇，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与社会交流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强两岸同胞命运共同体认知，夯实祖国和平统一基础，是今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以建构国内统一大市场为契机增强两岸融合发展的市场驱动

长期以来，台湾由于缺少内需市场的有效支撑，主要以代工生产为主，难以建立自有品牌。尤其是台湾电子信息产业虽然在国际代工市场上有很高的占有率，但国际知名品牌并不多见。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党的十八大以来扩内需促消费取得新进展，消费多年来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明显。但台商赴大陆投资后，除部分传统产业依托大陆市场建立自有品牌外，许多台企仍以代工生产为主、“两头在外”，习惯于代工生产方式。其重要原因是台企发展自有品牌与通路更为复杂，一些台商面临市场准入限制、产品内销因国内外标准与规格差异存在“水土不服”、在大陆拓展销售渠道成本高回款慢等问题。大陆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台商转型升级提供空前机遇。2022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大陆将持续推动在大陆台胞各领域同等待遇，对台经贸交流的制度、政策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进程将更密切衔接。这有利于台胞率先分享国内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等，破解台企拓展大陆内需市场障碍，助力台商扩大投资规模效应、加快向智能制造升级、建立自有品牌通路，改变“逐水草而居”特性，扎根大陆市场。

（二）以新经济发展持续为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2022 年 7 月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 年）》显示，数字经济成为驱动大陆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2021 年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17.1%，两年平均增长 13.8%，比全部投资快 9.9 个百分点^[16]。大陆新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为两岸产业合作提供巨大市场空间，但由于过去台湾高科技产业以为欧美跨国公司代工生产为主，参与大陆新经济发展的质与量均有待提升。应鼓励台商融入大陆新经济发展尤其是补短板、补弱项领域，吸引台商布局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更深嵌入大陆产业链、供应链以获取新的竞争优势。尤其在全球加快推进“双碳”目标下，大陆新能源产业市场前景广阔。2022 年 1 月至 1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25.3 万辆和 606.7 万辆，同比均增长一倍，市场占有率达到 25%，连续位居全球第一^[17]。新能源发电方面，2022 年 1 月至 10 月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 25.0 亿千瓦，同比增长 8.3%。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 3.5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6%；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 3.6 亿千瓦，同比增长 29.2%^[18]，未来两岸在节能减碳、发展储能产业等领域合作空间巨大。当前，新能源汽车电子化倾向为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带来新的机会，岛内龙头企业正加快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转型，但目前主要为欧美企业提供电子零组件配套。特斯拉电动车有 75% 的零组件如电机、线束、轮圈、充电系统、中控计算机、中控屏幕、车灯等，都由台湾供货商制造^[19]。部分发展电动车整车的台湾厂商也将销售与生产地点锁定东南亚等地，与大陆新能源汽车市场连接仍不密切。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两岸有很强的互补优势，应加快两岸产业合作，将台湾电子信息产业转型方向与大陆新能源汽车发展高度关联，将台湾优势

产能嵌入大陆产业链与市场体系, 为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动力。

（三）拓展两岸融合发展的国际纵深与布局

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地缘经济分裂风险, 但与此同时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在加快。有关调查显示, 得益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 RCEP 生效等积极因素的推动, 海外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82%受访企业预计未来一年在中国业务将实现增长, 93%的 RCEP 成员国受访企业预计该协议将增加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20]。加强利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把握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机遇, 扩大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 是防范化解地缘经济分裂风险的积极应对方式。首先, 推动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合作布局。为应对中美战略博弈, 部分在大陆台企已开始将中下游加工制造产能向第三地分散。对此应因势利导, 依托大陆产业体系和生态完整优势, 推动大陆台商在海内外合理参与产业分工布局, 加强在大陆的研发设计和中上游零组件生产; 利用 RCEP 区域内原产地累积规则、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等, 降低区域内产业链布局的关税与物流成本, 防止台商将中上游产能逐步带出, 将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嵌入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和“一带一路”建设, 进而与欧美市场相连接, 更有效应对和化解地缘经济分裂给两岸供应链带来的“脱钩”风险。其次, 加快推动制度、规则国际对接, 打破美台勾连意图构建的“制度围墙”。中国高质量对外开放正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在新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加快形势下, 应重点推动两岸企业在规则、标准等领域的对接合作。中国已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随着数字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上升, 要适时推进两岸在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数字产品服务税收、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数字贸易规则的合作。再次, 鼓励台商参与大陆推进内外贸一体化进程, 在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监管体制、加强规则对接、促进标准认证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等方面对台商实行同等待遇, 推动台商联动拓展大陆内需市场与国际市场。

（四）完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制度、政策和民间合作平台

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持续推进以同等待遇为重点的惠台利民措施, 实现两岸融合发展政策与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全面接轨。要提升惠台利民政策的法治化水平, 将其基本理念与原则、创新性和普适性政策逐步纳入涉台立法或与相关法律密切衔接, 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提升保护台胞权益的法治化水平。在两岸制度化合作机制停摆形势下, 大陆应加强和完善多层次、宽领域民间合作平台, 构建两岸民间性合作机制。在大陆自由贸易试验区、两岸产业合作区和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平台, 先行先试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创新试验。若未来两岸能够在“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上恢复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制度化协商, 应尽快推进 ECFA 后续协议的完成和实施, 就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推进“应通尽通”等构建高水平合作机制, 实现两岸双向互利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结一. 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J]. 两岸关系, 2022 (11): 5-8.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3] 刘国深, 芮鹏. 两岸融合发展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J]. 台湾研究集刊, 2019 (4): 1-9.
- [4] 吴宜. 新时代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J]. 台湾研究, 2018 (6): 50-57.
- [5] 苏美祥. 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内涵、难点与推进策略思考 [J]. 台湾研究集刊, 2020 (4): 101-110.
- [6] 台“经济部”投审会. 对海外投资事业营运状况调查分析 (2021 年) [EB/OL]. [2023-02-25]. <https://www.moeaic.gov.tw/news.view?do=data&id=1593&lang=ch&type=studyReport>.
- [7] 保供稳链 中欧班列 (渝新欧) 助力电子信息产业持续增长 [EB/OL]. (2022-12-22) [2023-02-25].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dfdt/298232.htm>.
- [8] 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发展情况发布会 [EB/OL]. (2022-09-21) [2023-02-25]. http://www.gwytb.gov.cn/xwdt/zwyw/202209/t20220921_12471899.htm.
- [9] 台“经济部”统计处. 2021 年 12 月外销订单统计 [EB/OL]. (2021-01-21) [2023-02-25]. <https://www.moea.gov.tw/MNS/dos/home/Home.aspx>.
- [10] 台“经济部”统计处. 2018 年 12 月外销订单统计 [EB/OL]. (2019-01-21) [2023-02-25]. <https://www.moea.gov.tw/MNS/dos/home/Home.aspx>.
- [11] 彭博: 台积电暂停为壁仞科技生产芯片 [EB/OL]. (2022-10-24) [2023-02-25]. <https://www.icspec.com/news/article-details/2096357>.
- [12] 张冠华. 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内涵与路径探讨 [J]. 台湾研究, 2017 (4): 1-8.
- [13] 通胀与不确定 [EB/OL]. (2022-10-11) [2023-02-25].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0/Issues/2022/10/11/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2>
- [14] 苹果生产大迁移, 供应链大分散时代? [EB/OL]. (2022-12-27) [2023-02-25]. <https://c.m.163.com/news/a/HPJA96EE0541RWUC.html>.
- [15] 杨丹辉.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与关键影响因素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 (7): 32-40.
- [16]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 (2022 年) 发布 数字经济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EB/OL]. (2022-07-30) [2023-02-25]. 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207/t20220730_400751.html.
- [17] 2022 年 11 月汽车工业产销情况 [EB/OL]. (2022-12-09) [2023-02-25]. http://www.caam.org.cn/chn/1/cate_148/con_5236518.html.
- [18] 国家能源局发布 1—10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 [EB/OL]. (2022-11-22) [2023-02-25]. http://www.nea.gov.cn/2022-11/22/c_1310678885.htm.
- [19] 特斯拉体内流着台厂血液 [EB/OL]. (2022-05-03) [2023-02-25].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912563>.
- [20] 报告显示 RCEP 扩大中国市场吸引力 海外企业继续看好中国 [EB/OL]. (2022-11-09) [2023-02-25].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rcep/rcepfgfd/202211/51400_1.html.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 百年演进与迭代升级

郭雷庆¹ 李新²

（1.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2.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1）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保证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百年历程中，反对民族分裂、解决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重大任务。在这一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日益系统、政策理论日益成熟。从1921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创建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制度保障路径。从1978到2012年，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加快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构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经济 development 路径。从2012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文化认同路径。新时代以来，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彻底清除民族分裂主义思想流毒，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依法惩治民族分裂主义、掌握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国际话语权、赋予经济社会发展以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功能、构建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协同工作体系、夯实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认同基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文化认同三条路径并非相互替代关系，而是螺旋式上升、互相支撑的关系，并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四个时期的主题任务基本一致。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实践路径的百年演进与迭代升级，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化反分裂斗争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3.02.007

作者简介：郭雷庆，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新疆工程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李新，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主义治理研究”（20CZZ009）

引用格式：郭雷庆，李新.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百年演进与迭代升级[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65-80.

提供了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加快经济发展和增进文化认同等经验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多民族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分裂斗争；民族分裂主义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2-0065-1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1] 民族分裂主义严重威胁我国的国土安全、国民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土是一个国家主权体现和实施的必要物理空间及存在空间，主要由领陆、领水、领空、底土四部分组成。国土安全指的是国家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海洋权益及边疆边境不受侵犯或免受威胁的状态^[2]。据不完全统计，自 1990 年到 2016 年底，“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共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3]。民族分裂主义是“三股势力”产生的深层根源与政治目标，严重危害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严重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开展反民族分裂主义斗争，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强盛的现实需要。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1]，持续肃清民族分裂主义思想流毒，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所指出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4]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保证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百年历程中，反对民族分裂、解决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重大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指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系统探索有效的反分裂路径，坚定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保障。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历史进程、实践路径和成功经验，对于更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问题指的是基于民族的发展和多样性而产生的民族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指民族间的不平等、不团结的问题，或者是指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等^[5]。民族分裂主义（或称为民族分离主义）是民族问题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指的是现代主权国家内部某一族群试图通过脱离现有政治共同体（母国）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或合并到另一主权国家的思想行为和政治活动。这一概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民族分裂主义的主体是现代主权国家内部的某一族群，并非泛指某一地区群体，这就与地方分裂主义（也有学者称之为政治分裂主义）或非族群旗号的恐怖主义区别开来，如“台独”“港独”和“伊斯兰国”等就不属于民族分裂主义的研究范畴。第二，民族分裂主义是

一种思潮,表面上往往将“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作为常态化的政治诉求,但实际上却将脱离现属国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作为终极目标。第三,民族分裂主义往往是某一族群部分势力自身的诉求,不被所属国家同意,因此其主要活动方式常常与暴力、恐怖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相联系。

可见,民族分裂主义的本质是“分疆裂土”,这将严重威胁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是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严重侵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曾经坚决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特别是恩格斯,他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就曾经毫不留情地斥责过东欧、南欧和法国的一些民族分裂主义运动^[6]。恩格斯认为:“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7]多民族国家必须借助国家政权,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措施,打击民族分裂势力,消解民族分裂主义,加强民族关系治理,“消除和化解不同民族围绕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利益、文化权利和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而产生的冲突和矛盾”^[8],强化国家认同。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国家政权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对民族事务进行治理的最核心主体。“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9]

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反分裂斗争的研究大多以个案研究为主,具体表现为对新疆、西藏地区涉及的民族分离主义问题的专题研究。比如,陈超等主要梳理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1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的反分裂工作^[10]。潘志平等研究了新疆地区民族分裂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11]。杨恕、李捷等探讨了新疆反分裂斗争中的国家认同建设问题^[12]。孙勇等主要研究了党的十八大之前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藏独”工作^[13]。在一般理论研究层面上,王建娥主张在既有国家的政治框架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包容性制度机制的设计来协调族裔文化差异,保证民族利益的公正分享,以此消解民族分裂主义的诉求,维护国家统一^[14]。刘泓等探究了当代国外反分裂的主要经验,强调要更加重视软性力量(教育体系、大众文化等)的作用,硬性力量(军事打击等)与软性力量应相辅相成^[15]。相关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史料借鉴和理论参考,但从整体性视角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开展反民族分裂斗争的理论研究较少,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新实践新经验的学术分析与总结偏少。

为此,本文探究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主要从制度、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梳理。制度、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轴,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从1921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建与完善构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制度保障路径。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加快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构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经济 development 路径。从2012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文化认同路径。从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虽在不同阶段有所侧重,但都是系统施策,综合发挥制度建设、经济发展和认同塑造的作用。历经百年演进和迭代升级,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步将反分裂的各种措施制度化和法律化,依法对民族分离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坚决遏制住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扩散和蔓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了

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二、1921 年到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制度保障路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实现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变，创造性地提出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有机结合。这是根据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制度安排，有力挫败了当时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民族自决”分裂中国的图谋。

从理论上讲，民族分裂主义会冲击国家内部的民族政治关系格局。分离势力不满足于民族间现行政治权利分配结构和民族政治关系格局，认为现有的国家政治体系不能充分反映和体现本民族的利益，本民族的政治权利受到损害，本民族未能获得充分的利益保障，本民族的利益在现有国家政治体系中受到压制或损害。在国外势力的挑动和影响下，他们试图摆脱或改变现有的民族政治关系格局，脱离国家政治体系^[16]。因此，找到一个既能够有效保障少数民族各项权利和利益，又能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制度安排，是解决民族分裂主义问题的关键条件之一。

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曾经主张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实行民族自决和联邦制。1922 年，党的二大提出赋予少数民族“自治”和“自决”权，提出“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7]。1923 年，党的三大提出“西藏、蒙古、新疆、青藏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民族自决”^{[17] 22}。1928 年，党的六大指出：“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17] 86} 1934 年 1 月，中央苏区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规定：“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独立的自治区域。”^{[17] 209}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提出的“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18]，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一，它是“被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的自决权，针对的是当时俄国沙皇的专制主义统治及其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列宁强调：“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19]其二，它的提出并不是鼓励任何民族分裂主义，其最终目的还是促进各民族的接近与融合。列宁指出：“我们想建立大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没有分离的自由，这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曾经主张的“民族自决”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压迫统治。但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恶意干涉，这种“先分离、再融合”的民族政策既容易被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也不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

到了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有了大范围的直接接触，逐渐认识到要找到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民族理论，开始由“民族自决”转向“民族自治”。例如，中国共产党在与苗、壮、土家、藏等 10 多个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所经之处，红军还留下了“实行民族自

治, 番、回族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彝民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17] 487}等口号。1936年, 毛泽东指出:“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 亦以区乡村为单位, 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 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 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17] 367}长征之后, 中国共产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 专门负责调查和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由此,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族人口“大杂居、小聚居”分布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民族问题有了突破性的认识, 对于后来选择和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 日本帝国主义经常打着“帮助民族自决”幌子, 故意挑拨各民族之间关系, 策划和煽动各民族之间的斗争, 尤其是利用满、蒙、回、藏等民族, 企图进一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对此, 中共中央指出:“日寇以华制华政策的一个方面, 就是分裂中华各个民族, 而特别集中力量于挑拨满、蒙、回的分立运动——实际是傀儡运动。”^{[17] 861}1936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内蒙, 是打着内蒙‘独立自治’的旗帜, 他利用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内蒙的压迫和内蒙的不满, 来挑拨内蒙一部分王公军人组织独立政府, 脱离中国, 而实际上在内蒙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权力, 完全掌握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中。”^{[17] 416}1937年,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进一步指出:“在目前宣传蒙人的独立或分裂, 甚至与汉族的统治者对立, 这是非常不妥当的, 而且会给日本以便利。”^{[17] 451}

为了避免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歪曲“民族自决”、煽动民族分裂, 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 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 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 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 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7] 595}

1941年4月, 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编写的研究回族历史和现状的著作《回回民族问题》。《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强调:“我们承认民族自决权, 并不等于我们主张在任何情形下都要实行民族自决, 并不妨碍我们去反对回族中可能发生的分裂投降活动……我们虽然承认民族自决权, 但是我们并不主张回回民族和其他民族实行自决, 实行分立。”^{[17] 917-918}同年11月,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 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 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7] 678}可见, 在抗日战争后期, 中国共产党虽承认民族自决权, 但民族政策已经转向民族区域自治。

1945年9月, 内蒙古地区再次出现了民族分裂主义的倾向, 部分原伪蒙古自治邦的官员宣布成立所谓“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鼓吹“内蒙古独立”。对此, 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民族分裂行为, 与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背道而驰, 决定派遣乌兰夫等同志去解决这一问题。1946年2月18日, 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指出“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17] 1000}, 主张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同年4月, 中国共产党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 以“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统一了东西内蒙古自治。1947年5月, 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内蒙古自治政府是非独立政府, 它承认内蒙民族自治政府仍属中国版图, 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的一部分。”^[20]这种将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的政策模式, 成功解决了民国时期长期存在的内蒙古民族分裂主义问题, 为中国共产党“最终确

立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思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践和实验过程”^[21]。

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总结道：“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史实，说明了中华各民族的解放决不能走民族分离的道路，而只能走民族平等联合团结的道路，从而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在统一民族大家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22]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7] 1290}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挫败了“藏独”和新疆分裂势力的企图。1952 年，中央政府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23] 1954 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写进我国第一部宪法之中，以国家最高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其法律地位。它具有坚持国家统一方向、加强民族团结和规范民族自治行为的显著制度效能。

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制造了多起分离暴乱。1951 年 2 月，毛泽东强调：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24]。据此，党中央以“慎重稳进”为指导方针，充分结合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先建立乡级、县级的自治区，再建立专署级、行署级的自治区，最后建立省级的自治区，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成立工作，于 1955 年 10 月 1 日正式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这一过程中，党中央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密切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优势，更好地号召和影响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反分裂斗争。毛泽东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24] 20}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和平解放西藏、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离叛乱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该协议明确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25] 1959 年 3 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对此，中共中央于当月 21 日发出《关于在西藏平叛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决定在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消除叛国分裂的根源，特别是对参加叛乱的分子采取一律没收其耕地、房屋、耕畜、农具，分给人民的政策^[26]。在民主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据“边平叛边改革、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的原则，团结各族群众，有步骤、有计划地摧毁了政教合一的旧政权，实现了政教分离，消灭了封建农奴制度，使农奴和奴隶成为拥有人身自由的国家公民，逐步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扫清了障碍。到 1960 年底，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西藏建立了区级政权 283 个、乡级政权 1 009 个，其中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 90%以上是藏族^[27]。随后，西藏又选举产生了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最终在 1965 年 9 月 9 日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郭雷庆, 李新.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 百年演进与迭代升级[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 65-80.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民族团结、抵御民族分裂主义、巩固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承认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又承认其具有区域自治权, 为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民族生态提供了空间, 赢得了各民族的认同”^[28]。1984 年通过、2001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以基本法的形式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并明确规定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为依法开展反民族分裂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三、1978 年到 2012 年: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经济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把加快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作为这一时期加强民族平等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关键任务。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特别是受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 一些长期寄居在国外的民族分裂势力伺机煽动民族极端情绪, 频繁制造分裂主义性质的骚乱活动和暴恐事件。面对严峻形势, 邓小平强调: “新疆稳定是大局, 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 谁搞分裂处理谁。”^[29] 1981 年 7 月, 党中央在转发《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的纪要》时指出: “搞好民族关系, 加强民族团结, 是进一步做好新疆各项工作的关键。”^[30] 1986 年, 邓小平提出了“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31]的重要论断。1990 年, 江泽民用“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32]概括了民族团结的深刻内涵。2003 年, 胡锦涛把“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33]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这些深刻的理论概括和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反民族分裂斗争提供了科学指引。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两条根本原则。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民族平等, 就不会有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则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 是促进各民族真正平等的根本保证^[34]。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条件薄弱等原因, 与内地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贫困问题较为突出。这种状况与民族分裂主义有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严重影响民族团结。正如邓小平所言: “在西藏, 要使生产发展起来, 人民富裕起来, 真正去做, 也并不难。只有这件事办好了, 才能巩固民族团结。”^[35]

从理论上讲, 贫困意味着缺少维持正常生活的物质供给, 包括充足的食物、体面的住宅、土地及其他财产和人力资本(教育和技能), 反映到精神层面则表现为少话语、无力感、边缘化、不公正、被忽视等^[36]。这些因素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传播下往往会使人们意识到国家内部族裔群体之间的差异。泰德·古尔(Ted Robert Gurr)通过对世界各地 227 个族群(或独特社区)动员与冲突的定量研究发现, 经济差异、贫困、歧视性待遇对 1980 年代群体表达不满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经济不满加上其被限制进入政治职位和失去自治的集体历史的怨恨, 形成相对被剥夺感, 进而激发出

分裂主义性质的集体动员^[37]。因此,在一个国家中经济发展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更容易受到分裂主义的威胁。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制定相应的分配政策,促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实施一定的经济补偿,通过补偿计划尽力消除或减少地区之间的横向不平衡,以遏制分裂主义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威胁^[3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39],依据各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给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防范和消除民族分裂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一,实施财税扶持政策。为了恢复和发展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生产,国家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支出力度。自 1980 年全国实行“分级包干”财政体制后,中央对新疆、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区实行收入全部留用,增加“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地区财政预备费”和“民族地区机动金”财政补贴。据统计,1980 年至 1993 年,中央政府对西藏投入了大量资金:定额补助从 1980 年的 4.96 亿元增加到 1993 年的 12.16 亿元,增长 2.45 倍;在 14 年间财政补贴累计达 115.88 亿元^{[34] 255}。此外,国家在新疆和西藏地区还实行了税收优惠政策。在西藏,国家长期实行“税制一致、适当变通”的税收政策;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改革,从 2010 年 6 月 1 日起,对新疆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税率都是 5%,单此一项就给新疆每年增加财政收入上百亿元。

第二,实施对口支援政策。在“先富带动后富”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实行内地省市支援边疆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政策,鼓励中央各部门、全国各有关省市、部分国有企业,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发展需要,在物质、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援,将经济发达省市的经济优势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据有关统计,1995 年至 2000 年,中央有关部委和对口支援的省市,在 62 项工程之外,还落实了 668 个援助、合作项目,投入资金达 8.8 亿元,这帮助西藏生产总值从 1994 年到 2000 年连续 7 年实现两位数增长^[40]。从 1997 年到 2009 年,14 个援疆省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累计为新疆无偿援助资金、物资折合人民币 43 亿元,援建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工程和民生工程;已经实施合作项目 1 200 多个,到位资金 250 多亿元^[41]。

第三,实施扶贫开发政策。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贫困现象比较突出。为了改善贫困地区状况,激发贫困地区内部活力,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扶贫专项资金,包括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专项低息贷款等,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开展开发式扶贫活动,鼓励开发本地资源和发展生产。新疆、西藏通过开展生产技术培训,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就业能力和科技素质,保障就业;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加工业;开发特色优势产业,包括有色金属深加工产业、棉纺产业、特色林果业等。1994 年春,国务院决定从当年起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在 20 世纪的最后七年内,基本解决当时全国 8 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此计划实施期间,中央和新疆地区投入三项扶贫资金 50.6 亿元,对新疆贫困人口的人均投资强度达 2 875 元;经过七年努力,新疆贫困人口由 1993 年的 176 万人减少到 44 万人,解决了 132 万人的温饱问题^{[41] 389-390}。

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策方面,1999 年 9 月党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在西部民族地区实施多个重大项目,涉及水利、电力、交通、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等各领域,带来

郭雷庆, 李新.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 百年演进与迭代升级[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 65-80.

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少数民族群众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2000 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中央政府给新疆的财政补助逐年增长, 年均递增 24.4%, 2008 年达 685.6 亿元; 2008 年, 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3 503 元, 比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 年增长 28 倍, 比西部大开发初期的 2000 年增长 1.2 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1 432 元, 比 1978 年增长 35 倍, 比 2001 年增长 1 倍^[42]。同时, 国家实施兴边富民行动。国家除了帮助边疆民族地区建立安居工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设施建设外, 还鼓励边境地区发展边境贸易, 出口民族特色产品。2007 年和 2011 年国家先后将“兴边富民行动”纳入“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 部署了新世纪新阶段兴边富民行动的重点任务, 并设立“兴边富民行动基金”, 用于支持全国兴边富民行动重点县区的经济发展。据统计, 2002 年至 2012 年, 国家民委、财政部和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调度安排资金 6.72 亿元, 用于开展边境地区和区内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教科文卫、生产发展、实用技术培训等项目 1 665 个; 投入资金 3.67 亿元, 用于建设兴边富民行动安居工程 2.9 万多户, 解决了边境地区和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群众的住房问题^{[34] 268}。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通过制定发展优惠政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等重大举措, 尽可能缩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 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为边疆民族地区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凝聚民心 and 消除滋生民族分裂主义的土壤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四、2012 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文化认同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对民族分裂、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创新举措, 特别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 着力强化国家认同意识, 为彻底遏止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传播和蔓延提供了思想指引。

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是国家认同危机的结果, 而族群、宗教、地域等文化认同的政治化并以寻求国家身份为目标则是其本质。这样一来, 基于认同角度建构国家凝聚力, 就不能仅依赖于对“不满”“差异”等认同叙事的安抚或妥协, 而需要国家在文化、理念等层面上形成相对于分裂认同的先进性, 从而建构国家的文化及政治向心力和凝聚力^[43]。因此, 应对民族分裂主义思潮, 必须在尊重多元族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国族文化认同, 培养命运与共的文化价值共识, 形成同属“一体”的国民心理归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便立基于此。2014 年 9 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 “解决好民族问题, 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 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 “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44]。2017 年, 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2021 年,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 “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 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

想的渗透颠覆。”^[45]2022 年,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在心理和文化层面上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高度认同,包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因此,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只有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块压舱石,民族团结的航船才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也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民族分裂的精神土壤,清除敌对势力借用民族问题实施干扰破坏的病毒基因^[46]。新时代以来,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彻底清除民族分裂主义思想流毒,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系列措施。

第一,更加注重依法惩治民族分裂主义。国家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法律法规体系,积极开展反分裂法治宣传教育,形成维护国家统一和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民族分离势力为达成其目标,往往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利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蛊惑人心、组织力量,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秩序,同时与国外反华势力沆瀣一气、内外勾连,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对此,中国共产党以法治严惩民族分离活动,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的反分裂法治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对禁止制造民族分裂行为作了明确规定。《刑法》第 103 条详细界定了此类行为的量刑标准,如“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此基础上,2015 年 7 月和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相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规定要“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民族分裂活动”,“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极端主义,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2017 年 6 月 14 日,国务院第 176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的《宗教事务条例》规定:“不得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不得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进行恐怖活动。”根据国家法律和相关法律法规,新疆结合本地区特点进一步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2016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2017 年)、《关于坚决贯彻落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坚定维护民族团结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的决议》(2017 年)、《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严肃反分裂斗争纪律的规定》(2017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办法》(2022 年)等地方性法规。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进一步将反分裂的各种措施制度化和法律化,为依法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提供了强大的法治保障。同时,各级党政部门在中华民族认同教育的推动下,制定本地区的普法宣传教育计划,将反分裂的法制法规予以广泛普及。

第二,更加注重掌握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国际话语权。国家围绕国际涉疆、涉藏舆论热点问题,主动开展舆论宣传和舆论斗争,彻底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全面展示新疆、西藏发展的巨大成就,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反分裂斗争中的话语建构作用。当前,国际反华势力一方面大肆攻击和抹黑新疆的反恐、反分裂政策,另一方面支持境外分裂势力通过电台、网络、书籍、传单、信件等各种途径对新疆地区进行分裂主义思想渗透。对此,中国共产党把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摆在突出位置,

郭雷庆, 李新.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 百年演进与迭代升级[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 65-80.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主导权。2021年8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 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 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45]从2016年到2021年, 国务院新闻办相继发表了《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2016年6月)、《新疆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2017年6月)、《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2019年3月)、《伟大的跨越: 西藏民主改革60年》(2019年3月)、《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2019年7月)、《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2021年5月)、《新疆各民族平等权利的保障》(2021年7月)等7部白皮书。2019年至2021年,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陆续播出了以新疆反恐为主题的4部纪录片: 《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幕后黑手——“东伊运”与新疆暴恐》《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这4部纪录片详细展示了新疆发生暴恐事件的原因与危害, 回击了西方反华势力的虚假指责, 披露了在西方反华势力支持下“三股势力”犯下的各种罪行。直观的、权威的信息有利于制止不实言论的产生与蔓延。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揭露民族分裂势力的谎言与罪行, 让民众充分认识到民族分裂主义的严重危害, 从而在大众舆论场形成反恐、反分裂的正确价值观引领。同时, 这些举措也向国际社会分享和展示新疆、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条件的巨大改善,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争取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三, 更加注重赋予经济社会发展以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功能。我国打赢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 进一步加强对口援疆、援藏工作,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认同需要以切实改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缩小民族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依托。“发展差距带来的矛盾和问题, 常常被民族分裂势力夸大和利用, 成为它们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民族分裂的借口。”^[4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改善民生为基础, 将“贫困地区扶助”与“弱势群体帮扶”结合起来, 在社会资源权威性分配过程中, 加大对边疆区域和弱势群体的倾斜性照顾, 避免民族身份(少数民族)、区域身份(边疆区域)和阶层身份(社会底层)的复合叠加, 不断弱化区域二元结构和民族二元结构,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各民族福利的普惠型增长^[48]。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把打赢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来抓。2021年2月, 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其中, 新疆地区“现行标准下306.4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49]; 西藏地区“62.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74个县(区)全部摘帽, 26.6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顺利入住, 3037个扶贫产业项目直接带动23.8万群众脱贫”^[50]。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加强对口援疆、援藏工作。2013年以来, 党中央召开了五次全国对口援疆工作会议, 对口援疆工作取得巨大成就。2014—2019年, 新疆地区生产总值由9195.9亿元增长到13597.1亿元, 年均增长7.2%; 中央财政对新疆转移支付6年合计2万多亿元; 19个援疆省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含兵团)964亿元, 实施援疆项目1万余个^[51]。在援藏工作方面, 1994年至2020年, 对口援藏省市、中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分9批共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建设项目6330个, 总投资527亿元,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2012年的710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080亿元; 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9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5698元提高到16935元^[52]。边疆民族地区全面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和对口援疆、

援藏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回击了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保护少数民族经济、教育、发展等权利的抹黑和责难，从根本上改变了边疆民族地区贫穷落后的局面，全面提升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铲除了滋生民族分裂主义的社会土壤，不断夯实文化认同的民心基础。

第四，更加注重构建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协同工作体系。国家充分发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相关部门在反分裂斗争中的协同治理作用，积极引导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政府是国家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直接实施者，是涉及民族自治地方各族人民利益的权威分配者^[53]。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对各族群众形成了最直接的认知感受，它是引导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防范民族分裂主义的“最直接主体”。协同治理民族分裂主义行为表现在：基层公安部门主动、持续、有力地打击民族分离势力，从根本上消除其发动暴恐活动的组织基础，不给分离势力以任何幻想^[54]。基层宗教工作部门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严厉打击披着宗教外衣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行为。基层政法综治部门，按照区县、乡（镇）、村等不同级别进行街面巡逻防控和基层治安防控等体系建设，构筑点线面相结合的常态化社会治安防控网。基层网信部门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加强网络技术手段的运用，建立专业化的网络应对机制。基层宣传部门积极主动地向各族群众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群众意见及可能出现的分裂隐患。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上传下达”“下情上达”中推进反分裂工作的良性开展。这些工作的有效开展都必须“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富裕一方、团结一方、安定一方的坚强战斗堡垒，使每一名党员都成为维护团结稳定、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面旗帜”^{[9] 161}。只有这样，才能防范和清除民族分裂主义对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影响，遏制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传播，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价值观念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不断增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感。

第五，更加注重夯实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认同基础。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中华文化认同建设。其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凝聚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价值共识，形成畅通的文化沟通模式，促进各民族坚定中华文化认同。比如，在民族地区乡镇明显地段设置文化公益广告牌或宣传栏，长期宣传“三个离不开”；制作推出一批“我们的主流价值观”主题公益广告宣传画，把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边境地区广为传播；在民族地区学校中开展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55]。其二，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在新疆广泛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81 个，建成互嵌式居住的村（社区）4 783 个、小区 9 223 个^[56]。2017 年新疆有 109 多万名干部职工与 146 多万户各族基层群众结对认亲，结对走访完成率为 99.74%，办好事实事 227 多万件，惠及各族群众 456 多万户^[57]。其三，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引导各族群众认识到“我们”都属于拥有共同理想信念和共同利益追求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同心共筑中国梦。比如，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县博物馆以馆藏文物资源为依托，用一件件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文物，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口口相传的民族团结故事。在传统节日、纪念日来临之际，该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还走进中小学、幼儿园，向学生宣讲民族文化故事，开展手工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郭雷庆,李新.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百年演进与迭代升级[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65-80.

深入人心^[5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和认同等一系列心理活动”^[59],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筑牢反分裂反渗透思想防线。

五、结语

在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日益系统、政策理论日益成熟。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通过创立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度保障路径,加快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经济发展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路径来系统应对和解决民族分裂主义问题,取得了反分裂斗争的伟大胜利,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三条路径既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内容,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三条路径并非相互替代关系,而是螺旋式上升、互相支撑的关系,并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四个时期的主题任务一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建与完善,有力保证了我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社会条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获得跨越式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成效显著,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全社会共识。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实践路径的百年演进与迭代升级,也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化反分裂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启示。一是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反分裂的民族法制建设,继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骨干、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律法规体系。二是要进一步加快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好援疆、援藏工作,不断缩小民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三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之以恒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建构,提升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身份的高度认同。

彻底清除民族分裂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当前,我国仍面临民族分裂主义形势复杂多变、分裂活动的策略和方式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分裂主义思想的传播更具煽动性和技术性、西方反华势力的介入等问题。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第一,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即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使其融入制度、体制、法律、组织、宣传、教育、民生等各个方面,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制度化、体系化、法律化。“有感”即要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内化于心”,把相关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让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有效”即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标的评估与检验,要在民族工作过程中通过建立效果评价机制回顾和总结民族工作的经验和不足,并根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工作方式,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在各项民族工作中发挥主线作用。第二,加强对美西方涉华干预新趋势下反分裂斗争的研判。在涉疆问题上,美国不断炒作涉疆议题,实质是以此作为打压中国和分裂中国的舆论工具。我们在外

宣方面既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坚决予以反击,又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落入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的“炒作陷阱”。同时,要开展好“文化润疆”工程,充分利用好大数据、自媒体、新媒体、国际媒体、社交网络等,加强数字时代的反分裂主义宣传,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引导各族群众自觉抵制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第三,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建设。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民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的意见》,要求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建立和完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新型智库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建设,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第四,加强边疆与内地的经济互补联系,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促进经济循环畅通。要继续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边疆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利益矛盾问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2] 范维澄, 陈长坤, 翁文国, 等. 国家安全科学导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447.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3.
- [4]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N]. 人民日报, 2023-02-08(1).
- [5] 沈林. 中国的民族国情与理论政策[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7: 210.
- [6] 宁骚. 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82.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59.
- [8] 严庆. 冲突与整合: 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45-146.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59.
- [10] 陈超. 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 [11] 潘志平. 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 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
- [12] 杨恕, 李捷. 分裂与反分裂: 分裂主义研究论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13] 孙勇. 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1989—2005)[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 [14] 王建娥. 民族分离主义的解读与治理——多民族国家化解民族矛盾、解决分离困窘的一个思路[J]. 民族研究, 2010(2): 13-25+107.
- [15] 刘泓, 等. 当代国外民族分裂主义与反分裂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16] 周平. 民族政治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137.
- [17]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8.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列宁论民族问题[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7: 312.
- [19] 列宁全集: 第2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43.

郭雷庆, 李新.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实践路径: 百年演进与迭代升级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65-80.

- [20] 《蒙古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 蒙古族简史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350.
- [21] 王珂.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310.
- [22] 李维汉. 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646.
- [23] 金炳镐. 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 [G].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469.
- [24] 毛泽东文集: 第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146.
-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2.
- [26]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 (1949—2004): 第1卷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150-151.
- [27]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 解放西藏史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515.
- [28] 马俊毅. 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06.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199.
- [30]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148.
- [31]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61.
- [32]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4: 237-238.
- [33]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民族工作文献选编 (2003—2009年)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2-3.
- [34] 贺新元, 等. 和平解放以来民族政策西藏实践绩效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29-130.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275.
- [36] 梅里·卡巴莱诺-安东尼. 非传统安全研究导论 [M]. 余潇枫, 高英, 等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89-90.
- [37] Ted Gurr. Why Minorities Rebel: A Global Analysis of Communal Mobilization and Conflict since 1945 [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 (2): 161-201.
- [38] Weber Shlomo and M. L. Breton. The Art of Making Everybody Happy: How to Prevent a Secession [J]. IMF Staff Papers, 2001 (3): 403-435.
- [39] 胡锦涛.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N]. 人民日报. 2005-05-28 (1).
- [40] 《西藏自治区概况》编写组. 西藏自治区概况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664.
- [41] 朱培民, 王宝英. 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史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 199.
-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疆的发展与进步 [EB/OL]. (2009-09-22) [2023-02-22].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2009-09/22/content_8814901.htm.
- [43] 李捷, 杨恕. 反分裂主义: 共识和应对 [J]. 国际政治研究, 2019 (4): 9-43+5.
- [44]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李克强俞正声讲话 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14-09-30 (1).

- [45]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46] 吴杰明. 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98.
- [47] 沈晓晨. 分裂主义与国家认同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66.
- [48] 周平, 等. 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420.
- [4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 [N]. 新疆日报, 2021-02-08 (1).
- [50] 西藏自治区政府. 2021 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 [N]. 西藏日报, 2021-03-24 (1).
- [51] 习近平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09-27 (1).
- [52] 对口支援西藏: 中国推动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创举 [EB/OL]. (2022-08-22) [2023-02-20]. http://tibet.news.cn/2022-08/22/c_1310654579.htm.
- [53] 李俊清. 新中国民族关系的回顾与前瞻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339.
- [54] 张金平. 当代恐怖主义与反恐怖策略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9: 177.
- [55] 王超品. 当代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的制度机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199-200.
- [56]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这十年”主题新闻发布会 [EB/OL]. (2022-08-27) [2023-02-20]. http://www.china.com.cn/zhibo/content_78394608.htm.
- [57]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谱写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新篇章 [EB/OL]. (2017-06-28) [2023-02-20]. <https://www.neac.gov.cn/seac/mztj/201706/1011836.shtml>.
- [58] 马颖. 陇原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常开长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甘肃实践” [N]. 甘肃日报, 2021-11-24 (1).
- [59] 青觉, 赵超.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 [J]. 民族教育研究, 2018 (4): 5-13.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三心二意”的追随者： 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

周明 何舒雯

（兰州大学 中亚研究所/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2019 年欧盟出台题为《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的政策文件，标志着欧盟对华政策发生显著转变。欧盟在文件中愈发强调中国作为其“制度性对手”的影响，并开始跟随美国围绕涉疆议题对华施压，中欧关系因此横生波折。相较于美国各界已达成高度共识，采取“全政府—全社会”的战略模式操纵涉疆议题，欧盟涉疆立场呈现“三心二意”的特点，即欧盟的涉疆立场不仅与美国有所差异，其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在欧盟三大机构中，欧洲议会操纵涉疆议题最为积极，而欧盟理事会与欧盟委员会均限制操弄力度，以防止中欧关系脱轨。根据操纵力度的不同，欧盟成员国可分为以法德为首的有限参与派，以立陶宛为首的积极介入派以及以匈牙利为首的拒绝附和派。面对欧盟内部在涉疆立场上存在的分歧，我国应在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基础上，加强对欧沟通以增信释疑，保持中欧整体关系不脱轨，并侧重各国、各机构的特性，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策略，从而更好地维护我国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关键词：欧盟三大机构；欧盟成员国；涉疆议题；欧盟对华政策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2-0081-23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23.02.008

作者简介：周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何舒雯，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19VXJ034）；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战略发展专项“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及影响研究”（2022jbkyzx005）；兰州大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大国中亚政策调整与‘一带一路’建设”（2022jbkyjd001）

引用格式：周明，何舒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81-103.

在中国国家发展和向西开放中,新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我国西北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需加强党对新疆工作的领导,健全完善工作协同机制,使各方面主体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完整准确地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1]。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中美关系恶化急剧推动中西关系全面复杂化,外部对华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在此背景下,欧美反华势力无视中国政府为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所做的巨大努力,无视新疆人权事业取得的历史性进步,歪曲事实,无中生有,大肆炒作涉疆议题,妄图借此抹黑中国形象,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破坏新疆繁荣稳定^[2]。相较于美国“全政府—全社会”的操纵模式,欧盟涉疆立场呈现出“三心二意”的典型特征。其中,“二意”指的是在涉疆议题上,欧盟目前形成两派意见:反华、不反华;“三心”则代表欧盟内部在涉疆行动上呈现出积极介入、有限参与及拒绝附和三种类型。为何欧盟内部的操纵立场无法统一?欧盟三大机构和各成员国在涉疆议题上的具体表现如何?我国又该怎样有效应对涉疆立场不一的欧盟?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具体分析欧盟及其成员国涉疆立场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就各机构、各成员国的特性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旨在进一步维护好中国的核心利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的目标^[3]。

一、现有文献评估

西方炒作涉疆议题由来已久,但学界对此研究尚不全面。其中,美国于 20 世纪 40 年代起就从政治上介入涉疆议题,并不断拓宽关注领域。学界对此基本达成共识:美国是涉疆议题国际化的最大推手,对其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注较少。

目前,针对美国涉疆干预的既有研究聚焦在历史、政治以及传播三大视角和全局、微观两大层次视野上。在三大研究视角的相关论述中,靳晓哲认为历史视角的研究多集中于美国介入新疆事务的历史与政策方面,政治视角的研究多集中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人权”表达上,而传播视角的研究则多集中于对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探讨与分析方面^[4]。在两大层次的研究框架中,李捷、杨恕等学者从宏观上系统地阐述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关系的历史互动及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变化对美国操纵涉疆议题的影响^[5]。部分学者还从微观层面分析了美国相关行为体操纵涉疆议题的工具动机以及手段等。如郭永虎、熊小艳对美国国会涉疆立法活动的动向、特征、影响进行剖析^[6];罗娟丽、刘长敏从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两份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关于涉疆议题的报道入手,尝试揭露美国媒体在操纵涉疆议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7];刘卫东则主要关注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操纵涉疆议题中发挥的向官方机构施压、为新疆分裂势力提供财政支持等作用^[8];励轩在其著作中探寻了美国学者对涉疆议题的反应,认为有部分学者参与操纵涉疆议题,为美国政府涉疆决策提供咨询^[9]。可见,学界对美国操纵涉疆议题的研究视角较为丰富、研究内容较为全面。

关于西方世界中涉疆议题另一大操纵实体——欧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学者出于美欧价值观趋同以及同盟关系的原因,倾向于将其看作美国操纵涉疆议题的“追随者”,将其纳入对美研究的整体框架。如赵怀普认为,虽然美欧在政治领域的具体分歧日益增多,但共同价值观依旧是

周明, 何舒雯. “三心二意”的追随者: 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81-103.

美欧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在美欧的涉华互动中, 两者会基于共有的人权、民主价值观操纵涉疆议题, 使解决中国所谓“人权”问题成为跨大西洋对华战略的切入点和突破口^[10]。目前专门研究欧盟操纵涉疆议题的成果稀缺, 既有论述也未过多关注欧盟内部在涉疆立场上分歧犹存这一典型特征。

(一) 国内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

欧盟作为致力于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超国家行为体, 其在诞生之时 (包括欧共体) 就主张内部各机构以及各成员国之间协调政策, 使欧盟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然而, 随着多重危机的爆发, 欧盟内部分歧日益显现。崔翠翠认为受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复苏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 欧盟内部离心力不断增强, 其在一系列危机问题上难以达成有效的共同立场^[11]; 李明明进一步提出, 受多重危机的连续冲击, 欧盟内部各种政治分歧日益凸显和深化, 具体表现为成员国国内多种力量的对立、成员国间的分歧以及欧盟各机构间的摩擦^[12]。

在涉疆议题上, 欧盟内部同样不是铁板一块, 欧盟三大机构以及成员国的涉疆立场各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盟操纵涉疆议题的力度。国内学界专门研究欧盟三大机构操纵涉疆议题的论著不多, 更多是将其包含在三大机构对华政策立场的研究内。刘娟平、张利华指出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对华政策立场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相似性在于三大机构都认为经贸合作是中欧双边关系中的最优先政策考虑, 且都对中国人权状况表示关切并呼吁各成员国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一致; 差异性表现在三大机构对华政策的侧重点和务实程度有所不同^[13]。此外, 国内学界对欧洲议会的关注高于对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的关注。张磊分析了欧洲议会在中欧关系中的作用, 指出欧洲议会在欧盟对外关系领域的权能得到强化, 其涉华议题已由单纯关注人权转变为关注政治、经贸、社会、发展、外交环境等多个领域, 欧洲议会在未来中欧关系中的地位将日益显著^[14]; 朱力宇、代秋影则具体评析了欧洲议会涉华人权决议, 认为欧洲议会活跃于人权领域, 是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主阵地, 经常在欧盟对华政策上发出不同腔调^[15]。

国内学界专门研究欧盟成员国干预涉疆议题的成果也较为缺失, 更多将其包含在各成员国对华政策的整体框架下。其中, 研究法德对华政策的论著最多。在关注德国的研究中, 熊炜、姜昊指出德国新政府提出的“价值观外交”会使其在对华政策中更加强调人权和价值观议题, 从而加大对涉疆议题的操弄力度^[16]; 陆娇娇、吴江强调德国绿党在自由主义价值叙事框架下会加强与中国的对抗^[17]。在关注法国的研究中, 国内学者更多侧重马克龙执政以来对华政策的变化。王鲲鹏认为马克龙继承了法国戴高乐主义的外交传统, 坚持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原则, 努力平衡大国关系, 中法关系稳中有进^[18]; 杨成玉强调马克龙在 2022 年法国大选中连任后有望进一步延续法国内外政策, 未来中法两国有望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 平稳推进务实合作^[19]。对屡次充当“反华急先锋”的立陶宛和多次反对欧盟对华制裁决议的匈牙利等代表性国家, 仅有少数研究关注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走向。如刘作奎指出 2018 年匈牙利大选后, 其政府将继续奉行“向东开放”的对华友好政策^[20]; 杨博文强调立陶宛积极推进冒进式外交策略, 其反华操作是受自身价值观、国内政党更迭以及美国因素的影响^[21]。

总之, 国内学界虽意识到欧盟内部涉疆立场存在分歧, 但研究三大机构及成员国在涉疆议题上的具体表现的论著还未出现。

（二）国外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

国外学界同样认为欧盟内部分歧日益显现。Heribert Kohl 认为 2004 年欧盟扩员后对自身经济更动态的发展，以及社会标准的进一步普及怀有强烈的乐观情绪。然而，始于 2008 年的银行和债务危机暴露出其结构性缺陷，导致欧盟内部分歧日益加剧^[22]。Katja Levy 和 Ágota Révész 认为欧盟成员国对华态度不一已是常态，强调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不同成员国在经济和文化话语领域的核心—外围关系^[23]。Pepijn van Houwelingen 等则从探寻欧盟内部 18 个国家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入手，认为虽然欧盟自称价值观共同体，但实际上整个欧洲的基本核心政治价值观存在很大分歧^[24]。Giuseppe Balducci 打开欧盟的“黑盒子”，探寻欧盟机构和成员国在欧洲对外关系的多层次治理体系中的相互作用，认为成员国和欧盟机构在欧洲外交决策体系内的利益互动并没有带来规范的趋同^[25]。总之，国外学界对欧盟内部分歧做出充分研究，但对欧盟内部各行为体在涉疆议题上所持态度的差异未进行详细探索。少数学者从人权角度出发对欧盟内部行为体在涉疆议题上的分歧做出初步分析。如 Max Roger Taylor 认为，有些欧盟国家受中国经济影响大，故他们不愿意与中国提出双边人权问题来损害彼此间经济合作^[26]。Ann-Charlotte Buntinx 和 Francesca Colli 则认为欧盟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缺乏统一性和一致性，成员国倾向自己采取行动而不在欧盟层面协调彼此行动，欧盟三大机构也在欧盟涉疆人权决策中作用各异，其中欧洲议会最积极、最公开^[27]。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均认为在欧盟内部分歧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欧盟三大机构和成员国在涉疆议题上所持立场不一。然而，现有研究具体分析三大机构和成员国在涉疆议题上所做表现的论著短缺，着重从人权价值看待涉疆议题，未将各行为体现实利益纳入考虑中。本文将重点分析欧盟三大机构和若干有代表性成员国在涉疆议题上存在的分歧以及态度各异的原因，为我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与安全提供参考。

二、欧盟三大机构在涉疆议题上的态度差异及其原因

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构成了欧盟的权力三角，这三者在欧盟涉疆决策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在 2021 年 3 月，欧盟同意就所谓涉疆人权问题对华实施制裁，但三大机构对待涉疆议题的看法依旧存在分歧。其中，欧洲议会表现最为积极，多次通过涉疆决议，并要求欧盟在涉疆议题上坚决对中国展现强硬姿态；而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仍对干预涉疆事务而恶化中欧整体关系保持警惕，它们都曾对欧洲议会的积极操弄表示不满，并呼吁各机构应在操纵涉疆议题上保持一致。下文将具体分析三大机构的涉疆立场，并探究三者涉疆态度不一的原因。

（一）三大机构操纵涉疆议题立场的异同

欧盟三大机构的涉疆立场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相似性表现在三者均对新疆人权状况表示“关切”，并呼吁彼此在涉疆政策上保持一致；差异性则体现在三大机构对华政策侧重点不同，导致各自操纵涉疆议题的程度存在区别。其中，欧洲议会作为欧盟的立法机构，也是一个民选机构，其意识形态色彩最为浓厚，热衷于对涉疆问题进行扭曲事实的指责和渲染；欧盟理事会属于国家间机构，偏向关注外交安全等方面事宜，虽在少数问题上表达对中国的不满，但在相当一部分问题上仍保持偏中性的立场和态度；欧盟委员会作为欧盟的行政机构，更注重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对华态度相

周明, 何舒雯. “三心二意”的追随者: 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81-103.

对务实。三者操纵涉疆议题的力度从高到低排序: 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 务实程度从高到低排序: 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

(二) 三大机构操纵涉疆议题存在立场差异的原因

根据已有学者利用最相似系统设计 (MSSD) 即求异法分析发现, 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在决策对象、信息来源等方面都高度一致^{[13] 92}。因此, 本文认为三大机构性质职能和决策程序的不同是造成彼此立场差异的主要原因。

1. 欧洲议会: 与民意深度绑定

欧洲议会是欧盟立法、监督、预算和咨询的机构。在中国与欧盟存在的若干分歧中, 欧洲议会经常扮演“麻烦制造者”角色。在涉疆议题上, 欧洲议会延续反华风格, 大力操纵涉疆议题。2021年9月, 欧洲议会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该报告共形成70条决议, 全文可分为三部分: 援引条款、背景介绍和正式决议。总体而言, “新欧中战略报告”虽然认为中国是欧盟的“合作和谈判伙伴”, 但其大幅渲染中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 “将人权置于与所有第三国, 包括其战略伙伴关系的中心”, 将中欧定位为“制度性对手”。在背景介绍部分, 欧洲议会更是基于偏见和谎言对涉疆议题指手画脚。其中, J、K两项集中指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犯有所谓“强迫劳动、大规模监视”等罪行^[28]。

欧洲议会热衷炒作涉疆议题, 与其作为欧盟民选机构的性质职能相关。一方面, 欧洲议会作为欧盟内部唯一的超国家民选机构, 其参选率的高低是衡量欧洲议会“民主代表性”的重要标准。欧洲议会权力的大小、各议员曝光度的高低以及自身有无代表性都与选民密切相关。为了吸引选民关注, 欧洲议会自产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人权、法治和民主等易受民众青睐的问题。另一方面, 民选性质导致欧洲议会权力有限。其在成立初期仅是一个“民主点缀”的机构, 除了享有监督权之外, 在其他事项上声音微弱。为了扩大自身权力, 欧洲议会以人权领域为突破口, 将人权与其他政策联系。借助人权的“渗透”功能, 欧洲议会逐渐扩大了自身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15] 45}。这也是其利用涉疆议题不断造势的关键原因所在。实际上, 积极操纵涉疆议题不仅满足了欧洲议会扩大自身权力的需要, 还反映出欧洲议会权力扩大的客观事实。

吸引民意也能为议员谋取个人利益。对许多人来说, 当选欧洲议员是一个肥差, 因为欧洲议员享有很多政治权利。由于欧洲议会成员不是成员国政府的代表, 为了确保他们的独立地位, 防止成员国政府或机构对其政治活动的干涉, 欧盟赋予了欧洲议员政治豁免权^[29]。因此, 有议员认为操纵涉疆议题不用承担很大风险, 还可以提高曝光度、知名度, 迎合某些选民的民粹主义心理, 争取选票。来自法国的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 (Glucksmann) 在国内政治光谱中属于传统右翼, 但当他正式步入欧盟政坛后, 格鲁克斯曼转而披上中左翼外衣, 将自己包装成人权的积极捍卫者。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 格鲁克斯曼成功当选议员。此后, 他更是不断就所谓“涉疆人权问题”指责中国。目前, 格鲁克斯曼已成为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的副主席。

议会中主要反映选民诉求的各大党团能对议会决策产生很大影响。各大党团的作用具体表现在议程设置方面。由于欧洲议会全席会议的议程设置权掌握在党团主席联席会议的手中, 力量占优的党团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诉求确定会议的优先议程。如今欧洲议会最大党团是欧洲人民党, 其在2021年推出了一份针对中国的战略文件。该文件不仅试图统一欧盟内部的意见, 而且在大方向上跟美国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尤其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竞争、合作加对抗”这一对华战略保持高度一致。欧洲人民党声称，将会以严格的所谓人权标准重新审查《中欧投资协定》，绝对不会在人权和价值观问题上向中方做出“妥协”。这意味着人民党会继续将人权作为优先议程，通过操纵涉疆议题来谴责中国^[30]。欧洲议会的政党力量碎片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强。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后，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等中左翼力量的权重持续上升。可以预料，未来欧洲议会仍将以人权为主要切入点，加大对涉疆议题的操纵力度。

作为欧洲议会中处理对华关系的主力军，对华关系代表团成员的“中国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欧洲议会的对华认知水平。2021 年 3 月，中国对欧盟进行反制裁的名单包括绿党议员彼蒂科菲尔（Reinhard Butikofer）。作为对华关系代表团的团长，他在欧洲议会对华立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将绿党党团重视的人权议题纳入其中，不断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积极推动涉疆决议通过。总之，欧洲议会中的党团、对华关系代表团等决策主体与民众联系紧密，其受民意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欧盟民众的对华认知。

2. 欧盟委员会：议程设置权和决策权集中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机关。作为一个国际官僚机构，它努力在问题解决中表现出中立性、技术性和非政治化特征^[31]。它依靠道德和专家权威在关于欧盟的战略与政策、法律、资金预算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发挥作用。据现任欧盟委员会的优先事项安排可以得知，欧盟委员会依旧将经济发展作为工作重点^[32]。然而，欧盟委员会近年来出现了政治化转向。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曾表示要让委员会在世界政治中更具战略意义、更活跃、更引人注目^{[31] 526}。履新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会在任期之初决定其任期内（5 年）的政治优先事项，为欧盟发展提供整体战略和政治方向。政治化逻辑产生的结果是委员会的目标不再被视为进步的、低调的、技术性的。相反，它们可以提出有争议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和高调的问题^{[31] 526}。2019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该文件标志着欧盟对华战略政策做出调整，代表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做出新判断。相较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在 2016 年发布的欧盟涉华政策基础文件《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该报告表达了欧盟追求双方经贸关系再平衡的诉求，以及对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和积极追求全球影响力的担忧。其中，欧盟委员会妄称：“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特别是在新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人权辩护者正在持续遭受镇压。”^[33]这一说法印证了欧盟委员会政治化转向的结果是在涉疆议题上持错误立场，通过抹黑中国的治疆政策来提高自身曝光度。

然而，行政官僚性质预示着欧盟委员会的行动依旧需要努力与欧盟外交政策的一般优先事项相一致，其原则、方法和工具将继续优先考虑功能性项目，以维护欧盟稳定和经济发展为最优先选项。因此，在欧盟对华外交政策倡导竞争与合作并存，两者在经贸领域依旧可以深化合作的前景下，欧盟委员会没有过度操纵涉疆议题而使中欧经济关系受到急剧动摇。2021 年 5 月，欧洲议会面对中国反制裁时通过一项暂停《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动议。其在相关专题辩论中将矛头对准欧盟委员会，声称他们发展与中国商业关系是以所谓牺牲人权为代价^[34]。虽然在欧洲议会施压下，欧盟委员会暂停推动 CAI 审议流程，但欧盟委员会用“暂停”而非“废除”等词语，暗示其不愿跟随欧

周明, 何舒雯. “三心二意”的追随者: 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81-103.

洲议会操纵涉疆议题使中欧经济往来遭受重创。由此看来, 中欧经济合作仍有较大回旋余地。

欧盟委员会非常重视效率, 强调决策权的集中, 欧盟委员会主席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欧盟委员会在每周会议上讨论的政策、法律及预算提案等议程均由主席设置。主席还拥有提名副主席和委员、确定本届委员会政策方向和优先目标的权力。现任主席冯德莱恩上台以来对华态度强硬, 曾就涉疆议题推动欧盟对华经济制裁。但在 2022 年 4 月举办的瑞辛纳对话中, 冯德莱恩一改常态, 称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要加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这一讲话传递出友好信号, 体现欧盟仍重视与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密切往来。作为负责维护、促进欧盟整体利益的机构, 欧盟委员会内部在大政方针上基本没有分歧, 均以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为优先考虑事项。

从历史上看, 欧盟委员会一直遵循以专家为基础的非政治化路线以获得对政策问题的关注, 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可信度。然而, 鉴于政治化趋向, 欧盟委员会越来越多地寻求公民观点来获得广泛支持和合法性。欧盟委员会将其寻求公众意见的重点集中在能力薄弱的领域。在具备深远能力的领域, 如对外贸易和竞争中, 欧盟委员会较少邀请公民发表意见^[35]。因此, 在关乎中欧整体关系的涉疆决策中, 欧盟委员会受民意影响确实比欧洲议会小。考虑到欧盟经济一体化的成熟度和优先性, 作为执行机构的欧盟委员会也必须以经济合作为优先目标, 从而推动中欧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

总之, 欧盟委员会对中国较为务实的政策立场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行政官僚性质下议程设置权和决策权的集中, 其政策立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贯性。

3. 欧盟理事会: 各成员国均有一定话语权

欧盟理事会是欧盟“实质上的决策者”。作为欧盟最高决策机构, 欧盟理事会的主要职能在于协调成员国政策、制定共同的外交安全政策、缔结国际条约等重大安全、外交事项。这意味着欧盟理事会对中国的政策立场一般是原则性和导向性的, 不对细节部署做出太多规定。它在做决策时会考虑对中欧整体关系的影响, 尽量避免由于某一具体问题的摩擦而使双边关系极度恶化。2016 年 7 月, 欧盟理事会发布《欧盟对中国战略决议》(Council conclusions EU Strategy on China), 第 1 条即明确表示该决议与《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共同构成欧盟对华政策的框架。该决议一共 23 条, 核心是确立中欧双方在外交安全和经济贸易两大方面的合作框架。《欧盟对中国战略决议》的基本特征是对各方面的政策做出了原则性规定, 侧重外交安全等政治合作领域。虽然欧盟理事会在决议第 5 条强调“促进人权和法治将继续成为欧盟与中国接触的核心组成部分, 欧盟继续呼吁中国确保少数民族的权利, 尤其是在西藏和新疆”^[36], 但其未过多干涉新疆事务, 未对涉疆议题做出具体安排。

欧盟理事会注重欧盟整体行动的连续性、一致性, 在政策决策上更具务实性。在欧盟以所谓涉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实施单边制裁中, 欧盟理事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担任了发起部门。这一举动更多是为了协调欧盟其他机构, 承担欧盟对外行动一致的责任, 其自身在操纵涉疆议题上还是有所克制的。除了在 2021 年 3 月发表的“欧盟对严重违反人类行为实施进一步制裁”决议中集中谴责中国新疆所谓的人权状况, 并采取实际的制裁措施外, 欧盟理事会更多是在相关领导人峰会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 并没有采取其他具体的制裁手段。

欧盟理事会主要由各成员国政府的部长组成。作为一个政府间机构, 欧盟理事会代表各成员国利益, 其决策通常是各成员国内部博弈的产物。由于欧盟理事会遵守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故在重

大事项的决策程序中，给予各国同等的投票权重，采用“全体一致通过”的表决方式。这意味着虽然在议程设置和决策方面，理事会主席国领导下的工作委员会对提案进行审查，对常驻代表委员会、分管理事会的讨论议程具有一定设置权力。但只要至少一个成员国对已经被纳入 A 类的议案提出异议，议案就需重新讨论。因此，理事会中的议程设置权力实际掌握在各成员国手中。欧盟强调理事会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共同承担使欧盟对外行动统一和高效的责任，这表明各国需要为了保持欧盟整体行动的一致性而适当牺牲本国利益。但在实际决策中，各国仍十分重视本国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实际利益，各国的利益分歧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的通过效率。在涉疆议题中，由于欧盟成员国基本都是美国的盟友和北约成员，出于地缘政治、盟友关系等考虑，理事会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但受本国实际利益的制约，各国涉疆立场有时也是内部分裂甚至自相矛盾的，这表明它不会像欧洲议会那样激进。同时，大多数成员国顾及与中国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也不愿过度渲染涉疆议题而恶化双边关系，致使自身蒙受更大的损失。

综上所述，三大机构职能性质的不同导致各自决策程序存在较大差异，最终带来了三者在涉疆立场上的分歧。其中，欧洲议会扮演操纵议题的主力军，欧盟委员会与欧盟理事会均反对过度操纵涉疆议题而为中欧整体关系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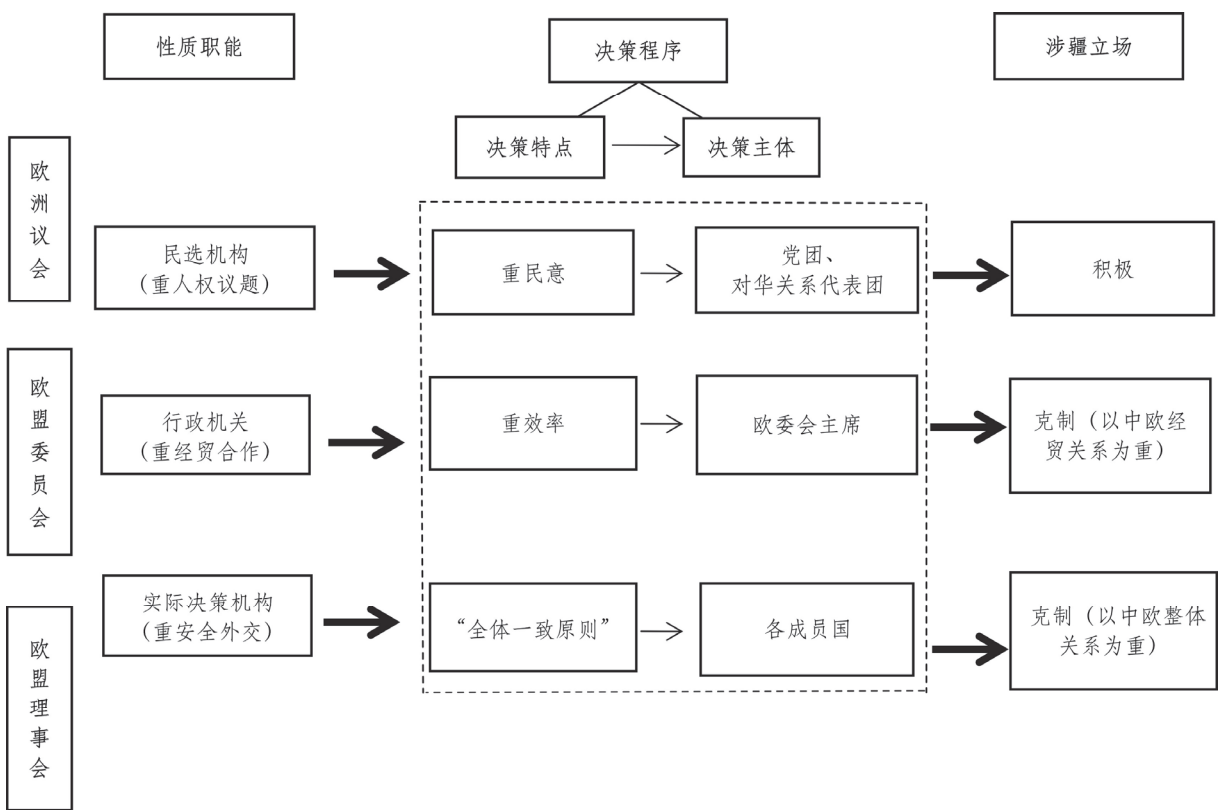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机构性质职能、决策程序与涉疆立场的关系

三、欧盟成员国在涉疆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差异

欧盟是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国际组织，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主权让渡现象冲击了成员国传统的主权观念，使得欧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然而，在对外决策中，主要代表成员国利益的欧盟理事会会在大多数事务上都拥有决定权，这说明成员国的意志仍能影响欧盟的整体决策。如欧盟成员国意见不一，就会极大阻碍决策通过，降低办事效率。反映到涉疆议题上，各成员国态度不一制约了欧盟整体的操纵力度。虽然立陶宛等少数国家甘愿充当“反华急先锋”，极力抹黑中国的治疆政策，但大多数国家依旧重点关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不愿大力操纵涉疆议题而使双边经贸关系受损。

为更好研究欧盟成员国在涉疆议题上所持的态度，下文依据操纵力度不同将成员国分为积极介入型、有限参与型以及拒绝附和型三类。在选取衡量操纵力度的标准时，虽然社会各界（媒体、民众、学者等）态度均会影响一国的涉疆立场，但最终决定一国涉疆政策的是官方态度，故本文以各国官方（主要是政府、议会）态度为准。其中，积极介入型主要指的是该国政府与议会均操纵、政府操纵（议会默许）、议会操纵（政府默许）三种情况。有限参与型包含三个维度：时间维度，指该国官方态度先后发生变化（从积极操纵到保持克制）；涉疆行为体参与维度，指议会操纵但政府持反对意见（现实中政府操纵而议会反对这一情形出现较少，故在此不进行讨论）；操纵形式维度，指一国更多联合他国发表涉疆声明，但很少公开表明自身涉疆立场这一情况（需要与积极介入型中官方明确通过某一涉疆决议，或在涉疆议题上公开表明态度这一行为相区分）。而拒绝附和型则指官方（政府、议会）均拒绝操纵涉疆议题或者对涉疆议题关注较少，未对这一议题进行明确表态。

在对各成员国的涉疆立场进行类别划分后，本文着重选取了立陶宛、法国、德国、匈牙利这四个有代表性的成员国，对其涉疆态度各异的原因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受自身安全感高低、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可度、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以及国内文化因素的影响，四国在涉疆议题上呈现不同看法。

表 1 欧盟成员国操纵涉疆议题的类型划分

类型	国家
积极介入型	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爱尔兰、丹麦、瑞典、波兰、芬兰
有限参与型	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
拒绝附和型	匈牙利、马耳他、塞浦路斯、希腊

（一）积极介入型：立陶宛

1. 立陶宛立场

近年来，立陶宛积极充当欧盟内部的“反华急先锋”，在涉台、涉疆等议题上一再挑战中国底线。2021 年 5 月，立陶宛议会通过一项涉疆决议，诬称中国在新疆实施所谓“种族灭绝”。2022 年 5 月，立陶宛外交部长与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大臣签署了关于双边合作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表示立、英双方将与美国、欧洲伙伴和区域行为体合作，一起捍卫彼此间的共同价值观，并呼吁中国

“遵守国际义务”^[37]。这一系列举动表明立陶宛官方（政府与议会）均积极操弄涉疆议题。我国学者李白杨利用 GDELT 新闻大数据工具检索的数据显示，立陶宛一度成为对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报道（包括转载）最多的国家^[38]。据《环球时报》分析，立陶宛一度成为涉疆“种族灭绝”谣言全球传播的“极点”。作为欧盟内部的一个小国，立陶宛在涉疆议题上“最为积极”，为中国与立陶宛双边关系带来大量不稳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整体的判断。我们有必要防止立陶宛这类在涉疆议题上喊声最高的国家对中欧整体关系造成破坏。

2. 立陶宛极力操纵的原因

立陶宛极力操纵涉疆议题的背后离不开美国的大力怂恿。首先，作为一个小国，立陶宛自身的“安全脆弱性”使其不安全感加剧。根据小国安全战略选择模式，当小国遇到威胁时，其很大程度上会选择追随一个强国从而获得安全保障^[39]。由于历史上多次受到俄罗斯的侵占，立陶宛人心中的受伤害情绪根深蒂固，它始终担心自己会被俄罗斯再次侵略占领，这就导致立陶宛严重的“反俄、恐俄”倾向。除了对俄罗斯的恐惧外，地理位置的敏感性、实力差距等都导致立陶宛在地缘政治上极度缺乏安全感。周边发生的克里米亚入俄、乌东部持续冲突等事件都令立陶宛如坐针毡。确保美国的安全承诺成了立陶宛政治的重中之重^[40]。

为了获得美国重视，立陶宛在对华政策上紧跟美国步伐。过去，立陶宛对华政策相对务实，中立关系曾长期保持稳定发展。随着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打压政策，立陶宛的对华政策也逐渐走偏。对美需求甚多的当局政府认为，只有在涉疆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才可以提升立陶宛在美国心中的重要程度。自 2019 年起，立陶宛便积极参与美国每年在联合国挑唆的涉疆联合声明，通过污蔑新疆存在所谓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除涉疆议题外，立陶宛还积极配合美国的其他反华措施。在涉台问题上，立陶宛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多次劝阻，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立陶宛贸易代表处（Lithuanian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背弃了立方在中立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性质极为恶劣。

立陶宛奉行全面西化、“二元冲突”的价值观，也是促使其操纵涉疆议题的重要动因。独立以来，为重塑身份认同，立陶宛极力撇清与苏联的关系，在社会文化领域实行全面西化和“去俄化”。立陶宛全面西化的价值观致使其在人权观等方面与西方大致无差，即认可“普适”的人权观。在此影响下，它不顾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强制从自身人权观视角出发看待新疆的人权状况，以至于片面认为中国存在所谓严重的人权问题。立陶宛的意识形态中有较为清晰的“我们—他们”“西方—东方”“民主—威权”的二元分野。在立陶宛的认知中，中国恰好与其分属东西两个不同的文明阵营，故立陶宛在价值观上极力排斥中国^[41]。

此外，经济层面的动机也不应该被忽视。部分人认为，中国与立陶宛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较高，立陶宛操纵涉疆议题的举动会为两国经济往来蒙上阴影，对于立陶宛这样一个经济体量不大的行为体来说是自找苦吃。诚然，我们应该看到立陶宛这一错误举动为其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但中国和立陶宛之间的贸易量本就不大。相比于美国和欧盟，中国对立陶宛的经济影响较为微弱。2021 年度，欧盟作为立陶宛的第一大贸易出口伙伴，占立陶宛出口总额的 57.5%；美国作为立陶宛的第五大贸易出口伙伴，也占据了立陶宛出口总额的 6.3%。立陶宛的十大贸易出口伙伴中没有中国^[42]。鉴于美国是立陶宛除了欧洲国家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美国的施压下，立陶宛认为与中国交恶比与

美国产生嫌隙付出的经济代价要小, 故其最终选择了紧跟美国。

最后, 立陶宛国内反共思潮的泛滥也对其操纵涉疆议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前文可知, 立陶宛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导致其自苏联时代就抗拒来自俄罗斯的影响, 国内“反俄、反共”的思潮由来已久, 不断发酵。由于中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 立陶宛对中国也抱有强烈疑虑。苏联解体后, 中国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受冷战思维影响, 立陶宛国内的反共思潮并未褪去, 并将矛头聚焦在中国身上, 企图通过操纵涉疆议题来破坏中国的稳定。

总之, 立陶宛积极操纵涉疆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但我们仍应认识到立陶宛体量有限, 对欧洲整体舆论的影响较微弱。欧洲其他国家更倾向于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 不愿伤害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即使立陶宛冲在有关反华议题一线, 也不会过多影响中欧关系的整体格局。

(二) 有限参与型: 法德

1. 法德立场

法国和德国一直被视为欧盟的轴心和双发动机。作为欧盟最强大的两个国家, 法德立场极大影响了欧盟政策的整体走向。因此, 分析法德两国在操纵涉疆议题上的态度十分必要。近年来, 受多重因素影响, 法德两国均参与抹黑新疆的部分活动, 但两者始终保持操纵限度, 并没有突破对华政策的底线。2020年10月6日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 德国拉拢38国发表联合声明, 对所谓新疆“侵犯人权”的事实表达“严重关切”。2021年5月17号, 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举办涉疆听证会并发表涉疆声明。2022年8月, 德国外交部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的关于中国新疆地区局势的“报告”发表声明称: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已经证明在新疆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充分尊重新疆所有人的‘人权’。”这一系列新行为证明德国官方机构(政府、议会)在涉疆问题上持有错误认知, 并通过操纵涉疆议题来污名化中国。然而, 2021年5月, 针对涉疆议题的德国“供应链法”无果而终, 体现了德国议会内部分歧犹存。2022年11月,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访华期间也明确表示, 德方愿同中方就双方立场不一致的问题交换意见, 增进了解和互信, 德方反对搞阵营对抗。这一说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德国政府反对因涉疆议题而与中国“脱钩”。由于德国涉疆决策行为体间未就操纵涉疆议题达成共识, 近年来德国在涉疆问题上保持有限操纵的立场。即使三党联合执政的新政府上台后对华政策日趋强硬, 但其并不希望双边关系失控。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依旧会在一定延续性基础上进行调整, 而非另起炉灶。这也暗示着虽然新政府上台后会增大对涉疆问题的操纵力度, 但依旧不会冲击到中德关系的底线。

法国作为欧盟的另一个轴心国家, 其操纵立场与德国大致相似, 都保持有限操纵的态度。一方面, 法国在形式上联合西方国家发表涉疆声明。2021年10月,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代表43个国家发表联合宣言抹黑新疆。2022年1月, 法国国民议会以谎言——“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犯下种族灭绝罪”为由通过涉疆决议, 要求法国政府“正式承认并予以谴责”。代表法国主流媒体立场的《观点》杂志曾多次发表针对新疆的不实报道, 极力渲染反华气氛。另一方面, 法国极少公开表明自身立场。2022年11月, 七国集团外长在德国明斯特发表的联合声明妄称: “我们将继续向中国提出我们对其在新疆‘侵犯人权’和实施‘虐待’行为的关切。”^[43]这份声明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法国的涉疆立场, 但其参与联合声明而非公开表明自身想法的行为是想以模糊的态度避免激化矛盾。

总之，法德在操纵涉疆议题上有所保留，体现出其国内涉疆立场的复杂性，也为中国准确应对以法德为首的欧盟国家的抹黑提供可能。

2. 法德有限操纵的原因

多年来，中法、中德关系一直是中欧关系的领头羊。即使法德政府更替，但双边关系的互利互惠性依然存在。然而，受法德对西方价值观认可度高、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高以及法德各自国内文化因素的影响，两者依然在涉疆议题上抹黑中国。

首先，法德作为西方国家的典型代表，奉行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被西方国家看作不容置疑的规范性原则，并被认为是构成“西方文明社区”身份与集体认同的基础，主要包括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核心价值。它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规范之间的零和竞争，把自由主义价值置于任何其他价值之上，由此建构出西方代表“优越道德”和“进步价值观”的世界角色。在这种语境下，非西方往往被描述为缺乏文明标准，并被视为西方“进步”价值观的威胁与破坏者^[17]¹¹⁹。出于对西方价值观的高度认可，法德未能充分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历史发展、基本国情的不同，而以西方的人权观为衡量标准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形成片面且错误的对华人权认知，并以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遭到“侵犯”这一谎言攻击中国的治疆政策。

其次，虽然中国已成为法德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双边密切的经贸往来使法德均十分重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但法德各自国内也有一种声音：过度强调与中国的关系会制约自身的自主性，不符合法德追求“战略自主”的目标。2021 年 3 月，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利（Florence Parly）在参加法国参议院外交、国防和军队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相比 2019 年，我国从中国的进口量增加了 4.5%，这一定程度上能够证明我们对中国的依赖性。在一些关键领域，我们绝对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44]。2022 年 9 月，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也表示，德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对华贸易政策，以减少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和半导体的依赖，并声称在与北京的贸易往来中“不再天真”^[45]。中国与法德间经济实力的此长彼消成为刺激法德操纵涉疆议题的重要因素。两者认为操纵涉疆议题可以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缩小与中国的实力差距符合法德现实利益。

除此之外，法德各自国内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在法德操纵涉疆议题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新疆分裂势力“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的总部就盘踞在德国慕尼黑，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德国操纵涉疆议题。慕尼黑也因此成为新疆分裂势力的境外聚居地，并一度成为海外维吾尔族居民人数最多的城市^[46]。“世维会”持续不断地向德国居民污蔑抹黑中国的治疆政策，德国的对华民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2021 年 8 月，根据 Forsa 公司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 58% 的德国民众支持对华采取强硬姿态^[47]。

在法国国内，穆斯林群体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法国拥有欧洲最多的穆斯林人口，该群体成为总统、议员等政治力量争取选票的重要对象。近年来，欧洲穆斯林人口呈现年轻化趋势，出生于欧洲的“2 代+”穆斯林，与其父辈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他们有些不仅摆脱了父辈来源国的部落、宗教、教派情结，改变了所谓“失败国家”国民的各种心态，甚至语言、价值观乃至宗教信仰也与父辈相异^[48]。这导致进入法国的穆斯林团体在与当地社会融合过程中日益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渗透。法国穆斯林集体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重视涉疆议题，而总统也会考虑通过操纵涉疆议

周明, 何舒雯. “三心二意”的追随者: 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81-103.

题来迎合国内穆斯林选民的诉求。2022 年法国总统大选中, 法国公共舆论研究所 IFOP 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大约 85% 的穆斯林移民将票投给了马克龙^[49]。法国穆斯林做出这一决定不仅是对勒庞领导的极右翼阵线的排斥, 还受马克龙在涉疆议题上有意迎合他们诉求的表态的影响。总之, 穆斯林选民对法国大选的影响以及新疆分裂势力在德国的聚居都对涉疆议题产生作用, 进一步推动了法德政府以操纵涉疆议题来获取政治回报的步伐。

除法德自身因素外, 国际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者的涉疆立场。从国际大环境看, 中西方对抗性上升、美国对以法德为首的欧洲盟友不断拉拢施压, 是法德政府对华态度转向负面的最主要外部原因。由于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 争取欧盟附和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 中美、中欧间的对抗思潮培育了法德政府酝酿调整对华政策的社会土壤。法德始终将与美国的关系作为“大西洋联盟的基石”, 在安全上依旧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北约同盟, 迫于美方压力而在涉疆议题上向美国靠拢。2019 年以来, 美国连续 4 次纠集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发布涉疆声明, 借人权问题攻击、抹黑中国。其中, 美方在 2020 年联合 39 个国家, 由德国发声; 2021 年则由法国代表 43 个国家发声。由此可见, 法德均在一定程度上附和美国的涉疆政策, 操纵涉疆议题。

与此同时, 由于法德现实安全感高以及两者依旧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法德并没有形成类似美国的“全政府—全社会”操纵模式, 而是始终以中欧整体关系的发展为底线, 保持有限操纵的态势。

首先, 较强的安全感能使法德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美国的控制。法德较强的实力保障了自身不像立陶宛那样与美国深度捆绑, 不用在涉疆议题上与美国保持完全同步。另一方面, 法德不安全感的降低使其对华认知有别于美国。区分于美国从地缘政治视角出发, 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及“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者”, 法德对华持有“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这说明法德虽然在某些领域强调与中国的竞争与对抗, 但也会在利益契合处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不同的对华认知决定了法德与美国奉行不同的对华政策: 美国强调与中国进行全方位对抗, 将操作涉疆议题作为对华施压的工具, 旨在通过“以疆制华”来护持其霸权地位; 而法德则认为自身与中国没有根本性地缘政治冲突, 双方矛盾更多是围绕利益分配而产生的具体问题。法德采取有别于美国的做法, 主张通过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解决和管控双边分歧, 在涉疆议题上秉持较为稳重、谨慎的态度。

其次, 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高既是法德介入涉疆议题的原因, 也是其保持一定限度的原因。2022 年 5 月, 马克龙成功连任法国总统。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当下, 中法关系是马克龙对外政策中可预见性最强、潜在政绩最多的一组双边关系, 未来他有望进一步延续法国内外政策, 促进中法经济往来, 使中法关系向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平稳推进^{[19] 21}。2022 年 11 月,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访华期间也明确表示反对“脱钩”。他强调中德在经济上高度互补, 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法德两国领导人的表态预示着经贸合作依旧是中法、中德关系的压舱石, 两国仍会推动中法、中德关系整体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 虽然法德在涉疆议题上秉持错误态度, 但中法、中德关系的互利互惠性依然存在。2021 年, 中法德三个月内召开两次首脑视频峰会。这些峰会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 即使中法、中德关系由于涉疆议题等出现波折, 但法德两国均认识到需要加强对话, 特别是高层交流。合作仍然是

中法、中德关系的主基调，中国与法德都有进一步发展彼此关系和中欧关系的强烈意愿，三国领导人也致力于确保彼此间关系的稳定^[50]。因此，法德作为欧盟主要国家在操纵涉疆议题上较为克制，并没有像立陶宛等国家一样对中国极限施压。两国均将经贸合作列为优先考虑事项，致力于推动中法、中德关系的稳定发展。

（三）拒绝附和型：匈牙利

1. 匈牙利立场

在 2021 年 3 月欧盟发出就涉疆问题制裁中国的相关决议后，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发声：欧盟做出以所谓涉疆人权问题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的决定是“毫无意义”和“有害的”，欧盟外长会不应该变成制裁大会，制裁将恶化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同年，匈牙利还先后 3 次行使一票否决权否决欧盟涉疆、涉港等声明。2022 年 4 月，匈牙利著名汉学家、帕兹马尼·彼得天主教大学教授绍莱特（Salát Gergely）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时，针对法广记者指责匈牙利在涉疆议题上对欧盟多个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投否决票的行为，回应道：“欧盟的这些谴责议案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一纸空文”^[51]。匈牙利国内各界表现出的对华友好姿态与欧盟大部分国家企图操纵涉疆议题来抹黑中国的行径相比显得与众不同，研究其对华立场可为中国发展与欧盟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提供借鉴。

2. 匈牙利拒绝附和的原因

匈牙利拒绝操纵涉疆议题很大程度上受中匈整体关系的影响。中匈建交 70 多年来，双方关系虽然经历过停滞期，但总体稳中向好。匈牙利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扮演中东欧和中国合作引领者的角色，并一直想发挥中国和中东欧合作“桥头堡”作用。2017 年 5 月 12 日至 16 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应邀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主席会见欧尔班总理，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中匈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匈牙利的对华友好政策蕴含着其对华战略定位的认知。相较于欧盟整体更加突出对华战略定位中“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认知，匈牙利更愿意从务实合作的角度看待中匈关系。

首先，匈牙利拥有较强的安全感。一方面，在地缘位置上，相较于立陶宛由于与俄罗斯相邻而具有强烈的恐俄情绪，匈牙利没有那么强的安全顾虑；另一方面，区别于立陶宛依赖美国制衡俄罗斯，匈牙利的安全战略理念更强调与俄进行务实合作。2015 年 2 月 17 日，在欧俄关系紧张、俄备受孤立之际，匈牙利政府热情接待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国签署了巨额能源协议。这一举动说明匈牙利没有站在西方一边强硬排挤俄罗斯，而是从本国利益出发，通过搞好与俄关系增加自身安全保障，也就是说防俄但不仇俄^[52]。由于匈牙利奉行多边务实的外交政策，其自主性得到明显增强，安全感也有所提升。也正因为匈方没有急迫的安全顾虑，其不必捆绑在西方反华的战车上，通过附和美国的涉疆行动来赢得关注。

其次，匈牙利虽然属于欧盟成员国，但并不认同所谓“欧盟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习惯强调欧洲或西方价值观，在人权问题上存在“高人一等”的“惯性”，认为其他地区多多少少存在人权问题。但事实上，欧盟内部各国也存在有关人权、价值观等的认知差异。匈牙利曾谴责欧盟西部国家向别国强加“想象中的欧洲价值观”，并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对当地文化的不尊重^[53]。2022 年 10 月，匈牙利司法部长朱迪特·瓦尔加（Judit Varga）在总部设于华盛顿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指

出: “欧盟正打造舆论霸权联盟, 但匈牙利认为, 多样性与统一性同样重要。在欧盟中不能只有一种意识形态。”^[54] 欧盟的部分西部国家忽视中东欧国家的历史文化而强加给它们欧盟抽象价值观的做法, 就如同欧盟对中国价值观的抨击一样, 使匈牙利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产生情感共鸣, 即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不被尊重。因此, 匈牙利对欧盟的排斥情绪更加强烈。

再次, 中匈务实的经济往来是双方关系的压舱石。中匈日益密切的经济往来主要得益于匈牙利政府自 2010 年开始实施的“向东开放”外交政策。该政策的宗旨是在发展与欧美发达国家关系的同时, 也注重加强与东方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苏联解体后, 匈牙利为实现自身发展, 曾积极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 大力推进西化改革, 渴望凭借欧盟的“东风”助力自身经济繁荣。然而,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及欧盟的欧债危机使匈牙利意识到西化改革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在入盟之初, 匈牙利等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一体化快速缩短与西欧的差距。但金融危机后欧盟经济一蹶不振, 经济增长长期疲软。匈牙利社会对一体化的期望值降低, 开始反思欧洲一体化, 国内疑欧情绪泛滥。为了摆脱经济低迷的影响, 匈牙利开始积极谋求发展与欧盟外国家的关系, 例如大力推进中匈、俄匈关系。此外, 匈牙利国内坚持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党——青民盟的上台是加剧其偏离“欧洲化”道路的直接原因。青民盟领袖欧尔班在 2010 年上台后采取的政治、经济改革, 以及外交上从偏重西方转向东西方平衡的政策被称为“欧尔班现象”^[55]。该现象突出体现了匈牙利在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一定成果后, 转而强调民族国家的政治动向。随着匈牙利“向东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 中匈经贸合作不断发展, 两者间有许多“第一”时刻。匈牙利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府间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 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和启动“一带一路”工作组机制的国家, 第一个同中国在中东欧地区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的国家, 也是第一个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中东欧国家^[56]。从这些“第一”时刻来看, 匈牙利政府显然认为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十分重要。目前, 中国已跃居匈牙利全球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中匈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显著提升。在某种程度上, 中国成为匈牙利除欧盟成员国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最后, 匈国内对中匈历史文化相亲性的认知也有利于增强两者的情感联系。长期以来, 部分匈牙利学者在探寻本国历史时认为匈牙利民族最早自乌拉尔山迁徙到欧洲, 其祖先极有可能拥有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这一认知的准确性虽然有待考证, 但在 2004 年, 2 500 多名匈牙利公民向国会提出申请, 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匈奴族”。至今, 匈国内有 10 万余人以“匈奴后裔”自居, 甚至连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都认为自己是“来自东方的西方人”。中匈历史文化具有亲缘性的认知, 无形中拉近了中匈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匈牙利自独立以来就与中国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57], 也因此成为欧洲吸引华人最多的国家。华人融入当地社会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匈牙利民众的对华认知, 促进中匈民心相通。

综上所述, 匈牙利自身较强的安全感、对西方价值观的一定背离、中匈密切的经济合作以及彼此间特殊的情感联系都促使匈牙利拒绝跟随欧盟操纵涉疆议题。匈牙利在涉疆议题上秉持的克制态度, 以及推进中匈合作的积极姿态为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但中东欧国家所选择的道路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会沿着欧洲化的大方向行进, 这就意味着匈牙利仍会立足欧盟优先战略。2021 年 3 月, 欧盟各国大使一致同意就涉疆问题制裁中国, 证明了匈牙利面临欧盟压力时会进行一定妥协。

表 2 影响各国涉疆政策立场的构成因素

国家 \ 因素	自身安全感	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可度	与中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	国内文化因素
立陶宛	低	高	低	反共思潮
法德	高	高	高	穆斯林群体（法）， 新疆分裂势力的境外聚居（德）
匈牙利	较高	较低	较高	与中国的特殊情感联系

由上文分析可知，各成员国自身安全感的高低、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可度、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以及国内文化因素共同影响其涉疆立场。然而，这四个因素对各国涉疆立场的影响程度是有所差异的。如表 3 所示，自身安全感高（如法德）或者低（如立陶宛），与中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高（如法德）或者低（如立陶宛）的国家都有操纵涉疆议题的表现，故这两个因素不是导致各国涉疆立场差异的主要变量。国内文化因素虽然也影响各国在涉疆议题上的态度，但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难以直接反映到各国的涉疆立场上。因此，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可度高低往往是影响各国涉疆政策的核心因素。对西方奉行的“普世”价值观较为推崇的法德与立陶宛均操纵涉疆议题，而与西方价值观有所偏离的匈牙利则拒绝附和其他国家的操纵行为。

总之，欧盟内部分歧犹存。三大机构中，注重中欧外交安全和经贸往来的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在涉疆议题上保持克制，而代表民意、强调价值观因素的欧洲议会则大力鼓噪涉疆议题。欧盟成员国里，自身安全感程度较高、和中国经贸关系紧密、获益较多的匈牙利等欧盟成员国倾向于加强对华合作；而自身不安全感强烈、与美国关系紧密、注重西方价值观的立陶宛等成员国则极力要求操纵涉疆议题。此外，从欧盟整体来看，欧盟民选机构（各国议会和欧洲议会）、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以及普通民众的政治观念和态度中含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时常鼓吹所谓“欧洲规范”。然而对于行政权力机构（各国政府、欧盟委员会等）来说，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仍然是其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务实主义外交往往占据上风^[58]。这凸显出欧盟内部立场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欧盟整体的操纵力度。

四、中国的应对措施

面对欧盟对涉疆议题的操纵力度逐渐加强之势，我国应保持警惕并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针对内部立场不一的欧盟，中国需充分考虑三大机构以及成员国的特性，制定差异化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中国应关注欧盟作为超国家行为体的整体性，需将发展与三大机构、欧盟内部成员国的关系置于中欧关系的大框架中去认识和思考。

（一）差异化应对措施

1. 针对机构

目前，欧盟三大机构在操纵涉疆议题的务实程度上，欧盟委员会最高，欧盟理事会次之，欧洲议会最低，所以应将处理好中国同欧洲议会的关系放在首位。欧洲议会虽然不是欧盟的决策执行机构，其立法权也很有限，但它毕竟是欧盟唯一的民选机构。欧洲议会的立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欧

周明，何舒雯. “三心二意”的追随者：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81-103.

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的对华态度。中方应该进一步拓展中欧的沟通渠道，特别是加强立法机构的交往与合作，有步骤地把欧洲议会内部明显持反华立场的议会党团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同时尽力争取欧洲议会内部更多对华友好人士的正面支持。例如，积极发展与欧洲议会内部致力于推进中欧关系的欧中友好小组的合作，逐步转变议会内部反华力量的态度，提升双方合作潜力。另外，应协调好同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的关系，将经济合作作为中欧关系压舱石，同这两大机构进行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提升战略互信。

2. 针对成员国

针对欧盟成员国操纵涉疆议题的三种样态，我国采取的举措还需进一步细化。在对待有限参与的国家时应该增信释疑、管控分歧，与其在利益交汇领域进行合作。在对待积极介入的国家时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坚决斗争，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斗争策略。例如，外交官在国际媒体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动澄清事实，在国际社交媒体上主动发声等。在对待拒绝附和的国家时需要与其充分沟通，保持彼此间的互信。

表 3 欧盟成员国操纵涉疆议题的三种类型及应对策略

操纵涉疆议题的类型	应对策略
积极介入	强烈谴责、坚决斗争
有限参与	增信释疑、管控分歧
拒绝附和	充分沟通、保持互信

从 2019 年开始，美国每年都要纠集国家在联合国发表涉疆联合声明来向中国发难。表 5 显示，每年参与联合声明的欧盟国家日渐增多，这表明对欧工作刻不容缓。其中，北欧与俄罗斯邻近的国家和西欧国家是主要参与者，而支持中国治疆政策的欧盟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和南欧。我们需要在维护与德法关系的同时，将重点放在维系与南欧和中东欧国家关系上。除了进一步巩固与匈牙利、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的关系外，还需继续向葡萄牙、罗马尼亚等南欧国家做好增信释疑工作，并积极关注意大利政坛的最新动向。2022 年 9 月意大利中右翼政党联盟赢得大选，疑欧派极右翼政治人物梅洛尼出任意大利总理，并在内政外交上奉行“意大利优先”政策。但梅洛尼政府对华持怀疑立场，有可能促使其加大在涉疆议题上的操纵力度。为防止意大利向积极介入型国家转变，中方应持续深化与意大利的双边合作与人文交流，保持彼此间的互尊互信。

表 4 2019 年以来欧盟成员国参与涉疆联合声明的情况

年份	参与涉疆联合声明国家数量	参与涉疆联合声明中的欧盟成员国	未参与涉疆联合声明的欧盟成员国
2019	23 国	英国（脱欧前）、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奥地利、瑞典、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克罗地亚（14 国）	匈牙利、马耳他、塞浦路斯、希腊、罗马尼亚、葡萄牙、保加利亚、捷克、意大利、波兰、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13 国）

(续表)

年份	参与涉疆联合声明国家数量	参与涉疆联合声明中的欧盟成员国	未参与涉疆联合声明的欧盟成员国
2020	39 国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西班牙、奥地利、瑞典、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克罗地亚 (21 国)	匈牙利、马耳他、塞浦路斯、希腊、罗马尼亚、葡萄牙 (6 国)
2021	43 国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瑞典、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克罗地亚 (22 国)	匈牙利、马耳他、塞浦路斯、希腊、罗马尼亚 (5 国)
2022	50 国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瑞典、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 (23 国)	匈牙利、马耳他、塞浦路斯、希腊 (4 国)

(二) 一般性应对措施

事实上，欧盟内各成员国及机构的情况虽有特殊性，但它们又都是同一个国家联盟的组成部分，在对外交往时不会违背欧盟整体的政治和外交立场^[59]。我们在采取应对策略时既要关注各国、各机构的特性，又要注重中欧关系的整体走向。立陶宛不顾中欧关系的整体发展而大力操纵涉疆议题的行为，显然让欧盟总部和其他成员国陷入了尴尬境地。匈牙利在涉疆议题上的态度未能与布鲁塞尔的立场保持一致，也令其背上了是欧盟内部“一匹黑羊”的骂名。欧盟委员会曾多次呼吁欧洲议会应在涉疆议题上协调其他机构。因此，我们除了对各成员国以及各机构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外，还需要将发展与三大机构、欧盟成员国的关系置于中欧关系的大框架中加以认识和思考，这样才有可能更好消除欧盟整体对华误解。

1. 加强中欧交流与沟通，增信释疑

深化双边人权对话。人权对话是中欧关系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欧共同努力解决敏感问题的方式^[60]。欧盟非常重视人权对话，中国也不例外，持续的双边人权对话可以增进沟通和减少分歧。虽然中欧官方人权对话渠道由于欧盟近年来在涉疆议题上的错误行为而遭到冲击，但中欧双方依旧将中欧人权对话作为双边在人权问题上交流与合作的最佳平台。目前来看，双方都非常珍视人权对话这一平台在解决价值观分歧上的作用。

帮助欧盟处理好“利益—价值观”两难困境。对外部势力以涉疆议题为由干涉我国内政的表现，中国应当坚决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划出一道红线。在此基础上，中国还需进一步与欧盟管控分歧，推动两者的务实合作。中方应该明确欧盟自身困境。欧盟操纵涉疆议题体现出对自身价值观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价值观而牺牲现实利益。欧盟常常陷入这种“利益—价值观”的两难困境，默克尔推行对华务实外交就曾被批判是重利益轻价值观。欧盟一向因为自身“规范性力量”的定位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影响力，不情愿在“利益—价值观”两难困境中为了现实利益牺牲价值观。但是为了确保现实利益，它有时也会作出一定让步。如果中国可以提供方案帮助欧盟摆脱“利

周明, 何舒雯. “三心二意”的追随者: 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81-103.

益一价值观”的两难局面, 欧盟操纵涉疆议题的热情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中国可以适当制定强调共同利益原则的折中方案, 尤其是在经济事务方面^[60]⁶¹⁹。比如在我国已缔结的国际投资条约中,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在“可持续发展”专章首次规定了有约束力的劳工条款^[61], 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欧盟对人权价值观的重视。

2. 保持战略定力, 强化国际传播能力

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欧盟的沟通虽能部分增信释疑, 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欧盟对华的错误认知和欧盟参与、组织操纵涉疆议题的行动。面对外界操纵涉疆议题, 根本的应对之道是处理好新疆事务。从长远看, 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所以必须立足于把国内的事情办得更好, 才更有条件处理好对外关系。同理, 处理好新疆事务是应对欧盟干涉新疆事务的内生动力。中国应该把自己的事办好, 把新疆的未来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其中, 最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坚定不移地做正确的事, 持续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按照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 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 牢牢扭住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发挥新疆区位优势, 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同时, 要密切关注欧美涉疆政策的最新动态和变化, 制定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策略。

提升我国的涉疆话语权。在一定意义上, 中国与欧盟围绕涉疆议题的角力也是双方涉疆话语权之争。由于美欧等西方主流传媒对国际涉疆话语权的长期垄断, 国际上的涉疆信息传播严重不公正、不对称, 涉疆国际舆论斗争日益尖锐和复杂。欧盟操纵涉疆议题的重要目标就是污蔑、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其通过媒体、学者、官方等多渠道发声, 传播涉疆谣言。为了批驳这些虚假的信息与谎言, 展现真实的新疆, 中国应将新疆事务放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来考量, 努力提升在该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 确立涉疆大外宣理念, 拓展涉疆公共外交, 掌握涉疆外宣工作主动权^[62]。其中, 各级传播主体应在海外社交舆论场积极发挥各自优势, 不断进行涉疆报道的创新探索^[63]。例如, 社交媒体由于传播速度快、内容更鲜活, 聚集了大量受众注意力资源, 提供了相对开放的平台。中国应积极在国际社交媒体推特、脸上主动发声, 澄清事实真相。除了运用多种媒体资源进行发声外, 中方还需注意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让国外受众听得懂。鉴于东西方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若干差异, 中国对外传播过程中时常面临“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为了让国外受众听明白, 中方还需要精心设置易引起共情的传播议题。2021年4月, 有关机构采用中外对比、引发共情的手法, 将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剪辑整合为1分钟的短视频, 从国内外反恐现状的四个主题进行对比, 将中国的反恐行动和措施解读得深入浅出, 对海外受众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该视频在推特平台首发后, 当日受众触及量就达3万人次, 播放量近1万人次^[63]⁷⁹。我国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开展涉疆对外宣传, 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五、结语

欧盟内部有关涉疆议题的看法各异。在三大机构中, 出于性质职能和决策程序的不同, 欧洲议

会扮演操纵的主力军，欧盟委员会与欧盟理事会则均保持有限操纵的态势。在各成员国中，以匈牙利为首的拒绝附和派优先考虑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不愿操纵涉疆议题阻碍双边经济关系发展。以法国为首的有限参与派受中欧实力对比、美欧同盟关系以及各自国内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涉疆议题上采取错误行动，但又出于对中欧经贸合作的重视、与美国对华定位的不同，它们始终保持有限的操纵力度。以立陶宛为首的积极介入派则紧随美国步伐，以价值观为借口极力操弄涉疆议题。面对立场复杂的欧盟，中国首先需要注意中欧关系的整体走向，加强中欧交流与沟通，以增信释疑。其次，中国需要根据各机构、成员国的特性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策略。针对三大机构，中国应将处理好同欧洲议会的关系放在首位，同时也需协调好同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的关系，将经济合作作为中欧关系压舱石；同三大机构务实合作，妥善管理分歧，重建战略互信。针对欧盟成员国，中国对待有限参与的国家时应该管控分歧，对待积极介入的国家时要旗帜鲜明地开展斗争，对待拒绝附和的国家要继续与其加强沟通、保持彼此互信。妥善处理中欧关系，有助于纠正欧盟在涉疆议题上的错误言行，挫败欧盟“以疆制华”的阴谋，增进中欧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参考文献：

- [1] 深入学习贯彻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是新时代做好新疆工作的关键[EB/OL]. (2021-01-15) [2023-01-02]. <http://www.xinjiang.gov.cn/xinjiang/xjyw/202101/0f9e5a87d1334ebdbb7dffbacc66a4141.shtml>.
- [2] 《新疆各民族平等权利的保障》白皮书(全文)[R/OL]. (2021-07-14) [2023-01-02].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08580/1708580.htm>.
- [3] 从习近平总书记新疆之行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成功实践[EB/OL]. (2022-07-16) [2023-01-02].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7/16/c_1128838550.htm.
- [4] 靳晓哲. 美国涉疆人权话语的演进逻辑与中国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2): 78-88.
- [5] 李捷, 杨恕. 遏制与干涉: 美国涉华核心利益法案分析[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0(4): 15-35.
- [6] 郭永虎, 熊小艳. 美国国会涉疆立法活动的动向、特征及影响: 2017—2020 年[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5): 52-59.
- [7] 罗娟丽, 刘长敏. 美国媒体眼中的中国人权问题——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为例[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98-104.
- [8] 刘卫东. 美国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新疆问题的干涉[J]. 国际资料信息, 2010(7): 1-6.
- [9] 励轩. 学者的角色: 美国的中国西部边疆研究者与对华政策制订[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6): 26-31.
- [10] 赵怀普. 拜登政府与美欧关系修复的空间及限度[J]. 当代世界, 2021(2): 18-24.
- [11] 崔翠翠. 欧盟政治分裂与重心转移的消极影响[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22): 150-153.
- [12] 李明明. 共识政治的危机: 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政治分歧的发展[J]. 德国研究, 2019(2): 37-48.
- [13] 刘娟平, 张利华. 欧盟三大机构对中国政策立场比较分析[J]. 国际政治研究, 2020(4): 82-105.
- [14] 张磊. 欧洲议会在中欧关系中的作用[J]. 国际问题研究, 2016(4): 37-49.
- [15] 朱力宇, 代秋影. 对欧洲议会涉华人权决议的回顾与若干评析[J]. 人权, 2011(1): 42-46.
- [16] 熊炜, 姜昊. “价值观外交”: 德国新政府的外交基轴?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1): 105-124.

周明, 何舒雯. “三心二意”的追随者: 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81-103.

- [17] 陆娇娇, 吴江. 德国绿党的中国叙事研究 [J]. 国际论坛, 2022 (3): 114-131.
- [18] 王鲲. 马克龙执政以来法国对外战略特点探析 [J]. 当代世界, 2020 (1): 56-61.
- [19] 杨成玉. 从法国大选看法国未来政策趋势及中法合作前景 [J]. 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 2022 (3): 21-30.
- [20] 刘作奎. 2018 年大选后匈牙利的内政和外交走向 [J]. 当代世界, 2018 (6): 56-59.
- [21] 杨博文. 立陶宛力推冒进外交, 到底为哪般? [J]. 世界知识, 2021 (16): 46-47.
- [22] Heribert Kohl.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10 years since EU enlargement [J].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2015 (3): 285-311.
- [23] Katja Levy, Ágota Révész. No Common Ground: A Spatial-Relational Analysis of EU-China Relations [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22 (3): 457-491.
- [24] Pepijn van Houwelingen, Plamen Akaliyski, Paul Dekker, Jurjen Iedema.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political values in 18 EU countries 1990—2017 [J].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2021 (4): 452-470.
- [25] Giuseppe Balducci. The Limits of Normative Power Europe in Asia: The Cas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J]. East Asia, 2010 (4): 35-55.
- [26] Max Roger Taylor. Inside the EU-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 Assessing the Practical Delivery of the EU's Normative Power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2022 (3): 365-380.
- [27] Ann-Charlotte Buntinx, Francesca Colli. Moral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NGOs in the EU's external human rights policy towards China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22 (3): 552-565.
- [28] European Parliament. Report on a new EU-China strategy [R/OL]. (2021-09-15) [2023-01-02].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A-9-2021-0252_EN.html.
- [29] 雷建锋. 欧洲议会与中欧关系 [J]. 云南社会科学, 2009 (5): 47-51.
- [30] Epp Group. Cooperate, compete and confront China [R/OL]. (2021-03-09) [2022-07-30]. <https://www.eppgroup.eu/newsroom/news/cooperate-compete-and-confront-china>.
- [31] Kamil Zwolski. Diversified in unity: The agenda for the geopolitical European Commission [J]. Global Affairs, 2020 (4): 519-535.
- [32] European Commission. W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Does in Strategy and Policy [EB/OL]. (2021-01-01) [2022-07-21]. https://commission.europa.eu/about-european-commission/what-european-commission-does/strategy-and-policy_en.
- [33] 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 [R/OL]. (2019-03-12) [2023-01-0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fs_19_6498.
- [34] 路透中文新闻部. 港报社评: 冻结中欧投资协定,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 [EB/OL]. (2021-05-24) [2022-05-2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E6%B8%AF%E6%8A%A5%E7%A4%BE%E8%AF%84%EF%BC%9A%E5%86%BB%E7%BB%93%E4%B8%AD%E6%AC%A7%E6%8A%95%E8%B5%84%E5%8D%8F%E5%AE%9A%EF%BC%8C%E8%B1%A1%E5%BE%81%E6%84%8F%>

- E4%B9%89%E5%A4%A7%E4%BA%8E%E5%AE%9E%E8%B4%A8-%E6%98%8E%E6%8A%A5%E6%9C%8824%E6%97%A5-idCNL3S2NB034.
- [35] Markus Haverland, Minou de Ruiter, Steven Van de Walle. Agenda-setting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eeking public opinion? [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8 (3): 327-345.
- [36] Council of EU. Council conclusions EU Strategy on China [R/OL]. (2016-07-18) [2023-01-0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6/07/18/fac-china-conclusions/>.
- [37]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Joint Declaration on bilateral cooperation by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Lithuania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Commonwealth and Development Affairs of the United Kingdom [EB/OL]. (2022-05-23) [2023-01-02]. <https://www.urm.lt/default/en/news/joint-declaration-on-bilateral-cooperation-by-the-minister-of-foreign-affairs-of-lithuania-and-the-secretary-of-state-for-foreign-commonwealth-and-development-affairs-of-the-united-kingdom>.
- [38] 盲目追随美国! 专家: 立陶宛曾一度成为涉疆“种族灭绝”谣言的全球传播“极点” [EB/OL]. (2021-05-24) [2022-06-07]. https://3w.huanqiu.com/a/5e93e2/43Ft9Zwd3Pu?agt=8%3Fp_a3336ca39064cf3f4f5f4e78d3d02cf70.
- [39] 王怡然.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的安全战略选择 [J]. 长春大学学报, 2020 (1): 102-106.
- [40] 凤凰卫视. 立陶宛反华背后, 是美国一箭双雕的计谋 [EB/OL]. (2021-08-17) [2022-04-28]. https://k.sina.cn/article_1643971635_61fd043300100ujf2.html?from=news.
- [41] 张艳璐. 小国对外战略的逻辑与偏好分析: 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例——兼论波罗的海三国对华关系和政策的演变 [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19 (5): 55-73.
- [4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rade Profiles 2022 [EB/OL]. (2022-10-27) [2023-01-05].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daily_update_e/trade_profiles/LT_e.pdf.
- [43] France Diplomacy. 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R/OL]. (2022-11-04) [2023-01-03].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en/country-files/europe/western-balkans-62918/article/g7-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4-november-2022-munster>.
- [44] 观察者网. 法国国防部长: 减少在一些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 [EB/OL]. (2021-03-23) [2023-01-03].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1_03_23_584994.shtml.
- [45] 环球时报. 德国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对华贸易政策, 将“不再天真” [EB/OL]. (2022-09-13) [2023-01-03]. <https://military.china.com/news/13004177/20220915/43418713.html>.
- [46] 环球时报. 德国纵容疆独过了头 [EB/OL]. (2009-07-20) [2022-09-01]. <https://m.fx361.com/news/2009/0720/5649173.html>.
- [47] 德国之声中文网. 多数德国人主张采取更强硬对华路线 [EB/OL]. (2021-08-30) [2022-08-01]. <https://m.dw.com/zh/%E5%A4%A9%E6%95%B0%E5%BE%B7%E5%9B%BD%E4%BA%BA%E4%B8%BB%E5%BC%A0%E9%87%87%E5%8F%96%E6%9B%B4%E5%BC%BA%E7%A1%AC%E5%AF%B9%E5%8D%8E%E8%B7%AF%E7%BA%BF/a-59028635>.
- [48] 周少青. 欧洲穆斯林人口的五个“事实清单” [N]. 中国民族报, 2018-02-06 (5).

周明, 何舒雯. “三心二意”的追随者: 欧盟涉疆立场与行为研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81-103.

- [49] BFMTV. Le vote Macron À 55% chez les catholiques, 85% chez les musulmans selon UN sondage [EB/OL]. (2022-04-25) [2022-07-25]. https://www.bfmtv.com/politique/le-vote-macron-55-chez-les-catholiques-85-chez-les-musulmans_AD-202204250370.html.
- [50] 环球时报. 社评: 中法德三个月内两次峰会传递清晰信号 [EB/OL]. (2021-07-06) [2022-07-19].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3p2eUfC89t>.
- [51] 环球时报. 匈牙利汉学家驳斥法媒记者“特洛伊木马”言论: 中国没有利用我们 [EB/OL]. (2022-04-09) [2023-01-03]. https://world.gmw.cn/2022-04/11/content_35650604.htm.
- [52] 张健. 中东欧地缘政治新态势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6 (6): 35-44.
- [53] 匈牙利力挺中国之后, 欧洲又一国幡然醒悟: 我们不是欧盟殖民地 [EB/OL]. (2021-07-10) [2022-07-30].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EI0777B0534NABM.html>.
- [54] 观察者网. 匈牙利司法部长: 欧盟正打造舆论霸权联盟, 胁迫我们放弃传统价值 [EB/OL]. (2022-10-25) [2023-01-03]. <https://www.sogou.com/sie?query=%E5%BC%A0%E8%8F%81%E5%A8%9F%E8%A7%82%E5%AF%9F%E8%80%85%E7%BD%91%E8%AE%B0%E8%80%85&hdq=AQ7CZ&ie=utf8&ekv=3&>.
- [55] 贺婷. “欧尔班现象”初探 [J]. 俄罗斯学刊, 2017 (6): 25-32.
- [56] 王雪彤, 王治江, 吕宝军, 等.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和匈牙利关系研究 [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 2020 (4): 127-132.
- [57] 26:1! 匈牙利不惧美国, 以一国之力否决涉华决议, 为中国发声 [EB/OL]. (2021-05-18) [2022-06-24].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AA393S40543KALT.html>.
- [58] 洪邮生. “规范性力量欧洲”与欧盟对华外交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0 (1): 52-65.
- [59] 环太国际战略. 解析保加利亚政治生态、探寻与中东欧国家的相处之道 [EB/OL]. (2022-10-10) [2022-10-10].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665384948&ver=4095&signature=vBU79mzpUHRxrFxxjN29pym95qNOH0J4CphIs9ApGr1EfPVV8aMOKkSESlyQ8HZ1Lp4xuFkGq6kwcFIImjbxR9pVW9K2-7x16LTrsYj2gEaGNDbIaYH8tW5S09JwuesOP&new=1>.
- [60] 潘忠岐. 中欧在主权和人权上的规范偏好 [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6): 614-622.
- [61] 肖军. 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劳工条款的可执行性 [J]. 法学, 2022 (9): 178-192.
- [62] 郭永虎, 朱博. 从特朗普到拜登: 美国涉藏政策的动向、影响及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95-105.
- [63] 李芳芳. 西方涉疆议题报道“布局”及中国应对策略解析 [J]. 对外传播, 2022 (3): 77-80.

责任编辑: 龚静阳



“台湾自决论”发展动向与学理批驳

薛佳贝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台独”分子为了寻求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不断鼓吹和操弄所谓“台湾自决论”，并将其作为扩大自身影响力的理论基础。“台湾自决论”作为“法理台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实现从“法理台独”到“事实台独”的理论铺垫。当前，“台湾自决论”发展体现出新动向及特征，但该论调在史实与法理上没有任何依据。经过“台独”势力的操弄，“台湾自决论”主要由所谓“台湾民族自决论”和“住民自决论”构成。前者通过塑造所谓“台湾民族”虚假概念来解构中华民族，后者则是歪曲嫁接“民族自决”与“民主”等理论的产物。这两种论调均缺乏理论依据来证明其所谓“自决权”的合理性。首先，所谓“台湾民族”并不存在，更不可能成为国族主体；广大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光复后的台湾也非殖民地，因此不具备行使民族自决权的条件。其次，国际法上并不存在“住民自决”，该论调混淆了自决和分离的概念。“台湾民族自决论”和“住民自决论”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有所不同，但都是服务于“台独”势力的政治工具，其实质不过是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掩盖真实的分裂行径。以分裂国家、挑战主权为目的而炮制出的各种“自决”理论，必然无法经受住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双重检验，在逻辑上、学理上根本站不住脚，必将遭遇失败。

关键词：民族自决；“台独”；“台湾民族自决论”；“住民自决论”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2-0104-11

DOI：10.13946/j.cnki.jcqi.2023.02.009

作者简介：薛佳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薛佳贝．“台湾自决论”发展动向与学理批驳[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04-11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1]目前,“台独”势力的扩大和影响在极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实现统一的进程。“台独”思潮和活动是台湾社会复杂的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以及境外反华势力综合影响的产物。“台独”势力为了使其言论“有理有据”,借用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原则,炮制出所谓“台湾民族自决论”“住民自决论(又称2300万人决定论)”等“台独”论调。“台湾民族自决论”和“住民自决论”都是将“自决”作为理论来源,是“法理台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在产生背景、论调内容和行使主体上有所不同。这严重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和平统一进程。以史为据,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广大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分子,并不存在所谓“台湾民族”。从法理上看,“台湾自决论”也无法自圆其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需要坚决反对一切“台独”言论和行径,回应和批驳其系列论调是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在梳理民进党当局鼓吹“台湾自决论”动向和特征的基础上,全面阐述和分析“台湾自决论”的形成过程,并批判其虚假性。

“台湾自决”的论述体系包括了“台湾民族自决论”和“住民自决论”。按照历史沿革,“台湾民族自决论”的产生早于“住民自决论”,也正是“台湾民族自决论”的幻灭才催生了“住民自决论”。目前,相关研究集中在单一化、片段式阐述二者的形成、概念和发展历程,未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首先,两种论调都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来掩盖分裂行径,是“台独”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而炮制的理论幌子,进而构成“台湾自决论”体系。其次,就性质而言,“台湾民族自决论”企图通过捏造不同于大陆的所谓“台湾血统”来强调“台湾民族”的存在,而“住民自决论”意在强化“住民权”在国际上的合法性,从而与“公投”捆绑兜售。上述两种论调都属于“法理台独”范畴,涉及“内造台独”“文化台独”,是“隐性台独”的一种表现。其危害性更强,需要通过理论分析结合法理研究、现实动向结合历史回溯的方法进行批判和驳斥。

一、“台湾自决论”发展动向及特征

“台湾自决论”是“法理台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台独”势力宣传“台独”理念的政治工具。它旨在为“全民公决”服务,并企图将“自决”合法性做铺垫。它的核心论调是“无论是2300万人还是‘台湾民族’都有权独立地决定台湾地区的未来”。虽然它不像“修宪”“公投”等论述影响的程度深,但自1942年美国国防部“远东战略小组”提出“台湾民族自决”至今,它不断地“变异”,以满足“台独”势力的政治需求。“台湾自决论”不仅企图增强台湾民众的“主体意识”,还妄图将台湾民众从中华民族中分隔出来^[2]。其主要表现为“去中化”,包括篡改和删减台湾历史教材中有关中华民族英雄和文化的部分,减少“千年祭”“龙王祭”一类的两岸宗教交流活动内容等。“台湾自决论”的受众对象不只是部分岛内民众,也包括了海外反华、分裂势力。“台独”势力的真实意图为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寻求更多的国际资源和所谓“盟友”,在国际上建构所谓“独立主权”的虚假叙事。

当前,“台湾自决论”表现出三大发展趋向。第一,为蓄意对接国际法上自决权的行使主体原

则，部分“台独”分子炒作所谓“台湾地位已定论”。如陈仪深在所谓“中日和约生效 70 周年纪念与台湾地位之定论”的报告中宣称“台湾地位未定论”已经过时，并且鼓吹“台湾地位已定”。第二，“台湾自决论”藏于“文化台独”“法理台独”“内造台独”之中，与“公投”捆绑，更具有隐蔽性和危害性。蔡英文当局推行“三破三立”，宣称“新一代台湾人民的血统已经发生变化”，企图打造所谓新兴“台湾族”^[4]。其中，“三破”为回避两岸共同政治基础，消除两岸历史集体记忆，限缩两岸现实活动连接；“三立”为构建台湾所谓“国家”形象，强化“台独”社会文化，打造“台独”法制通道^[4]。该做法实质上是以“三破三立”之名制造两岸同胞的差异性。第三，外部势力长期干涉我国内政，公然支持“台湾自决论”。2022 年 9 月，拜登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专访时声称：虽然他不鼓励“台独”，但台湾的前途问题应该由台湾民众决定^[5]。美国长期模糊化对台政策，企图“以台制华”。未来民进党当局将继续保持“倚美谋独”动向。2023 年 1 月，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窜访台湾时声称：支持台湾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希望加强“台欧”之间的合作^[6]。在长期的自身“变异”和外部势力干涉下，以上三种趋向凸显“台湾自决论”的复杂性，并进一步内化成为“台独”体系的论调基础。

同时，“台湾自决论”的发展轨迹体现出四个特征。第一，以虚假的“民主”作为政治工具，在所谓“公投”中操弄“住民自决”。2021 年 12 月，台湾地区《新新闻》声称：“公投只是以民主的游戏规则来处理‘台湾前途问题’，而这已是国际人权公约所赋予的普遍人权。”^[7]2022 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前，蔡英文坚持“抗中保台”概念，甚至将这个概念升格至“2024 台湾‘大选’行使自决权”。民进党当局掩盖了真实的国际人权公约内容。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有人民都有行使权”中的“人民”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所有人民，而不仅是台湾地区的人民^[8]。

第二，增加“台湾自决论”的曝光率，利用议程设定迷惑国内外受众群体。为树立所谓“国家”形象、拓展所谓“外交空间”，台湾地区有关政治人物频繁参加国际活动，持续推动“新南向政策”。譬如，2022 年 9 月，在法国智库“国际关系研究院”（IFRI）举办的研讨会上，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育仁妄称：“台湾外交政策主轴强调‘主权国家’、安全以及国际社会参与，致力于‘民族自决’。”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不仅将“亚东关系协会”更名为所谓“台湾日本关系协会”，还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企图塑造与日本、美国一样的“国家”形象^[4]。事实上，我国《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再次强调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并明确指出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官方法律意见：“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台湾当局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从而进行有效的回应和反击。

第三，营造虚假“弱者”身份，强调“人权高于主权”。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施正锋声称：台湾之所以不被国际所认可，并且在加入国际组织时只能采取经济个体的身份，是因为大陆的掣肘及“强权”^[9]。实际上，参加国际组织的普遍原则是独立主权国家，或者在独立主权国家允许的原则下以地区经济体的身份加入，而台湾地区从来不具备独立主权国家资格。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前提是认可“一中原则”，这才是台湾无法拓展所谓“生存空间”的真正原因。施正锋进一步妄称：“台湾人在从事‘独立建国’的过程中，若是要求国际社会将台湾接受为‘国家’，在道

德上的正当性是‘民族自决权’，也就是说，台湾人与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都有平等的权利享有自己的‘国家’。”^[9]然而，若只强调道德上的“正当性”，而忽略国际法和国内法层面的合法性，那么“台湾自决”产生的结果非但不具合法性，亦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可。更何况，“台湾自决”本身就不具备任何道德上的正当性。

第四，长期受到外部势力干涉，故意制造“民主—威权”意识形态对立，造成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误解。岛内“台独”势力的造势是“台湾自决”内生化的重要因素，而外部势力干涉则是“台湾自决”国际化的助燃剂。外部势力干涉主要采取如下途径。其一，向台湾地区兜售武器，并将其美化为“维护台海稳定”。美西方一些反华势力借所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为由“协防台湾”，实则“以台制华”，破坏“一中原则”。2022年8月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此后瑞士和欧洲议会某些政客也计划窜访台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也在涉台问题上不断炒作，试图挑动海峡两岸关系及中美矛盾。其二，以所谓“自由民主灯塔”“政治发展特优生”幌子制造“价值观对立”，阻碍两岸统一。外部反华势力企图通过塑造台湾所谓“民主示范”角色来弱化台湾人民统一认同，污名化大陆发展和形象。

总体而言，民进党鼓吹“台湾自决论”的动向及特征，都离不开与“民主”“人权”“修宪”和“公投”相捆绑。从根源上批驳“台湾自决论”，要回溯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揭露其理论中的错误，精准反击“台独”分裂言行。

二、“台湾民族自决论”的本质及其错误

“台湾民族自决论”的所谓主体是“台湾民族”。然而，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同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国族”意义上的所谓“台湾民族”根本不存在。因此，从史实和法理上击破“台湾民族自决论”的内核尤为重要。

（一）“台湾民族自决论”的产生及其本质

“台湾民族自决论”的本质是为了分裂中国。其论调为：台湾同胞是不同于“中华民族”的另一“独立民族”，拥有“民族自决权”。“台独”分子王育德曾宣称汉族不是“民族”，因为资本主义是诞生“民族”的必要条件，蛊惑台湾地区借助“国家”这一容器来精炼“民族”这个“内容物”^[10]。随着“台湾民族”这一论调的衍生，在台湾光复之后依然存在关于“台湾民族不同于中华民族”的说辞。肆意推动“去中国化”的“台独”分子杜正胜，为了绕开台湾历史包含在中国历史之内的事实，处心积虑地建构了“从台湾出发的、凸显本土性和主体性的历史论述框架”，即所谓台湾“同心圆理论”（又称“同心圆史观”）^[11]。该理论以台湾为中心向外扩散，并以此将历史论述的空间单位划为五个层级：台湾地区的乡土史（核心部分）、台湾史、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这种利用区域史、世界史和后殖民史对中国历史进行解构、再对台湾地区历史重构的范式，影响了台湾地区民众对于祖国历史的正确认识和学习。已有大陆学者对此指出：“这一理论框架并非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而是从对民众历史态度进行教育和灌输历史知识的角度来提出的，其论述逻辑不是传统历史学强调的时间的‘由远及近’，而是地理空间上的‘由近及远’，完全打破了传统历史教学的线性范

式。”^[11]

从源头上看,最早的“台湾民族自决论”是美国、日本反华势力扶持下的产物。二战后,日本虽根据条约归还了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但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试图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汉奸分子,在台湾建立“台独”组织,并策划“台独”活动^[12]。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美国军方主张对台湾先占领、再托管,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远东战略小组”来研究战后托管台湾的方案。1942 年,该小组便向麦克阿瑟提出“建议”:托管期间让台湾民众举行“公投”(即“台湾民族自决”)或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并开始培训一批未来“接管”台湾的行政人员。1949 年 1 月 19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相关文件声称:美国会扶植“台独”势力,以此维护美国在台利益。在此背景下,被称为“台独祖师爷”的廖文毅四处抛售“台湾独立公投”“台湾地位未定”“台湾应交由联合国托管”等谬论。异化的“台湾意识”便成为“住民自决论”滋生的心理催化剂^[13]。1957 年美国参议院发表《康隆报告》,妄称“中共入联合国,承认‘台湾共和国’为美国保护国”^[12]。即使中美建交后,“台独”组织及其活动仍在美国存在,如游说美国议员、鼓吹“台湾加入联合国”等。

(二) 台湾光复前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民族自决”主张被刻意歪曲

一段时期以来,民进党试图通过混淆国际法上自决权行使原则和歪曲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地区政治立场的阶段性历史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事实上,台湾光复的历史不仅证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定事实,还成为驳斥“台独”分子所谓“台湾民族自决论”的最有力的证据。

至今,国际法律文件与国际实践所认可的民族自决只适用于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殖民主义统治、外国占领和强加的政治统治、种族主义政权。日据时期的台湾为了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怀抱,便提出了民族自决,其本身对抗战战争、民族革命具有积极意义。1924 年,李大钊在阐述民族概念时强调,台湾地区虽然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但“其历史、文化都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14]。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论述了“两步走”策略,认为台湾正处于被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状态,只有通过第一步“台湾革命”实现“独立”,才能迈出第二步回归祖国^[14]。1927 年刊登于广州《民国日报》上的《台湾革命青年团为“六一七”台湾耻辱纪念日事致中国民众书》强调:“台湾是日本霸占的中国领土,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实现‘台湾民族的自决’‘谋举台湾独立’,回归祖国。”^[15]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民族自决”理论为两岸人民找到了两岸革命团结的新方向。为实现“台湾民族革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革命力量联合在一起,共同抗日、光复台湾,追求实现祖国统一。台湾革命同盟会编印的《台湾问题言论集》的第一集写道:“我们恳切地希望着将台湾编入沦陷省区,设立台湾省政府及军管区的筹备处,作战与复员均须兼筹并顾,使在孤岛内的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劝慰其对祖国的思念,增强其对敌人作战的决心。”^[16]根据“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库藏史料,1943 年台湾义勇队分团部发表了《台湾革命同盟会为纪念“六一七”台湾沦陷四十八周年宣言》,其中强调了三点:一是日据下的台湾只有革命未来才有光明可言;二是实现回归需要集中力量、团结一致;三是再次申明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会建立光复的武装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16]。

然而,境外反华势力为干涉我国内政,蓄意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歪曲,企图误导台湾民众和

国际舆论。国台办对此进行了回应:“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之日起,始终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统一而不懈奋斗……1936年,刚经长征到达陕北,就率先提出‘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讨论并决定包括对日绝交宣战、收复失地和公开宣布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完全无效等政策。这清楚无误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主张废除《马关条约》、收复台湾的态度和立场。1937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时便表示‘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17]1943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台湾,回到祖国来!》社论,第一句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台湾回归祖国的政治主张,呼吁国内力量团结一致进行抗战,驱逐日寇,让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16]。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台湾随之光复,重回祖国怀抱,随后因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导致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17]。尽管在国际上存在歪曲事实、分裂国家的声音,但是从1949年起,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三)“台湾民族自决论”不具备行使民族自决权的条件

在国际法上,行使民族自决权需要满足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行使主体不是“族群(nationality/ethnic group)”而是“国族(nation)”;^[18]二是行使主体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托管领土以及非自治领土等。根据上述条件,台湾均不具备行使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要件。民进党当局炒作“台湾民族自决论”在国际法上没有任何法理依据。

一方面,台湾人民是以血缘文化为内涵的族群,它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籍、国民身份、国民素质等含义^[18]。从历史上看,台湾人民属于“中华民族”是既定事实^[19]。不论大陆人还是台湾人都同属炎黄子孙,不存在“血统差异”。即便台湾最早的少数民族居民——高山族,其先民也来自大陆东南沿海一带,即古越人的一支——闽越的后裔^[20]。此外,在清代前期,移民社会是台湾的主要社会形态,其中移民的主体力量便是来自闽、粤的汉族移民^[21-22]。相关资料表明,大陆居民大规模迁徙到台湾地区共有五次:第一次是1638年前后,明朝负责福建海防的郑芝龙从遭大旱的福建招募数万饥民迁台定居;第二次是1661年郑成功率军击退荷兰人、收复台湾后的二十几年间,先后有四批8万多军民迁台;第三次是康熙、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台设立一府三县后出现的移民高潮;第四次是太平天国时期,大量福建地区的民众为躲避战乱而迁移到台湾;第五次是1945到1949年之间,国民党政权败退至台湾,约200万大陆军民移居台湾^[20]。因此,从民族学角度而言,台湾同胞最多也只能是族群,而不是国族。族群是非国家层面的^[23],它不拥有自决权。族群成员可以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但对它的认同不能高于对国族的认同。

另一方面,1945年后台湾并没有遭受殖民统治和压迫,并不属于殖民地性质。二战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迫使日本于1945年将在甲午海战中窃取的台、澎、金、马地区归还中国,并明确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以及中国政府对台湾地区的有效管辖权。然而,在“台独”动机的驱使下,一些台湾学者竭力切割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历史联系,否认“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11]。譬如,歪曲污蔑清朝对台湾地区的统治是一种“殖民形态”,诬称清朝的海禁政策是为了孤立台湾。即便如此,也无法否认台湾地区历史镶嵌于祖国历史之中、与祖国历史共同呼吸的事实,这也是中国史观认知、中华民族认同和“一

个中国”认同三位一体得出的正确结论。因此，台湾不是殖民地，法理清楚、史料充分、事实明确，不具备行使“自决权”的条件。

三、从说不通的“台湾民族自决”到歪曲嫁接的“住民自决”

“住民自决论”在吸取“台湾民族自决论”的有关内容后，将“民族自决”“人民主权”“民主”等理论歪曲嫁接，从而形成新的“台独”论调。对“台独”势力而言，“住民自决”具有更强的政治工具性。其重要节点是民进党第五届“代表大会”将“住民自决论”和“公民投票”捆绑在一起进行表决，妄想通过“公民投票”来实现“台独”^[12]。区别于“台湾民族自决”，“住民自决”除了与“台湾民族自决”一样以“台湾独立”为核心诉求外，它直接服务于全民公决，旨在为分离性公投做铺垫，企图让“2 300 万台湾住民通过公投的方式来决定台湾未来”。

（一）“台湾民族自决论”的失据与“住民自决论”的产生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所谓“台湾民族”论缺乏法理支撑，在逻辑上漏洞百出，以此为核心的“台湾民族自决论”逐渐失去市场。随后，“台独”势力费尽心思地炮制出“住民自决论”，使其成为目前“台独”主流理论之一。“住民自决论”是“台独”势力将“民族自决”“人民主权”“民主”等理论进行歪曲嫁接而炮制出的论调，主张“由台湾 2 300 万人民通过公投来决定台湾地区的前途”^[24]。其实质是，企图通过捆绑“公投”与“住民自决”行使自决权，进而实现“台独”。1987 年，谢长廷宣称：“国共长期对峙的结果，台湾面临中共政权强大的威胁和压力之下，台湾住民自然形成台湾岛命运共同体的台湾意识”，即包含了“所有本省、外省同胞、也包含国民党在内的一种意识”^[25]。简言之，“住民自决”宣扬的主要内容为：“台湾的前途”只能由现居于台湾地区的居民决定，将大陆人民排除在外。

最先提出“住民自决论”的是“台独教父”彭明敏。他声称，台湾住民“有权”决定“台湾前途”。当他的“住民自决论”已有雏形后，开始在岛内进行传播，如 1964 年所谓《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提出了“一中一台”的论调。随后，“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于 1971 年公开发表《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一文，强调台湾的“主体性”，提出“人民自决”的主张。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丽岛事件”“高雄事件”等运动的兴起，极大地助推了“住民自决论”的传播。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士于 1978 年 12 月发表了《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这也标志着“住民自决”理念正式成为“党外运动”的主要政治纲领之一^[26]。“住民自决”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传播，很大程度上缘于民进党势力的扩大。1986 年民进党正式成立后，不仅将“住民自决”的理念与“公民投票”理论相捆绑，还于 1991 年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将“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的内容纳入党纲^[27]。此后，“住民自决”成为其推行“台独”路线的行动指南，岛内“台独”势力逐步取得了以政党名义进行活动的地位^[28-29]。2003 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再次公开宣称：“台湾的未来有赖 2 300 万人民决定”，而决定方式包括“公投”等。该论调披盖着“国家化”的外衣，具有非常大的蛊惑

性和隐蔽性,对岛内民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二)“住民自决论”的错误所在

“台独”势力通过混淆自决和民主的概念而创造出“内部自决”概念,企图借“民主”之名,行分离之实。事实上,自决和民主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概括而言,自决权是缔造性权利,是非制度化的权利,可以创设边界,但仅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托管地等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民主权是派生性权利,是制度化的权利,不可以创设边界,更不能改变疆界,针对主体是独立建国后民主政体国家的公民^[30]。按照国际法中有关自决权的定义,不难发现,台湾地区没有国际法意义上的自决权。

从“公投”的角度而言,分裂势力常常将“住民自决论”与“台湾独立公投”捆绑“销售”。2017年12月12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通过《公民投票法》修正案,意图降低公投门槛和投票年龄^[31]。其具体内容包括:将“公投”年龄从20岁下调到18岁(台湾地区规定年满20岁为成年,拥有投票权),将“公投”通过门槛由同意票达投票权人总额的1/2降为1/4。2022年11月26日,台湾地区举行所谓“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公投”,该案同意票未达到通过门槛,最终以失败告终。民进党将“修宪”作为操纵政治的工具,其结果注定失败。从国际法和国际社会承认新产生国家的具体实践看,某一地区住民要想通过“住民公决”获得独立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新国家的产生首先要获得母国同意,主权国内某地区的居民无权单独决定该地区的独立^[30]。这里涉及公投主体的概念,若公投主体只有台湾地区的居民,那么它只能决定地方事务,属于地方性的公民投票。从法理上,“对于涉及如台湾前途的主权问题,必须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否则,投票结果是无效的”^[32]。譬如,苏格兰独立公投是在英格兰中央政府同意下并签订协约后进行的,属于协约式分离公投^[33]。第二,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民主都是在预先确立的范围和边界内来运行的,并有其特定的议题^[30]。现实政治中,借着“住民自决”的旗号来创设国家的做法,是不符合民主政治运行逻辑的^[34]。第三,从主权理论看,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具有唯一性与排他性,是不可分割、不能分享的,它属于该国的全体国民,个体或部分人无权分割属于全体人民的领土与主权^[30]。台湾与大陆的边界不是国家之间的疆界,而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行政疆界。实际上,两岸人民共同享有人民主权、领土主权,构成“两岸命运共同体”^[35]。

(三)“住民自决论”与“台湾民族自决论”的区别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台湾民族自决论”早于“住民自决论”,而后者产生是由于前者的“破产”。从二者的主体对象而言,“台湾民族自决论”的主体对象是所谓“台湾民族”,而“住民自决论”的主体对象是“2300万台湾住民”。除上述时间顺序和主体对象的区别外,二者在本质上更有不同。

首先,二者虽然都带有“自决”的概念,但“台湾民族自决论”的支撑点是“台湾民族”,而“住民自决论”的着力点是“2300万台湾住民”。从“台湾民族自决论”演变为“住民自决论”的原因是“台独”分子意识到台湾人无法算作“民族(nation)”,无法援引“民族自决”,便将“民族自决”中的“民族”偷换为“住民”^[8]。实际上,国际法上不存在“住民自决”的概念,“住民自决”没有国际法根据^[34]。通过“住民自决”来实现一个地区的独立,是得不到国际法支持的,也

不会被任何母国所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中，也有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相关表述。这从侧面反映出台湾没有单方面变更台湾领土主权的权利。

其次，在实现路径上，“台湾民族自决论”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化。相比之下，“住民自决论”在吸取了前者的内容后，处心积虑将其与“公投”捆绑，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复杂。“台独”分子不仅利用“自决”这一理论工具，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推动“自决”。“修宪公投”“制宪”“释宪台独”等都是“台独”分子一步步为达到“台湾自决”的分裂行径。

再次，“台湾民族自决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民族自决论”，而“住民自决论”的基础不是民族自决权而是分离权。由于分离行为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相悖，“台湾民族自决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被明令禁止^[36]。《反分裂国家法》第二条规定：“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此外，自决权包含独立权，但不包括分离权，且在国际法意义上不存在分离权。“分离是指主权国家的一部分从中脱离，体现主权国家与其内部部分领土与人民的关系。”^[8]分离是国家主权的头号大敌，自决会缔造国家主权^[8]。列宁曾表示：“我们拥护分离权，但不拥护所有民族的分离！……分离绝对不是我们的计划。我们绝对不宣传分离。总的说来，我们是反对分离的。”^[37]而所谓“台湾自决论”不仅损害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还罔顾我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更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总之，从现代国家的角度而言，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不能因为台湾与大陆暂时处于隔离状态，就否定中国掌握台湾的主权。不论“台湾自决论”演变为何种形式，“台独”势力所捏造的两种“台湾自决”论调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如果赋予每个现代主权国家内部人民“住民自决权”，就会使“民主、自由问题绝对化，成为滋生分离主义、民粹主义的土壤”，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内的四分五裂以及国际的动荡^[38]。

四、结语

“民族自决”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托管领土以及非自治领土实现独立自由；另一方面又可能会被分裂势力、外部干预势力所利用，成为其解构所在民族体系、分裂国家、危害国家领土及主权完整的理论工具。以分裂国家、挑战主权为目的而炮制出的各种“自决”理论，必然无法经受住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双重检验，在逻辑上、学理上根本站不住脚。基于特定历史场景和条件，在承认自决权对二战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托管领土与非自治领土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应当防范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别有用心。

虽然海峡两岸由于诸多原因尚未完全实现国内法层面的统一，但台湾问题属于我国内政是不可改变的既定事实。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坚决维护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推动两岸统一，必须以一中原则为前提和基础。这不仅是政治原则，也是当今国际法处理中国统一问题的基本规则。因此，“台独”分子无论是以“民族自决论”还是“住民自决论”又抑或是其他形式、理论去包装“台独”，都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无论在法理上还是逻辑上都站不住脚，必将遭遇

薛佳贝.“台湾自决论”发展动向与学理批驳[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04-114.

失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 陈先才.当前台湾岛内“独”派组织发展状况分析[J].台湾研究,2018(3):26-33.
- [3] 张娟.关于台湾“住民自决论”的评析[D].北京:北京大学,2005:6-10.
- [4] 肖杨.蔡英文当局执政以来推行“内造台独”评析[J].台海研究,2019(3):59-68.
- [5] 路透分析保台说:拜登暗示“支持台湾自决权利”[EB/OL].(2022-09-21)[2022-11-28].<https://udn.com/news/story/123034/6627713>.
- [6] 前北约秘书长访台 表态支持“台湾人自决”[EB/OL].(2023-01-04)[2023-02-03].<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hx1-01042023053011.html/ampRFA>.
- [7] 朱昊天,严安林.台湾地区国民党与民进党“公投”政治动员的比较研究——以2021年四项“公投案”为例[J].台海研究,2022(4):80-91.
- [8] 王英津.国际领土变更公投案例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385-389+526-540.
- [9] 民族自决权——台湾“独立建国”的民族主义观点[EB/OL].(2002-08-15)[2022-11-26].<https://www.wufi.org.tw/民族自決權——台灣獨立建國的民族主義觀點/>.
- [10] 朱松岭,许崇德,易赛键.“法理台独”理论根源之批判[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15.
- [11] 林红.“大一统”历史秩序与两岸关系基本结构的再思考[J].台湾研究,2021(4):1-15.
- [12] 陈明辉,华学成,吴自华,等.形势与政策基础[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5:258.
- [13] 肖鹏.用心何其险恶——台湾“住民自决论”[J].文史月刊,2009(7):24-26.
- [14] 陈忠纯.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73-87.
- [15] 左双文.华南抗战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78.
- [16] 陈占彪.甲午五十年(1895—1945):媾和·书愤·明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310-321.
- [17] 国台办.美国杂志有关报道蓄意歪曲事实,居心邪恶[EB/OL].(2022-05-06)[2022-11-28].http://www.gwytb.gov.cn/xwdt/xwfb/wyly/202205/t20220505_12433424.htm.
- [18] 潘志平.Nation及“国族一体”论[J].新疆社会科学,2018(3):61-69+157.
- [19] 欧可平,梁平.“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8:232-300.
- [20] 许良国.台湾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1-12.
- [21] 肖通.论清代台湾在社会转型前后的变化[J].现代台湾研究,2010(3):51-55.
- [22] 潘云东.清代台湾平埔族汉化原因试探[J].台湾研究集刊,1988(3):71-76.
- [23] 叶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伟大的历史的民族”论述析论——兼谈其对新时代认识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启示[J].学术界,2018(10):83-94.

- [24] 方锦程. “住民自决论”在岛内的散播及其活动 [J]. 台湾周刊, 2019 (9): 14-15.
- [25] 周志怀. 台湾研究优秀成果获奖论文汇编 (2010 卷) [G].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90-98.
- [26] 李立. 台湾政党政治发展史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159-160.
- [27] 民进党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台独党”的? [EB/OL]. (2008-03-24) [2022-10-16]. https://news.ifeng.com/special/TWDemocracy2/doc/200803/0324_3063_457202_2.shtml.
- [28] “台湾前途决议文” [EB/OL]. (2001-11-01) [2022-10-16]. http://www.taiwan.cn/wxzl/stcs/mc/200111/t20011101_50347.htm.
- [29] 刘红. 台湾“国家认同”问题概论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74-76.
- [30] 王英津. 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研究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6: 374-395.
- [31] 季烨. 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修订述评 [J]. 台海研究, 2018 (3): 56-66.
- [32] 王莹. 公投制宪与民族自决——驳“台独”谬论 [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5): 46-48.
- [33] 许川. 试析分离主义视角下的苏格兰公投——兼论台湾地区“独立公投”的非法性 [J]. 台湾研究, 2019 (2): 50-59.
- [34] 廉思, 孙国华. 民族自决权实现方式的法理研究——以全民公决制度为对象的分析 [J]. 政治学研究, 2008 (3): 33-40.
- [35] 王英津. 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发展创新与时代意义 [J]. 台海研究, 2022 (1): 1-13.
- [36] 肖杨, 严安林. “台独”分裂势力的“住民自决论”批判 [J]. 台湾研究, 2022 (2): 21-31.
- [37] 王惠岩. 政治学原理 [M]. 修订版.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195.
- [38] 吴二华. “台独”分子的梦醒时分——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失败的警示 [J]. 两岸关系, 2018 (1): 57-58.

责任编辑: 林华山



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动向、风险与应对

张梦¹ 罗昕²

(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2.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在世界政治权力再分配的竞争舞台上, 西方国家试图利用前沿信息技术在国际舆论这一全球性力量方面占据主动。2019 年以来, 西方对中国展开了计算宣传的集中攻势, 针对中国的计算宣传行动明显增多, 传播主体和运作方式更加多元, 诬称中国运用计算宣传改变全球权力格局。西方涉华计算宣传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在个人层面挑战公众话语权, 影响公众感知信息环境; 在社会层面煽动仇恨言论, 触发网络民族主义行为; 在国家层面强化信息地缘政治, 威胁国家政治安全。我国应将计算宣传的应对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全球网络治理战略中, 提升计算宣传预警和分析水平, 协同各主体参与全球治理, 建构完善的国家话语和叙事体系, 提升公众媒介素养。未来, 我国仍需要实时监测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新动向, 防范新风险, 不断探寻有效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计算宣传; 舆论操纵; 国家安全; 信息地缘政治; 社交机器人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2-0115-10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2.010

作者简介: 张梦,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罗昕,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竞争格局与中国进路研究”(18AXW008)

引用格式: 张梦, 罗昕. 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动向、风险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115-124.

人工智能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 21 世纪的世界数字信息生态发生了巨变,公众舆论在国际关系和信息生态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在西方语境中,“宣传”这一构造他人思想的武器,在塑造和影响舆论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事实上,每一次新的公共传播媒介诞生及发展都催生了新的宣传浪潮,书写着宣传的演变史。人工智能时代,西方世界的计算宣传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自动化代理人和大数据,在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公投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崭露头角。201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使计算宣传迅速获得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在推出约两个月后,1 月已达到 1 亿月活跃用户,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程序。ChatGPT 不仅是新一代聊天机器人的突破,也将为信息产业带来巨大变革,但由此带来的学术造假、技术滥用、舆论安全等风险亦不容忽视。如今,西方政府和媒体将这种旨在有组织地操纵公共舆论的新型宣传方式瞄准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和敏感议题上制造涉华负面舆情,给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安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新动向

从 2019 年开始,为了配合美国不断升级的对华遏制,西方国家和媒体开始频繁且多样化地针对中国开展计算宣传,并倒打一耙,不断“挖掘”中国使用计算宣传的所谓证据。

(一) 针对中国的计算宣传行动明显增多

西方计算宣传的运作机制是“瞄准争议性议题制造社会冲突和分歧,通过算法技术快速传播政治模因,利用中介化的社交媒体塑造注意力中心”^[1]。2018 年,牛津大学学者的研究显示,Twitter 上存在针对中国的计算宣传,中国学术界首次意识到西方计算宣传给中国带来的危机。过去 3 年,在香港修例风波、中美贸易谈判、2020 年美国大选等一系列议题中,西方针对中国开展的计算宣传行动明显增多。例如,2020 年美国大选期间,社交机器人涉华推文利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候选人对华政策分歧制造极化舆论,诬称拜登“忠诚”于中国、“伤害”美国^[2],将所谓“中国威胁论”炒作为美国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工具。2020 年部分国际企业和媒体大肆炒作“新疆棉花”事件。《纽约时报》发文声称,新疆的“棉花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Twitter 上的社交机器人对该报的涉疆报道进行了“两级传播”:一级传播流是将专业媒体机构生产的新闻报道引入社交媒体,二级传播流是促使人们在社交媒体点赞、评论和转发,由此将该报道影响力无限扩大。社交机器人在一级传播流中更加活跃,在二级传播流中更喜欢发布可能引发争议和具有煽动性的内容,形成特定问题上的舆论操纵者^[3]。

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为国家行为体提供了重构全球权力格局的空间。健康和科学争议被西方国家行为体政治化,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在社交媒体发起信息运动以操纵国际关系和政治,形成“信息疫情”。国内外学者发现了诸多以社交媒体为平台传播“中国病毒论”“中国阴谋论”“中国赔偿论”等话题的计算宣传案例。澳大利亚研究所责任技术中心研究人员分析了 2020 年 3 月份 10 天内 260 万条推文中的 2 550 多万次转发数据,跟踪关于 COVID-19 虚假信息的系统性传播。研究发现,“新冠病毒是中国一手策划的”这一谎言得到了美国总统及其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关于“中国

将该病毒设计为生物武器”的阴谋论,是由亲特朗普人士、QAnon 或共和党人操纵的社交机器人发起的一场针对中国的协调一致的造势运动^[4]。另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推特上关于所谓“中国共产党故意制造病毒”的推文,几乎由美国的保守派单方面主导,围绕这一阴谋论的计算宣传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负面情绪^[5]。

(二) 涉华计算宣传的传播主体和运作方式更加多元

西方涉华计算宣传在传播主体和运作方式上有了新的变化。在早期西方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计算宣传案例中,西方政府机构和政党、政客是主要参与者。而近两年计算宣传行动的主体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特点:政府和政党是主导者,媒体、商业公司、社会组织和意见领袖协同宣传。长期致力于研究计算宣传的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OII)将当前计算宣传活动中常见的传播主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政府机构,通常与媒体、互联网管理部门、军方、警方协同工作,制造热门话题和趋势;第二类是政党或政客,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压制政治参与和贬低对手来操纵数字化竞选活动;第三类是商业公司,他们与政治行为主体合作,签订商业合同,从中赚取巨大利润;第四类是社会组织和意见领袖,其中不乏各类民间机构、青年亚文化团体、黑客、边缘弱势群体、网红和志愿者等^[6]。

与此同时,西方开展计算宣传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一是传播介质丰富,社交机器人具有多种不同类型,包括旨在压制目标信息、渠道或声音的阻尼器机器人,寻求扩大互动或关注互联网上特定信息的放大器机器人,帮助数据收集、维护 and 数据分析过程的服务机器人,以及使用社交媒体来吸引人们关注政府中政治行为者行为的透明机器人^[7]。二是不再一味追求隐蔽的传播渠道来掩饰其在道德和法律上的“污点”,开始利用搜索引擎优化(SEO)为自己披上“商业广告”的外衣。社交媒体与搜索引擎的结合能够使计算宣传在短时间内滋生蔓延。通过海量传播和付费广告等手段,计算宣传的运营主体可以让用户通过关键词搜索接触到其创建的“垃圾网站”及其推送的信息,包括阴谋论和虚假信息^[8]。相关研究证实了搜索引擎及其优化过程在引导流量流向有关 COVID-19 的垃圾新闻和虚假信息方面具有非常高效的作用。这些网站可以通过数字广告将流量变现,提高它们的在线声誉和知名度^[9]。三是新增了图文和视频化运作的传播内容。2019 年,伍利和霍华德曾将社交机器人定义为“为执行简单、重复、通常基于文本的任务而创建的软件程序或代理”^{[7] 3-18}。而当下的计算宣传不局限于单一模态的文字文本,而是拓展到图文、表情包、视频等形式。尤其是 YouTube、Netflix、TikTok 等热门视频平台上具有视觉特征的数字内容,更容易成为计算宣传捕猎的对象。这些视频内容能够更全面地刺激人类的认知系统,诱发更强大的情绪反应,实现注意力最大化,增加受众覆盖面和参与度,进而“与计算宣传的深度伪造趋势一拍即合,同时又使得计算宣传更不易被观测到,增加了主流舆论演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10]。

(三) 诬称中国运用计算宣传改变全球权力格局

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 2018 年的报告指出,没有发现中国政府运用计算宣传的痕迹。然而,近 3 年来,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中国计算宣传”研究热潮,试图“证明”中国开展了计算宣传的文章急剧增多,指责中国政府利用计算宣传影响国际舆论。一方面,西方国家一直认为中国具有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来开发和推广适合进行对外宣传的媒体平台,以便促进自动化宣传快速发展。萨曼莎·布拉德肖和菲利普·霍华德列出了一份全球网络部队能力清单,认为中国、以色列、阿联酋和

美国具备用于开展国际信息战和心理战的团队和预算，愿意在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拥有复杂和各种各样的技术^[11]。国际版抖音 TikTok 在国外大受欢迎后，西方政府和政客对此产生危机感，一度试图封禁 TikTok。一些西方学者利用 TikTok 大做文章，企图证明中国生产具有视觉特征的数字内容来达到宣传目的，但最后却得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结论，即“在与政府有关的账户传播的内容中，宣传一直只占不到一半”^[12]。

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学者始终怀疑中国具有通过计算宣传操纵国际舆论的意图，同时片面地将“亲中国”标签视作中国政府使用计算宣传的证据，指责中国影响国际社会在各大事件中对中国的看法。这种主观臆想的目的是制造信息运动，提升软实力，改变全球权力格局。例如，Facebook 和 Twitter 仅仅基于意识形态将外国影响力活动归因于七个国家——中国、印度、伊朗、巴基斯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13]，而完全无视西方国家对计算宣传的大规模运用。有学者研究了 Twitter 上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相关信息，将凡是传播有利于中国的叙事账户标记为“亲中国”的自动化账户，得出了“亲中国的群体似乎比中立的群体多发了 35 到 115 倍的推特”^[14]的歪曲结论，进而指责中国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关于新冠疫情的虚假信息，并将之视作全球信息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方面反映出社交机器人已经成为现代信息战争的工具，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在人工智能时代进一步加剧，也从侧面反映出关于计算宣传的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国际话语权博弈中的新工具。

二、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潜在风险

西方计算宣传给我国带来了各种层面的风险：挑战了公众的话语权，污染信息环境；网络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引发社会层面的仇恨言论和攻击行为；加剧国家之间冲突性的信息地缘政治格局，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一）个人层面：挑战公众话语权，影响公众感知信息环境

随着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和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计算宣传在全球政治传播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计算宣传是故意的、有预谋的，而不是偶然的，它试图在特定受众中创造某种状态，包括塑造感知、操纵认知，以及直接触发相关行为。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社交机器人生产各种“虚假信息、玩弄标签、制造趋势、放大特定内容，并同时启动伪草根运动”^[15]。这些精心策划和传播的具有政治宣传目的的信息，影响用户感知信息环境，改变公众的政治认知、态度和行为，在重大国际事件和国家民主政治中制造虚假的舆论气候和舆论生态。通过影响信息环境，计算宣传不仅让不受欢迎的意见在社交媒体对话中显得更受欢迎，还使公众保持沉默或形成分裂。因此，这种数字虚假信息的产生和运作是一场巨大的“公共传播危机”，它干扰公共领域的真相和透明度，破坏公众对媒体、公共机构和科学的信任，挑战公众的话语权。

美国公共关系研究院的社会虚假信息报告显示，63% 的美国人认为虚假和错误信息是社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可以与枪支暴力（63%）和恐怖主义（66%）不相上下^[16]。虚假信息的大肆传播，已严重影响当前的信息环境，成为影响公众认知的最大障碍。在西方涉华计算宣传中，最明显的舆论操

纵方式是传播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新冠疫情破坏了全球政治气候的稳定, 世界不得不面临一系列全球政治问题。这些问题中最明显的是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假新闻现象。西方涉华计算宣传加剧了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的流行。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将抹黑和攻击中国作为其内部政治斗争的砝码, 以及巩固本国在全球权力地位的工具。他们否定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成绩和贡献, 利用计算宣传在病毒来源、疫情信息公开、疫苗生产、国际合作与责任等问题上塑造不利于中国的信息环境, 影响世界公众的认知。相关研究证实, 在新冠疫情流行的各个阶段, 社交机器人试图干预公众对疫情的认知, 推特上 11.63% 与疫情相关的内容由社交机器人发布^[17]。计算宣传建构的信息环境, 使世界各地的公众无法及时获得有关安全与健康的真实信息, 引发信息疫情和政治焦虑。充斥中国负面信息的“茧房”, 不仅会压制西方公众的个人话语权, 影响其对中国的态度, 还会误导不明真相的中国公众, 破坏国内秩序稳定, 带来公共传播危机。

（二）社会层面：煽动仇恨言论，触发网络民族主义行为

一般而言, 互联网上的仇恨言论往往根植于现实世界的社会分歧, 但如今它也可能由计算宣传利用“喷子”和社交机器人凭空制造。根据罗伯特·戈瓦的说法, “喷子”(trolls)最初被定义为“那些故意引诱人们引起情绪反应的人”, 然而, 在过去十年里, 这个词成为仇恨言论和骚扰的代名词, 并演变成越来越有组织甚至制度化的活动^[18]。在计算宣传的相关研究中, 喷子通常是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目标群体和社区开展仇恨言论和在线骚扰的人”^[19]。起初, 这些专业或半专业的“喷子”通常被用来传播对政治家、记者和学者的贬损幽默或诽谤性言语攻击, 例如仇恨言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 逐渐形成了“喷子农场”或“喷子军队”。随着社交机器人的出现, “喷子”正在转变为自动化叙事创作者。他们设计故事、编纂仇恨言论并输入社交机器人网络, 进而开展更高效的计算宣传活动。社交机器人和“喷子军队”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网上传播激进的观点和“另类真理”。由此可见, 计算宣传已成为破坏社会民主、煽动民族仇恨、制造阴谋论的工具。

西方涉华计算宣传围绕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刻意制造中西方对立, 将寻求对话的中西方关系转向对抗, 导致政治极化。处于社交媒体“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中的公众被计算宣传刻意放大的种族和国际冲突所误导, 可能会表现出极端、狂热、偏执的一面, 发表仇恨言论, 激发国内和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有关计算宣传案例显示, 西方国家凭借其全球传播的主导地位引发亚洲其他国家中国的对立情绪, 触发群体极化, 煽动仇恨言论和针对中国公民以及华人华侨的仇恨行为。一项研究描述了 Twitter 上美国和菲律宾关于新冠疫情的对话特征, 评估仇恨言论和机器人驱动活动之间的联系, 发现机器人活动与更高的仇恨有关, 尤其是在人口更密集、与他人更隔离的社区^[20]。日本学者证实了计算宣传是安倍领导下自民党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 右翼分子利用社交媒体和计算宣传, 煽动种族主义情绪。他们在 Twitter 上操纵了一支庞大的机器人网络军队, 推动民族主义议程, 体现出明显的反韩、反华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意识形态^[21]。令人担忧的是, 这种基于网络民族主义的仇恨言论正在上升为针对人身攻击行为。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 针对华人或亚裔人士的种族主义攻击在澳大利亚呈急剧上升势头。澳大利亚“人均水平(Per Capita)”智库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81% 的受访者经历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攻击, 而 61% 的事件包括种族主义辱骂。该智库研究员奥斯曼德·邱表示, 种族主义事件激增, 华人社区普遍对此有感觉。

（三）国家层面：强化信息地缘政治，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算法传播范式赋予主权国家以更大的权力实施信息传播控制。算法技术强国在国际传播中能够置身于由中心观察四周的全景敞视空间，从而继续主导信息地缘政治格局^[22]。面对日益复杂的信息地缘政治格局，世界各国将算法技术视作国家之间进行战略竞争的重要力量，以提升自身软实力。软实力是一个国家说服和吸引其他政治行为体的能力，国家行为体可以通过这种能力来实现自身在世界政治中希望的结果，即让其政治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得到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可。新闻媒体的报道、文化产业的输出等是国家行为体获取软实力的传统方式。算法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为软实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其与公众强大的互动性能帮助国家行为体在更广泛的层面实现软实力战略。互联网政治化和计算宣传带来的新范式正在改变国家行为体在国内和国际运作软实力的方式。西方国家开始将计算宣传纳入其软实力战略，以此增强软实力、抢占信息权。计算宣传成为一种战略叙事方式。政治行动者利用战略叙事增强软实力，将故事投射给观众，试图说服他们；计算宣传通过劫持叙事被投射的平台，从根本上加强了这一投射过程，间接地充当了软实力的增强器^[23]。

计算宣传的出现使全球信息地缘政治格局更加复杂，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更加困难，也破坏了国家战略竞争的平衡性。西方计算宣传围绕敏感议题操纵国际舆论的运作机制，更容易实现高效的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进行政治干涉。此外，计算宣传难以防范，目前我国还没有成熟的技术来快速、准确地识别和监控网络上的计算宣传，一旦受到计算宣传攻击就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政治安全是国家的核心安全，西方涉华计算宣传对我国的政治干涉是对我国网络主权的侵犯。网络主权是我国基于国家主权对我国境内的网络设施、网络行为以及相关网络数据和信息等享有的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西方涉华计算宣传利用海量的网络数据传播虚假负面信息，操纵国际舆论，是在推动隐蔽的信息殖民主义，对中国政治安全、政权安全造成了威胁。同时，西方涉华计算宣传背离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是国际组织、主权国家、商业公司和公民等多种行为体为应对网络空间的共同问题、维护共同利益而开展的协商性合作。“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治理参与的公平性以及治理目标的公共性，基于人工智能的国家隐形政治宣传，无形中加剧了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削弱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24]，进而推动信息地缘政治格局走向更加冲突和不平衡的局面。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

我国应将计算宣传的应对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全球网络治理战略中。这要求我们优化各环节要素，在本土和全球层面发展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建构系统性治理框架。

（一）提升计算宣传预警和分析水平

人工智能是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核心领域。我国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力争到 2030 年实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世界。目前，我国在人脸识别、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应用产业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功，但整体性竞争优势有待提升，尤其是在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涉华计算宣传，我国需要在人工智能技术上寻求突破，以高效、尖端的技术研

发手段和完善、长效的技术管理机制, 形成应对涉华计算宣传的完善体系。其一, 运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建立计算宣传监测网络, 对境外势力企图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开展的计算宣传及时检测、预判和跟踪, 防止境外虚假新闻“内流”引发社会焦虑或“扩散”引发国际社会误解。其二, 及时剖析涉华计算宣传案例的发生机制, 包括为谁宣传、为什么宣传、如何宣传、下一步动向等, 深刻揭露西方国家操纵国际舆论的政治目的, 防止涉华计算宣传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三, 打通区域和行业壁垒, 加强国内外学界和业界的合作, 促使国内外有更多的学界、业界人员能识别、监测和分析计算宣传, 不断提升涉华计算宣传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水平。

（二）协同各主体参与全球治理

计算宣传无孔不入、难以防范, 且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应协同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多方力量参与治理。就参与主体而言, 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应对需要“两步走”。对内“需要建立由多个相关部门组成的治理战线, 如将外交、国防、法律等部门结合起来, 将学术界与智库吸纳进来, 联合应对社交媒体平台上针对中国的计算宣传攻击”^[25], 形成以政府为主导, 互联网企业、媒体和公民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网络。对外发挥联合国、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全球性、区域性组织的调节与整合作用, 积极发起和响应各类应对计算宣传的有益行动, 建构对话性的、共识性的计算宣传全球治理平台。此外, 由于计算宣传发轫于社交媒体, 而西方国家掌握着推特、脸书等世界主流社交媒体的主导权, 因此设法促进全世界达成计算宣传治理的共识非常重要, 有必要让社交媒体公司对更严格的数据收集法律负责, 并在识别和删除虚假账户方面保持警惕。同时, 虽然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政客是当前计算宣传的主导者, 但西方国家为避免遭到计算宣传的攻击, 也强调计算宣传的法律应对和平台责任。例如, 欧盟于 2019 年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再监管条例》(GDPR), 规范了用户数据的收集、存储、转移和使用; 美国反机器人行为准则 (ABCC) 则是由政府代表和公民共同讨论制定的应对机器人风险的政策和法规。

（三）建构完善的国家话语和叙事体系

2020年, 美国将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等在内的9家中国主流媒体列为“外交使团”, 对中国驻美媒体和记者进行歧视和政治打压, 损害中国媒体的声誉和形象, 干扰中国媒体正常运转。2021年, 英国以存在“政治属性”为由撤销CGTN在英国播出执照。Twitter在2019年和2020年多次将香港修例风波等事件中公众发布的真实信息视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而强制删除。这些都表明, 媒体是操纵国际舆论的“命门”。长期以来, 西方国家在全球传播中占据主动权, 这也是西方开展涉华计算宣传的有力武器。虽然计算宣传通常发生在社交媒体, 但社交机器人仍会大量转发传统主流媒体报道。而社交媒体平台凭借其超强的服务和链接能力正在走向基础设施化, 深刻塑造社会公众的生活和交往方式, 也对传播、经济甚至是政治权力结构造成改变。因此, 我们需要建构一个由多种媒体话语主体构成的国家话语体系, 强化我国媒体的对内和对外传播能力, 以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的舆论操纵。我国媒体在报道计算宣传中的争议话题时, 要特别注意国内舆论场和国际舆论场的衔接, 避免“失声”和“失衡”。我国要对内及时传播真实信息, 消除疑虑, 破解谣言, 维护社会稳定; 对外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发挥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等多元化主体的协同作用, 平衡各方新闻来源和观点, 及时回应国际社会上出现的虚假错误舆论, 不被西方国家和媒体制造的竞争性“真相”牵着鼻子走^[26]。

（四）提升公众媒介素养

西方计算宣传主要基于算法技术的“趋势”“过滤”和“推荐”三种基本形式来实现舆论操纵^[27]。其实质是信息的选择、安排和呈现，也即信息的“把关”过程。把关曾经被定义为新闻编辑工作者独有的活动，即通过有目的的安排和突出一些信息来决定新闻的生产和呈现过程。虽然传统媒体的把关也会影响到社交机器人传播的内容，但计算宣传更直接地受到算法把关和用户把关的影响。计算宣传所依赖的算法会为社交媒体选择特定的热门话题和标签进行放大和推送，并过滤掉不符合宣传目的的信息，而“普通用户在社交媒体分享和放大信息时充当次要看门人，参与了一个流动的网络守门过程”^[28]。一旦计算宣传掌控了算法的把关过程，或者用户相信了计算宣传的内容，将虚假信息进行大范围的点赞、评论、转发，那么用户的“二次守门人”角色就失去了意义，转而成为计算宣传的推手。由此可见，对于西方涉华计算宣传而言，我国需要加强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提升我国公众的媒介素养，使公众具备理解计算宣传的生产逻辑、防范计算宣传塑造的认知偏差、批判计算宣传带来的负面影响等能力。我国要不断提升公众的批判性数字生存技能，使公众扮演好社交媒体平台“二次守门人”的角色，通过用户自身的把关消解西方计算宣传的活跃水平。

四、结语

计算宣传是传统宣传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产物，也是改变信息地缘政治的新工具。计算宣传早期被用于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随着美国对华遏制、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的发生，西方国家将计算宣传的矛头对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西方计算宣传的传播主体和运作方式更加多元，利用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传播图片、视频等更具有视觉冲击性和互动性的信息。逐渐增多的西方涉华计算宣传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负面情绪，污蔑中国利用计算宣传改变全球权力格局。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给中国带来了诸多风险，对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形成隐患。西方涉华计算宣传导致中西方关系更加紧张，西方公众出现了针对中国的仇恨和种族主义言论以及针对华人华侨的人身攻击等。全球信息地缘政治格局在计算宣传的运作下变得更加隐形复杂。

对此，我国需要从国内和全球两个维度，建构一个高效的应对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机制，以巩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竞争力。要进一步提升计算宣传预警和分析水平，推动各国政府、企业、国际组织、公众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强化我国媒体的对内和对外传播能力，提升我国公众的算法素养，同时推动全球达成计算宣传的治理共识。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产生源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注定是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的信息霸权。虽然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探索计算宣传的应对方式，但新的宣传机器及其计算工具将继续存在。未来，我国仍需要实时监测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新动向，防范新风险，不断探寻有效的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 [1] 罗昕，张梦．西方计算宣传的运作机制与全球治理[J]．新闻记者，2019（10）：63-72．

张梦, 罗昕. 西方涉华计算宣传的动向、风险与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115-124.

- [2] 相德宝, 韦向洁. 美国大选涉华计算宣传的道德基础研究 [J]. 情报杂志, 2022 (3): 108-113.
- [3] Na Han et al. Information Diffusion Model of Social Bots: An Analysis of the Spread of Coverage of China Issues by The New York Times on Twitter [J]. Hindawi Complexity, 2022 (2): 1-9.
- [4] Peter Lewis. Pro-Trump Accounts Coordinated Spread of China Bio-weapon COVID Conspiracy [EB/OL]. (2020-06-10) [2023-02-09]. <https://www.Centreforresponsibletechnology.org.au/pro-trump-accounts-coordinated-spread-of-china-bio-weapon-covid-conspiracy-theory>.
- [5] Nicholas Havey. Partisan public health: How does political ideology influence support for COVID-19 related misinformation? [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2020 (3): 319-342.
- [6]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 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 [R/OL]. (2021-01-13) [2023-02-10]. <https://demotech.oii.ox.ac.uk/wp-content/uploads/sites/12/2021/02/CyberTroop-Report20-Draft9.pdf>.
- [7] DUBOIS, Elizabeth, McKELVEY, Etc. Political Parties,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n Social Media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75-79.
- [8] 史安斌, 杨晨曦. 信息疫情中的计算宣传: 现状、机制与成因 [J]. 青年记者, 2021 (5): 93-96.
- [9] Emily Taylor et al. Follow the Money: How the Online Advertising Ecosystem Funds COVID-19 Junk News and Disinformation,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ion [R/OL]. (2020-08-03) [2023-02-10]. <https://demotech.oii.ox.ac.uk/wp-content/uploads/sites/12/2020/08/Follow-the-Money-3-Aug.pdf>.
- [10] 邹军, 刘敏. 全球计算宣传的趋势、影响及治理路径 [J]. 现代传播, 2022 (6): 28-36.
- [11] Samantha Bradshaw, Philip N. Howard. Challenging Truth and Trust: A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Research Project, University of Oxford [R/OL]. (2018-07-20) [2023-02-11]. <https://comprop.oii.ox.ac.uk/wp-content/uploads/sites/93/2018/07/ct2018.pdf>.
- [12] Yingdan Lu, Jennifer Pan. The Pervasive Presence of Chinese Government Content on Douyin Trending Videos [J].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2 (1): 68-97.
- [13] Samantha Bradshaw, Philip N. Howard. The Global Disinformation Order: 2019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sed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R/OL]. (2019-09) [2023-02-12]. <https://digitalcommons.un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09&context=scholcom>.
- [14] Chang, Lai, et al. Detecting Propaganda on the Sentence Level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B/OL]. (2020-07) [2023-02-07]. <https://arxiv.org/ftp/arxiv/papers/2108/2108.12269.pdf>.
- [15] 罗昕. 计算宣传: 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舆论新形态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 (15): 2

5-37.

- [16] Soroush Vosoughi, Deb Roy, Sinan Aral.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J]. Science, 2018 (3): 1146-1151.
- [17] 师文, 陈昌凤. 议题凸显与关联构建: Twitter社交机器人对新冠疫情讨论的建构[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10): 50-57.
- [18] Al.I.Cuza. The Propaganda Machine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J]. Journal of the Seminar of Discursive Logic, 2020 (2): 117-138.
- [19] Holly Schnader. The evolution of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Trends, threats, and implications now and in the future [D/OL]. (2018-12) [2023-02-10].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223058974.pdf>.
- [20] Joshua Uyheng, Kathleen M. Carley. Bots and online hat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a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J].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2020 (3): 445-468.
- [21] Fabian Schäfer. Japan's Shift to the Right: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Abe Shinzō's LDP, and Internet Right-Wingers (Netto Uyo) [J].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2022 (2): 1-18.
- [22] 罗昕, 张梦. 算法传播的信息地缘政治与全球风险治理 [J]. 现代传播, 2020 (7): 68-72.
- [23] Sarp Duyar. Of Algorithms and Autocrat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Exploitation for Soft Power During Covid-19 Crisis, Lund University[D/OL]. (2018-12) [2023-02-10]. <https://lup.lub.lu.se/luur/download?func=downloadFile&recordId=9011273&fileId=9011275>.
- [24] 韩娜, 虞文梁. 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计算政治宣传: 运行特征、风险识别与治理路径 [J]. 公安学研究, 2020 (6): 1-23.
- [25] 赵永华, 窦书棋. 信息战视角下国际假新闻的历史嬗变: 技术与宣传的合奏 [J]. 现代传播, 2022 (3): 58-66.
- [26] 涂凌波, 田欣荷.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 表现、原因及影响 [J]. 当代世界, 2020 (11): 57-64.
- [27] 罗昕, 张梦. 西方计算宣传的运作机制与全球治理 [J]. 新闻记者, 2019 (10): 63-72.
- [28] Efrat Nechushtaia, Seth C. Lewisb. What kind of news gatekeepers do we want machines to be? Filter bubbles, fragmentation, and the normative dimensions of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s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9 (90): 298-307.

责任编辑: 龚静阳



算法权力与未来民主： 数字技术的政治效应及其规制

——基于《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的考察

曹克亮

（中国计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英国学者杰米·萨斯坎德《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一书围绕算法力量对所涉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自由、民主、正义等议题进行了细微的未来政治史考察。本文对数字技术的政治效应及其规制问题开展了研究性书评。算法政治不再是左右选举、操控舆论这么简单，一定程度上还在改变着未来的民主形式。算法作为一种机器公式和语言，正在塑造代码化的法律和数字新型权力的底层逻辑。代码语言与权力表达的融合造就新型权力政治的武力数字化、私有化、自动化，一个从技术奇点到政治奇点的新型权力配置机制正在形成。算法和数字系统的新型权力机制成为自我指导、自我维持、自我独立的存在。西方社会的网络协商民主、区块链直接民主、开源维基民主、大数据民主、人工智能民主等数字民主形式已经呈现出异化风险。加强对数字技术负面政治效应的规制，必须谨防数字滥用和算法霸权，回归政治民主的“人本主义”立足点。根本而言，“数字民主”与“算法政治”仅仅是技术政治学维度的合理想象，真正民主的现实基础依然需要遵循普遍的人类政治价值述求和技术伦理规范。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用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2.011

作者简介：曹克亮，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计量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基金项目：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浙江工匠精神研究”（21WH70077ZD）；浙江文化工程重点项目“浙江铸剑工匠与工匠精神研究”（21WH70077-7Z）

引用格式：曹克亮. 算法权力与未来民主：数字技术的政治效应及其规制——基于《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的考察[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125-136.

好制度优势，进一步使技术正向赋能民主实践和治理效能。

关键词：杰米·萨斯坎德；算法权力；代码法；数字民主；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2-0125-12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着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和内容，形塑着作为共同生活准则与运行机制的政治实践主题和方式。当下，人类集体生活在多大范围和多深程度形成政治议题，已经从取决于国家和政治转向受功能强大的公—私数字系统的指引和影响。这一议题既是公众技术政治学的核心议题，也是个体生命政治学数字转向必然要面对的议题。算法政治（Algorithmic Politics）是这一转向的最前沿领域和最大变量。算法不仅左右选举、操控舆论，或许还能改变未来民主的实现形式。算法也正从技术角度调整传统古典民主和竞争性精英主义政治形式，进而引领政治民主走向未来数字民主形式的“百家宴”——网络协商民主、区块链直接民主、开源维基民主、大数据民主、人工智能民主等形式。这些民主形式是基于数字技术和算法力量的想象。但不可否认，算法技术正在改变公众议题的参与形式，在政治民主视域内算法与权力、数字和民主确实具有天然耦合的“孪生兄弟”式关系。

有关算法对政治及权力的影响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深刻剖析。高奇琦、张鹏对算法权力和算法民主进行民主平衡研究时认为，“算法技术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引发了算法民粹主义”^[1]。段伟文认为，深度智能化时代“计算理性”和“量化社会”观念大行其道，导致了机器役使和社会驯化的困境。“当前数据驱动的算法认知的观念源于科学革命以来现代性建构进程中对‘计算理性’和‘量化社会’的追寻，它正在从根本上决定着深度智能化时代的伦理与政治结构。”^[2]张爱军、孙玉寻认为算法对社会主体的权力权重构成博弈风险，认为“算法的主体性权力特征构成了国家能力主体博弈风险的生成基础，表现为国家与资本对算法的社会控制能力博弈，国家与公众的算法意识形态能力博弈两种风险样态”^[3]。T·布赫就算法媒体环境中的权力和政治进行描述时指出：“算法不仅具有权力和政治；它们有助于在世界上产生某种形式的行为和认知。在处理、分类、排序和排名数据时，算法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有助于使世界以某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出现。”^[4]C·斯科维尔在研究气候变化中的算法守恒问题时指出：“人工智能在保护中日益普遍的作用有可能引发道德困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重新分配权力，并促成新的知识对象和政治斗争的出现。”^[5]尤瓦尔·赫拉利对脸书的人类社群愿景（目前是元宇宙愿景）进行评价时指出：“如果成功，后续可能出现更多这样的尝试，算法也将成为人类社交网络新的大师；如果失败，则会揭示新科技目前的局限：算法或许已经可以驾驶汽车、可以治病，但碰上社会问题的时候，还要靠政治人物和宗教人士。”^[6]

英国学者杰米·萨斯坎德《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一书围绕算法力量对所涉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自由、民主、正义等议题进行了细微的未来政治史考察。这些考察紧密围绕数字生活世界所发生的“日益强大的系统、日益综合的技术、日益量化的社会”三元背景展开，全面呈现了一项未来政治学技术路线的发展轨迹。杰米·萨斯坎德从民主的概念史挖掘出发，将传统古典自由民主、现代竞争性精英主义民主、互联网后的民主形式进行了连贯和对比研究。他指出，西方社

会基于自治的早期民主基本形态——协商民主, 正在遭受来自算法技术感知控制、碎片化现实操控、在线匿名干扰、自动机器人威胁等诸多困境。

二、代码与权力: 代码就是力量

语言既可以作为知识传递的媒介, 也可以作为权力运作的媒介。代码作为一种机器语言正在实现知识与权力的深度融合表达。作为代码语言运行的权力模式消除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这是技术影响和改造人类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必然结果。代码即权力表明, 一个从技术奇点到政治奇点转变的新型权力配置机制正在形成。

(一) 代码语言与权力表达的融合

权力是一种力量, 它是一方对另一方施加影响的力量。在行动上谈论权力, 权力可以理解为“对某人具有控制权”和“有权力做某事”。前者可以理解为控制权, 后者可以理解为行动权。控制权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 行动权则是一种随心所欲式的自由能力。权力的实施大多通过语言展开, 这与代码(一种机器语言)一样, 即知识和语言构成某种权力的媒介。“人类的知识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 这些知识与人类技术、实践和解放的兴趣密切相关; 这些兴趣主要源自人类的劳动、言语交际和权力关系。”^[7]显然, 语言既是知识传递的媒介, 也是权力构型的媒介。但是, 人类语言与机器语言的区别在于, 人类语言的表达有时是含混指令, 其语义、语速、语境动态可变。因此, 语言指令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代码(机器语言)则消除了这种灰色地带和不确定性, 它生产的均是明确的指令和即刻的裁决。这种指令不仅存在于虚拟世界, 也潜在影响着现实世界。

“代码技术不仅是虚拟世界中的‘法律’, 也正在成为现实世界中潜在的‘规制者’。在‘规制’逻辑的影响下, 代码技术逐渐具有了‘反自由’属性, 作为人之主体性重要支撑的自由价值逐步被消解与重塑。”^[8]代码技术的“反自由”属性, 是代码即力量的展示。代码语言的权力效果正在扩展甚至超越传统法律语言, 调控着人们对权力的认知观念和生活秩序方式。“因此, 面对调整对象和模式的高度信息化, 传统意义上以文本逻辑为调整规范的法律条文, 必须通过代码的转换才能在信息空间中有效发挥作用。”^[9]但是, 代码与算法不能混淆, 算法最早可以追溯至9世纪波斯数学家阿卜杜拉·花刺子模。“Algorismus”一词是对花刺子模名字的解释, 用来描述推理、计算和处理一切的数学方法。“算法是公式, 代码则是该公式在编程语言中的表达式。大量的代码包含算法, 无论是用于制定政策、学习技能、发现机制和整理数据, 还是预测事件。”^[10]

代码与权力的关系可以通过一个简单实例来解释, 如果被访问的计算机或文件设置了密码, 则必须输入正确的密码口令才可以进行访问, 这是机器和人都无法更改的指令。机器和人对此都没有选择裁量权, 只能遵守。在游戏世界之中, 这种“代码权力”体现得更为明显。“遵从游戏规则者将获得来自游戏的奖赏, 而反对规则者则被这一空间驱逐。在此背景下, 元宇宙空间的政治参与、政治认同已然开始在‘代码权力’的操控下被重塑。”^[11]代码做了类似法律规定所禁止的事情。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认为, 代码即法律。实际上这种表达不太充分, 更准确的表达是代码即权力。“它能让我们去做只有武力、强制、影响力和操作才会让我们就范的事情。而代码还能以更稳定也更广泛的方式来施加影响。这就是代码在未来的政治中扮演如此关键

角色的原因。”^{[10] 65-66}显然，从萨斯坎德到莱斯格都认为代码即权力，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与维贝克的“道德物化”概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其根本一致性来自于技术对人类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影响和塑造。当前，“赛博空间”已经不是所谓的虚拟空间，而是真实的存在。例如，自动驾驶汽车不再是网络世界的构想，而成为现实并趋势性地成为可能的常态。汽车的操控权、自我生命安全权、交通规制遵守权交给了由算法指导的自动驾驶数字系统。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区分已经不再成为阐释今天数字生活的主要方面。

（二）技术奇点与政治奇点：一种新型权力配置机制

随着数字生活的不断延展和扩域，一个由代码和算法组成的数字生活世界——代码帝国左右我们生活的现实性状况会越来越明显和扩大化。代码不仅构成了影响操控的权力，也构成了生活与工作不可逆转和躲避的本质与事实。现在的代码大多由人类编写，随着机器深度学习的不断发展，未来代码则是由机器自主编写。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实现自主编程和算法规则的制订。它将改变代码生成的既有方式和作用发挥方式。“未来，代码将会成为动态的、敏感的和适应性更强的人类行为裁判——能够改规则，也能加强规则。……然而，这就是权力。”^{[10] 67}可见，在不断由算法及其应用主导的未来数字生活中，算法通过机器语言规则重新定义了人类可以做或不可以做某事的决策机制，它的作用机制来源于数字监控、算法对外界事物的感知。今后激活算法的技术将越来越自主化、智能化和具有更高的适应性，能够以一种灵活（可变、可调整）、集中（大规模、不可舍弃）的方式约束人类行为。“因此，某些数字技术将提供一种在数字生活世界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方法，控制此类技术的人将通过他们施加巨大的权力。即使没有特定的人或团体能在给定时间‘掌权’，人类也将不断受制于来自不同方向的权力，人的行为会受到这些权力的约束和引导。”^{[10] 67}

更加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规制与算法操控正在成为新的权力生产要素和主导因子。技术权力置换政治权力机制已经开启，权力流动更为隐蔽、灵活和频繁，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和依赖主体都将发生多重面向的变化。这提醒人们，如果技术公司拥有更充分、更优质的数据，技术公司掌握更先进、更高级、更智能的算法，技术公司或许就可能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配置空间和余地。这是一个技术奇点诱发政治奇点的“奇点时代”。所谓“技术奇点”是指“在当下这个技术呈指数级发展的时代，奇点——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亦被用来指称即将到来的一个事件点，在该事件点之后，‘人类主义’的一切叙事（价值、规则、律令……）都将失去描述性——解释性——规范性效力”^[12]。本文所强调的“政治奇点”则是指大数据、代码、算法等作为一种机器语言，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法律规制权力和政治影响力，它将在某一刻成为一个德勒兹意义上的“事件性”存在。它让传统政治语言的描述性、解释性、规范性效力渐渐隐藏于代码化、数据化、算法化的技术语言之下，虽不被看见但效率至上且效力惊人。代码权力作为一种新型权力，与传统权力表现中的武力、强制、影响力、权威有所不同，产生了类似武力数字化、私有化、自动化问题。其中，它呈现出数字警察式的审查机制、隐私透明化问题和感知控制以及公权力的公司化等特点。

三、权力运行：武力数字化、私有化、自动化

数字法作为数字集成系统中新型权力数字化、私有化、自动化的展开，改变着权力运行的表达

范式。掌握更多数据和更先进算法的平台成为权力掌控和实施的最重要主体之一。算法系统正在扮演“自动法官”角色，超越福柯所言“可见的监视”，演变为隐秘的凝视、善意的规劝和便捷的服务，权力运行正在走向数字“自动主义”。

（一）数字法：一种新型权力数字化、私有化、自动化的展开

传统意义的法律是基于语言的规则。立法者负责给定和解释语言，执法者负责实施。当破坏规则时，法官根据法律语言进行裁决。然而，系统集成性的数字技术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数字法，这是一种全新的权力形式。它规劝、强迫或限制人们的行动，但却不是暴力的形式。从政治角度而言，权力的形塑和运行或多或少有着秘密性甚至暗黑系特质，这也是传统政治术的奇点性质所在。在一定意义上，政治技术的秘密和暗黑系特质甚至可以被描述为语言的奇点。“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一切政治秩序内部，都充满着黑洞。而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共同体根基处那深渊性、黑洞性的奇点。”^[13]法律是应对政治共同体内部和之间可能出现的黑暗奇点问题进行协调的一种语言机制。与传统政治的法律语言不同，数字法具有自身特征。“首先，它将由数字系统实施，而不是由人类实施。其次，它将迫使人类无法违反法律，而非简单地事后惩罚。再次，它将具备适应性，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最后，它可以用代码起草，而非使用自然语言。”^{[10] 69}数字法由数字系统实施，是一种自我执行法。这种自我执行不是从裁决阶段才开始发挥作用，而是从制定开始就显现威力。它或许已经是由完全人类语言法、整体成文法向普遍机器语言法、整体算法法律的真实过渡。在现代社会之前，执法一定程度上由私人或者准私人来完成，比如封建地主、庄园主等。他们拥有自己所管领地的绝对执法权。这算是一种法律的私人化表现。进入现代社会，专门的执法机构——警察、部队、监狱等逐渐出现。

全面数字生活的不断升级促使“数字人”不断走向“数字公民”，人的数字意识、数字拒绝权不断觉醒，理论上权力数字化不会对人本身造成根本性的威胁。事实上，“由于过度追求大数据技术的公共属性与商业价值，公民的数字身体在技术权力的压制下沦为‘数据人’，数据和技术成为‘利维坦’的化身，公民的品格在权力面前消亡。将权力的民主合法性基础转向数字空间，就必须回应技术失范和权力失序问题。只有强化‘数据人’的‘公民’属性，来平衡权利与权力的对应关系，才能捍卫权力之‘公’的来源”^[14]。数字时代的权力运行机制已经打破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形成了“国家—平台—社会”三元结构。平台的加入导致数据公司和平台企业成为信息寡头，权力规训的主体已经不是单一的国家机器，还包括掌握数据和算法的技术权威主体。这种主体变化和重心转移最大的危害在于平台权力的过度膨胀带来严重的个人数字拒绝权难题，且这种权力膨胀和掌控是在资本助推下进行的。毕竟数字平台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人类全部数字生活实际上建立在一片网络数字焦土之上。有学者认为：“被资本主义控制的数字平台和智能算法，让我们的生活世界变成一片数字焦土，在这片数字焦土上的生命变成了无根者。”^[15]这是对数字时代算法权力运行和武力数字化、私有化、自动化激进的揭露，“无根者”如同摇曳的风烛，虽有光亮，但令人担忧和害怕。即使不以数字焦土这样悲观的态度看待数字平台和智能算法，人类也很难逃脱被大数据技术和算法治理还原为“数据—流量”的用户状态。

（二）超越福柯：算法权力的新“技术景观”

福柯的权力理论建立在传统权力规则基本形式之上。传统权力属于监视模式，而数字和算法权

力属于凝视模式。“监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明显的目标性，即主体对客体的压迫性关注。相比之下，凝视的压迫性就会减少许多。凝视产生的动机可能是关心或者爱好。因此，尽管凝视也可能具有权力属性，但从实现机制来看，凝视更多表现为非压迫性的内涵，其权力属性更具有隐蔽性。”^[16]如今，算法系统扮演的是“自动法官”角色，没有法庭、律师，只有无形且不可违背的裁决。这种无形的数据凝视和算法裁决时刻规训着人的行为，改变着权力运行模式，异常顺畅和平滑，且不易令人抗拒。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因其内部代码设定了最高时速限制指令，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超速的。这就是数字法作为自我执行法的权力形式。就数字法的本质而言，它或许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一切违法行为，但能以代码的形式指示数字系统在某些情况下对犯下此类罪行或违法的人进行自动惩罚和制裁。

数字生活世界的法律将逐渐实现法律“代码化”，越来越多的规则被置于代码和算法之中。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权力调控的手段具有机器优势、架构优势、嵌入优势。机器优势体现于算法训练和机器学习，架构优势体现于算法搭建的复杂生态架构对人的行为控制，嵌入优势体现于算法借助资本和公权力直接影响社会权力运行。“概言之，算法提高机器优势争夺人类的决策权力，基于架构优势框定了人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并借助嵌入优势指数级扩张其影响，从而反过来规制、塑造社会运行方式。”^[17]举例来说，“弱形式的代码化法律可被用于诸如土地注册、婚姻注册等手续的办理。如今，如果你没在民事部门登过记，就算没结婚。将来，婚姻状况可能取决于已经在正确的数字登记处输入的内容”^{[10] 77}。或许有人觉得，只是数字系统及其代码对人的行为进行数字化操控，还算不上权力或真正的法律。事实上，在法律以文本形式出现之前，指导人们生活和政治的是习俗，表现形式可能是诗歌和谚语。随着文字和印刷术的出现，关于如何生活的法律逐渐以文字形式出现，法律的数量和复杂性逐渐激增和细化。随着数字生活的不断推进，代码化的法律和权力将是未来法律和权力的主要形式。数字生活中，人们不会违背他们未曾意识到的规则。在一定意义上，违反数字法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违反之前已经被无形禁止。这就是数字法、代码化法律运行的基本形态。不过，并非所有成文法都将被数字法、代码化法律取代，既有的法律形式依然存在，作用依然明显，但是不得不面对数字法律系统掌握人类事务的领域和范围越来越宽、越来越全的事实。对此，人类应批判性接受，这或许就是对待数字法和未来权力运行形式应有之态度。

算法和代码所主导的武力数字化革命必然带来武力私有化的可能威胁。国家不再是使用武力统治的唯一主体。“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研究一般来说是谷歌和 Facebook 等公司的研究机构做出的，而非任何国家政府（甚至大学）。我们假设只要这些公司建立在各个国家之中，并受其法律约束，那么这些技术就可能被要求用作该国执行一国法律的手段。”^{[10] 82}例如，要求将限速规定写入代码程序，让酒后驾驶者无法启动汽车等。武力私有化不仅彰显于法律规则之内，也会被用于平台或物品。平台规则使用的事前协议及其信息获取规则，强制性地规定平台使用者必须用个人信息交换使用权。物品也是一样。例如，“Keurig 公司销售的‘叛徒咖啡机’拒绝煮其他品牌的咖啡豆。这些技术造成的单个限制可能只施加了很小的压力，但其积累的结果会是我们受制于相当大的权力，这些权力来自控制这些技术的主体”^{[10] 83}。武力和权力数字化，是算法政治“技术景观”的一角，越来越智能、自主的权力形式将修正和改造传统的政治权力概念。一种依靠算法和数字的系统新型权力机制将具备自我指导、自我维持、自我独立的存在和运行方式。

四、网络协商民主、区块链直接民主批判

民主一词历史悠久，其进化过程亦曲折多变。就其本质而言，民主是人民行使统治权的集体决策程序和机制。在大数据技术和算法系统宰制下，西方网络协商民主、区块链直接民主等形式正在成为政治利益集团和平台企业精英操控大众、愚弄人民的“后真相政治”和“过滤政治”的牺牲品。

（一）网络协商民主批判

从词根来看，英语的“民主”来自于希腊语 *demokratia*，它由希腊语词根 *demos*（人民）和 *kratos*（统治）结合而成，即人民的统治。从本质上说，民主是一种人民行使统治权的集体决策程序和机制，后来才被西方社会上升为政治统治中的社会理想。传统古典民主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出现在雅典。“雅典的市议会（议会）既是一个统治机构，也是一个有形场所。公民们聚集在那里决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法律、税收、战争与和平等各种问题。……任何雅典公民都可以被选任公职，并且参与公职是有报酬的，因此所有人都能平等地获得参与公职的机会。”^{[10] 171-172}但是，雅典城当时被称为公民的人数大约有 30 000 人，有投票权的只有约 6 000 人。“事实上，只有在雅典出生、年龄超过 20 岁的男子才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这就排除了所有移民、妇女和奴隶——他们的人数加起来是有投票权的公民的十倍。”^{[10] 172}中世纪之后，西方世界人们生活的中心目的变成服从上帝意志，视权力来自天堂而非人间，君主和教皇靠神权统治，而不是靠民意统治。在他们眼中，服从统治不是政治而是信仰使然。之后，古典民主遭遇挫败而逐渐式微。

19 世纪末，民主以自由民主的形式再次回归。但随着政客谎言和权力滥用，西方代议制民主和竞争性精英主义政治让不少人对其嗤之以鼻。网络出现后，这种本应改变民主程序的技术和趋势却被政治利用，产生了更加精准的操控和政治术。“在 201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据报道，一家名叫剑桥分析公司的政治咨询公司（特朗普购买了这家公司的服务）基于 5 000 个不同的数据点，收集了囊括 2.2 亿人的数据库——几乎是美国所有的投票人口，每个选民的心理特征都被其收入囊中。”^{[10] 177}可见，互联网虽然在促进协商的民主手段实现方式上升级了“装备”，但并没有改变西方政党政治竞争及其虚假民主的本质。“尽管普通公民表达个人意见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这并没有广泛提高协商或政治讨论的质量。相反，政治上的分裂和信息不透明让人觉得跟过去没什么差别，甚至愈演愈烈。”^{[10] 184}可见，西方社会的网络协商民主在被人为操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且这种操控是建立在碎片化现实和感知控制的基础上。

社交平台及其拥有者成为操控人们政治偏好的幕后始作俑者。这种政治过滤和操控是决定性的，且越来越多地由自动机器和智能算法来完成。虚假消息和诱导性新闻层出不穷。它加速了后真相政治的两极化倾向，智能算法加上资本人为的蓄意操控，西方政党政治在网络协商民主的道路上成为碎片化现实和片面性激进言论的牺牲品。网络协商民主沦为彻底的“后真相政治”和“过滤政治”，其标榜的民主意涵已经被严重异化和毒化。在线匿名和信息隐藏让协商成为带上“至尊魔戒”的怪物，各种“吟游诗人账户”和机器人账号已经成为激进话题引诱者和意见陷阱的温床。从某种角度来说，协商不再是人类的专利，智能社交账号和机器人已经参与其中。凤凰网的一篇报道称马斯克曾拒绝收购推特，就是因为“马斯克一直认为，推特平台上的垃圾信息和虚假账户的份额远远高于推特官方公开的比例，即小于日常用户的 5%；他相信虚假账户的占比达到了推特用户的 20%，

甚至更多”^[18]。“在未来，这些声音将不仅仅是无实体的代码行：它们被赋予了面孔、声音及非凡的修辞天赋，完全能做到听上去和看起来都像是人类。如果对手是被一百万条自作聪明的反驳武装的机器人大军，我们的观点瞬间就会被它们撕得粉碎，那么凭我们脆弱的大脑和有限的知识，怎样才能有效地参与协商？”^{[10] 188-189}或许，从机器人参与协商到机器人主宰协商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骇人听闻。

（二）区块链直接民主批判

传统观念认为，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是民主实现形式的最好选项。过去，该形式因受到技术限制一直无法真正实施，现在的大数据技术和区块链技术似乎可以帮其实现。有学者认为：“区块链是一种链式数据结构的信息技术，具有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特点……区块链技术使网络协商民主中的信息和数据一旦记录就不可更改，避免了数据有误，保证数据的安全与真实，从而推动了网络协商民主新型信任体系的构建。”^[19]但是，这可能是一种幻想。技术支撑优势不代表民主实现优势，区块链优势也不等于民主进程优势。区块链虽然定义了身份和数据的唯一性与安全性，但是，任何作为政治决策的公共议题都是共识与妥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人一票的区块链民主实际上可能是“镜花水月”，它就算实现了理论上的可行界定或技术上的完美契合，也难以保障议题代表的政治利益不被操控。况且，基于区块链的政治投票和政党选举都极易走向被操控和左右的实质性的无序和失序。“网络化导致政党意识形态的碎片化，可能引发政治的无序；智能化则进一步加剧政党意识形态的极化，可能导致政治的失序。”^[20]另外，被信息投喂所构筑起来的“信息茧房”让选民投票已经远离真正的全面理性范畴。因此，我们越来越多看到西方民粹主义政治兴起中的算法因素。“算法技术与民粹主义的结合引发了算法民粹主义。算法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这个旧身子进入算法新时代后发生偏离的产物，并且已经对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结构以及参与者的行为造成了重大影响。”^[1]即使区块链技术所奠基的治理术似乎是一种对权力的直接下放和去中心化再造，它也无法改变西方政党政治被技术性极化的趋势。

区块链直接民主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人们对西方政治早已失去信心的现实。“一个疲惫的工薪家庭真的会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考虑金融衍生品新规的优点吗？”^{[10] 196}区块链仅仅是实现政治投票的保密性、安全性、快捷性的技术要件，但一种民主的真正优势不在简单的投票多寡。直接民主的不可取之处在于，它往往是一时的个人建议的集合，并不是明智或深思熟虑的民主决策。一种更加激进的区块链直接民主论断认为，既然区块链让直接投票变得可靠而安全，那委托代理政治是否可以实现更大规模的跨越？这一想象认为可以通过区块链实现安全委托代理，既保障了安全，又化解了自身对政治的不专业问题。“在城市规划问题上，我可能希望一位著名的设计师为我投票；在医疗保健方面，可以将我的意见委托给一个由护士、医生和患者团体组成的联盟。这种民主模式的数字平台已经由 DemocracyOS 的创建者开创，并被欧洲各政党使用。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民主’（liquid democracy）。”^{[10] 196-197}这看起来非常适合区块链直接民主对民主流动性、专业性的期待，但这一期待的前提是选择真正代表大众的真民主人士，很多所谓的民主人士实际上是披着维护民主正义外衣的趋利者。他们竭力包装自己对民主的渴望和专业性，却出于利益考量贩卖政治斗争或妥协进行牟利。这是人工智能时代和视觉政治时代的“深度后真相”，更是区块链直接民主无法更改和超越的现实。

五、开源维基民主、大数据民主、人工智能民主批判

开源维基民主要求更专业的知识和更自主的时间。它有可能导致一种民主描述阐释和“无限修改”的死循环,更可能导致民主的僵局和延迟。大数据民主赋予算法和数据以无上的政治意义,这消解了政治的“人本主义”性质,造成数据民主对实际和实质民主的“代议制”接管。这种情况不符合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民主政治观念。人工智能民主作为“类人”的专家型民主,也极易造成政治偏见和隐私泄露等削弱政府公信力的风险。

(一) 开源维基民主批判

互联网催生了一种新的内容生产方式,使得陌生人通过团结互助进行有意义的内容生产和规则制订成为可能。这种内容生产可以叫作“维基百科”或“百度问答”。它是一种内容生产的开源开放性模式,任何希望有所贡献的人都可以进行编写和修正。“在数字生活世界中,通过共同对等生产或众包直接邀请公民来帮助制订政治议程、制订政策和起草并完善法律是可能的。这种民主制度或它的变体的拥护者,将其称为维基政府(wiki-government)、合作民主(collaborative democracy)和群众民主(crowdocracy)”^{[10] 198} 笔者倾向于称其为开源维基民主。开源维基民主可行吗?答案是否定的。“它比其他任何民主模式都更加重视参与者的时间和注意力。并非所有人都会乐于参与对法律的修改,喜欢修改代码的人就更少了。其结果可能是冷漠感增加,合法性却下降了,这是因为维基民主变成了知识渊博又有闲的阶层的维基民主了。”^{[10] 199} 这还仅仅是杰米·萨斯坎德对维基民主不可行的最表面回答。

维基民主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即使由知识渊博又有闲暇的专家进行合作议事也难以达成制订政策或法律所需的真正的代表性和公共性价值。一种无限论证的网络民主程序样态或许就是这样,民主协作过程走入了没有重点和终点的重复差异之中。开源维基民主很可能只是一种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共享的民主浪漫表达,而很难成为民主实践的真正核心选项。开源维基民主是一种极致的机器理性惯性认知,是一种“算法理性”的狭隘民主实践观念。实际上,无论“技术决定论”还是“技术等同论”都是对数字时代政治的最大误解。“‘算法理性’的出现,至少使理性的运用带来两个变化:它使理性的运用主体不再是人,而变成了类人的人工智能;它使理性运用越来越具有相对固定和封闭的边界。从学理上看,前者导致了理性运用的‘去人化’,从而导致人的客体化;后者导致了理性运用的‘封建化’,从而成为‘公司统治’的帮凶。”^[21] 由资本和算法主导的维基民主最后极有可能走向一种“机器民主”和“公司政治”:技术“去人化”的民主实践不太可能因“去人流数”而变得完美,也不太可能因所谓的“开源”特性就实现人人参与。

(二) 大数据民主批判

卢恰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对古代雅典民主与今日民主作对比研究时评价说:“两千多年之后,我们需要以数百万人能够有效参与的方式来重塑民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保证,个人能够获得他或她负责地投票所必要的所有信息、备选方案和论据。”^[22] 能够做到全面信息收集分析、方案拟定和论据查找分类的或许只有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确实反映了人类的思想、行动、情感等信息。这些信息是人的真实表达,依此来参与民主解决方案,看似可行。这种民主模式或许可以称为大数据民主。“在这种模式之下,政策将建立在对人们的生活——所做、所需、所想、

所言和所感——无比丰富和精确的描述之上。这些数据将是新鲜且实时更新的，而非以四五年为周期来处理，理论上，这将确保更大程度的政治平等，因为这些数据是平等地从每个人身上抽取的，而不仅仅来自那些热衷参与政治进程的人。”^{[10] 201}

实际上，大数据民主更是“算法理性”和“数据主义”主导民主的一厢情愿。大数据赋予算法和数据以无上的政治意义。它取代了民主表达和价值功能中的具身性个人维度，直接以数据信息作为民主决策的最根本甚至唯一依据，实现了数据民主对实际和实质民主的“代议制”接管。这种接管动摇的不仅是民主的意义问题，甚至还有人的社会性及其意义问题。尚且不论污染数据和噪音数据将导致的民主决策失灵问题，就其将所有人的全部生活演变为潜在的政治参与行为，就已经是足够的道德和侵犯隐私了。更何况大数据民主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类意志在民主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投票不只是一个数据点，就选民而言，投票也是一种重要的同意行为。”^{[10] 202}以大数据民主剥夺和替代人民有意识地参与政治生活的意愿，在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观点看来显然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剥夺了人向更高尚道德和社会理性政治迈进的可能性。即使不以道德绑架大数据民主，也难以给其更高评价，人类思想、行为、情感中的数据只是反映了情况是什么，而不能告诉人们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民主中包含人类道德分歧的诸多实践问题，表面的数据反映的只是信息及其数据集之间的关系。大数据不是知识，也不能代替知识。大数据更不是根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信仰、观念和价值，特别是有关公平、正义、民主等方面。大数据民主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民主决策和民主程序优化过程的改善要件，但绝不能作为民主实现的根本要件和深层观念。

（三）人工智能民主批判

人工智能时代，很多专业的问题正在交给专业的“机器人”去处理。比如，人工智能系统正在代替现实的交易员进行着数十亿美元的股票和证券交易；机器人正在代替外科医生成为精准医学手术的实施者。库兹韦尔在《机器之心》一书中曾这样描述 2099 年的人类定义：“甚至在依旧使用碳基神经元的人类智能体中，神经植入技术也已经普及，大大提高了人类的感知和认知能力。那些没有采用植入技术的人也无法与采用了植入技术的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人类的定义也已经被彻底颠覆。”^[23]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原因很简单，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所构造的人工智能系统是一个“专家”系统，它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逻辑与传统人类思维方式和逻辑有所不同。

人工智能在解决特殊问题时，确实具有更强的能力。例如，最近爆火科技界和人工智能界的 ChatGPT，它是由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新推出的一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它通过连接大量的语料库来进行训练模型，这些语料库包含真实世界中的对话。这使得 ChatGPT 不仅具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知识能力，还具备根据聊天的上下文情况进行互动的能力，做到与真正人类的聊天场景几乎无异。ChatGPT 不单是聊天机器人，还可以自动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译文、代码等。它可以像一个公司职员甚至企业高管那样工作和决策。人工智能用于民主，不仅包括涉及公共议题的调查问卷，也包括其他事项。“税收、消费者福利、环境政策、金融监管，这些领域的复杂性和我们对它们的无知，鼓励我们允许人工智能系统根据它对我们生活经验和道德偏好的了解来为我们做出决定。”^{[10] 205}

如果出于繁琐的投票环节引发的时间焦虑，在一些民主环节和领域做出尝试未尝不可。但是，人工智能民主的问题依然显而易见。比如，算法偏见所引发的政治偏见，数据透明所引发的政治泄

密和隐私问题等, 最终也可能引发算法黑箱而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 以及产生科技伦理和政治议题的重大风险。“启蒙运动为现代政治学设定了‘人的政治’模式, 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人的启蒙定义被结构性改写。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社会管控领域, 人类似乎正在丧失对自己的自主且理性的管理。随着人类利用技术可能转变为技术控制人类, 技术的异化已经成为政治学必须直面的一个严重问题: 启蒙运动奠基的‘人的政治’趋于终结, 而‘技术利维坦’降临。”^[24]显然, 面对可能的“技术利维坦”, 人工智能民主只能是有限性民主实现形式的辅助手段, 真正的民主肇始于人类对公平、正义、团结、互助的共同追求与维护, 有时甚至还需要妥协和让步。但人工智能系统显然不知何为真正意义的公平、正义、团结, 更不会妥协和让步。面对新技术浪潮导致的新型权力结构, 构造新的民主实现形式是需要考量的话题。但是, 也不必过于悲观焦虑, 无论是“数字集权论”还是“数字民主论”, 都是对人工智能裹挟或操控权力和政治的夸大。毕竟, 到目前为止, 数据技术和民主议题依然由人类掌控, 二者的真正契合也才刚刚开始, 未来是好是坏还未可知。

六、结语

伴随深度数字化和智能算法时代的来临, 权力和民主的观念与形式正在发生剧烈变革。算法即力量, 代码即权力, 各类数字民主实现形式的粉墨登场已经让西方社会的权力形式和民主观念的异化风险与日俱增。权力和武力的数字化、私有化、自动化、平台化日益显示出强大威力。面对“群体极化消解数字协商民主公共理性, 数字鸿沟扩大数字协商民主不平等性, 数字治理安全风险降低数字协商民主参与性”^[25]等风险难题, 必须谨防资本无序扩张、平台越权和算法霸权的挑战与冲击, 保持警惕并做好有效引导、合理规制、有序应对。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要用好制度优势, 进一步使技术正向赋能民主实践和治理效能。

总之, 技术创新一直具有内在的“政治性”维度, 有些影响是温和的, 而有些影响是剧烈的。兰登·温纳 (Langdon Winner) 在 1980 年的写作中, 曾引用核电的例子说明技术的内在政治维度, 即技术或技术物会影响权力决策形式和民主政治进程。人工智能、算法与政治、民主, 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领域正在“决策与控制”与“计算与协调”的维度上深度耦合并呈现智能权力和数字民主的未来样态。算法的力量改变着政治程序和民主的结构与形式, 奠基于算法和数据之上的权力形式和民主模式有些是可信的, 有些则只是想象。

参考文献:

- [1] 高奇琦, 张鹏. 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 数字时代下民主政治的平衡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4): 15-25.
- [2] 段伟文. 深度智能化时代算法认知的伦理与政治审视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 (3): 23-35.
- [3] 张爱军, 孙玉琴. 算法权力及其国家能力形塑的主体透视 [J]. 学术月刊, 2021 (12): 96-105.
- [4] Bucher T. If...then: Algorithmic power and politic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9.
- [5] Scoville C, Chapman M, Amironesei R, et al. Algorithmic conservation in a changing climate [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21 (51): 30-35.

- [6] 尤瓦尔·赫拉利. 今日简史: 人类命运大议题 [M].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79.
- [7] 胡铁生, 张凌坤, 赵远. 语言转向中的话语意义及其权力 [J]. 外语教学, 2016 (3): 18-21.
- [8] 郑智航, 雷海玲. 代码技术对传统自由的挑战与法律应对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 139-148.
- [9] 褚尔康, 张钰. 法律代码化的理论逻辑与技术路径 (英文) [J]. 科技与法律 (中英文), 2022 (6): 126-134.
- [10] 杰米·萨斯坎德. 算法的力量: 人类如何共同生存? [M]. 李大白, 译.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 64.
- [11] 张梦晗, 陈泽. “可体验的未来”: 元宇宙游戏中的政治参与——基于游戏体验模式的考察 [J]. 传媒观察, 2022 (8): 30-36.
- [12] 吴冠军. 人类世、资本世与技术世——一个政治经济学—政治生态学的考察 [J]. 山东社会科学, 2022 (12): 47-57.
- [13] 吴冠军. 共同体内的奇点——探访政治哲学的“最黑暗秘密”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2 (1): 5-14.
- [14] 周维栋. 元宇宙时代的数字公民身份: 认同困境、实践逻辑与理论证成 [J]. 电子政务, 2022 (10): 62-74.
- [15] 蓝江. 数字焦土和剩余数据——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人的生存 [J]. 求索, 2023 (1): 57-65.
- [16] 张宪丽. 数字世界中的共有凝视: 从福柯和拉康出发的思考 [J]. 学习与探索, 2022 (12): 50-59.
- [17] 张凌寒. 权力之治: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规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39.
- [18] 老马叹气! 马斯克再回应推特虚假账号问题 [EB/OL]. (2022-07-31) [2023-02-11]. <https://i.ifeng.com/c/8I5p1InH5h7>.
- [19] 李占乐, 赵浩. 信息技术视角下网络协商民主的可能、挑战及应对 [J]. 理论导刊, 2022 (5): 46-54.
- [20] 高奇琦. 算法政治转向与治理功能弱化: 新科技革命下西方政党政治发展趋势研判 [J]. 行政论坛, 2022 (1): 148-154.
- [21] 孙国东. “算法理性”的政治哲学检视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 23-33.
- [22] 卢恰诺·弗洛里迪. 在线生活宣言: 超链接时代的人类 [M]. 成素梅, 孙越, 蒋益,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168.
- [23] 库兹韦尔. 机器之心 [M]. 胡晓娇, 张温卓玛, 吴纯洁,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304.
- [24] 任剑涛. 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J]. 探索, 2020 (5): 52-65+2.
- [25] 曲秀玲.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协商向度: 优势、问题与优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6): 65-70.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的现状与引导路径 ——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

许科龙波

（喀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摘 要：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心力、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发展稳定。新疆由于其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在新时代做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新疆高校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为切入点，结合调查问卷，从心理维度、价值维度与实践维度对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基于认知融合推进认知形成机制的完善、基于价值理性完善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教育空间、基于实践理性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云教育”模式、基于“全数据模式”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精准性和加强信息舆情监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等引导路径。

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新疆大学生；认同教育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2-0137-11

DOI：10.13946/j.cnki.jcqi.2023.02.012

作者简介：许科龙波，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新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与文化研究基地成员。

基金项目：南疆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乡村振兴视阈下南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探赜”（NFG2210）；喀什大学重点项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研究”〔（2020）1670〕

引用格式：许科龙波. 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状与引导路径——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137-147.

新时代新征程，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多变。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已然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着力点。新疆作为祖国最西部的省级行政区，其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深入分析了当前新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对做好新疆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指出新疆工作总目标为“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1]。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需要从文化润疆的视角出发，广泛汇聚全疆各族人民的智慧与力量。2022 年 7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大学考察调研时进一步强调，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新疆高校大学生由多民族学生共同组成，意识形态工作交织民族、地域等因素，更易受西方多元社会思潮的侵蚀与渗透。因此，凝聚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不仅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维护边疆稳定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一些学者就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探讨。顾超、王学俭提出“从明确认知前提、打牢物质基础、凝聚价值共识、优化教育渠道和促进实践确证五个维度系统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王连旗、高汝东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提出了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有效路径为“大力推行国学教育，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以校园文化为载体，积极开展国家认同教育；大力发展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合”^[4]。程志杰、黄泰博则重点探讨了民族高校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需从中华文化认知、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自信、中华文化传承四个维度入手”^[5]。另有部分学者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角度出发，如左殿升、冯锡童提出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需要增强学生获得感、筑牢主流价值传播主阵地、强化学生崇德修身、掌握互联最大变量，切实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学生“知、情、意、行”的高度统一^[6]。姜黎黎、张峰从实践理性维度出发，提出应实现行为与主体相统一，实现教育技术、教育载体、教育方法合理有效运用，实现交往式教育、主体交流交往及生活世界的交融^[7]。

总体来看，学者对于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多集中于价值教育层面。然而，对不同民族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不仅仅是塑造价值层面的认同，更应当着力于凝聚精神层面的共鸣。鉴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现实环境，当前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新疆部分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从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及实践理性的三重维度进行数据回归分析，剖析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状，并提出相应引导对策。

一、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实证调查

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视角分析当代新疆大学生的认同状态，可以从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三个维度展开。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问卷调查作为主要研究工具，运用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新疆部分高

许科龙波. 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状与引导路径——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137-147.

校的 500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从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及实践理性的三重维度进行数据回归分析, 运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以及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 确定问卷内容后结合 SPSS 25.0 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为确保调查结果有效性, 该调研对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以及喀什大学五所高校展开调研, 并进行交叉、相关性分析。其中, 重点高校 1 所, 师范类高校 1 所, 财经类高校 1 所, 农业类院校 1 所, 综合类院校 2 所。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456 份, 有效率为 91.21%。

（二）问卷信度及效度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问卷设计覆盖了大学生文化认同基础上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及实践理性三个维度的问题。为保证问卷信度及效度, 调查中对信度和效度检验如下。

1. 信度。为检测问卷量表的实用价值, 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进行信度检验。系数越大表示显著性越强, α 表示信度系数, 通常在 0~1 之间。 α 大于 0.8 表示极好, α 在 0.6~0.8 表示较好, 而 α 低于 0.6 表示较差。由表 1 可知, 本问卷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6, 表示问卷可信度较高。

表 1 问卷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信度检验	
项数	系数
19	0.836

2. 效度。为了测量问卷的有效性, 进行 KMO 和巴特里特检验。由表 2 可知, KMO 值为 0.846, 大于 0.6, 即问卷具有有效性, 能够有效反映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状。

表 2 KMO 和巴特里特检验

KMO	0.846	
巴特里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 476.547
	自由度 (df)	649
	显著性 (Sig.)	000

（三）研究对象分析

456 份有效问卷中, 男女各占 42.33%和 57.67%。少数民族与汉族所占比例分别为 56.34%和 43.66%, 其中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回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 6 个民族。学历层次方面, 在读本科生占 91.46%, 大一学生占 38.4%, 大二学生占 31.16%, 大三学占 16.67%, 大四学生占 13.77%, 硕士研究生占 8.54%。在学科类别方面, 人文社科类占 63.43%, 理工农业类占 36.57%。父母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有 97 人, 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有 128 人, 初中文化程度的有 156 人, 小学文化程度的有 96 人, 未接受过学校教育的有 23 人。

（四）研究样本分析

本文的因变量选取国家认同指数 (YI) 来反映新疆大学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现状, 设

置分值为 1~5 分。分值表示新疆大学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程度：1 表示非常差，2 表示差，3 表示一般，4 表示好，5 表示非常好。自变量选取国家认同意识、身份认同以及行为倾向来表示。具体变量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 3 研究样本分析

项目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解释
认知理性	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呈愈来愈高的趋势 (X1)	4.87	0.403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 (X2)	4.83	0.393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X3)	4.93	0.412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呈愈来愈高的趋势 (X4)	4.89	0.406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每次参加升国旗仪式都为祖国而自豪 (X5)	4.67	0.389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十分有必要 (X6)	4.69	0.391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非常熟悉 (X7)	3.24	1.436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新时代是否应当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X8)	4.91	0.409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你是否认为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X9)	3.12	1.784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价值理性	民族间存在习惯差异很正常,不影响我们都是华夏儿女 (X8)	4.75	0.412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我讨厌打着文化差异旗号分裂国家、民族团结的言行 (X9)	4.63	0.435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民汉合宿时我时常会感觉民族差异并总感觉有隔阂 (X10)	2.36	1.374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不同民族同学交往时我时常会感觉文化、习惯的差异,有时候会让我感觉不舒服 (X11)	2.46	1.273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MHK 考试占用了我大量时间精力,利大于弊(民族学生作答) (X12)	3.12	1.316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新疆与内地省份存在经济落差,作为新疆大学生感觉略有自卑情结 (X12)	2.89	1.648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你容易受网络舆论的影响吗? (X14)	4.46	0.387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相较于传统教育,我更容易接受在线网络媒介信息,比如微博、微信、抖音等 (X15)	4.57	0.414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西方文化对我来说比传统文化更吸引我的注意 (X16)	3.76	1.021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在线课程选择中我更愿意选择国际高校的课程,更高大上 (X17)	4.01	0.768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实践理性	通过学习专业课增强文化认同感 (X18)	4.23	0.832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通过系列思政课获得文化认同感 (X19)	4.36	0.769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通过学校组织的系列集中学习活动获得文化认同 (X20)	4.15	0.892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通过学习强国增强文化认同感 (X21)	3.89	1.039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通过在线教育学习增强文化认同感 (X22)	3.45	1.169	很不认同 1-2-3-4-5 非常认同

二、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现状分析

根据表3数据显示, $X1$ 、 $X2$ 、 $X3$ 、 $X4$ 、 $X5$ 、 $X6$ 、 $X7$ 、 $X8$ 、 $X9$ 通过了显著性检测。这表明新疆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一定认同基础, 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总体呈正趋势, 但在局部环节缺乏深层理解与认同。

(一) 认知理性分析

在心理学领域, 认同被视为心理过程。认知理性被视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过程中的主观性内容, 更多地强调认同心理与认识, 在凝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心理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也是人们在对事实进行理性判断时的重要评定标准。认知理性可以分为“不知”“碎片化认知”和“熟知”三个阶段。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此次受调查的新疆大学生普遍处于认知理性的第二阶段, 即“碎片化认知”阶段。一是认知仍存在模糊地带, 对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基础概念普遍处于了解其基础内涵, 但对其深刻意义及实践意义仍处在浅层认知阶段。二是尚未形成完整的认知系统, 对所学理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碎片化认知难以转化为深度认知并形成完整认知体系。三是碎片化认知尚属浅层认知, 表现出认知层面的不稳定,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知晓度及信任度呈弱相关, 易受多元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出现认知偏差现象。凝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1. 主体内容: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在“五个认同”中,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居于首位。本次调查将国家认同置于全球化境遇中进行考量。在“我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呈愈来愈高的趋势”的问题中, 93.69%的学生表示认同, 其中65.45%的学生表示非常认同。在“每次参加升旗仪式时都为祖国自豪”的问题中, 96.36%的学生表示认同, 其中82.72%的学生表示非常认同。在回答“我讨厌打着文化差异旗号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一题时, 94.69%的学生表示认同, 其中77.08%的学生表示非常认同。结果显示, 受调查新疆大学生具备基本的国家荣誉感, 对国家的认同度普遍较高。

2. 核心要素: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认同层次中属于高层次认同, 是建立在对国家认同基础上的更深层次的认同。新时代智能传播环境下, 新疆大学生处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 其身份属性与身份认同表现出更强烈的个体化需求, 呈现出认同的多重性特征, 极易将不同民族间生活习性上的差异上升为民族差异。在“民汉合宿时我时常会感觉民族差异并总感觉有隔阂”一题中, 34.36%的学生持中立态度, 这实质上体现民族认同的跨边界认同意识的模糊。

3. 深层基础: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为此, 要考察受调查对象是否能够正确理解民族文化差异性与中华文化统一性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不同民族间存在文化差异很正常, 归根结底, 我们都是中华儿女”一题中, 92.69%的学生表示认同, 其中非常认同占72.76%。在“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十分有必要”一题中, 有高达96.04%的大学生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非常有必要或有必要, 这显示绝大多数的受调查者在主观意愿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呈普遍认同。从认知理性角度分析, 总体情况较为乐观, 但认同不等于认知, 认同与认知仍存在一定落差。在回答“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内容非常熟悉”一题时,非常清楚的仅占 49.5%,较为了解的占 36.63%,一般的占 12.38%。可以看出,尽管绝大多数受调查者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必要的,但仍然存在认知模糊、认知不系统、不稳定的现象,体现出主观认同与实践认知的较大差异。

4. 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8]新时代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要求。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在认知层面上表现为个体的归属感与忠诚感^[9]。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一题中,问卷认同度高达 95.05%,其中,非常认同达到 82.67%。这表明受调查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高度认同,同时表现出了较高归属感与认同感,体现出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认同。但从认同维度分析,受调查者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状态高于认知状态,体现出较高的认同感与认知水平一般的差异性。认同从程度上可以分为“情感认同”与“信仰认同”。受调查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尚属“情感认同”,而未上升到深度自觉的“信仰”阶段,即尚处于浅层的感性认同阶段。情感认同是指将个人情感因素作为判断主体思想观念及社会价值一致性的依据,也称感性认同。信仰认同则是建立在理性层面上的认知,通常以固化理性的思想观念及社会价值体系为判断依据,表现为一种坚定不移的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归根结底追求的是“情感”向“信仰”的升华,需要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认知的基础之上。

5. 制度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在“新时代是否应当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一题中,94.8%的学生呈现认同。但在“你是否认为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一题中,却呈现出较大差异性,36.7%的学生持中立态度。尽管半数以上学生对此持认同状态,但也侧面反映出受调查学生对新时代“四个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呈现出高度认同的同时,对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持不够坚定的态度。

(二) 价值理性分析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0]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实质上是人们价值观念层面认同。“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1]价值理性是人们对客观行为本身进行价值判断时的理性判断力,注重精神凝聚与目标激励功能。主流意识形态在凝聚精神共识的过程中,为实现不同民族在地域、文化、利益等方面的不同诉求,追求精神层面价值理性的最大公约数,属于应然层面的价值判断和理性选择。本次调查有以下发现:

1. 主体地位认知存在偏差。社会价值是通过社会实践对社会创造的价值,个体价值则是指单一个体在社会实践中对个人价值的实现,二者不能孤立存在。当前,对新疆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层面的引导多注重个体的社会价值培育,突出大学生社会价值的重要性,强调服务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调查发现,新疆高校在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时,要加强“个性化教育”。在“MHK 考试占用了大量时间,弊大于利(民族学生作答)”一题中,14.95%的学生持认同态度,23.26%的学生持中立态度。这表明少数受访大学生对当前的意识形态引导的部分政策表现出不认同态度。

2. 受到地域因素影响。新疆地处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新疆的地域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边”上,

从而呈现出复杂的地域特性。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普遍性来看,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和管理,进而将其疆域划分为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12]。新疆高校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易受地域及环境的影响。据统计,新疆各类清真寺等宗教场所约有2.48万所(包含清真寺2.44万所),总量是各级各类学校(不含幼儿园、成人、技工学校)的4.8倍,宗教活动场所中的各类神职人员有2.93万人,是全疆高校专任教师1.94万人的1.5倍^[13]。在新疆地域性文化氛围下,新疆大学生易受外部敌对势力的蛊惑,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难度较大。

调查显示,在“不同民族同学交往时我时常会感觉文化、习惯的差异,有时候会让我感觉不舒服”一题中,11.63%学生持认同态度,25.25%的学生持中立态度。在“民汉合宿时我时常会感觉民族差异并总感觉有隔阂”一题中,22.35%的学生持认同态度,34.36%的学生持中立态度。这表明部分受调查者在文化、民族差异问题上,呈现总体坚定、局部迷茫的状态。这要求我们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强化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3.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引起情感落差。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状况不仅受学校教育及引导的影响,也与其所处地域的发展状况、家庭因素等相关联。在“新疆与内地省份存在经济落差,作为新疆大学生感觉略有自卑情结”这一问题上,46.04%的受访大学生持认同及中立态度。数据表明,近半数受访大学生认为由于新疆经济上与内地省份存在落差而存在一定自卑情绪。同时,由于新疆特殊的地域环境,西方敌对势力历来将新疆视为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突破口。他们通过线上线下、境内境外结合新媒体新技术,将新疆高校意识形态场域作为首要争夺阵地,这严重威胁到了新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4. 西方在线教育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调查发现,在线教育中存在的西方意识形态内容对大学生产生了一定渗透和腐蚀。在“相较于传统教育,我更容易接受在线网络媒介信息,比如微博、微信、抖音等”一题中,39.53%的学生持认同态度,35.22%的学生持中立态度,仅有25.25%的学生持反对态度。数据分析反映出新疆大学生在智能传播时代受网络舆论的影响较大,大学生正处在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网络舆论导向很容易影响其思想。这时候西方在线课程若有似无的渗透会对其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极其不利。

在“在线课程选择中我更愿意选择国际高校的课程,更高大上”一题中,25.58%的学生持认同态度,41.53%的学生持中立态度,32.89%的学生持反对态度。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持中立态度的学生比例较大,表明这一部分学生一定程度上缺乏主观判断力或者呈现观望态度,在文化认同上呈现出存在认同但认知不足的问题。这也侧面反映出西方在线教育对新疆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渗透是客观存在的。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社会转型,造成了社会阶级及利益关系的多元化,从而决定了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14]。在“西方文化比传统文化更能吸引我的注意”一题中,21.93%的学生持认同态度,31.56%的学生持中立态度,仅有46.51%的学生持反对态度。这表明学生在自主选择文化时,过半的学生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表4显示,与西方历史哲学类课程相比,中国哲学经典著作导读课程选课人数悬殊较大且课程评分也较低。这反映出大学生在自主选择时,由于其处在价值观形成期,自我判断力较差,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渗透影响^[15]。

表 4 Coursera 西方历史哲学类课程与“中国哲学经典著作导读”课程选课统计

课程名称	选课总人数	课程评分	参评人数
希腊与罗马神话 (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96 669	4. 8	910
哲学导读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300 325	4. 6	3 796
古埃及及其文明导言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Egypt and Its Civilization)	63 219	4. 6	1 137
古希腊 (Ancient Greek)	61 373	4. 7	1 145
古代哲学：柏拉图和他的前辈 (Ancient Philosophy: Plato & His Predecessors)	60 032	4. 7	846
中国哲学经典著作导读	35 856	4. 5	233

（三）实践理性分析

实践理性是指人在进行实践判断时候的践行能力。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意义上看，实践理性要实现与认知理性、价值理性的逻辑统一，需要从“知”“情”“行”三个方面进行。

1. 线下认同概念化。本次调查分析了专业课、思政课、集中学习、在线教育、“学习强国”等载体对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在“通过专业课和思政课获得文化认同感”一题中，85.38%的学生持正向态度，其中 53.49%表示非常认同。在“通过学校组织的系列集中学习活动获得文化认同”一题中，82.06%的学生持正向态度。调查数据表明，新疆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表现为高认同率、低认知率的书本化、概念化认知现状。实践中，新疆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引导方式集中在线下的课堂教育，需要加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有效引导，如组织学生深入基层、社区进行实践教育活动等。

2. 线上认同表面化。在“通过在线教育学习增强文化认同感”一题中，79.4%的学生持正向态度，略低于线下教育。在“通过学习强国增强文化认同感”一题中，88.04%的学生持正向态度，通过调查结果分析得知，新疆大学生对于线下教育依赖程度较高，对线上教育略有保留，同时在线上教育的选择上判断力不足。

3. 求知认同功利化。在“大学生学的系列思政课程对我们本专业的作用不大，学习作用不大”一题中，49.46%的学生持认同态度，其中 27.43%学生表示非常认同，27.36%的学生持中立态度，仅有 23.18%的学生持反对态度。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在行为选择上更加务实，出现一定程度的功利化认知现象。

三、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引导路径

基于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状分析，打破认知偏差、实现有效引导的路径可以从认知、价值、实践、全数据模式及舆情监督五个方面着力，不断增强新疆高校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一）基于认知融合构建理性认同机制

从认知理性的角度出发，个体偏好在形成过程中与认知模式的形成呈正相关。因此，可以从大

学生认知模式的形成机制着手,从认知融合的角度改变其原有认知,进而构建理性认同机制。认知融合主要指当人们产生认知冲突时,调整冲突的协调方式。融合过程是将新的知识体系加入原有知识体系中,继而改变其原有认知状态。

一是通过体验式教学加深认知融合。对于思想观念层面的问题,应旗帜鲜明地倡导将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引领当代大学生的主导意识形态,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基础,通过辩论、演讲等形式多样的方式引导学生从正向思维、逆向思维两方面主动进行思考,身临其境地体验理论和原理的逻辑性及可靠性,从而提高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从融合内容着手,以课程思政为引领,创新思政教学方式,大道至简地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融入其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信仰式认同。

二是发挥认知环境的隐性教育功能。要注重将主流意识形态与高校校园文化相融合。在校园文化的构建上,一方面应根据新疆的特殊性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新疆多元文化相融合,促进新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注重多元校园文化的发展,鼓励多元民族文化在不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原则引导下的多样性发展,打造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三是增进认知融合的整体性。一方面,认知融合要注重对学生认知整体性、系统性的培养,克服互联网时代信息碎片化的弊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较为全面地融入学生的认知体系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另一方面,认知融合的整体性要注重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与实践相结合,切实将实践教学落到实处。

(二) 基于价值理性拓展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教育空间

空间理论源于哈贝马斯、福柯等学者,空间因自身的封闭性而自带生产认同的功能。从空间理论的角度看,认同的产生是被动灌输与主动选择的双向过程。对于新疆大学生而言,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最要紧的即为不同民族学生在同一空间下将“国家”上升为“祖国”的认识升华,将个人价值上升为集体价值,并建构共同的空间身份与身份归宿,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制度逻辑并通过间性教育促进认同形成。哈贝马斯提出:“只要不断地通过交往、协商、‘互为主观’等途径,就可以寻找出能被普遍接受、类似最小公约数等共同原则。”^[16]运用到新疆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中,哈贝马斯的最小公约数原则可以被视为圆桌视角下多民族间多元文化间的有效方法导向。在圆桌视角下,对于意识形态间的异质性差异,主张以沟通化解争议,进而统一知识增量与认同。

(三) 基于实践理性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云教育”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17]新时代媒介融合的发展使网络舆论场成为网络话语权争夺的主战场,每个大学生都身处于网络舆论场中。有效引导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传统单一的线下教育已经不能够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在线“云教育”双管齐下是大势所趋。一方面,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云教育”建设的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将主流意识形态“云教育”提上议事日程,结合地方实情作出制度安排和规划。同时要结合本地情况,将五个认同、民族团结教育等融入“云教育”,潜移默化地强化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强化各民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方面,要提高在线教育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内容上要宣传贯彻主流意识形态,方法上要从高等教育的亲和力着手,有

针对性地提高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

（四）基于全数据模式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精准性

大数据权威学者舍恩伯格提出在大数据时代的“全数据模式”，认为“样本=总体”^[18]。将“全数据模式”应用于新疆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工作中，不仅对于意识形态工作者准确把握大学生意识和行为的精准性有积极意义，同时可以大大提高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打破了前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群体性定性研究模式。实践中通过结合大数据 MapReduce 和 Hadoop 等分析技术以及智能云计算，将定性定量相结合，对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和行为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精准性。基于云计算的联机分析原理与“全数据模式”相似，是一种数据动态分析模型。联机分析将分散的数据聚集起来进行智能多维分析，不需要人为整合。基于云计算、数据聚类分析、关联模式、统计分析等多维数据分析，能够挖掘不同学生群体之间的关联，进而可以在不同学生群体间形成协同性，针对性更强，精准度更高。

（五）加强信息舆情监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高校要以大学生兴趣为导向，集中关注大学生活跃度较高的微信、微博、贴吧等社交平台，搭建专项网络舆论反馈平台，并设置相应机制进行回应，同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媒体技术不断升级网络技术系统，有效引导网络舆论。新媒体作为智能传播时代的重要传播载体，对于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善于有效利用新媒体及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另一方面要积极加强校园文化阵地建设，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引导工作。例如，在各种校园 APP 上加强正能量宣传、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导向，强化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重要性的相关教育，坚持监管与融入相结合，牢牢把握主流意识形态在新媒体阵地中的话语权。

四、结语

“新疆局势事关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事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新疆大学生是维护新疆社会发展与长治久安的新生力量，是新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对象。如何提升这一特殊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不仅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关键，是当前新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也是多民族大学生认同教育中面临的重要课题。从“认知、价值、实践”三个维度出发，有针对性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科学性、时代性，形成构建新疆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良好氛围及有效机制，是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 [1] 本报评论员.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09-28 (1).
- [2] 习近平在新疆考察时强调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 [N]. 人民日报, 2022-07-16 (1).
- [3] 顾超, 王学俭. 新时代培育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9 (7):

许科龙波. 新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状与引导路径——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2): 137-147.

167-173.

- [4] 王连旗, 高汝东. 新时代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探析[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3): 185-189.
- [5] 程志杰, 黄泰博. 民族高校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5): 36-43.
- [6] 左殿升, 冯锡童.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认同实证研究——以全国30所高校为例[J]. 思想教育研究, 2019(3): 70-74.
- [7] 姜黎黎, 张峰. 基于实践理性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三维向度研究[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4): 61-67.
- [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5.
- [9] 柴宝勇. 论政党认同的含义及其要素[J]. 探索, 2009(1): 62-68.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06.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70.
- [12] 周平.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边疆治理[J]. 社会科学文摘, 2016(7): 46-48.
- [13] 闫国疆. 信仰教育、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10): 120-127.
- [14] 陈锡喜.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4.
- [15] 郭明飞, 陈继伟.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嬗变论析[J]. 东岳论丛, 2021(2): 174-182.
- [16] 哈贝马斯. 现代性哲学话语[M]. 曹卫东,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153-155.
- [17] 习近平.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 奋斗, 2019(6): 1-5.
- [18]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斯·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 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变革[M]. 周涛,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37.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81.

责任编辑: 刘伊菡



论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合作： 以匈牙利和美国为中心的考察

严少华¹ 李炳萱²

(1. 复旦大学 中欧关系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2.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国际化与跨国化是民粹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当代欧美右翼民粹政治的重要特点之一，在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互动与合作，对于研判西方主流民粹主义思潮尤其是右翼保守政治的走向具有样本意义。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的跨国互动既是基于双方各自发展处境的诉求，也受益于技术层面跨国网络传播的发展。通过跨国互动与合作，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以一种“全球化”的策略推进其“反全球化”议程，试图超越国家层面的局限，实现右翼民粹主义在跨国层面的联合。为此，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围绕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人民与精英以及传统基督教保守主义与现代自由多元主义等维度建构了共同的议题框架和跨国身份，为跨国合作奠定了身份基础。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的跨国互动不仅在理念和实践层面推动了右翼民粹的国际化，建构了共同的民粹议题和跨国的政治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政治的“欧尔班化”和欧美关系的分化。由于分歧尚存，对华政策目前尚没有成为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跨国合作的主要议题，但美国右翼并未放弃对匈牙利的持续施压，试图引导匈牙利与中国保持距离，这可能对中匈友好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中国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3.02.013

作者简介：严少华，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炳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基金项目：复旦大学资政研究支持计划项目“美欧对华战略协调与中国战略运筹空间研究”（IDH4300010/031）

引用格式：严少华，李炳萱．论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合作：以匈牙利和美国为中心的考察[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48-160．

应密切关注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跨国互动的趋势与发展, 避免在相关议题上成为被针对的目标。

关键词: 右翼民粹主义; 匈牙利; 美国; 跨国化

中图分类号: D05; D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3) 02-0148-13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尤其是 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发生以来, 欧洲政治右转倾向日益明显。在以难民问题为核心的多重危机刺激下,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 成为近年来欧洲政治领域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在西欧, 法国的“国民联盟”和德国的“选择党”成为议会内重要的反对力量。在东欧, 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青民盟”)与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则成功执政多年并且地位稳固。在北欧, 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在 2022 年 9 月的选举中成为瑞典第二大党并首次进入执政联盟。在南欧, 极右翼的“意大利兄弟党”也在 2022 年 9 月的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 组建了二战后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由极右势力领导的政府。可见, 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已经成为全欧范围内的现象, 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已经成为欧洲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随着欧洲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后疫情时代可能进一步发展壮大^[1]。

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图谱中, 以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为代表的右翼民粹力量占据了十分显要的地位, 被称为“欧洲民粹主义的最前哨”^[2]。2022 年 4 月, 欧尔班在大选中以绝对多数击败了反对派联盟, 赢得连续第四个任期。这一胜利让欧尔班成为欧盟任期最长的政府首脑, 也进一步巩固了匈牙利作为欧洲右翼势力堡垒的地位。右翼民粹主义在匈牙利的崛起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反思。国内学术界从历史渊源、国内结构、外部环境和冲突等方面, 探究了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 认为右翼民粹主义在匈牙利的崛起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思想根源, 是认同政治与利益政治双重构建的结果^[3]。弓联兵等则认为组成“同质联盟”让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获得了更大的政治优势, 而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完整的组织体系则是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执政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4]。此外, 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的动员策略及其对欧洲政治生态与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等, 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5]。

从已有研究来看, 目前学术界对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的分析主要从国内政治与欧洲政治视角切入, 围绕民粹主义崛起的国内政治原因及其对欧盟政治的影响展开。但在政治实践中,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国内政治层面而呈现出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和欧洲化的倾向。如今大多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在国家层面之外开展政治动员与合作, 与其他国家的类似政党和组织保持着跨国联系。尤其是 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 以法国“国民联盟”和意大利“联盟党”为代表的欧洲右翼民粹势力开始改变以前各自为战的作风, 开始在欧洲层面走结盟之路, 试图以松散的议题联盟方式推进共同目标的实现和重塑欧洲政治格局^[6]。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与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也一直试图联合欧洲的右翼民粹势力, 在欧洲议会中建立一个新的党团。因此, 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跨国化成为当代欧美右翼民粹政治的重要特点。其中, 右翼民粹主义的国际化主要强调政治家和政党之间的国际合作, 而跨国化则不仅包括右翼民粹势力的跨国互动与合作, 也涉及将“人民”建构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统一跨国实体。

作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右翼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全球化和排外的，以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为核心神话，这与近年来出现的右翼民粹势力跨国协调与合作的现象似乎构成了一种悖论。这一悖论也给学术界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互动与合作现象？更进一步讲，右翼民粹势力是如何克服传统狭隘的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立场而开展跨国互动与合作的？虽然关于右翼民粹主义跨国互动的经验事实越来越丰富，但国内学术界对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跨国化”现象的关注仍然很少。鉴于此，本文以匈牙利和美国为例，研究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互动与合作现象。以欧尔班为代表的匈牙利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大本营，而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则代表了右翼民粹主义一个新的高峰。在匈牙利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过程中，跨国的互动和学习过程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研究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互动，可以丰富对右翼民粹主义“跨国化”这一新现象的理解，对于研判西方主流民粹主义思潮尤其是右翼保守政治的走向具有现实意义。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的互动对两国涉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

二、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跨国合作的动因

匈牙利与美国右翼的跨国互动在 2016 年特朗普竞选前后就开始趋于频繁和密切。在特朗普宣布参加竞选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欧盟国家领导人。在特朗普当选后，欧盟大多数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陷入低谷，而匈牙利与美国的关系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美国结束了对欧尔班政府 10 多年的孤立政策，开始与欧尔班政权积极接触，欧尔班与特朗普的“兄弟情”（bromance）也日渐升温^[7]。2019 年 5 月，欧尔班在执政多年之后首次实现对美国的访问，并公开表示此举旨在强化匈牙利与美国的“战略联盟”，与美国共同打击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并帮助全世界的基督教群体^[8]。值得关注的是，匈牙利与美国右翼的紧密互动也延续至后特朗普时代。在 2022 年匈牙利大选前，特朗普发表声明，支持欧尔班参加竞选，称其“在保护匈牙利、阻止非法移民、创造就业和贸易方面做了有力而出色的工作”^[9]。欧尔班胜选后，美国规模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保守主义者聚会——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简称 CPAC）也首次移师欧洲，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办，这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右翼与欧尔班政府之间不断深化的关系。

虽然右翼势力在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但就紧密程度与合作深度而言，像匈牙利与美国右翼之间的紧密合作仍然非常少见。在一定意义上，匈牙利与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互动有其深层政治动因，双方彼此借力、互相支持。尽管两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历史文化背景相差较大，尤其是比起匈牙利与其他中东欧国家或美国与西欧发达国家来说，匈牙利与美国之间并不具备很高的结构相似度，但这种差异不仅没有影响两国右翼民粹势力的跨国互动，反而为彼此提供了一个规避风险的合作伙伴。在双方共同但有差异的诉求下，基于其本质要求、现实考虑与可行基础，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互动不断发展和深化。

表 1 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跨国合作的动因

		匈牙利右翼	美国右翼
本质要求	议题属性	右翼民粹主义关注的议题要求“反全球化”	
	实现路径	议题的落实与互动的路径要求“全球化”	
现实考量	总体目标	增强国内执政的合法性	增加执政当权的可能性
	保守目标	改善国际受孤立的现状	表达国内受限制的主张
	积极目标	扩大个人与国家影响力	设立国家未来发展高标
可行基础	思想基础	实用主义政策倾向	
	技术基础	跨国网络大众传播	

（一）本质要求：议题属性与实现路径的张力消解

右翼民粹主义以全球化逆反力量的身份存在发展，其所关注的各项议题本身就具有全球化属性。但是，就其实现路径而言，由于其自身“国家”话语建构需要与国际合作面临的现实困难，右翼民粹的跨国互动不得不以反全球化的方式各自进行，充满着内在张力。而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互动，不同于匈牙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互动，两国结构上的差异与地理上的区隔，能够消解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内在张力，使彼此成为右翼民粹跨国互动上难以替代的合作伙伴。

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于全球化负面影响凸显的时代，并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印证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彰显自身的正当性。尽管其在立场上反对超国家体系，但许多右翼民粹运动仍然认为有必要在跨国层面上参与政治。右翼民粹主义所聚焦的议题与坚持的立场包括反对政治一体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等。这种“反全球化”议题不仅依赖于各国内部右翼民粹势力在身份政治层面的话语建构，还依赖于全球化下每一位民众在利益政治层面的个体感受。无论是反对移民还是反对全球自由贸易，本身就具有全球属性，需要超出国家边界，放到全球语境下进行论证。如果各国人民相对普遍地感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那么一国国内的右翼民粹议题也会更加具有说服力。换言之，“反全球化”议题在一国国内的确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的联合论述。因此，右翼民粹势力也被称为“全球化的反全球主义者”（globalized anti-globalists）^[10]。通过反全球化的国际合作，右翼民粹势力试图凸显其国内议程的合理性，获得自我加强的“正反馈”。

“全球化的反全球主义”逻辑也存在于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互动实践中。对于匈牙利与美国的右翼民粹势力而言，“匈牙利第一”（Hungary First）与“美国第一”（American First）之间似乎没有本质的冲突。在反全球化的共同话语战略的掩护下，两国的右翼民粹势力在策略上共同转向了一种“全球化”的方式，成为右翼民粹主义“跨国化”运动的推动者。从匈牙利的角度看，由于自身国家体量、历史背景与地理代表性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在欧盟平台内的右翼民粹集团中突出匈牙利本国特色、发挥最核心的引领作用。匈牙利右翼民粹势力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国际化合作，既能完成相关议题的全球化论证，又将其方式限定在了国家及政党之间，不会减损其一直以来致力于建构的“国家”神话，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议题属性与实现路径之间的内在张力。从美国的角度看，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势力也需要通过跨国动员与合作推广其反全球化议程，匈牙利作为欧洲的反全球化先锋，则是美国右翼优先合作的对象。

（二）现实考量：双方基于各自发展处境的诉求

除去理论上的合作必要性之外，匈牙利与美国两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对彼此各有现实诉求。基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匈牙利以欧尔班为代表的青民盟致力于增强国内执政的合法性，进一步巩固政权；美国共和党中的右翼民粹势力则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在国内的影响力，增加执政当权的可能性。对于青民盟而言，与美国有关方合作至少能够帮助其改善在国际上受孤立的现状，同时能够积极地扩大欧尔班的个人魅力与匈牙利的国际影响力。对于美国共和党右翼民粹势力来说，匈牙利有关方面不仅能够帮助其表达在美国国内或共和党内受到部分限制的主张，还为美国展现了右翼民粹力量在一个国家内部稳定执政后的图景。

在总体目标层面，匈牙利青民盟由于已经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执政基础，因而更侧重于进一步巩固并增强其合法性与影响力。青民盟于 1998 年第一次成为匈牙利的执政党，在欧尔班的领导下于 2010 年再一次夺取政权，成为匈牙利的第一大党，并连续四次执政至今。在 2022 年的议会选举中，尽管匈牙利国内 6 个反对党史无前例地组成竞选联盟，青民盟和基民党的执政联盟还是高票赢得选举，欧尔班也以高票第五次当选匈牙利总理。而美国方面，对于右翼民粹势力来说，其国内执政基础的稳定性与广泛性仍有待提高。在 2016 年特朗普以相对微弱的优势赢得总统大选后，美国国内的右翼民粹倾向引起了各方的密切关注。特朗普在 2020 年总统大选中失利后，虽然“选举欺诈论”等支持特朗普的声音依旧占据了美国政坛不少的分量，但本预计在 2022 年中期选举中形成的“红色浪潮”却以“红色涟漪”草草告终。因此，美国的右翼民粹势力更需要能够进一步动员并扩大其选民基础，增加未来执政当权的可能性。

对匈牙利而言，2010 年重新掌权的欧尔班经常因其集权倾向、媒体舆论控制等政策而受到欧盟和美国民主党的批评，因此急需美国共和党右翼民粹力量的支持，以改善其国际上受孤立的现状。在欧盟内部，欧尔班政府被指控“侵蚀民主、讨好俄罗斯与贪污腐败”，不仅被边缘化，亦无法获得欧盟内部正常的资金支持。至 2022 年 11 月，欧盟委员会以匈牙利无法履行符合欧盟法治标准的承诺为由维持先前警告，将共同财政预算中对匈牙利拨款的 65%，合 75 亿欧元予以暂停。此前，欧盟新冠疫情“复苏基金”中针对匈牙利的 58 亿欧元也已冻结，直至欧盟认定匈牙利完成了司法等方面的 27 项改革为止。欧尔班与美国民主党领导人的互相攻讦也由来已久。早在 2011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匈牙利，就表达了美国对匈牙利法院及媒体的独立性以及政府腐败的担忧。2016 年，比尔·克林顿在为希拉里举行的竞选活动中声称，匈牙利欧尔班在过去一年的政策“越来越接近普京专制主义与独裁的领导风格”^[11]。在 2021 年举行的所谓“民主峰会”上，欧尔班是唯一没有被拜登邀请参会的欧盟领导人。

相比之下，特朗普不仅多次邀请欧尔班访问华盛顿，并且高度评价欧尔班及其政策。在与特朗普的一次会面后，欧尔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将不再被视为美国眼中的“害群之马”，而特朗普也抱怨美国民主党以对待欧尔班的方式对待他本人^[12]。事实上，尽管特朗普与欧尔班对彼此的支持不足以直接动摇对方国家的选民，但是双方都需要与彼此的互动和声援来对冲国际上的批评与孤立。与美国共和党右翼势力的互动，有助于塑造欧尔班的个人魅力与匈牙利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欧尔班政府国内执政的合法性和吸引力。虽然以合法方式当选执政，欧尔班等右翼民粹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其超凡魅力来推行相关议题的改革与国内秩序的重塑。如果能够获得美国有关力量的支

持甚至“崇拜”，那么欧尔班的个人魅力与形象将进一步得到加强。事实上，欧尔班也已经成为世界上各地右翼民粹势力心中的“旗手”，在美国尤为如此。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亦称其为“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恭维之意显而易见。目前看来，匈牙利凭借其在右翼民粹主义方面的突出表现，成功地扩大了自身在美国、欧盟乃至世界各国内有关群体内的影响力。美国保守党专栏作家罗德·德雷赫（Rod Dreher）将欧尔班领导的匈牙利视为保守主义的“典范”^[13]。

对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而言，与匈牙利青民盟的合作能够使其获得表达右翼民粹主张的“传声筒”与“扩音器”，至少能够帮助其表达在美国国内乃至共和党内受到部分限制的政治经济主张。2022年5月，由美国保守派联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组织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CPAC）在匈牙利青民盟的支持下于布达佩斯举办。匈牙利国民议会议员巴拉兹·欧尔班（Balazs Orban）表示，匈牙利青民盟希望能够保护住种族的同质遗产，保护基督教和欧洲白人的遗产，但是这种在匈牙利可以大声疾呼的主张，在美国的政治背景下很难直接宣之于口^[14]。共和党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裂。作为右翼民粹势力的对立力量，传统的反独裁保守派重视个人自由、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他们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与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发生冲突^[13]。由此，匈牙利右翼民粹势力成为美国共和党内部政治路线与文化观念斗争的重要外部借力。

从更加积极的角度看，匈牙利青民盟也为美国共和党内的右翼民粹势力设立了未来发展的高标，描摹了稳定执政后的蓝图。匈牙利青民盟之所以能够稳定执政，并不仅仅依赖绝对多数选票，而且依赖国家权力巩固自身地位，改造国家机构以确保其对权力的持续掌控。这对同样需要依赖选举程序和机构的不对称性来掌握政权的美国共和党来说，其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15]。无论是修改宪法，将司法机构从相对独立的法院体系变成基本忠于执政党的政治系统，还是修改选举法，划定面积差异巨大的新选区以保持自身在选举中的优势；无论是通过法律手段限制性少数群体的各项权利等措施，还是将部分非政府组织界定为削弱本国力量的“工具性外国代理人”并征收高额税赋，欧尔班的各项举措都严格遵守法律程序、授权动议和议会投票。换言之，他不是通过违反法律，而是通过巧妙运用法律与自身政治主导地位，推动右翼民粹主义的相关议程。欧尔班及青民盟在匈牙利的成功，不仅告诉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掌权是极为可能且有国际先例的，还证实了这一目标可以通过至少不在字面上违反现有规则体系、没有公开欺诈胁迫的方式实现。

（三）可行基础：思想基础的奠定与技术障碍的扫除

一般而言，民粹主义政党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阵地，不像传统政党一样以某种意识形态为使命，其核心要义在于识别各类潜在的政治机会，而后“取悦于民”。在思想层面，这种内化于右翼民粹主义的实用主义倾向也有助于匈牙利与美国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例如，尽管美国持续地对匈牙利亲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表示不满，并在北约军费分摊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欧尔班与特朗普依旧能在右翼民粹的相关政治文化议题上达成一致，并在选举中互相声援。

在技术层面，跨国网络大众传播的发展也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国际传播与合作奠定了基础。从深层属性来看，网络媒体的群众性与右翼民粹的草根性不谋而合。相关研究也表明，在浏览信息的时候，人们往往是“态度先行”而非“事实先行”，这为右翼民粹主义强调身份认同与引发人民情绪的煽动性发言提供了绝佳的平台^[16]。在主流媒体为精英政治共识主导的情况下，跨国社交网络为各

地的民粹主义提供了发声与交流的场域^[17]。社交媒体让信息能够绕过传统的新闻审核机制并精准传达至相关群体中,原本相互隔离的信息“泡沫”亦能由此产生紧密联结^[18]。于是一方面,右翼领导人可以通过跨国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渲染民粹氛围,加强他们与其跨国追随者的联系;另一方面,遍布各地的右翼民粹支持者也能够利用网络直接进行个体到个体的跨国互动,这有利于增强其身份认同感。与传统政治家相比,以欧尔班和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领导人往往更加喜欢通过推特等社交平台与选民直接对话,塑造鲜活而有力的个人形象。欧尔班与特朗普亦在推特上互相支持,向公众展示两人的互动与友谊。

三、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跨国合作的内容及表现

思想和价值观的传播是形成跨国合作与身份认同的前提和基础,而思想的传播集中体现在对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建构过程中。就合作内容而言,匈牙利与美国的右翼民粹力量在多个维度上建构了共同的跨国民粹议题(问题),并在这些议题上发出了共同的声音(方案)。横向维度上,两者都关注本民族国家与国际上的“他者”乃至国际社会本身的对立;纵向维度上,两者都强调人民群众与国内外政治经济精英的对立;综合性的文化维度上,两者都注重传统基督教保守文化与现代多元自由主义文化的对立。就合作形式而言,除了个体与集体性的互动,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匈牙利右翼民粹势力在国内建构相关身份议题的具体路径。

(一) 横向维度: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

建构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是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重要的共同关注。就具体议题而言,他们一方面各自进行着拒斥多边主义与超国家机制的努力,追求狭隘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在对待移民问题上展现出联合的态度,相互支持彼此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和解决方案。右翼民粹主义在身份议题建构中,通常以同一民族来定义的国家概念是区分“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标准。在匈牙利,欧尔班强调匈牙利的种族同质性,并将特殊的国民历史记忆与区域一体化的现状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国家的身份建构。欧尔班将 1956 年与 1989 年作为匈牙利反对苏联统治的关键节点大加庆祝,并将青年作为庆祝活动的主要目标群体。在 2016 年匈牙利“反对苏联统治革命”60 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欧尔班将 1956 年纳吉与苏联的斗争与现如今他本人与欧盟的斗争相提并论,声称“我们的责任是防止布鲁塞尔苏维埃化”^[19]。在美国,类似的身份建构同样不断发生着:从“美国优先”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从对“剥夺我们国家利益的”“摧毁我们中产阶级工作和财富的”全球化经济贸易合作的拒斥,到质疑北约是一个放任欧盟搭乘美国便车的“过时的组织”。双方都在以各自的口号,承诺保护国内“沉默的大多数”免受全球化以及欧洲一体化程度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20]。在这一过程中,匈牙利与美国的右翼势力针对的不仅是全球化议题本身,更是长期持自由立场的、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中坚持“政治正确”立场的国内政治集团。

在对待移民问题上,欧尔班与特朗普互相声援对方的反移民举措,欧尔班于 2015 年前后修建的隔离墙更成为特朗普移民隔离墙的前身。对于移民以及难民问题,欧尔班的立场始终坚定,声称席卷欧洲大陆的移民浪潮正在“扼杀欧洲”,且移民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联系。欧尔班是最早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界的领导人之一。他认为,试图非法入境的难民应该被关押并驱逐出境。

在难民大量涌入欧洲之际, 匈牙利在南部边界修建了围栏以驱赶难民。同时, 欧尔班曾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 要求欧盟出资 4 亿欧元作为隔离墙的建造费用。无独有偶, 特朗普在修建美墨边界隔离墙之时也对墨西哥提出了分摊建造费用的要求。事实上, 真正进入匈牙利与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并没有达到足以威胁这两个国家人口结构的地步。在 2015 年欧尔班建造隔离墙之时, 匈牙利的阿拉伯人口微不足道, 但他仍将安置 1 000 余名叙利亚难民的前景视为对匈牙利民族的生存威胁。在 2019 年布达佩斯人口峰会 (Budapest Demographic Summit) 上, 他提出这是“欧洲某些政治力量出于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想要更换欧洲的人口结构”。在 2022 年的 CPAC 会议上, 他进一步呼吁, 如果其他西方国家继续实施宽松的边境管制政策, 结果将是“人口替代”^[21]。类似地, 截至 2021 年底, 从墨西哥边境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只有不到 0.2%, 但是当时即将卸任的特朗普仍下令加快隔离墙的建设, 试图保存自己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政绩工程。

需要说明的是, 尽管反移民等民族国家至上话语激增, 与欧尔班和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当权密切相关, 但是这些观点早在他们当选之前便已经有了相对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匈牙利而言, 人们担心随着移民的定居, 匈牙利的身份和民族认同会被消解; 在美国, 这种担忧同样存在, 但不如在匈牙利普遍。与此同时, 两国都对恐怖主义和移民对国民财富的消耗有着共同的担忧^[22]。

(二) 纵向维度: 人民与精英

在纵向上, 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一套人民群众与国内外政治精英的二分对立体系: “人民”通过反对被认为是数量少且不合法的强大“精英”群体, 在话语上被建构为一个庞大的无权群体^[23]。在此基础上, 右翼民粹领导人将自身标榜为“人民”的代言人, 以“否决者”身份利用人民群众对全球化及有关政策现状的不满, 将政治上的竞争者及反对者定义为“腐败的官僚精英”, 并将矛盾加诸其上。民粹主义中天然具有反精英的身份议题特征。弗朗西斯·福山指出, 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家们都将获得尊重的愿望置于人类动机的中心, 身份政治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场为争取尊严而发生的斗争^[24]。而通常情况下, 政治精英们常常对大多数选民所珍视的身份认同不屑一顾。例如, 希拉里·克林顿便曾傲慢地将特朗普的选民描述为一群“可悲的人”^[25]。这也为右翼民粹领导人提供了崛起的政治机会。

匈牙利与美国的右翼民粹势力面临着共同的结构因素。在经济全球化与自由化之下, 发达国家国民的实际工资增长停滞不前; 西方新自由主义为发展中国家勾勒出的发展前景也进一步被金融危机所粉碎, 神话破灭后, 民众的相对被剥夺感进一步增强。而传统的政党几乎没有在危机之后对金融精英施加任何法律制裁, 这让民众更加失望, 视之为助长危机的、金融精英的共谋者^[18]。或者说, 这至少凸显了传统政党的无能与僵化。

在反精英倾向强化背景下, 匈牙利出生的美籍犹太商人乔治·索罗斯无疑会成为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联合重点打击的目标。索罗斯是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 并在匈牙利资助非政府组织, 以向被欧尔班称为“非法移民”的群体提供支持。在匈牙利 2018 年议会选举前后, 欧尔班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对索罗斯的打击, 将其符号化为国际剥削者的代表, 将其形象用于宣传海报, 并通过了“阻止索罗斯”法案。该法案涉及 9 项法律的修改。根据新法律, 为非法移民相关犯罪活动提供资金或者组织相关活动者可被判处一年的监禁, 从事相关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也将被征收 25% 的特殊税款^[26]。类似地, 特朗普也指责索罗斯为“全球权力结构的一部分”, 这一负责经济决策的权力结构“剥夺

了我们的工人阶级，剥夺了我们国家的财富，将这些钱放到了少数人的口袋里”^[27]。此外，匈牙利还以索罗斯为名，回应国际社会对其国内舆论不自由的指控。例如，匈牙利司法部部长茱丽特·瓦尔加（Judit Varga）曾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表示，左翼舆论泡沫试图通过虚假报告诋毁匈牙利，有关组织正试图将匈牙利描绘成一个新闻自由受到无情压迫的地方，而背后予以数十万美元支持的正是索罗斯的基金会^[28]。

（三）综合维度：传统基督教保守主义与现代多元自由主义

呼唤传统基督教文化的回归，不仅是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力量互动的重要议题，更构成民族国家与人民群众身份建构的底层文化基础。具体来说，他们强调文化的纯洁性，倡导传统家庭观与宗教观，并将其进一步与民族国家结合起来。无论是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还是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本身并不必然具备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他们都将自己描绘成社会观念保守、遵循基督教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在美国，特朗普在福音派的支持下掌权，并予以实质性回报，反对堕胎和性少数群体权利并任命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29]。欧尔班更是推动匈牙利新宪法以“上帝”作为国家的参照，将“上帝保佑匈牙利”正式写入新宪法。

在上述准宗教式的意识形态建构下，匈牙利和美国围绕着以传统家庭观为代表的传统基督文化开展了频繁的互动，试图强化传统身份认同，并动员更为广泛的社会光谱。2021 年，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参与了以“家庭价值观”为核心的布达佩斯人口峰会。这一峰会始于 2015 年，是欧尔班倡导的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重要品牌活动，其核心理念是反对西方自由主义、非欧洲移民和 LGBTQ 文化。在会议上，欧尔班声称，西方左翼正在发动攻击，试图使家庭的概念相对化，以性少数群体权利为工具，攻击我们的孩子。他认为，比起将移民作为解决人口挑战的对策，增加欧洲儿童的数量对保存欧洲基督教文化传统才是至关重要的。与欧尔班相呼应，彭斯强调了现如今欧美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直指文明核心的危机。他提出，对核心家庭的侵蚀，其特点是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堕胎率提高与出生率直线下跌。他也利用这一机会，呼吁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推翻美国既有法律对堕胎权的保护^[30]。类似地，美国保守派联盟在 2022 年与匈牙利基本权利中心（Center for Fundamental Rights）共同将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首次引入欧洲大陆，并以“上帝、国家和家庭”的三位一体原则作为会议主题。其中，匈牙利基本权利中心受到了欧尔班政府的支持，并以捍卫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西方生活方式和传统家庭作为其核心原则^[31]。

四、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跨国合作的影响

以匈牙利和美国右翼民粹为代表的跨国互动与合作是近年来民粹主义浪潮中的一个新兴趋势，虽然这一趋势因特朗普的落选而受到一定的冲击，未来走向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其影响已经开始凸显。美匈两国右翼民粹势力的跨国合作，不仅对作为一种思潮的民粹主义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两国的内政以及更广泛的欧美关系也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右翼民粹主义的国际化。近年来，匈牙利与美国的右翼民粹力量超越了其思想内核中隐含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束缚，强化了在跨国层面的互动与合作。在跨国互动的过程中，两国的右翼民粹力量合力建构了共同的民粹议题和跨国的政治空间，这反过来又为团结更广泛的国际民粹力

量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先例, 促进了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国际化。特别是 CPAC 的存在, 为两国右翼民粹的互动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和思想碰撞的理想空间。美国保守派联盟一直试图将 CPAC 引入欧洲, 匈牙利则被视为一个天然的选择。2022 年 5 月, CPAC 首次移师欧洲举办, 并将会址选择在匈牙利, 成为 CPAC 实现跨国影响力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此次会议吸引了 1 500 多人参与, 确立了以“上帝、国家和家庭”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原则, 试图为连接世界各地的保守派提供基本的价值纽带。2023 年 5 月, CPAC 将再次回到布达佩斯举办, 并且以“团结就是力量”(United We Stand) 为主题。根据 CPAC 官网的介绍, 会议将聚焦各国保守力量在国际层面的联合。很明显, 匈牙利和美国不仅试图团结两国的保守派, 也试图在美洲、欧洲和日本、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联合保守主义盟友, 以促进右翼民粹主义的国际化。

第二, 美国政治的“欧尔班化”。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互动, 在形式上体现为欧尔班与特朗普个人关系的密切, 也体现为双方保守力量对彼此国内行动的支持。这种互动和支持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美国政治“欧尔班化”的担忧^[32]。在 CPAC 的发言中, 欧尔班提及匈牙利右翼民粹势力完善了配方, 并想免费提供给世界其他地方的保守党派。事实上, 美国右翼民粹势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匈牙利在国内推动相关议题的经验。从反性少数群体的立法到通过选区划分来影响选举, 再到相关宣传方式的使用, 他们使用的原则和方法与欧尔班的成功路径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一方面, 就选举而言, 欧尔班全力声援特朗普, 并提出“要想获胜, 仅仅知道在为什么而战是不够的, 还需要知道应该如何战斗”。他给出的答案是“按照你自己的规则行事”^[33]。这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特朗普自 2020 年总统大选失败后一直坚持的“选举欺诈论”。事实上, 早在 2002 年欧尔班第一次竞选连任失败后, 其支持者便表示无法接受这一结果, 仍将欧尔班看作“任何选举结果都不能改变的匈牙利人民的合法代表”^[34]。另一方面, 就选举后的议题推进而言, 美国地方层面的相关法律很大程度上以匈牙利的相关法律作为蓝本。在匈牙利通过相关法律, 禁止在学校中进行涉及性少数群体话题的教育之后,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纳德·德桑提斯(Ronald DeSantis)也签署了相关法案。法案禁止该州公立学校向 10 岁以下学童讨论有关多元性别和性别倾向等议题。对此, 桑德提斯的新闻秘书透露, 在编写这一法案时, 他们是以匈牙利相关法律为参照的^[14]。可见, 欧尔班强势的领导风格、对法律和秩序的强调以及在保护匈牙利边境等方面的努力, 对特朗普及其之后的美国保守政治主张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 欧美关系的分化。鉴于在批评欧盟方面的相似立场, 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跨国合作对欧美关系也可能起到分化的作用。这种分化的作用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欧美关系一度跌入冷战结束后的低谷。一方面, 欧尔班政府在民主和法治等根本价值观的问题上, 与欧盟存在深刻分歧, 虽然俄乌冲突暂时掩盖和缓解了双方的矛盾, 但这种分歧在欧尔班执政期间恐怕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 欧盟的强硬立场只会强化欧尔班的反欧盟倾向, 并为匈牙利已然成气候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提供更丰富的土壤。另一方面, 特朗普政府对欧盟的敌视态度与其对欧尔班政府的赞许和支持形成鲜明对比, 传统主流的跨大西洋共识——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和对俄罗斯的孤立等则遭到欧尔班和特朗普的共同挑战。虽然 2020 年特朗普的败选让欧洲松了一口气, 但欧洲对美国保守政党再次执政的疑虑始终存在。这种疑虑也成为笼罩在当前欧美关系上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

五、结语

跨国合作与互动是民粹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当前欧美民粹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尽管右翼民粹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神话，但在实践上它已经成为一种跨国的现象。无论是在欧洲内部还是欧美之间，右翼民粹主义都超越了国家的障碍，在跨国层面进行频繁的互动与交流。作为欧美右翼民粹势力的堡垒，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与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之间的互动对于理解当代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化”与“国际化”议题具有样本意义。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跨国互动，既是基于双方各自发展处境的诉求，也受益于技术层面跨国网络传播的发展。通过跨国互动与合作，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以一种“全球化”的策略推进其“反全球化”议程，试图超越国家层面的局限，实现右翼民粹主义在跨国层面的联合。为此，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围绕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人民与精英以及传统基督教保守主义与现代自由多元主义等维度构建了共同的议题框架和跨国身份，为跨国合作奠定了身份基础。

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的跨国互动不仅在理念上为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共同的思想与价值基础，也在实践层面推动了右翼民粹的国际化。在互动的过程中，美国政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欧尔班化”倾向，在内政与外交的诸多议题上都沿用了欧尔班的“配方”。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也是欧美关系中一支分化的力量，两者在反欧盟上的共同倾向也让欧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的跨国合作也可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层面，也可能影响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右翼民粹政党往往从更加吸引民众的角度出发，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采取更为大胆和务实的对外战略。欧尔班政府近年来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向东开放”战略。这一战略试图进一步增强匈牙利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塑造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与中国的合作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战略的支持下，中匈关系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相反，中美关系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持续恶化，对华强硬成为美国两党共识，这一声音在以特朗普为核心的共和党内甚嚣尘上。就对华态度而言，美国与匈牙利的右翼民粹势力基于各自不同的现实诉求采取了不同政策。由于分歧尚存，对华政策目前尚没有成为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跨国合作的主要议题，但美国右翼并未放弃对匈牙利的持续施压，试图引导匈牙利与中国保持距离，这可能对中匈友好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此，中国应密切关注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跨国互动的趋势与发展，避免在相关议题上成为被针对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玄理.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员策略与未来走向探析[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1(2): 136-144.
- [2] 黄丹琼. 匈牙利民粹主义政治极化[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4): 42-49.
- [3] 项佐涛, 李家懿. 认同政治与利益政治的双建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J]. 欧洲研究, 2020(4): 50-70.
- [4] 弓联兵, 秦清.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化的动因与策略[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0(4): 110-117.
- [5] 石立春, 杨雨林. 21 世纪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发展态势与规律研究[J]. 世界民族, 2021(1): 12-23.

严少华, 李炳萱. 论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合作: 以匈牙利和美国为中心的考察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148-160.

- [6] 胡冀.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大串联”, 意在重塑欧洲? [J]. 世界知识, 2019 (11): 46-47.
- [7] Lili Bayer. Trump-Orbán Bromance Takes Off [J/OL]. (2019-05-03) [2023-02-0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rump-orban-bromance-takes-off/>.
- [8]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Orbán of Hungary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EB/OL]. (2019-05-13) [2023-02-0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ime-minister-orban-hungary-bilateral-meeting/>.
- [9] Donald Trump. Endorsement of Prime Minister Viktor Orbán [EB/OL]. (2022-01-03) [2023-02-08]. https://saveamerica.nucleusemail.com/amplify/v/TFhcK9qrPq?hids=kPXgFJAl&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ncl_amplify&utm_campaign=20220103-endorsement_of_prime_minister_viktor_orban&utm_content=ncl-hW3WFbqVZy&_nlid=hW3WFbqVZy&_nhids=kPXgFJAl.
- [10] Manuela Caiani. Radical Right Cross-national Link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radical right, 2018: 394-411.
- [11] Zoltan Simon. Trump Victory May Be Best for EU, Maverick Hungarian Leader Says [N/OL]. (2016-07-23) [2023-02-0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07-23/trump-victory-may-be-best-for-eu-maverick-hungarian-leader-says>.
- [12] Zoltan Simon. Hungary's Orban Says Trump Invited Him to U.S. to Reset Ties [N/OL]. (2016-11-25) [2023-02-0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11-25/trump-said-to-invite-black-sheep-hungarian-premier-to-u-s>.
- [13] Peter Eisler. U.S. Conservative Conference with Hungary's Hardline Leader Reflects Republican Divide [J/OL]. (2022-04-05) [2023-02-08].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us-conservative-conference-with-hungarys-hardline-leader-reflects-republican-2022-04-05/>.
- [14] Terry Gross. How the American Right Became Aligned with Hungary and its Authoritarian Leader [N/OL]. (2022-07-13) [2023-02-08]. <https://www.npr.org/2022/07/13/1111274698/how-the-american-right-became-aligned-with-hungary-and-its-authoritarian-leader>.
- [15] Anna Grzymala-Busse. Orbán Inspires GOP Authoritarians, But They Can't Copy Him [J/OL]. (2022-11-02) [2023-02-08]. <https://www.niskanencenter.org/orban-inspires-gop-authoritarians-but-they-cant-copy-him/>.
- [16] Sven Engesser, et al. Populism and Social Media: How Politicians Spread a Fragmented Ideology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7 (8): 1109-1126.
- [17] Terry Flew, Petros Iosifidis. Populism, globalisation and social media [J].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20 (1): 7-25.
- [18] John Sculom, The Transnational Diffusion of Populism [J/OL]. (2017-04) [2023-02-08]. https://www.cidob.org/en/articulos/cidob_report/nl_1/the_transnational_diffusion_of_populism.
- [19] Lili Bayer, Viktor Orbán's Revision of the 1956 Revolution [N/OL]. (2016-10-23) [2023-02-0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viktor-orbans-revision-of-the-1956-revolution/>.
- [20] Abdul Noury, Gerard Roland.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pulism in Europe [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 Science, 2020 (23) : 421-439.
- [21] CPAC Hungary. Prime Minister Orbán' s Keynote Address [EB/OL] . (2022-05-05) [2023-02-08] .
<https://www.cpachungary.com/en/>.
- [22] Eve Cervenka. Public Opin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ungary:How Trump and Orbán have Manufactured the Debate over Refugees [J] .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cape Journal, 2020 (1) : 9.
- [23] Sabine Volk. Speaking for “the European People” ? How the Transnational Alliance Fortress Europe Constructs a Populist Counter-narrative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J] . Politique européenne, 2019 (4) : 120-149.
- [24]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M]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 [25] Andrés Velasco. Popul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J] . LSE Public Policy Review, 2020 (1) .
- [26] 匈牙利国会通过“阻止索罗斯”法案[EB/OL] . (2018-06-21) [2023-02-08] .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21/c_1123015562.htm.
- [27] Zoltan Simon. Hungary Plans to Crack Down on All Soros-Funded NGOs[N/OL]. (2017-01-10)[2023-02-0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1-10/trump-s-win-prompts-hungarian-call-for-crackdown-on-soros-groups>.
- [28] Justice Minister:George Soros Is Behind Fresh Attacks on Hungary[N/OL] . (2021-07-06) [2023-02-08] .
<https://abouthungary.hu/news-in-brief/justice-minister-george-soros-is-behind-fresh-attacks-on-hungary>.
- [29] 徐以骅. 基督教福音派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J] . 当代世界, 2020 (5) : 39-45.
- [30] Ishaan Tharoor. The GOP Alliance with Europe' s Far-right [J/OL] . (2021-10-12) [2023-02-08]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1/10/12/republican-alliance-europe-far-right/>.
- [31] CPAC Hungary. Miklós Szánthó' s Speech at CPAC Hungary [EB/OL] . (2022-05-05) [2023-02-08] .
<https://www.cpachungary.com/en/>.
- [32] Ishaan Tharoor. The Orbanization of America: The US right walks in Hungary' s path[N/OL]. (2022-05-17) [2023-02-08]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5/17/viktor-orban-american-right-il-liberal-orbanization/>.
- [33] Mark Niquette. Orban Is an Outsider in Europe. At CPAC, He Fits Right In [N/OL] . (2022-08-04) [2023-02-08] .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8-04/orban-is-an-outsider-in-europe-at-cpac-he-fits-right-in>.
- [34] Andrew Marantz. Does Hungary Offer a Glimpse of Our Authoritarian Future? [N/OL] . (2022-07-04) [2023-02-08] .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2/07/04/does-hungary-offer-a-glimpse-of-our-authoritarian-future>.

责任编辑：林华山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题脉络与进路展望

——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何旗 王婷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成为近年来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通过对1991年至2023年1月CNKI收录的639篇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发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在2018年后迅速由冷转热，研究议题从单一走向多元，研究方法由浅层思考走向多学科、专业化的深度阐释，整体研究状况由稚嫩走向成熟，由零散走向系统，并逐渐形成了以生成逻辑、主体构成、独特优势、治理效能、国际话语建构、完善路径等为核心主题的研究热点。深度考察和理性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有研究的文献规模、研究力量、来源期刊、热点议题等发现，既有研究亟待突破的问题包括研究对象同质化、研究议题抽象化、学科视角单一化及研究方法失衡化等。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学理性探究、跨学科研究和扎根中国实践的研究，推动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走向深化。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知识图谱；研究热点；前沿趋势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2-0161-18

DOI：10.13946/j.cnki.jcqi.2023.02.014

作者简介：何旗，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农村党建中心特约研究员；王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领导能力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和经验研究”（21&ZD045）

引用格式：何旗，王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题脉络与进路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61-178．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伟大的政治创造。2018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联组会上明确将这一政治制度概括为“新型政党制度”，并以“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精辟论述了其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这一论述旋即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强烈关注和广泛讨论，促使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主题的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本文基于科学计量分析和可视化知识图谱对国内学界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分析，客观揭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现实图景，反思与总结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与发展进路，以期科学把握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提供参考。

一、研究工具与数据来源

近年来，基于 CiteSpace 软件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成为国内学界梳理某一研究领域历史演进、总结当前现状图景和分析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方法。本文使用这一研究方法，在数据处理和方法步骤上都严格按照既定要求，以便能够得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相关知识图谱。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在数据检索过程中，检索方式采用高级检索，相关参数设置如下：篇名=“新型政党制度”，检索条件=“精确”。为保证研究能够系统反映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最早成果与最新成果，未限定检索的前置年限与后置年限，具体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31 日。由初步检索可知，最早于 1991 年国内学界开始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命题，故本研究的有关文献时间范围选定为 199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初步获得期刊文章 674 篇。为降低研究误差，笔者对初步检索所得文献进行人工校对与筛选，剔除其中期刊导语、报纸摘编、会议综述、新闻报道、人物访谈和重复文献，共得到有效样本文献 639 篇。将样本文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后，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规范化处理，如规范相关同义词、缩写词，合并部分相似关键词，最后经格式转换后导入 CiteSpace 软件，生成相关知识图谱。

（二）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使用 NoteExpress 软件对 199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期间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年发文量的数量分布、核心作者群的发文量与发文量的期刊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其次，运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基于 Java 语言开发的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6. 1. R6(64-bit)梳理样本文献数据，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直观呈现关于本研究领域热点主题的信息图景^[1]。最后，基于 CiteSpace 共词分析，以余弦指数测度关键词的共现强度，借鉴 Callon 等构建子簇的方法进行聚类分析，进一步绘制新颖度与关注度战略坐标图，以系统地呈现当前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领域的热点结构，展望该领域未来研究趋势。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脉络与外部特征

文献数量等外部特征能够反映某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热度，其在时间轴的变化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核心作者群情况反映该领域学术共同体发展的成熟度，文献来源期刊的层次与质量反映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程度，文献关键词的频次与聚类分布则反映学者对该领域内各项议题的研究兴趣与完善程度。基于此，本文从时间、空间与内容三重维度来探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热点分布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时间维度：文献数量迅速增长，研究热度持续攀升

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走过 70 余年历程，但从相关文献呈现时间看，学界将这一制度称为“新型政党制度”并展开正式研究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的。由图 1 可知，2018 年和 2020 年是该主题研究历程中相关论著发表量的重要拐点，据此大致可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历史脉络划分为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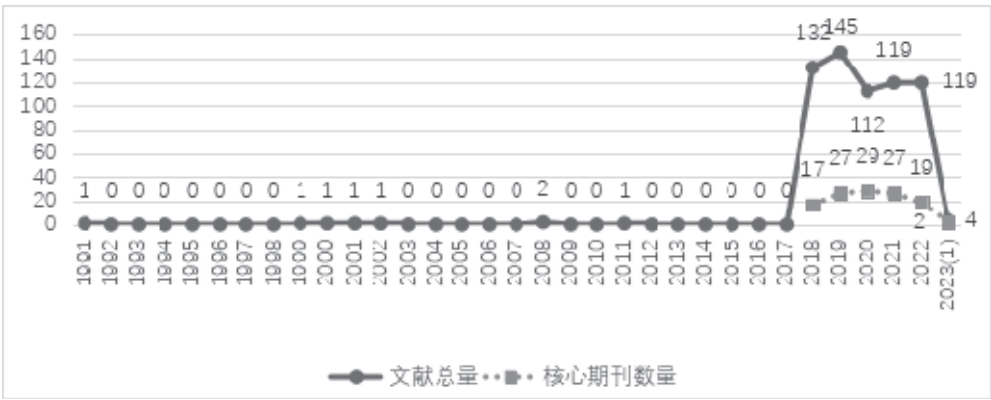


图 1 1991 年 1 月—2023 年 1 月 CNKI 来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献的年代分布

1. 萌发期（1991—2017 年）

在这一阶段，国内并未出版“新型政党制度”有关论著，相关期刊论文累计发文量只有 8 篇，且许多年份发文量为 0。1991 年，郭尚华在《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上发表题为《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思考》一文。该文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探究“为什么中国必然会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如何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2]。据目前所能掌握文献看，这是国内首篇使用“新型政党制度”一词的专题论文。另从 CNKI 搜索获得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题论文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然性》（周秋光，1999）、《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初探》（谢佑卿，2000）、《中国政党制度是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新型政党制度》（牟光平，2008）等。此时，少数学者开始从政党制度视角看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从必然性出发希冀回答“中国为什么能且仅能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问题，进而论证这一政党制度“正是中国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政党模式”^[3]。但该时期累计发文量较少且多数年份发文量出现“断层”。这反映出在很长一

段时期内,学界大都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视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予以考察,并未从学理层面将其视为我国一项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的新型政党制度进行探究。

2. 激增期(2018—2019 年)

自 2018 年起,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著陆续出版,期刊论文呈爆发式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年发文量于 2018 年开始激增,于 2019 年达到最大峰值,该阶段累计发文量约占发文总量的 43%。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编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识》(2019)、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编的《“五一口号”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2019)。另据 CNKI 检索数据可知,2018—2019 年间“新型政党制度”主题相关的被引次数较高且具代表性的论文有:《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周淑真,2018)、《嵌入型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国家治理——基于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发展经验》(艾明江,2019)、《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邓晶艳、代金平,2018)。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学界之所以高度关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问题,一方面在于中央正式提出“新型政党制度”命题并作出系列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4]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长期实践,正式以“新型政党制度”这一理论形态出场,极大推动着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使得 2018 年发文量激增。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日臻完善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亟须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提炼与升华,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以推动该制度实践的发展。对此,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5]尔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再度强调,要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成国家治理效能^[6]。因而,如何发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并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成为此时学术研究的新兴热点。由此,经过两年来的热烈探讨,学界普遍达成这样一个共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符合当代中国实际且具有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

3. 升华期(2020 年—现在)

这一阶段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系统性论著增多,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徐峰、高国升著的《正谊明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何以为新》(2021)、中共中央统战部著的《伟大的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2022)。这些论著大都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基础性的说明与介绍,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某一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分析的专著较少。从期刊论文看,这一阶段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发文量有小幅波动,2020 年发文量相比 2019 年的高峰期略有回落,而后于 2021 年、2022 年达高位持平,其间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献总量为 354 篇,约占总发文量的 55%。相较于前一阶段,热度渐减但仍受关注。其中被引次数较高、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优势》(齐卫平、柴奕,2020)、《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及其发挥——人民政协视角的分析》(罗峰,2020)、《国家治理场域中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基于新时代中

何旗,王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题脉络与进路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61-178.

国话语建构的视角》(阙天舒、方彪,2021)。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之所以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发文的小高峰期,是因为恰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全景式勾勒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程,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为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也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模式”^[7]。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自信,促进了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认同。

总之,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在研究数量方面,从零星走向丰富;在研究议题方面,从单一走向多元;在研究方法方面,由浅层思考走向多学科、专业化的深度阐释;整体研究状况由稚嫩走向成熟,由零散走向系统。

(二) 力量维度：核心作者群尚未完全形成，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度有待提高

分析作者群与发文期刊等研究力量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现状,同时有利于发现和掌握该领域科研动向。根据普赖斯定律(Price law),同一研究主题中,半数论文为核心作者所撰且核心作者数量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平方根,这标志着该研究领域的成熟^[8]。据CiteSpace软件统计显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领域作者最高发文量为12篇,因此取发文量≥4篇的前23名核心作者群进行考察(如表1所示)。核心作者共发文120篇,约占总量的18.8%。这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该研究领域仍处于发展阶段。从核心作者群所属机构来看,集中为党校、社会主义学院与高校中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院等两大类。另据NoteExpress软件统计显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领域639篇文章涉及作者611人,多数研究者属于独立进行研究,显示作者间的合作关系较弱,呈现出各自为战的状况。

表1 1991年1月—2023年1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核心作者及其所属单位分布

序号	作者	篇数	单位	序号	作者	篇数	单位
1	华正学	12	浙江财经大学	13	齐春雷	5	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
2	臧秀玲	9	山东大学	14	黄天柱	4	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
3	王小鸿	7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15	吴智楠	4	华南师范大学
4	张献生	6	中央统战部	16	梁晓宇	4	中共涪陵区委党校
5	张师平	6	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	17	周淑真	4	中国人民大学
6	许奕锋	5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18	周云莲	4	华中师范大学
7	林怀艺	5	华侨大学	19	康 杰	4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8	蒋 锐	5	山东大学	20	崔晓彤	4	中共辽阳市委党校
9	张 毅	5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	21	丁仲礼	4	全国人大常委会
10	王晓璐	5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22	钟德涛	4	华中师范大学
11	钱再见	5	南京师范大学	23	徐 锋	4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12	王彩玲	5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文献来源期刊的层次和质量反映学术共同体对该领域的研究程度。据 NoteExpress 软件统计显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领域涉及期刊 183 种,刊文量前 14 的期刊如表 2 所示。它们累计发文 269 篇,约占总文献的 42%。与核心作者群所属机构集中于社会主义学院、党校相对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领域的期刊也多集中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政协与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期刊。它们大都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策划专题栏目,如《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自 2019 年起便开设“新型政党制度专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于 2018 年第 5 期、2022 年第 2 期分别设置“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专题,体现出学界对新型政党制度与统一战线工作联系的密切关注。重庆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统一战线学研究》,持续对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进行策划和出版。但多数专业度高、权威性较强的学术期刊并未开设相关专栏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多是在相关政治学研究与党建研究专题下进行零星探讨,高层次研究成果仍偏少。

表 2 1991 年 1 月—2023 年 1 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领域刊文量排名前 14 期刊

序号	期刊	篇数	序号	期刊	篇数
1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34	8	中国政协	15
2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34	9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4
3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5	10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4
4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5	11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3
5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4	12	统一战线学研究	13
6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6	13	社会主义研究	13
7	甘肃政协	16	14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3

（三）内容维度：热点主题网络初步形成，潜在研究热点有待深入挖掘

1. 关键词共现分析：核心议题高度聚焦，热点议题分布广泛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的主要功能是对输入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和生成共现矩阵,据此获得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具体步骤如下:（1）对从 CNKI 搜索所得的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领域的文献数据导入 NoteExpress 进行筛选、去重与梳理。（2）对文献数据的关键词进行规范化处理,将关键词的同义词或缩写词进行规范,部分关键词进行大类合并,如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规范为“新型政党制度”,“共产党”规范为“中国共产党”。（3）对软件参数进行设置,设置“Time Slicing”为“1991 年 1 月—2023 年 1 月”,以 1 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分析对象选择“keyword”,阈值设置为 TopN%=15%,运行结果生成 1991 年 1 月—2023 年 1 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2 所示)。同时,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是衡量其受关注度与重要性的重要指标。本研究运用 Cite Space 软件的词频分析功能得出 1991 年 1 月—2023 年 1 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前 26 个)(如表 3 所示)。

何旗,王婷.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题脉络与进路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161-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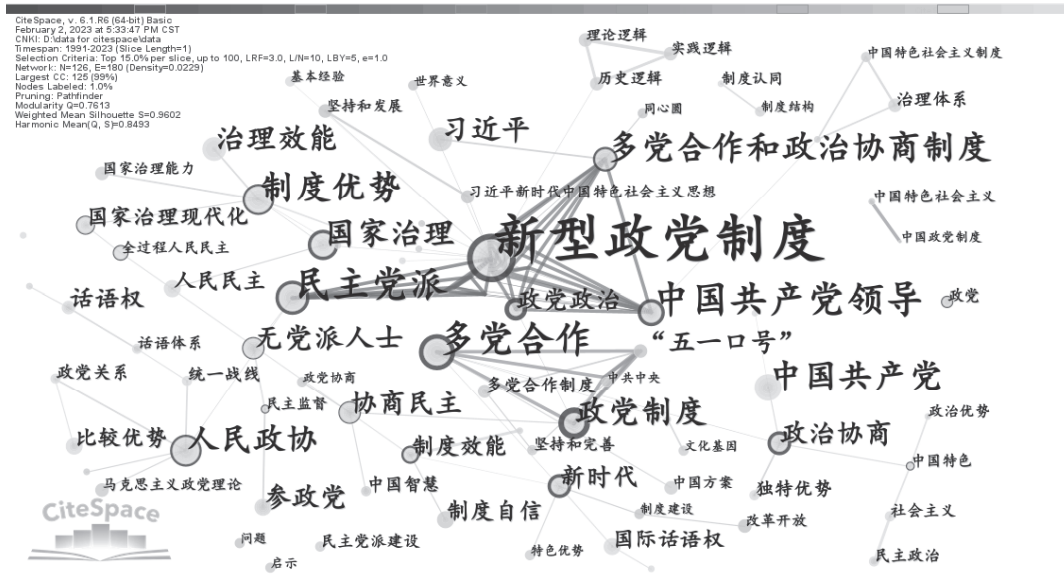


图2 1991年1月—2023年1月CNKI来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3 1991年1月—2023年1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前26个）

序号	关键词	首现年份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首现年份	频次
1	新型政党制度	1999	571	14	协商民主	2018	21
2	多党合作	2008	75	15	参政党	2018	20
3	民主党派	1999	71	16	政治协商	2018	20
4	中国共产党领导	1999	69	17	“五一口号”	2008	18
5	制度优势	2018	53	18	新时代	2018	16
6	中国共产党	2018	47	19	政党政治	2002	16
7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002	47	20	话语权	2018	15
8	国家治理	2019	38	21	制度效能	2018	13
9	人民政协	2018	35	22	制度自信	2018	12
10	政党制度	2008	34	23	比较优势	2019	11
11	治理效能	2020	28	24	国家治理现代化	2020	11
12	习近平	2018	25	25	人民民主	2019	11
13	无党派人士	2018	24	26	国际话语权	2019	10

通过表3中的高频关键词可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与现实性，受到较高关注度的议题多是在2018年及以后提出的。具体结合图2而言，学界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题，形成了“多党合作”“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优势”等相互关联的中心放射型研究主题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延伸探讨了众多议题。但相比核心议题的高频高热度，其他热点议题的频次与热度相对较低，与其相关的文献多是从相近视角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研究，并未形成一定

的规模。

2. 关键词聚类分析：研究议题多聚焦制度本身，研究细化程度有待加深

为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前沿和趋势认知更加清晰，本文借鉴 Callon 等构建子簇的方法，将基于 CiteSpace 所得的 126×126 关键词共现矩阵划分为 26 个聚类。考虑到由两个关键词构成的聚类难以准确地反映其代表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因此删除这类聚类，最终得到有效聚类 17 个。每个聚类根据其所包含的关键词，概括出聚类的名称。17 个聚类代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领域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向，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 4 1991 年 1 月—2023 年 1 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领域聚类构成

序号	聚类名称	聚类成员
1	制度主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 民主党派 多党合作制 政党模式 历史必然性 现实必要性
2	制度发展历程	政党制度 多党合作制度 政治协商制度 多党合作 “五一口号” 中共中央
3	制度必然性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政党政治 民主革命时期 同盟会 国民党一党专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必然性
4	制度效能	制度效能 制度自信 新时代 路径 参政议政 全过程人民民主
5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 人民政协 政党关系 政治引领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话语体系
6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新型政党 政治协商 “中国之治” 和合文化
7	制度优势	制度优势 制度价值 国家治理 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能力 效能转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 发展逻辑 人民民主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
8	参政党	参政党 无党派人士 民主监督
9	协商民主	政党协商 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坚持和完善
10	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 评价标准 新发展理念
11	生成逻辑	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
12	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 人类政治文明 中国特色
13	制度目标	治理体系 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4	西方政党制度	西方政党制度 政党 历程 启示
15	制度认同	制度绩效 制度认同 制度结构
16	文化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基因 创新发展
17	发展路径	发展与安全 效能提升 路径研究

新颖度与关注度战略坐标图是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以各聚类的新颖度和关注度指标为依据绘制的二维平面图，用可视化的形式呈现每个聚类的象限位置及变化，继而分析当前领域的研究热点结构及其发展变化。新颖度指数代表每个聚类中各关键词成员的平均共现时间与全部关键词平均共现时间的离均差，负值表示该聚类研究起始时间较早，正值表示该聚类研究起始时间较晚；关注度指数代表每个聚类的平均共现频次与全部关键词平均共现频次的离均差，负值表示该聚类研究内容受关注程度较低，正值表示该聚类研究内容受关注程度较高^[9]。根据前文所得的 17 个聚类，通过计算各聚类的关注度指数和新颖度指数建立战略坐标图，具体如图 3 所示。

何旗,王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题脉络与进路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61-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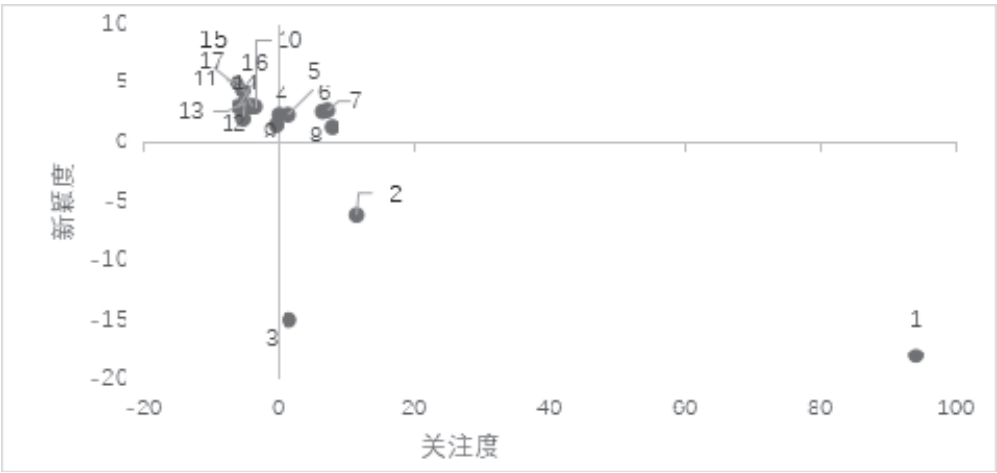


图3 1991年1月—2023年1月CNKI数据库中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领域的战略坐标图

战略坐标图以关注度为横轴，新颖度为纵轴，共分为四个象限。如图3所示，从聚类总体分布来看，在上述17个聚类中，5个聚类位于第一象限，9个聚类位于第二象限，3个聚类位于第四象限。大部分聚类位于第一、二象限，说明“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命题当前处于研究的黄金期，受关注度较高，潜在研究动力强劲。综上所述，可以把各聚类议题划分为三类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热点，分别是基础型研究热点、核心型研究热点与潜在型研究热点。

第一类是基础型研究热点。基础型研究热点位于战略坐标图第四象限。该象限的3个聚类关注度 >0 ，而新颖度 <0 ，表明其所代表的内容在1991年1月—2023年1月期间虽然不是研究的新发热点，但是关注度一直较高。其具体包括“制度主体”“制度发展历程”“制度必然性”等相关内容。

第二类是核心型研究热点。核心型研究热点位于战略坐标图第一象限。该象限的5个聚类关注度和新颖度均 >0 ，表明其所代表的内容在1991年1月—2023年1月期间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领域较为成熟，属于研究热点和核心内容。其具体包括“制度效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制度优势”“参政党”等相关内容。

第三类是潜在型研究热点。潜在型研究热点位于战略坐标图第二象限。该象限的9个聚类关注度 <0 ，而新颖度 >0 ，表明其所代表的内容是1991年1月—2023年1月期间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领域潜在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热点或将成为今后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其具体包括“协商民主”“话语权”“生成逻辑”“民主政治”“制度目标”“西方政党制度”“制度认同”“文化渊源”“发展路径”等相关内容。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热点透析

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献外部特征的定量分析在宏观上展现了该研究的整体状况，但深入解读该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与聚类分布特征离不开对研究内容尤其是热点议题的定性分析。为此，本文结合关键词图谱与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的内容分析，梳理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以

下热点主题。

（一）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

围绕“如何理解新型政党制度是生长于中国土壤的制度”这一命题，学界立足于中国大地，从理论渊源、文化根脉、历史根基三个维度切入，研究阐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中国式生成逻辑。

其一，理论渊源：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任何理论的生成都不是一座“飞来峰”，而是必须从已有思想材料出发。从理论上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及其中国化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吕楠指出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10]。赵婷、蒋锐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对政党理论、民主理论与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在政党理论中深化了政党类型划分的理论认识，引入政党制度分类的新变量；在民主理论中扩充了民主意蕴，丰富了民主形式；在国家治理理论中扩展了嵌入式治理理论，丰富了协同治理内涵^[11]。

其二，文化根脉：吸纳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任何一种政党制度都带有本国独特的文化基因。新型政党制度是政党文化的结晶，必然要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王成、李珊珊认为“和合”文化中包括的和谐相生的自然观、中庸平和的道德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等内容贯穿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过程、制度结构与理论体系之中，使整个制度呈现出鲜明的“和合”价值取向^[12]。梁杰皓、丁俊萍指出“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思想基础，为其出场提供了思想支撑和政治基因^[13]。

其三，历史根基：承接和赓续中国政党政治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政党制度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而是植根于具体的历史实践。对此，学界从两种视角展开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回溯。一是对近代中国政党模式的摸索。尚同认为近代中国政党制度经历了一个照搬西方政党制度、一党独裁和多党合作的动态演化过程。无论是民国初年多党政治的探索，还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共同选择^[14]。二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的开拓创新。政党制度既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中天然“长”成的，更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奋力“做”成的。钟德涛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视角进行考察，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孕育、形成、确立、发展和定型^[15]。

（二）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构成

与西方国家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从而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生动局面。为此，学界高度关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体在政治体制运作过程中的定位、主体关系等问题。

其一，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格局中共产党领导与执政地位的探讨。周淑真从历时性角度展开分析，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制度问题上的领导力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契合，是通过在“长”和“做”之间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实现的^[16]。董树彬运用共时性叙事手法，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过程中同其他微观政治主体互动并实现了对其他政治主体理论、实践和制度三个层面的全面超越，确立了自身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17]。

其二，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格局中民主党派参政党地位的分析。基于政党制度结构范式的分

何旗,王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题脉络与进路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61-178.

析视角,张春满、郑鑫指出新型政党制度包含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间多党合作的主范式和民主党派内部良性竞争的次范式,长期稳定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内部的良性竞争超越了西方政党政治的短期有限合作、恶性竞争和否决体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创新^[18]。黄天柱从无党派人士角度出发,强调无党派人士参加多党合作有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大特色,具有独特的功能价值^[19]。

其三,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格局中党际关系的比较阐释。崔珏从理论层面对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这些制度主体的内涵与定位进行提炼和归纳,认为政党概念、属性的不同决定不同政党的政党建设目标不同,但协商民主方式和合作性政党关系也决定了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具有相关性^[20]。熊光清、蔡正道从结构、规则和关系三个层面剖析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形成的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和相互监督的政党关系是对西方国家竞争性和对立性政党关系的超越,是一种以协商和合作为核心的新型政党关系^[21]。

(三) 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新命题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政党制度由原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演进为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由“特色”到“新型”诠释着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传统政党制度和旧式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就此,学界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土优势和比较优势两条路径之“新”展开了讨论和分析。

其一,从本土视角出发阐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历史的考察,蒋锐、杨森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日益彰显出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政治与社会和谐稳定、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强化监督和减少腐败等独特优势^[22]。基于对内涵、演进逻辑和结构要义的分析,周淑真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显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这三重关系上更为负责任和有效率^[23]。李军刚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构建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新型结构关系,在机制层面包含利益表达机制、政党协商机制、决策施策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在效能层面发挥共识达成效能、优化决策效能、高效执行效能、维护稳定效能,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并最终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24]。

其二,从比较视角出发揭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最合乎中国国情,还体现在与他国政党制度进行横向比较时,具有“我有你没有、我能你不能”的政治特质和政治优势^[25]。就此,杨德山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分别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以及中国旧式政党制度进行比较,深入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理论、实践和制度上的“新”之所在^[26]。高立伟以新型政党制度如何回应政党政治的价值追求、民主政治和制度效能三大核心命题为切入点,论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强调其为世界政党政治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27]。龚少情以中西政党制度比较视角,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对西方政党制度的双重超越,丰富了世界政党制度的类型^[28]。

(四) 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

治理效能反映制度构成要素的互动关系及其变化,是制度优势发挥程度的关键变量。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成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彰显着多重治理效能。目前，学界对其治理效能的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切入。

其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体现。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间具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有助于推动我国治理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成果能更好地彰显与反哺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推动这一政治制度成熟定型。方雷、崔哲以政治过程的动态分析为视角，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引领、政治整合、政治协商过程的有效运作中体现出“人民本位”的利益代表、多元互动的利益整合与有效参与的利益实现三大治理效能^[29]。魏晓文、秦雪从政党制度与治理效能的逻辑关系出发，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独特优势集中彰显了凝聚国家治理目标和道路共识、提升国家治理主体的社会整合力、保障国家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国家治理效能^[30]。许奕锋继而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其政治效能、共识效能、整合效能及制度效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定向、善治、聚力和规范等独特的治理效能^[31]。

其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提升路径。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推进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尤为重要。臧秀玲、刘华超认为需立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善协商民主机制，巩固和维护依法治理格局，不断增强党的人民利益代表性、巩固和发展和谐的政党关系、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32]。王萌、柏维春以政党制度中主体结构耦合的内在稳定性和要素互动的有效性为逻辑起点，提出聚焦政党主体建设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可行路径，即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化民主党派的责任意识和加大多党合作的制度供给，提升作为组织平台的人民政协建设水平^[33]。齐卫平、柴奕提出需完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同其他方面制度的衔接，发挥这一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具体效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34]。

（五）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建构

长期以来，由于政党起源于西方，一些人认为西方政党制度是先发性的、内生的，中国政党制度是后发的、外生的，因而中国大地上生发的政党制度被排斥在世界政党谱系之外。作为实践形态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尽管已然形成，但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尚处构建进程之中，呈现出实践先于理论话语的状态。“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新’深刻地揭示出来，进而形成新的政党制度理论，创建新的政党制度话语，用中国先进的政党制度理论和话语表述充实世界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迫切任务。”^[35]为此，学界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内涵与价值展开了研究。杨松禄认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就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解释权、表达权和引导权。”^[36]孙林从制度学习与变革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制度形式结构、政党关系模式与制度运行机制三方面的变革，突破了传统政党制度类型学的理论分类，由此实现了对建基其上意识形态和舆论话语霸权的突破^[37]。

在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现状基础上，学界更多地以问题为导向，对“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困境与路径”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与探讨。赵云指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建设面临“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话语体系、政党文化发育不成熟、政党制度理论不完备、传播

何旗,王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题脉络与进路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61-178.

工作不到位等四方面的困境^[38]。面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滞后现象,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是等不来、靠不来的,只有积极地去建设、勇敢地去争取。基于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转换的审视,华正学提出“话语表达要使用独具魅力的中国话语、要遵循政党话语的规范、做到守正创新”,由此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影响力^[39]。臧秀玲提出,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从话语体系、话语主题、传播方式、话语环境着力探索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实践路径^[40]。

(六) 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路径

历史与实践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智慧的政党制度,但这并不是说这一制度已完全成熟定型。相反,它在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同时仍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其一,在理论体系上,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科学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就此,徐凤月、孙壮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新定位,提出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创新在于两方面:一是在现有理论基础上结合新型政党制度相关议题进行探索与深入分析;二是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怎样高质量地建设好这一政党制度”这一理论命题形成完善的政党理论体系,厚植新型政党制度理论根基^[41]。

其二,在主体优化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化民主党派能力建设。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是新型政党制度主体建设的一体两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其中,执政党建设是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参政党建设是主攻方向和发力重点。就执政党建设看,孙文飞、王立峰认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着眼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注重政治共识建设三方面^[42]。就参政党建设来说,蔡宇宏提出参政党自身参政议政和主体监督能力的提高,应主要着眼于树立和强化政党主体意识、充分了解社情民意以出好实招、激发组织活力三方面^[43]。

其三,在载体建设上,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以人民政协的政治定位为出发点,刘家强认为发挥好人民政协制度平台作用首先要在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中,不断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共识度;其次要着力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最后要推动政协协商与政党协商的有机衔接,在协商中广泛凝聚共识^[44]。罗峰认为,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人民政协具有政治性、群众性、协商性、专门性和制度性的结构特征,要通过人民政协进一步彰显蕴含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代表性、动员性、整合性以及包容性等优势^[45]。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薄弱之处与突破路径

运用科学计量分析方法和可视化图谱的分析表明,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为相关议题的深化研究做了较好的学术积累。但是深度考察和理性分析既有研究的数据、图谱、战略坐标图等发现,既有研究仍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亟待学界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一）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不相匹配，学理性探究亟待加强

如前所述，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命题的新论述，成为推动我国政党制度发展、加强多党合作研究的关键节点。针对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到“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演进，学界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为明显的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不相匹配现象，学理性探究亟待加强，整体成果质量有待提高。CNKI 所收录的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期刊论文在 2018 年以前几乎是空白的，在 2018 年“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命题正式提出后，相关学术论文呈井喷式增长，高达 639 篇，但其中高质量的核心期刊论文仅 121 篇。从研究质量看，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多是经验性、解释性研究，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看作“政治话语”，以解读、论证、宣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讲话、党中央发布的相关文件为主，偏重文本的宣传性与解读性。从聚焦议题看，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生成逻辑与特色优势的肯定性研究成果较多。这些研究成果对帮助人们科学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演进逻辑、制度优势、理论意蕴与实践价值等问题积累了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夯实新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加强多党合作的民意基础、社会认同，凝聚统一战线正能量。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当前政策解读成熟的研究状况，学界也应注意到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领域有深度的学理性研究成果较为缺乏，学理性分析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研究重心理应转向更高层次的学理探究。所谓更高层次的学理探究，就是要摒弃和克服低水平、同质化、碎片化研究，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科学性，注重对逻辑理路和客观规律的理论探索，善于从政理、法理、哲理维度作出更加体系化的归纳和阐释。

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基础理论的研究，夯实理论根基。在学理上探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推进该领域研究学术化转向的重要标志。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普遍政治现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体现类型创制的世界性和文明意义，就需要有完善的理论体系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发生的政治活动和现象的普适性和独特性进行解释和分析。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体系已基本确立，但对于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究，如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关核心概念的源流考释与话语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多党合作制度的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角色定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契合互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新困难与新任务必然要求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下一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基础理论研究的工作重点是从本国国情出发，运用中国的政党理论解释中国的政治现象，引领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的研究，拓展研究视野。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现实政治议题，同时也要更加关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不仅要关注对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探究与反思，同时也要更加关注基于中国经验的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不仅需要掌握制度体系的宏观性，同时也要剖析相关机制和具体行动的中观性和微观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包含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两大方面，还涉及利益表达、政党协商和民主监督等相关机制的运行。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队伍规模、成员结构、组织网络都将不断发生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也会随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因此，在坚持根本原则和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

何旗,王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题脉络与进路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61-178.

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体制,推进多党合作的制度化建设,发挥多党合作的制度效能,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以及构建民主党派干部培养选拔使用机制等都需不断完善。这些具体的实践议题也都应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二) 研究力量与研究表现力状况不相匹配,跨学科研究队伍亟待建立

众所周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萌芽于近代以来中国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革命斗争中,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内容日益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这项制度也面临理论研究不足、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内容趋同、参政合力不强、参政机制不健全、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认识不到位、履职能力不够等不足。面对上述状况,亟须建设一支高素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队伍,开阔研究视野,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持续研究注入活力。然而,从既有研究力量和期刊分布状况来看,当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领域核心作者群尚未完全形成,作者、研究机构与期刊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经验共享尚不够充分有效。合作不足导致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纵深发展的后劲不足,专业度高、权威性强的学术期刊缺位导致高质量研究成果相对缺乏。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关键在于政党责任担当,既需要执政党的坚强领导,也需要参政党的力量支撑,即需要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这就需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领域的作者群进一步增强学术共同体意识,以中国政党政治实践为基础,以学术活动为纽带,聚焦问题研讨与理论创新,共同思考、交流、对话和合作,在良性互动中激发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热点问题的研究热忱,在个人智慧与共同体力量的双重驱动下推动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繁荣发展。一方面,增强学科融合意识,运用交叉学科知识加强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要将不同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形成跨领域的交流与对话,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与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相结合,选择不同的学科视角去考察新型政党制度。另一方面,推动方法论的拓展与求新,综合定量与定性等多种研究方法,增强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成果的学术表现力。纵观当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状况,受限于研究力量的单一,研究方法上也多以定性研究、文本分析和概念阐释为主。如从领导人讲话和相关政策文本出发进行宏观阐释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基于地方多党合作实践、协商民主以及民主党派成员等的实证研究较少。单一研究方法的运用无疑会限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活力的迸发。为此,可以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量化研究、实证分析等方法作为定性研究与文本分析法的补充,如构建一个可量化的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某个领域或某一地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实践经验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了解等。

(三) 理论与实践不相匹配,研究成果要扎根中国大地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身处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变局中,尤其是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会遇到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各种风险与挑战,这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深化拓展提供了现实的需求与广阔的空间。但从新型政党制度的既有研究来看,理论与实践并未保持一致步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研究总体上落后于实践。这种滞后不仅体现在理念层面,而且还表现在学术研究上。

一方面,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更多是从“基本政治制度”或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维度去考察中国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还是一种产生于中国土壤,且历经考验并臻成熟完善的世界范围内的新型政党制度,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嵌入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架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功能作用集中体现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价值功能,实现优质高效发展的社会价值功能,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文化价值功能,实现团结和谐稳定的安全价值功能,探索人类社会更好政治制度的道路价值功能^[46]。但学界近乎只在 2018 年正式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命题后,才开始对这一制度进行阐释与研究,整体的理论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反观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强烈反差,当今通行的政党政治学也还未能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充足的学术支撑。有的研究用西方政党政治概念裁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故事”,更无法从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实践出发探索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为此,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是中国政党屹立于世界政党之林、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掌握话语权的客观需要。

另一方面,学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理论、轻实践倾向,大多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论证,较少深入基层实践去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学界阐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与特征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些特点和优势的“应然”与“实然”之间是否统一仍待印证。因此,如何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丰富的制度化实践经验及其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尤其是对新时代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践中的创新探索进行经验总结,并上升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仍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但以何种形式出现、以何种方式运行,在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探索。与时代的脉搏互动,与时代的主题呼应,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踏上新征程的基础。当前中国正处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时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政党政治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会被放大。为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挑战、风险、阻力和矛盾提供学理支撑,是当前该研究领域的紧要任务。我们要自觉树立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加强政策文本的挖掘,从中汲取养分,也要立足于实践,关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学理分析,剖析这一制度运行过程中尚不完善的地方,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与改进措施。

参考文献:

- [1]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 [J]. 科学学研究, 2015 (2): 242-253.
- [2] 郭尚华. 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思考 [J].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综合版), 1991 (3): 115-117.
- [3] 周秋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 [J]. 民主, 1999 (3): 14-16.
- [4]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N]. 人民日报, 2018-03-05 (1).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293.
-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75-276.

何旗,王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主题脉络与进路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61-178.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5.
- [8] 王崇德.期刊作者的量化研究[J].情报科学,1998(6):471-475.
- [9] 沈君,王续琨,陈悦,等.战略坐标视角下的专利技术主题分析——以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为例[J].情报杂志,2012(11):88-94.
- [10] 吕楠.新型政党制度对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6):81-89.
- [11] 赵婷,蒋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意蕴[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20):109-111.
- [12] 王成,李珊珊.试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和合”文化意蕴[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25-133.
- [13] 梁杰皓,丁俊萍.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基础、原则和价值[J].社会主义研究,2022(4):100-106+123.
- [14] 尚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20-31.
- [15] 钟德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立发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7-17.
- [16] 周淑真.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重要体现[J].中国领导科学,2018(5):26-30.
- [17] 董树彬.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领导地位的生成逻辑[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57-66+86.
- [18] 张春满,郑鑫.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双重超越:基于主次双重范式的分析[J].学习与探索,2022(10):61-67.
- [19] 黄天柱.新型政党制度视域下的无党派人士:中国的理论与实践[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5):9-24.
- [20] 崔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概念与政党建设[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5):36-41.
- [21] 熊光清,蔡正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内涵——结构、规则 and 关系层面的分析[J].学习与探索,2021(6):1-10+195.
- [22] 蒋锐,杨森.试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演进与发展[J].理论学刊,2021(3):40-48.
- [23] 周淑真.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基于内涵要义、演进逻辑与结构关系的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7):6-13.
- [24] 李军刚.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三重维度:结构、机制和效能[J].学习与探索,2022(10):54-60.
- [25] 徐锋,高国升.正谊明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何以为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71.
- [26] 杨德山.试论新型政党制度之“新”:比较政党制度视角下的分析[J].教学与研究,2019(3):38-46.
- [27] 高立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政党政治三大命题的回应[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3):83-91.
- [28] 龚少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制度的双重超越及其类型学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7):106-115+164.
- [29] 方雷,崔哲.政治过程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3-91.
- [30] 魏晓文,秦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研究[J].理论导刊,2021(1):51-57.

- [31] 许奕锋. 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效能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 (4): 1-6.
- [32] 臧秀玲, 刘华超.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意蕴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0 (3): 116-124.
- [33] 王萌, 柏维春.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机理分析 [J]. 行政论坛, 2021 (5): 30-36.
- [34] 齐卫平, 柴奕.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优势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 11-18+184.
- [35] 虞崇胜. 亟待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 [J].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8 (5): 29-31.
- [36] 杨松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构建的四重维度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 (5): 42-47.
- [37] 孙林. 制度学习与变革: 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突破 [J]. 科学社会主义, 2021 (6): 81-89.
- [38] 赵云. 构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增强政党制度自信 [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 (4): 70-77.
- [39] 华正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模式转换与经验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6): 21-30.
- [40] 臧秀玲.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内涵与提升路径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 (4): 122-131.
- [41] 徐凤月, 孙壮. 新中国 70 年新型政党制度的演化逻辑与前景展望 [J]. 江淮论坛, 2019 (5): 13-19.
- [42] 孙文飞, 王立峰. 中国共产党探索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经验与新的实践要求 [J]. 理论导刊, 2022 (7): 15-21.
- [43] 蔡宇宏. 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 (2): 16-23.
- [44] 刘家强. 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识和理解 [J]. 红旗文稿, 2021 (16): 4-8+1.
- [45] 罗峰. 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及其发挥——人民政协视角的分析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0 (1): 177-184.
- [46] 林华山. 多维互嵌: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功能 [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6): 32-41.

责任编辑: 刘涓菡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x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3年第2期 总第38期 第7卷

双月刊 2023年3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何晓栋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微信公众号

定价：20.00 元